

目 录

出版说明

储安平与“党天下”	戴 晴 (1)
评国共两党	储安平 (121)
一、一场烂污	(123)
二、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126)
政论选辑	储安平 (129)
一、失败的统治	(131)
二、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	(136)
三、论上海民乱	(146)
四、中国的政局	(152)
五、大局浮动 学潮如火	(168)
六、学生扯起义旗 历史正在创造	(174)
七、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 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	(180)
八、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 态度	(185)
九、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	(190)

十、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全国专科以上 学校不得准其入学之不妥	(199)
十一、国大评论	(205)
十二、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	(217)
十三、评翁文灏内阁	(223)
十四、政治失常	(229)
十五、施用闷药前后的心理与感觉	(234)
办刊志趣与甘苦 储安平	(245)
一、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247)
二、辛勤 忍耐 向前 ——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	(252)
三、艰难 风险 沉着 ——本刊第二卷报告书.....	(267)
四、风浪 熬炼 撑住 ——“观察”第三卷报告书.....	(281)
五、政府利刃 指向“观察”	(297)
六、吃重 苦斗 尽心 ——“观察”第四卷报告书.....	(302)

储安平与“党天下”

戴 晴

储安平与“党天下”

一个聪明的君王，遇到如果守信就要违反自己的利益，遇到束缚他的守信的理由已不再存在之时，他便应该不守信……君王为了自己的不守信，总不会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藉口的。

——马基维里：《帝王术》

毛主席及许多中共领袖先生的阔大深厚、人民解放军的严明坚强、中共同志的刻苦耐劳，使中国人民倾心折服、一致景从。

——摘自本文男主人公 1949 年手记

【帽子】(mào zi)①戴在头上保暖、防雨、遮日光或作装饰的用品：一顶～。②比喻罪名或坏名义：不必用～压人|批评应该切合实际、有内容，不要光扣大～。

——《现代汉语字典》

帽子这字眼，如果不考虑它的第一个含义，在中国近现代

(可能也只在中国近现代)以来最风光的一次,要算是 1978 年了。那年,从春天到秋天,至少有 2 则关于帽子的文字,扰动了中国(恐怕还不只中国)上百万人的心。它们是:

《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1978 年 4 月 5 日;统战部上报,中共中央批复。

《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8 年 9 月 7 日。

半年之后,1980 年 5 月 8 日,55 万余顶右派帽子已全部摘去——它们是在 1957 年夏天和以后的几个月里被陆续制作出并扣在别人头上的。如果不考虑其中一部分人已在 1959—1964 年间陆续获摘,到了 1980 年,真正以皮肉俱全的头顶享受到大自然的空气与阳光,并且还享受到那帽子压出的凹痕已不再被人视为种性标记的快乐的,只剩下 10 余万了。

帽子已不复存在,对当初“戴帽”这一动作的必要性仍有说道。也就是说,在经过了复查核实、推敲议论、左右上下平衡之后,终于匀出一类“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人。从中央一级而言,他们是最后筛出的 27 名“上层爱国人士”中的 5 名;如果再加上地方上的 90 多名,占原戴帽者的 0.00018,即不足万分之二,以此来支持“1957 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了”这一论断。

这中央级的五名“不予改正”者是:

章伯钧,当年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中央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罗隆基,当年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彭文应 法学家，曾留学美国威斯康辛的哥伦比亚大学，继而返国在上海法学院等校任教，上海市民盟盟员。笔者至今也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彭先生这种没什么言论，也算不得“要角儿”的人也被排在不予改正之列。

储安平 当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辑。

陈仁炳 当年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分部长。

他们当中，19世纪末出生的“章伯钧同志”骨灰已于1982年深秋郑重地移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比他年轻3岁的“罗隆基同志”虽然逝于69岁，却在他90岁冥寿时享受到了一个由公家出面主办、且专为缅怀他一人而开的纪念会；“朴素谦和”的彭文应是戴着帽子辞世的，那是1962年，陈仁炳目下居住在上海。

储安平呢？

据传在八十年代初的一次宣传口的会议上，乔木谈到新闻工作目下有点青黄不接。他问：为什么不能把有经验的老同志请出来当顾问，比方说储安平先生？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有人递上一张纸条。乔木看过之后轻轻地“哦”了一声。

条子上写了些什么，今天只能推断而无从查考。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另一段话，一段康生在1969年就说过的话：“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他突然消失了，在1966年深秋的一个黑夜。住在隔壁的一个妇人说她听见了厮打声与呼救声，但一个男人——想必是她的丈夫或兄弟——立刻向她喝道：“就你能！谁都听不见就你听得见？！”

他消失了。或许在第二天，他曾与他学农的女儿照过一

面？那是她按照几天前他所在的九三学社的通知到机关去看他的时候。从北郊进城，她先回了一趟家——门虚掩着，爸爸不在，家里的东西已荡然无存，只在屋子中间的一把破椅子上，扔着一个破行李卷。她那时并不知道，这正是几天前由弟弟送到机关而为病弱的父亲自己扛回来的。满地撒的都是花手帕，那是她小时候一条条精心攒在盒子里的。她没敢在自己家多停留，一心想到机关去看爸爸。路过什刹海，她看见一部卡车，一群人围着，正把一具具从湖里捞上来的尸首往上扔……

他消失了，在他 58 岁的时候，距今已 22 年。

已经出版的各种辞书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载，要不是 1980 年的那份文件，今天的青年，哪怕是研究新闻与现代史的青年学者，都已经不大知道这个很有生气地活过一阵子的人了。不错，他是“大右派（不予改正）”，同时也是小说集《说谎集》，杂文集《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和特写集《新疆纪行》等书籍的著者。他曾在南京戏专，湖南国立师专，重庆及上海的复旦大学教过书，还主编过《中央日报》副刊，《观察》周刊和《光明日报》。对于统治了中国 20 年的国民党（截至 1948 年）和 8 年的共产党（截至 1957 年），他分别下过两句评语，

前者是——“一场烂污”；

后者是——“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他倏地消失了，没有通电、宣言，也没有给生活在这与他有关与无关的人群的世间留只言片句。只有这两句话，带着一个读书人全部的失望与厌憎，泥巴一般地甩在历史的记录簿上。

二

【社会主义阵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联盟。继苏联、蒙古之后，战后在东欧和亚洲又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为了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互助合作，曾经一度形成一个阵营。从50年代后期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严重分歧，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常关系，社会主义阵营便不复存在。

——《社会主义名词辞典》

这“不复存在”实际上是对现实情况的认可。因为并没有哪一个声明宣布它的开端，也没有哪个决议宣告这一结束。

如果细细考察囫圇个的“阵营”如何象宋哥百极碎一般出现一条条裂，首先引起注意的第一条，当是1948年被开除出9国共产党情报局的南斯拉夫。到了这爆裂之声不绝于耳时，已经是极不平凡的1956年了。

第一个大动静是苏共20次代表大会和勇敢的改革家赫鲁晓夫的那篇简直没有什么理论性可言却极具震撼力的报告。斯大林的神坛崩塌了，人们于是开始有了自己思索的可能性。虽然目前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正在为消除对铁托的个人崇拜而努力，但当时在“阵营”之内，对这一行为看得最为透彻的，显然是这位游击队员出身的元帅。在他的《普拉演讲》中，铁托谴责的不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虽然他

与这个“暴君”有过多次激烈的正面冲突^①。铁托认为对人的褒贬无论如何总是第二位的。赫鲁晓夫的最大不足之处，是把“整个事情当作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不是当作一个制度问题”。他认为现象“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而不是“由于斯大林老了，他开始有点愚蠢起来，犯了各种错误”。至于比较直接的根源，铁托指出的是：“官僚主义组织机构，领导方法与一长制，还有忽视劳动群众的作用与愿望”。

没过多久，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上街了。如果这里暂且不谈后来其他政治力量的介入从而对这一单纯的行为所加以利用的话——目前，对此在观点，甚至对当时的事实认定上还有很大争议——事情可能正如原英共党员，英《工人日报》记者，匈牙利事件的目睹者彼得·弗莱雅所说，在革命胜利了10年之后——

大多数匈牙利人是不要资本家或地主们回来的。但是今天，他们却理当地厌恶了那个贫穷，枯燥与恐怖的制度，厌恶了人家以共产主义名义送给他们的这个制度。此一情形的全部责任应该放在共产党领袖们的肩上，特别要让拉科西，法卡斯与吉罗来负，他们曾经答应给人以一个地上天国，而结果真正给人的却是一个与战前霍尔第海军上将法西斯专政同样压迫，同样值得非难的警察国家。工人们受剥削，威吓和欺骗。农民们也受剥削，威吓与欺骗。说

^① 斯大林逝世后，在他书桌的抽屉底层，发现一封铁托给他的信。信中写道：“亲爱的斯大林，请不要再派特务到南斯拉夫来暗杀我了。我已经把你派来干这件事的7个人都抓起来了。如果你不停止，那么我将不得不派遣我的人到莫斯科去。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将不必再派第二个人。”

出自己的心里话,提出一个为谁的问题,甚至于谈论政治问题时如果不用安全的,习见的,单调的废话来加以掩饰,就有被那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抓去的危险。这一个糜费了巨额国币来维持的机构,其目的原来是保护人民,使资本主义不能复辟;而事实上,它却保护了少数寡头们的权力。为达此一目的,秘密警察应用了最惊人的方法,其中包括新闻检查,思想管制,监禁,酷刑与谋杀。其所以成为悲剧者,乃在于如此这般的制度却说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说成为“人民民主”,说成为走向共产主义去的第一步。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承认在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了破坏”,另一方面也最坚决地强调这两次事件的反革命性质:

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至在 1956 年 10 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

应该说,对这两方面,毛泽东的估计及预先采取的措施都远在他的欧洲同道之上。只看建国初,即史家所谓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一直不曾停顿过的全国性整肃:

- | | |
|------------|--------------------------------|
| 1950 年 5 月 | 共产党整风,整肃“打天下”的干部居功自傲,官僚主义与腐化堕落 |
| 10 月 | 镇压反革命 |
| 1951 年 5 月 | 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 |
| 11 月 |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
| 12 月 | 三反 整肃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 |

1952年1月	五反 整肃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
1954年2月	揭发并制止了高、饶反党阴谋
10月	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梁思成的建筑思想，批判历史学家尚钺，改组《文艺报》
12月	批判胡适思想
1955年2月	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
下半年	肃清国家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从这里可以看出的是，起码在那时，毛泽东与铁托的见解就是大相径庭的。毛泽东一方面十分注意执政党党员的个人品德——他对居功自傲、觊觎高位、贪污枉法等农民起义领袖们最常见的毛病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则绝不容许思想异端，哪怕离政治很远很远并且非常专业化的独立思想的存在，就比如俞平伯先生之不赞成新版的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

那时，没有人深究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于数亿人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的阶段以至体制——或称制度，这在英语世界里本是一个词 system——的领悟，直到二、三十年后才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出现。当时，对待人民，特别是人民之中涌动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倾向：对私产的珍视、对个人创造力的尊敬、对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捍卫意识等等，采用的办法有点类似鲶的治水——堵。而眼见堵不成的时候，就发生我们下面要讲的故事了。

应该说，在苏共 20 次代表大会及波、匈事件面前，中国共产党表现得比他的任何“兄弟”都镇定与从容。因为这个政权的班底并不是如匈牙利拉科西班牙子那样由斯大林一手扶植起来的，恰恰相反，她是在斗掉了斯氏的传声筒，并与这名专制

者本人经过一场场又执拗，又瞻前顾后且极具分寸的较量之后，自己立住的。

另一方面，在中国，类似匈牙利事件中的“帝国主义者和在他们指使下的匈牙利内外的反革命分子”，不但其肉身早已被处决或关押，与他们有着血统、情谊、包括思想联系的人，也都相应被扣了金盅、上了紧箍或吓破了胆。当然更彻底的是灵魂出壳——或曰脱胎换骨、曰革心洗面——的完成，恰如丁玲女士在延安整风结束时极形象的描述：

开始有点恍然大悟，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就象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到自己的躯壳随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惧的感觉……

但毛泽东显然不是沉湎于表面升平景象的小角色。他完全超出了马基维里对古代帝王们所作的种种结论。马氏断言：

对百姓对他怀有敬意之时，君王不必担心阴谋；但当百姓们对他表示敌对，而且怀有仇恨时，他就应当害怕一切事、害怕一切人。

事实上，在1956年，中国大陆并没有一份报纸或者一次演讲对当政者是怀有些微的不敬的（还不要说仇恨）。但毛泽东具有的，显然不是常人的禀赋，只消望一眼微风拂动的树叶，他老人家就平抑不住对暴风雨的预感。更何况，那时在党内党外，特别在一批不明就里、一味将革命神圣化与理想化的青年中，一种不肯俯首贴耳，不时地总想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见解的倾向，正不断地冒出头来。

1956年秋，河北正定地质学校的学生与“主观武断专横、厌恶一切反对意见的人”的白司长冲突起来。中国青年报整版

报道并发社论；

文学界，就在沈从文已万念俱灰，而老舍和巴金正不知怎么写才能跟上气势磅礴的新社会的时候，一股带着清新气息的风从北方吹来。苏联新小说《在区里的日子》、《拖拉机站站站长与总农艺师》令“完全是自己培养出来”，不但满怀第一种忠诚，间或也怀有一些第二种忠诚的党员作家们欣喜不已。《在桥梁工地上》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于是出笼。

标志王蒙创作水准的，当然是1986年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了。但如果我们回到50年代，将这位作者的开笔之作《小豆子》与1956年那篇受到来自相当一级的压力与批评的作品作一个比较，就会看出，逐渐成熟、并且对新生的共和国抱有切切之情的文学家们，正要冲破那只有纯朴的蒙昧才感到自在的一味歌颂的樊篱，向着直面生活并且热烈地干预生活转化。

接着，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成了报面上的闻人。其实，保卫、照顾要人，让他们舒服、惬意、前前后后不可乱了章程，在左叶一类人看来，是高于一切的。记者以及记者背后的公众，算得了什么呢？“态度粗暴”也好、“破口大骂”也好，本是天经地义，不粗暴不骂倒是奇迹了。不幸的是在1956年，记者们还没有、或者说还不曾牢固地与这批侍卫们共识，难免挣扎了几下，终于实打实地被抓住，对左叶的驳诘（这种文字今天是极难见报了。对黑龙江森林大火报道是一个难得的例外）成了货真价实的“向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进攻”。

今天，相当一部分记者把自己的饭碗看得比莫衷一是的“新闻尊严”重得多了。或者换一种说法，他们早已练就一套本领，或侧着身、或闭着眼，或者低头缩颈，总之想方设法不使二

者发生碰撞。而在当时，彭子冈们对此要么不懂，要么不屑。由她执笔的社论直截点到“尊重新闻记者”，喊出了即使在热切呼唤新闻改革的今天，也没有哪家报纸会公开印出的话语：

鄙视新闻记者在我们国家是有传统的，遗憾的只是这个衣钵竟传到如今。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

如果再加上当时电影界的一番热闹^①，这种种，都使毛泽东下决心必得有点举措，使得看起来在新政权下浅表的平静变成对她彻底的、遍布在各个层面上的、从内里到外表的深沉的折服。否则，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将永远处在愿望不曾实现的不宁之中，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睡不安稳”。也就是说，他要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每个中国人都要象雷锋、象王铁人一样，对新政权加上他本人无条件地忠诚与热爱，不管他是年轻的村姑，还是留洋的教授；也不管他是持枪的士兵，还是打坐的和尚。至于被分掉土地的富农和被赎买了产业的资本家，再加上他们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代理人”，就算作不到心悦诚服，也要放老实点。

当时确是一片欢欣与繁荣。笔者清楚记得的是，北京东单体育场外墙上的标语，既不是“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也不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甚至连“行人车辆遵守交通规则”都不是。上面赫然写的，是“姑娘们，打扮起来吧！”随后推

^① 1956年11月、上海文化界在文汇报上开展讨论：“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这样少？”影评家钟惦棐在北京文艺报上撰文《电影的锣鼓》、《为了前进》，认为“工农兵电影”的提法忽视民族传统，且行政干涉过多。后来，这场讨论被定为“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开辟道路”。

出的新剧目是《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全台男女粉白黛绿，口里念着“只应天上有”的台词。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这繁荣到底能维持多久，有没有人躲在暗处咬牙切齿或是磨刀霍霍呢？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在这前后提出的。其实，只要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在一个国度中有切实的保障，本不必再用华美的诗一般的语言对它的必然结果加以特别的描述。但在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情形似乎特别些。从今天所获得的材料看。这口号的形成不是集体讨论的结果，而是毛泽东本人一步步思索、提炼最后极有耐心地说服人接受的。请看黎澍的回忆：

我大约是在1953年或1952年就获知毛泽东主张对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取“百家争鸣”的办法来解决。当时由中宣部出面约请历史学家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个人合作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历史概要》的小册子，准备提供给苏联大百科全书备用。书稿交来以后，请示毛主席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诸如古史分期问题等等。毛回答说：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后来没有专就此事开过讨论会，而是根据毛的意见裁决的）。不久，又传来毛的指示说：“中国历史很长，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研究所，把中国史分作三段来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于汉；第二所研究魏晋到鸦片战争前；第三所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三个历史研究所合办一个杂志，定名为《历史研究》，方针是百家争鸣。”我当时认为“百家争鸣”是指古代史而言，并不感到惊异，因为古史去今已远，随便发表什么意见，

与现实无关。1955年9月或10月，陆定一向毛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回答说：“百家争鸣。”而且他反对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我当时怀疑我听错了，反问说：“党史也百家争鸣吗？”陆说：“是的。”语气非常肯定。当时参加谈话的只有我和田家英二人。田问了些情况，没有提其他问题，似乎已有所闻。

到这时为止，这两句话还没有并提，将它们联缀在一起，成为今天每个干部学人都能朗朗上口，或按汉语独特的缩词方式，简称“双百”的，是陈伯达。据陆定一回忆，某天夜晚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讨论，有毛泽东，陈伯达等。当时没有人记录。它的正式出现是在四月底。据黎澍回忆：

此后毛泽东本人在1956年4月25日和28日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我看这应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1956年5月2日毛又在最高国务会议谈到这个方针。最高国务会议有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参加，因此是第一次公开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对待艺术和科学问题的方针。毛的态度使陆定一感到鼓舞。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学术文化界一千多人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方针。他在这个报告中特别谈到党史问题，说：“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编出一本党史教科书来，然后根据党史教科书来写各种近代史。现在请你们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党史教科书，

只准备陆续出版党的大事记和文件汇编。……在近代史研究中,也应该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不应该采取别的政策。”

这里,黎澍没有提到陆定一的另一段话,那段使所有的与会者直到30年后还难以忘怀的代表党的许诺。在郑重地向俞平伯先生表示道歉之后,陆定一宣布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陆甚至明确提出,还有“宣传唯心论的自由”。

从陆定一后来的一系列举动中,包括在葬礼上向浦熙修郑重致歉及后来以80岁的高龄在党的最高层会议上为“自由”所作的辩护,可以推断,在他当年甚至直到如今都是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提出“双百”的诚意的。

但当时党内的反应,如果不说冷淡,至少也是观望的。之所以取这样的态度,就算不是因为对1952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别具心得的回忆,起码对毛泽东在局面纷复的1956年所表现出的泱泱大党的情怀,还不大吃得透。

再看黎澍的回忆:

6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个报告。人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感觉政策难以掌握适当。《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4人联名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表现了这样一种忧虑。实际上,《人民日报》的同志也感觉这个方针的宣传没有把握,不知怎么办好……毛的坚决态度和人们的观望不前适成对比,人们愈是观望、他愈是坚决。

从1956年4月底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到1957年初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再到后来的最高国务会议，直到3月上旬的宣传工作会议，几乎整整一年，毛泽东一次次地作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一个长期性的方针”；“我们许多干部中间，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这个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的。是不是我的话讲过了？我说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不赞成，或者半赞成，或者不甚通，真正通了的，真正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是少数。所以很需要做工作，做说服工作。”……

这前后，与正面阐扬这个口号相辅，有几件事情更令人惊异：在中共党内，历来不成文的规矩，“左”总是很吃香的。无论任何事，你只要一味“左”下去，或出于无知或出于狡狴，无一一帆风顺。而这时，毛泽东却对一连串的非“左”行为支持起来了。如说钟惦棐在电影界“作了一好事，引起许多人发表文章，揭露电影事业中的错误缺点，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电影局开门不够。我们管电影事业的人，必须要注意，他们揭露的那些坏事，统统应该加以改正”。

对于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义的一面，我看他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他暴露了我们的缺点，不能用李希凡那样的批评。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我们党的威望高，靠党的威望、官僚主义就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是不是应该揭发？”

对于陈其通等四人相当勇敢并且理直气壮地为维护党而

对“双百”提出质疑的文章，毛泽东先是调侃他们：“忧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乱”，继而明确说：“我不赞成那篇文章，那篇文章是错误的，方针不对，方法也不对。”“他们的方针是反中央的方针，用的是压的方法，不能说服人。”对于既老成、又机智；既能坚持党性原则、又能与党外人士交朋友；一直有党内英才之称，但此时也已莫衷一是的邓拓所主持的《人民日报》，则一再点名批评：“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宣传，从陈其通的文章，最高国务会议之后，《人民日报》无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你不要把着茅坑不拉屎。”

……

真是前所未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黎澍回忆：

当时(中国)在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取得的出人意料的进展使他对意识形态的解决充满信心。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合作化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工商业改造消灭了资产阶级，可以说，所有私有制社会的各阶级在一个短短的时间里全消灭了。天下事如此易易，其令人踌躇满志，自不待言。早几年讲百家争鸣，因为是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无关宏旨；后来眼看阶级消灭了，区区学术问题固然不算什么，就是其他一些问题也不在话下，可以百家争鸣。所以贯彻这个方针的态度越来越坚决。毛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题目就叫《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意义就是阶级消灭了，阶级对抗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就行

了。这个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几个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果然起了鼓舞作用。

历来一直到今天一的教科书都将这部在 1957 年 6 月 19 日反右斗争要害关头发表的作品视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这一评价由康生打头，随后为全党全民所接受。细究起来，它与现代科学精神其实颇多相悖之处。别的不说，只看它所表现出的随意性：什么叫“对抗”而什么叫“非对抗”性矛盾？什么叫“敌”什么叫“我”？什么叫“鲜花”什么叫“毒草”？什么叫处理“当”了而什么叫“不当”？什么叫“共存”与“监督”，特别是这“存”，究竟指肉体的存还是精神与意志的存？什么叫“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以及它“结束”还是“没结束”？……要知道，对规矩着人们行为的法的语言要求的是准确而不是涵义丰富、富于想象。中国的实践证明，这部作品不是法，却明显地高于法。公民们在怀着崇敬之心学习又学习之余，既搞不清周围是怎样一个世界，也搞不清自己在其中的地位，更不知道本来是响应号召的行为会不会招致杀身之祸。

但当时有幸听到产生这篇文章的那个讲话的录音的人，还清楚记得毛泽东那机智、透辟、通今博古、不带一点八股气的风格，以及马寅初、刘少奇等人当场无拘无束的插话。他们感受到的是“和煦的春风”般欢愉与温暖。直到 1957 年 6 月 19 日，当这个讲话以文章的形式正式发表时，这种温馨还没有从这批当代中国文化精英们心头消失殆尽，虽然他们发现当时在录音里明明听得清清楚楚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是毛毛雨下个不停。”这种话已经不见，代之以并没有讲过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

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黎澍对当时的描述是:

人们目瞪口呆。毛本人也难于自圆其说。正式文本虽然经反复修改,也还是不免自相矛盾。

但这一切,在1957年3月间,几乎还没有人能看透,也没有人能对它作个清晰的估评,更不要说对后来局势的发展有一个哪怕轮廓模糊的推测。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不能,曾彦修、沙文汉、陈其通不能;即便是陆定一、李维汉、邓拓也未必能。康生也许行,因为在那时,他突然不再养病了,活泼泼地,精神焕发地介入到几乎每一个具体步骤中。

最可怜的是那一整批饱学深思之士。他们在过去苦难的年代极难得地受到了完备的现代教育,诚心诚意的拥护新政权,1950—1955年所闻所见本已使他们决心三缄其口,这时又极可悲地被激发起来。在给儿子的家信中,傅雷,这位纯洁的、理性的、一丝不苟的而且除了译好书之外绝对别无他图的翻译家热情洋溢地写道:“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既然他老人家说了“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傅雷决定“本着毛主席的精神,和风细雨,治病救人”,与党“完全善意地互相批评,改善关系,同心一致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历史已经证明这“善意”并不是相互的,翻译家文质彬彬的建议无例外地被划入“猖狂进攻”一路。他熬过了“戴帽子”的50年代末,却没有胆子再熬揪头发打耳光的60年代中了。他与他贤惠的妻共同赴死,不为别的,只为尊严。

4月27日，正式指示发出，在全党进行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建国7年来第12场政治运动开始了。

党号召大家讲话，号召鸣放，号召大鸣大放，号召——用15天之后的语言——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一场大“阳谋”开始了。

三

【个人英雄主义】 gè rén yīng xióng zhǔ yì 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好出风头、逞能干。不肯虚心向广大群众学习，企图在革命事业中把自己造成“英雄”，为了满足这种欲望，甚至损害革命和集体利益。

——《现代汉语辞典》

1909年，储安平出生在宜兴乡间。

问及他的老友，大都有一个印象：“孤儿、幼时很苦”，并不象他自己后来在斗他的大会上所交待的“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就过着剥削的生活，一向轻视劳动人民”。其实这两说都有道理。在19世纪中叶，储家或许可称作大富：在宜兴那种地方，他的祖父拥有千亩土地。这老人有三个儿子，储安平的父亲行二，分家时得了300亩田。这位先生开头可能相当热衷功名，曾北上做过一任不大不小的京官，后来不知为什么，官做不下去，人也做不下去了。他开始花天酒地打发日子。储安平出生仅数月母亲即过世，抚养他的是祖母。当父亲续弦，旋

即又出去花天酒地时，少年储安平面对的，只有那位带着一个小女儿，并怀着一腔幽怨的继母了。

“祖母过世以后，不知她们母女吃什么，我单独吃饭，一块腐乳吃三、四天。过年过节给一点肉酱，也是一吃几天。”储安平对他的妻子这样回忆过。

他很小就离开家了。高中是靠伯父的资助在南京读的。就在他 17~19 岁的这段时间，功课之余，开始化名写小说。他的作品在《申报》上连载，拿到 200 元稿筹。用这笔钱，储安平只身到上海，报考光华大学。他的小说后来集成一册出版了，名为《说谎集》。这本出自少年人之手的小说集今天在北京图书馆被归为“蓝参”，即只有持有身份证明的读者方可阅读的一类书。

他在光华读的是新闻系，从 1928—1932。这段时间，正是新月派的一批博学、散淡，且极具自由与浪漫气质的教授们集于上海，并活跃于课堂上与课堂下的时候。当然，按照新编《辞海》1980 年版，新月派是“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为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服务；在文字上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储安平当时对此肯定无所察觉，他甚至很不象个新月派，因为他一点不具诗人气质，而且对此也颇自知。在他数十万字的遗文中，没有一首诗。而这是每个中国文人，包括没有仗可打的将帅们，全都随大流顺手弄弄的玩意儿。胡适与徐志摩等人对他最大的影响是对欧美文明的倾心，特别是那种以实证为根基的明晰的思维与精确的行动。

留学成了他日夜萦怀于心的梦——其热切程度恐怕不在今天数以十万计星夜排队等着取“托福”表格的青年之下。或

许缘于凄凉的童年生活的阴影，他渴望出人头地，而不留学则绝无出头的一日——以后我们会看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他的这一判断是多么背时，多么贻害于己。他不是衣食无虞的阔少，想留洋，要靠自己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攒钱。这愿望，直到他娶妻生子之后才实现——这是后话。

在大学里，他没有停止写作，但投稿的方向，已经由申报转向大公报。青春骚动期过去之后，他即不再写小说。大学尚未毕业，他观注的热点已转向政局。21岁，他为新月书店编了一本政论小书：《中国问题与各家论见》，薄薄的一册，约十多万字，收入胡愈之、陈独秀、罗隆基、汪精卫、王造时、梁漱溟等20多位学界名流各执一词的政论，他自己则坦然为之作序并书写扉页题辞。

拿到这份资料时，笔者的惊诧是可想而知的——不在书法，储安平字写得如何从来不曾被人提起过。当然看见这几个字很难让你不想起今日北京大学学生虫子爬出般的大字报。今天，35岁还被为“青年作家”、60岁还属“中青年学者”，何为韶光、何为莫年，恐怕常常出现在梦里而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作为中吧！娇儿已经绕膝，习惯了的还是“接受”、“领会”和一切小字辈的唯唯。题辞作序是德高望重者的事，当然当官职大到老先生们在他进门时也不得不站起来笑着点头等候握手者也有，但在这般年纪而有如此气势与号召力的，在中国恐怕只有靠他令尊坐着的那把交椅了。今日大学生，就算已经不是21岁，而22、23、24岁，若想赚点零花钱，对不起，在校园里摆摊卖茶叶蛋吧。

请看这位30年代学子的口气：

编这本小书的用意，在于使每一个人，能从这一

集子里,知道目下中国一般人他们所主张的是什么,他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并且,政府当局能否满足一般国民所要求的,能否尊重一般国民所主张的?……一般小百姓在哑着喉咙喊取消一党专政,少数在野元老或政客在通电主张国事公诸国人,若干在朝要人也说“我们赞成取消一党专政”,“我们正在取消一党专政”,然而言论不自由如故,集会不自由如故,民众运动之被压迫也如故……一国家民气的盛衰,外交政策、治国政纲等等在有形无形中,全见到政府的生存根据。这集子的编印,正给国民对政府的功效检督查本,同时也给政权当道以俯察民意的一份参考。

这篇序写于10月,11月就出版了——这种速度今天在中国恐怕也只有“在朝要人”可享有——而徐志摩的迁难恰在那年10月。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徐志摩去世后,新月派由热衷政治的罗隆基接手,“至使它原有的文学艺术意味,几乎全为政治气氛所笼罩所淹没”。由此推测,这本书应是在罗隆基的主持下出版的了。我们在后边将会看到,对于出版他的第一本书的这位“盟主”,储安平并未视为终生恩师——虽然他们的名字自57年就被绑到一起,直到今天。

毕业之后,储安平养病一年。以他经济之窘迫与求学心之迫切,这似乎有点费解,但也足见幼时营养缺乏之结果。储安平一生都不曾有过健康充沛的体质。他个子长大,或许因为用得太过,总是处于“透支”状态。以他撰写《英国采风录》为例,这本10万字的书,居然完成于“自长沙失守至桂林沦陷这几个月近乎逃难的生活之中”。他不安于作难民,“将整天的精力,化费在日常的饮食琐事之上”。“在那种混乱、困顿、几乎无

所依归的生活中，有时竟不能不做一点较为正常的工作，维持一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纪律”。这样的用语是很奇特的，可见工作于他绝不是徐志摩式的“想飞”，也不是达尔文式的着迷，而是一种近乎严苛的约束。这很可能来自他少时乡居生活的清苦刻板，也许是英国式的公道(Fairplay)和直道(Justice)的崇信，坚信“有能力有抱负的人，不须气短，只要在正道上努力奋斗，不怕不能成功”。取这种人生姿态，真使他吃够了苦头。他没有了正常的情感生活，也失去了人世间纯朴的情亲之爱，这在后面还要说到。

在职业无着的养病期间，他居然娶了一位美貌的富家少女。Lucy——储安平一生都这样称呼她，即使在他们离异之后。她是低他两班的同学，对优美的文字与情调抱着一种只有那个年龄和那种时代的女孩才有的倾心之爱。初交时，他给她写情书，投书申报时的本事和情绪又焕发了，对这些无由问世的妙文，她的妹妹们的评语是：“跟这样的人做朋友，看看信也是幸福的。”在看到她手中他的照片时，她们则惊呼：阿姊，梅兰芳送你照片呀！

他很快有了职业，在南京为《中央日报》编副刊。很难想象一个既无权势背景、又非国民党党员的穷学生能谋到这份差事。考查储安平一生之所为，他应归作苦干型而非钻营型，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当时的中央日报在文化界太没面子，急需找人撑场；而文化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但分有别的办法，是不肯到这种地方来的。作为新月派的第二代才子，储安平的资格还说过得去，加之他又急于谋职……总之，他上任了，而且颇为得意。因为一般大学毕业生只能拿到60~80元一个月，他则拿到120元。25岁的他，租了一所花园洋房：院子里能打高尔

夫球，客厅可招待 7、8 对跳舞。他开始结交权贵，请他们吃饭、陪他们打牌——他实际上很讨厌打牌，而且根本不会打，一夜就输掉一、二百，而交给太太的菜金，却是每个角又都要计较的。编副刊的同时，他还在南京戏剧学校任课，往来于曹禺、夏衍、马彦祥等左倾人士中间。

这时，已经很难想象，不过二年前，他还随着一批热血青年，准备北上投奔马占山，参加东北抗日！他们在北平被劝阻，并且就地入学了。所以，在储安平的经历中，还应有段燕大的学习生活。

但他一心向往的，还是留学。为了攒足这笔钱，他锱铢必较，Lucy 大为光火，成了夫妻间出现裂痕的原因之一。

机会终于来了。1935 年，柏林奥运会开幕。说起来真够可怜——中国那时穷得连记者都派不出。储安平捉住这个机会，提出不必拨专款，只许他无偿搭乘奥运会专列即可完成报道。他那时已有了自己的一小笔钱，还由把积蓄全部花到家乡的伯父出面，为他申请到江苏省的 2000 元官费——这就是在 1957 年屡屡被提到的“和国民党张道藩交往甚密，托张说项，得到教育厅补助”的那笔钱。奥运会一结束，他就去了英国，考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系，从学于著名的费边社员拉斯基教授。

正是从那时起；费边社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储安平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费边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用古罗马统帅费边缓进待机的办法实现社会公有。储安平 27 岁投师拉斯基门下，以一般标准衡量，恐怕只能增进知识，未必能动摇立身的观念。但看储氏后来的所思所为，确实堪称为费边民主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实现“而奋斗

终身”。他没有组党，介入党派的时间也非常后；在政界，无论当权的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几乎没有人把他看作是重要的党派成员。他热烈地主张并为之鼓吹的，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用《辞海》的话说，是“既反对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又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可以想象，这种反对，无论从1928到1948，还是1949到1968——这正是储安平从19岁到57岁的40年间——总是令当权者（特别当这当权者又颇具专制倾向时）恼火的，所以第三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几乎从国共双方所编的史书中消失了。他们的为后人所识，只为他们的个人身份：哲学家、律师、记者等等，而他们的政治主张简直就如一茎小海草，完全淹没在中国农民意识的大洋之中。

1938年，储安平归国，在英国耽了不足4年。这期间，他担任中央日报驻欧洲记者，只具名义，不支薪水，但发回来的稿，发表后所得稿酬，则由中央日报兑成英镑汇去。可能因为学业太重，也可能顾忌派驻记者的身份，储安平没有打工。开源之路既绝，只有节流一法。据他自己描述：“在爱丁堡时，虽不敢自谓中国最穷苦的留学生，但至少可以列入第一等的穷留学生名单中。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每月食宿零用，仅费4磅，合当时国币约为65元左右，而庚款留学生的费用是每月24磅。”他如何节衣缩食呢——“那时，因脚爪之价值较猪肉为廉，几日日吃猪脚爪烧白菜”。因“脚爪无甚营养价值，久吃之后，健康不支，才改食干酪”。

Lucy第二年也去了。两个南京生的儿子，一个3岁、一个1岁，丢给了外祖母与祖母。除了中央日报，他还想方设法给别家投稿，这也颇不易。直到1957年，“章罗联盟”说提出，在

交待与该盟的关系时，他在英国的这段东拼西凑的日子才得以披露：

大约在 1937 年春天，那时我正在伦敦读书，罗隆基担任北京晨报的社长（在宋哲元时代），他托人要我给北京晨报写欧洲通讯。我是积了 3 年稿费才到英国读书的。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生活很苦，所以愿意写些稿子，得些稿费来支持自己读书。当时我给北京晨报写了四、五篇通讯，但是始终没有收到罗隆基的复信，也没收到一分稿费。在当时我那样困苦的情况下，罗先生这样做人，是伤害了我的感情的。但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提过。这是我后来同罗隆基不大来往的一个原因。

抗日战争爆发，储安平学业未卒，即提前回来了。当时，《大公报》曾有延聘之意，储问能不能任主笔，因为那时《中央日报》是请他以这一资格出台的。未能遂愿，经比较，他还是回到了中央日报，任主笔兼国际版的编辑。

这阶段，他在事业与家庭两方面都不大愉快。中央日报主笔是要奉命写作的，这与他一贯的主张抵触得厉害；而有钱有势的社长对他的妻子仍有觊觎之心，这种在当年官场常常被用作进身之阶的局面，令储安平不堪忍受。他终于辞掉了这个“肥差”，经当时国民党宣传部次长张道藩介绍，到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一年之后，这研究员也做不下去了，因为照张的意思，若续聘，必须同时接下两份聘书，一为研究员；另一份是一纸国民党特别党员（即无候补期者）的入党志愿书。他回绝了。不能说他在那时对国民党就已经有了写《一场烂污》时的认识；也不能说他对官场已全面憎恶——直到 1948

年，他与在政府中身居要职的老同学如沈昌焕等依旧有着密切的私人交谊。但他不愿厕身其中。他的直觉是：“没意思，还是超然一点好。”

就在这时，老教育家、原光华副校长廖世承出面，在湘西组建国立兰田师范学院。不少光华同学都出任教席，储安平带着妻子和新生的第三、第四两个孩子也去了。

这时已是 1941 年。我们的男主人公那年 32 岁。

不知他当初在伦敦读政治系时有没有从仕的打算，就算有，在他回来 3 年之后，在国民党官场的腐败面前恐怕已经绝了望。在兰田，他终于找到一方真正的阵地，使他的见解得以以作学问的方式无拘束地发挥。他教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给学生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英国宪法。据 Lucy 回忆，每逢周会，教授们是要轮流演讲的，轮到安平，“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拍多少次掌。”他在这里赢得了学生与校方两方面的赏识。后来为办《观察》，不仅自己全身心投入，还力劝父亲卖了地作开办金的雷柏龄，就是当年的学生。储安平务实的精神与经营的才干此时已略见端倪：在那动乱的年月，而且是湘西那种地方，他居然编起一套丛书，共 10 册，自印自装自办发行，销路还颇好。而卖书所得，他不购置田地，不存黄货，却买成成匹的布，由学生挑进挑出。

最不争气的依然是他的身体。虽然他已尽环境与财力的可能，吃饱吃好，依旧十分羸弱。校长曾在过年时，专门送给他一笔慰问金，以滋补身体。不知这是否就是 1957 年批判时屡屡提到的“国民党伪中央宣传部汇寄的一笔医药补助费”。

胜利之后，学校内迁，他回到重庆。

1945~1946 年的重庆，真是热闹非凡。如果不考虑沪宁

杭、陕甘宁、晋冀鲁豫等地军队的频繁调动与冲突，在重庆的这一方舞台上，真可说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各种思想体系、各派政治势力的一次真正平等与平心静气的大交锋。当然这平等仅指人格与观念而言。尽管这样，令后辈学人感到欣喜的是，毕竟有那么转瞬即逝的一瞬，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靠子弹而靠理性才智而发言。

上面提到过的五名“不予改正右派”中的三名，此刻正混迹其间：

章伯钧，1928年脱党的原中共党员、闽变的参加者、民盟与农工民主党领袖。那时，他正以参政员的身份飞延安商谈国事，并作为党派代表出席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老政协）。

罗隆基，著名英美派教授，国家社会党创始人、民盟创始人。他的政治主张显然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届时与中共合作亲密。当中共代表团愤然撤离重庆时，他曾与王若飞紧紧拥抱，热情洋溢地保证：“放心，一定努力干下去！”

和前两位比，储安平无论年龄还是资格都稍逊，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立场与做法。他当时在中英文化协会任秘书，这是一份闲差，储安平却是个闲不住的人，虽然他那时候刚遭婚变，正照顾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家伙。这阶段，他没有结交任何一位共产党人，也没参加任何一个民主党派——与此相反的是邓初民，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候民主党派很多，我为着推动民主运动，差不多什么民主党派都参加了。”——他们一批号称自由知识分子的费边社信徒，正幻想着持枪的双方能色霁心平地一道坐下来讨论中国的民主政体。他和梁漱溟的友谊想来就是此时开始的。虽然梁先生是实实在在地厕身其间，而安平仅仅站在一边评头品足。

他们办了一份名为《客观》的刊物，阐扬第三条道路，销得不错。今天回过头看，这很象是他们投石问路之举。他并未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押上，钱由老板出，他们只管编。

1946年初，储安平下了决心。他将刊物的中文名字稍稍动了一下，变《客观》为《观察》，突出了主动精神，英文刊名《OBSERVER》则未变。《观察》着手筹备是在1946年春天，向各种倾向，主要是自由的中间派学人公开征股。检索一下《观察》的股东名单，并不见巨富者。这些人是匀出生活费来辟一处自己说话的地方的。他们的生活其实并无保障，但他们觉得还是得说话

1946年9月1日，《观察》在上海开张。储安平的“出道”，正是从这里开始。

四

“《观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曾经起过很大毒害的一个最反动的刊物，储安平——《观察》曾是一个人民革命最狡猾、最毒辣、最凶恶的敌人。”

——摘自《光明日报》第三届总编辑1957年对本文男主人公(第四届总编辑)的批判

1948年11月24日。

那天，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完成。黄伯韬兵团遭全歼，黄本人被击毙，解放军总部正向在宿县西南黄维兵团的将军、军官与士兵们喊话；

那天，翁文灏内阁正如热锅上的蚂蚁，两天后的解散已在

预料之中。孙科继任行政院长；

那天,《观察》社内乱作一团。就在前一天,一家夜报以“观察封门”为标题发表了内政部的“永久停刊的勒令”。社内同人人都知道,这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主编储安平此时不在观察社。不仅此刻,他已经有一段日子没有在社里露面了。但他最密切的助手林元与雷柏龄都知道他还在上海,并没有随着一批批左翼文化人避到香港。他们经常接到他打来的业务指示电话,今天从这里、明天从那里。只有他找他们,他们找不到他,24日那天,他们知道他不会打电话回过来了,因为他为编辑事务,已潜入北平,而这座文化名城随即被解放军匝匝围住。

那天,是《观察》发行五卷十八期的日子。从1946年创刊起,在2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观察》已经发行了113期,印数从400份上升到10万另500份——在那种动乱的日子里,可真算得上一个奇迹。他们深知刚才提到过的那家夜报不会谎报军情,因为早在半年前,《观察》就已经处在一月一查的黄牌警示下。用今天的标准看,当年的中央政府对言论的控制是相当稀松的。具体到《观察》,虽然几乎每期都发出不利国府的激烈言论,但真正惹乱子,却是一篇接一篇要么远在中央社之先,要么与中央社唱反调的“观察特约军事记者”的前线通讯:“昌潍失守鲁局鸟瞰”、“徐汇战局的变幻”、“热河之战”、“陇东之战”……这批特约军事记者是谁,他们怎么会有本领搞到这又快又准的军事情报的?他们当中有没有共党?储安平又是怎么和他们联络上的?随着储安平的离世,或许已成为千古之谜。确切留在世间的,只有当时的最高军事统帅蒋委员长的一句话:“娘希匹,报上都登了,还打什么仗?!”

24日那天,编辑部一片忙乱。为了作者和读者的安全,再加上读者的经济利益不可受损,《观察》的员工们一面焚烧往来信件与名册,一面电告本埠的分销户直接到印刷所去提取刊物。同时,提前将外埠的分销户和直接定户的刊物付邮。笔者曾反复调查,当时有没有中共地下党员暗中领导这事?员工们那时有没有“共产主义觉悟”?和读者诸君常听到的故事相反,当时没人号召、没人约束,却没有一个离开岗位。用今天的标准看,这批人可算傻到了家:老板不在,没有人会为他们加工钱,闹不好还会把命送掉;能够解释他们的行为的只有一点——职业道德,一种中国报人的传统、一种自新闻出版业出现以来就一代代延续下来的敬业精神。直到1987年,湖北省社科院主办的《青年论坛》被勒令停刊时,年轻的社长和编辑们的所作所为,差不多就是他们前辈同人的翻版——虽然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世间曾有过一种叫做《观察》的刊物。

下午四时,林元、雷柏龄等人正忙着打最后一包《观察》,以交火车运南京,三名公差闯入,自称受警察局、社会局、警备司令部派遣,执行“勒令永久停刊”命令。勒令全文如下:

查观察周刊,言论态度,一贯反对政府,同情共匪,曾经本部予以警告处分在案。乃查该刊近竟变本加厉,继续攻击政府,讥评国军,为匪宣传,扰乱人心,实已违反动员戡乱政策,应依照总动员法第二十二条及出版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予以永久停刊处分。相应电请查照办理,饬缴原领登记证送部注销。

联想到《观察》后来被批判为“蒋介石集团的帮凶、反共反苏急先锋”,与此勒令对照一下,实在是滑稽的。

雷柏龄签字收文,然后请求允许出一期休刊号,以便对社

会、对读者有个交待——《青年论坛》也曾作过这样的请求；另一家也是 1987 年被封的《湖北画报》干脆问都不问就这样干了。一口气读下去，好不悲壮。

警备司令部的特务笑了：“休刊号，别做梦了。现在是追究编者和南京那个特约军事记者的问题。原稿呢？账簿呢？拿出来！”

在这里要对今天的读者作一个交待的是，《观察》的署名办法，与今天是大不相同的。今天我们熟悉的是，消息与通讯的记者个个署名、署真名，若是位置与字号署得不够意思，还要计较一番。但事关重大的代表一张报纸倾向的专论与言论，只署“本报评论员”，某些享有特权、专门在各报发表言论的班子，则署些一望而知是编出来的梁效、罗思鼎之类化名；若言论的作者觉得奉命之作违心违得厉害，有时也临时凑个“姜伯铭”（讲不明）之类，只有极特殊的情况才会在大块、重头的政论文前署真名，如《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这是有着特别道理的，后边还要谈到。

《观察》恰恰相反。对于专论，它在发刊词里就已言明：

本刊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实姓名的任何论文

只看下边这几篇署名政论文——它们是《观察》中最常见的——不是颇有一点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味道么：

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	张东荪
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	吴世昌
论官吏的民权	楼邦彦
论政府大捕学生	赵超构
政治力量能稳定物价	严仁庚

评最近官方抢救经济危机的办法
箭在弦上的币制改革
政府利刃，指向《观察》
至于记者，

施复亮
笄移今
储安平

《观察》特约记者的姓名，“储先生是素来不告诉任何人的。所以我们即使在社服务多时的同人，对于《观察》在南京、北平、天津、西安、汉口、成都、昆明、迪化、兰州等地的特约记者，究竟是些什么人，都弄不清楚。为了工作上的机密，我们也从来不问储先生。”（林元语）

但官方是一定要找到这个泄密的家伙的，案子后来的发展于是就很象一部惊险小说了：特务们在观察社布下了个“口袋”，把凡是去联络工作的人都捕了进去，大约捕了一百多人。在北平，储安平也不得不躲起来，一会儿在楼邦彦家，一会儿在费青家。他所指定的北京联络点——大公报驻平办事处被包围，照老规矩也作了“口袋”，联络人徐盈被软禁。北平的特务还不放心，因为依照户籍册，城里共有3个徐盈，于是那两处也布下网。碰巧第二个徐盈有一位身材高大如储安平的朋友造访，马上抓起来，还动了刑……总之，险象叠起，不必虚构，即可进入惊险小说。这案又拖了四个月，上海的林元、雷柏龄被打入真正的大牢，从提篮桥解到南京，直到“天翻地复慨而慷”的那天。至于那位重犯“南京军事特约记者”则在林、雷二位的拚死保护下待机会溜出上海。他连夜逃到香港直到上海解放才回来。在“晴朗的天空”下，他笑嘻嘻地向林元道谢。并送他一把保险剃须刀。“另一把是送给小周的！”他笑着，拍着口袋。“哪个小周？”林元问他。“周恩来呀！”他说。

遗憾的是，这段故事，《观察》社的人一直没机会讲。红旗下长大的人如笔者辈，于是只知道井冈山会师，只知道延安大生产，只知道打了绑腿的士兵睡在南京路上——拒腐蚀、永不沾。

这段历史再度与读者见面时，已换了说法。那是1957年，光明日报第三任总编辑在他的批判中抛出了这么一段：

这位主编（指储安平）在1948年8月的报告书中还说，“在最近半年，政府好几方面的高级会议（！）（惊叹号为批判者所加，下同）几次讨论到这个问题（！），政府把这个问题看得极其严重（！）”看呵！真是多么够瞧的。政府多么够有“宽容”精神了！从1947年5月开始，为了这个“可怕”的刊物，到1948年8月以前好几方面的高级会议不止一次讨论过它，可是一直到1948年12月，一直到上海危在旦夕之前，在“南京中枢”准备逃跑之前，又是这位主编远赴北京后才查封的。——这真是凑巧极了，也就这样使《观察》维持了“完整的人格”！储安平的生命庆幸保存下来了！

他于是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

《观察》到底是“第三条道路”的文艺刊物，还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某一核心组织的机关报，倒是很值得分析和考查一番的。

这实在够吓人的。幸好那时是1957而非1966，这种思路尚未全民普及，否则储安平后来就不可能有在宅中养羊之举而要坐大牢了。

那么，《观察》究竟是一份什么样的刊物呢？

先看发刊词。虽然一个人的宣言并不能代表他的全部，但这篇储安平亲拟的卷首语就是今天读起来还能感到它的冲击力——不仅对旧营垒，还对了荼毒中国人的旧传统与旧文化。读到这里，恐怕不少读者准备着逃跑了，因为近年来向旧传统旧文化冲击的文章是那么多，又是那么大和那么空，真让人吃不消。还好储氏的文章恰恰与之相反，它是太切实了，实得如同今天的读者几乎都有感同身受之错觉：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盈、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虑；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多的读者。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也因为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我们感到现在大多数人只知道追逐权势，追逐利欲；人人以一己为先，国家的祸福竟成为末要而少人过问。是非不明、正气不张。许多人常在一种冲动下，流露他们爱国的情绪；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

及人格上，表现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尽他们对国家的责任。但要抗御外敌，自强图存，显非单凭感情所能济事；而建设国家、改革社会，尤需有众多的能够咬得紧牙关、站得住脚跟、挺得起胸膛的人民。环顾海内，种种现状，固足使人疾首痛心，而瞻望来日，尤使人不胜疑惧忧虑。在这样一个混沌悲痛的历史中，有志之士，实应挺身而出，不顾一己的得失毁誉，尽其天良，以造福于他所属的国家。这诚然是一个充满着祸乱灾难的痛苦时代，但这也是一个大足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和情操的时代。

有志之士如何挺身而出呢，从军？从商？从政？从事高尚纯粹的文艺活动？储安平选的是一条即使用或者说特别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不但吃力不讨好，且荆棘丛生的路。俗话说就叫做“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政治都是感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兴趣的方式，只是

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对于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也就是同人共守的信约，储安平提出八个字：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充满着英国式的立宪精神。他认为：

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归，无可抗阻。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措施设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最大的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同时，民主不仅限于政治生活，并应扩及经济生活；不但政治民主，必须经济民主。

对于自由，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叙述是很带了一点感情的，至于将自由与人格这两概念联在一起，起码对唱惯了“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与“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当代中国人而言，是相当陌生的：

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人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人民必须守法护法之不暇。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为维护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应该使人民的身体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

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增加国家社会的福利,而自由即为达到此种优性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必是一个奴役的社会。我们要求人人获有各种基本的人权以维护每个人的人格,并促进国家社会的优性发展。

接下去的“进步”论述一般。或许“进步”本身含义太泛,不具太强的抗争特色,谁都可以高高兴兴甚至加着码接受。学校里派进控制学生思想的训导员可称作进步;大跃进、超英赶美也可称作进步。

第四点,理性。应该说这点最具储氏思想特色。也许汉学家们会觉得奇怪,受英国教育的报人,居然要在“道也者,不可离之须臾”的文明古国呼唤理性。如果汉学家们除了读《易经》也读《人民日报》,碰巧还步作一点社会调查,他或许还记得,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判断一件事一个人是不是大恶,常以“俺们贫下中农(是否)气炸了肺”为标准;时至今日,也常见以“××同志很不高兴”来臧否事物(这里的××同志一定得是××而不是×××,如展堂同志、精卫同志,否则就不大象大家敬爱的最高决策中人了)。且看储氏的论述:

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的理性。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凭借冲动和强力来解决纠纷,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动辄用武。我们完全反对这种行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完全失败。我们要求政府及社会各方面能全力注意这点。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

有和平、始有公道。我们要求一个有是非有公道的社会，我们要求各种纠纷冲突都能运用理性来解决。唯有这样，才能使一切得到合理的发展，才能加速一切建设的成功。

在 1957 年特别遭到批判的，是这篇发刊词的最后一句话：

只要无背于前面的四个基本原则。在这一个刊物上面，我们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其作者负责。而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

这样的办刊旨趣，如今是日渐其少了。我们所熟悉的是别样的宣言——虽然刊物就性质而言，与观察周刊显然有颇多相似之处：

我们要满腔热情地讴歌各条战线正在风起云涌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由衷地赞颂我们党和人民在四化建设中开创的日新月异的新局面。……成为向四化进军的航船上一个新建的小小的观察哨，并与早已工作的千百个兄弟观察哨一起，在浩瀚无垠的生活的海洋中，为党和人民进行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了望。……“我为人民鼓与呼”——我们就是要为在党的指引下进行战斗的人民击鼓，我们就是要为党所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欢呼。

应该说，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就是在四十年代后期，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流精神也不大吻合。现在不能确知毛泽

东是否读过《观察》，但只看他在1943年对彭德怀《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一文的批评，即可知储安平的这一套是不可能对他的心思的。毛泽东批评彭“谈民主从定义出发强调反封建，而没有从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强调抗日”；他批评彭“确立言论出版自由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而没有着重为着发动人民积极性”；对于“集会结社自由”，彭也搞错了，按毛的意见，不应是“为着增进人类互相团结、有利文化科学发展，而应是争取斗争的胜利”……

不过毛泽东谋略式的原则当时并不为一大批民主人士所知，也管不到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储安平仍得以大模大样地贯彻他的“四个坚持”。

紧接着发刊词，署名打头阵的，是大公报总主笔王芸生：《中国时局的三个去向》。今天，恐怕没有人署名在报上发表“时局之我见”之类的东西了。对时局走向的讨论，一般只在两处进行：要么由有血亲关系的老老少少在饭桌上瞎胡聊；要么高层人物在极机密的会上商讨。其余的人，包括大、小报编辑，学者、各机关首长，都眼巴巴地等着，任何创新都不敢有，一件非重复性的事都不能干，生怕“精神”一旦下来，闹个满拧。

但王芸生那时是不会有这种种顾虑的。在1946年的秋天，他将时局走向归为三个要点：

1. “南北朝”。他并且指出，这是中共要达到的；
2. “十月革命”。他认为中共那时未必有这么大的野心和力量。他以为此种局面的出现必是国民党军队哗变的结果；
3. “政协之路”。他认为要害是改组政府，举行民主大选，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大路上。他断言，这是“中国时局前景最好的一个去向”。

历史已经证明，王总主笔的估计全错了。

半年之后，储安平自己出来谈政局了。那时，《观察》已从400份（试刊）跃为正式发行的8000份。本来，按需求，10000份也打不住。对此，储安平心里是有数的。但他只印8000份，这是他的生意经——让市面觉着抢手。

这篇题为《中国的政局》的文章，1957年曾专门被提出来示众，不是在批判会，而是在大报的正版上。应该说，标题虽是“政局”，实质上是对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分析与评价，开首即讲在朝的国民党：

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由民选出来的政党，为了顾全本党的前途，搞不下时，早就漂漂亮亮的下台了，但在一个以武力争得政权的国家、一个执政党，即使在最无办法的时候，还是要挣扎维持其政权。挣扎是人情之常，就看如何挣扎。在正路上挣扎，成败另为一事，要亦不失为一种努力；若走错了路，则所有的挣扎，都成为了一种浪费和罪行。

接着历陈现政权实已毕露的“穷形极相”。他认为：

今日的国民党成了维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机构，要希望他能顾到一般低层人民的生活，不啻缘木求鱼。我们希望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后，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一切社会主义的政策，其目的都在为最广大的穷苦人民造福，国民党为了要争人心，虽非所愿，亦难固拒。共产党最可怕的一点是统制思想。但共产党既以争“民主”为号召，加入联合政府后，必不致倾向统制，国共双方且均欲尽量提倡“民主”，以博民情。今日中国一般人所追求的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

政治(包括意志自由),这两样东西在以国共两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中或能勉可得之。我们期望这个联合政府者在此。

他认为改组政府故然是一种努力,但更重要的在于改革政治:“一般人民所期待的,不是随便换几个部长,添几个委员,而是改革政治的根本作风。”

接下去,他开始分析第一大反对党共产党。读者或许不会忽略,他这是在国统区里,对政府正在清剿的“匪”(当时蒋委员长已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中共军”)加以评议。如此立论,不必说在1947年,就是在1930年代和1970年代,也属罕见:

共产党是要获取政权的。一个政党当然要努力获取政权;争政权是一个政党的常情,政党不想争取政权才是天下大荒唐。共产党的坚主组织联合政府,只是他们的一个步骤,并非永远满足于这个联合的方式。能用政治谈判方式,插入政权阶层,徐图后举,自然最好;否则只好硬硬头皮用武力来夺取。我们在原则上是反对一个政党蓄养军队,以武力来夺取政权的;为中国的元气设想,我们也不希望共产党采取武力革命的方式。但这是就理论而言。就事论事,共产党的不肯放下枪杆,也未尝不能使人同情,因为在国民党这种政治作风下,没有枪,简直没有发言权,甚至没有生存的保障。所以国民党主张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共产党则主张先政治民主化,然后军队国家化,各人的出发点都是由于双方的猜疑,而双方猜疑的根据则为过去种种事实。

对于周恩来氏之“往返于南京,上海,延安之间并参加国

大起草宪法”，他认为：

老实说，宪法不宪法，共产党并无太大的兴趣，共产党真正的兴趣，还是在军队和地盘两者之上。就军队论，他们显然不愿再接受过去整军协议中所规定的国共军队的比例了。就地盘论，他们有他们的价钱。他们在过去至少希望得到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要具有三个条件：第一，要能自给自足。第二，要交通工具便利。第三，要四地能连为一气。不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地点，他们不要。那四个地方，他们不说，但是照上开三个条件，似乎是指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四省。然而要南京给他们这四个省，在南京看来，这不啻要南京的命了。

下边是他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的分析。这种言论对今天中国的读者而言，是相当不习惯的。不有知有没有人会产生“不幸而言中”的感慨：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于共产党的内情，我们自承所知不多，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近几年来，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困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个政党当他在艰困奋斗的时候，总有他一股生气和生命的力量。

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其广泛笼统的名词，就经济生活方面言之，共产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其间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已。就实行社会主义而言，今日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并不反

对，毋宁说是很期望的。今日一般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心目下，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实际上，今日中国的知识阶级，除了极少数一些人外，大都都已沦为“无产阶级”了。这是国民党的恩赐！知识阶级的领导重心仍然在一般教育界文化界中，然而今日中国的教育界文化界中人物，那一个不是已经到了虽然尚未饿死而早已不能吃饱的局面！而且知识阶级，大都有理想，有理性的。除了少数自私分子外，那一个不承认贫富的悬殊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所以共产党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原则，并不可怕。一般人怕的是他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做法。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言论自由，那还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同时，要实行民主政治，必得有一种公道的精神。所谓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说他好，不好的说他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

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就前一点论，譬如说我们这批自由分子，不讳言，都是受英美传统的自由思想影响的，但我们一样批评英美，抨击英美。同时，苏联或延安有好的地方，我们一样称颂他们的好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见共产党批评史大林或苏联？从来没有看到左派的报纸批评毛泽东或延安？难道史大林和毛泽东都为圣中之圣，竟无可以批评之处？难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都圆满得一无可以评论的地方？就后一点说，我们虽非共产党党员，但一样尊重共产党的党员，只要他确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义，忠于他的党，忠于他的理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业，我们都在心底里对他尊敬。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他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勱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端作风有关。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讲到民主党派，特别是不带一点虚饰的评介列位或名人，或同道时，其率直与百无禁忌，即使今天不大知就里的晚辈读

者读起来，怕也会不禁莞尔：

在中国，散布于国共以外的自由思想分子，为数极多，不过他们较为散漫，甚少严密的组织。其中组织较大的就是民盟。我们现在先就民盟作一个大概的论述。我们可以拿两句话来批评民盟，即“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民盟是一个很勉强集合而成的政团，民盟里的人物，各有各的教育背景，各有各的政治看法，各有各的历史环境，他们只是在一个相同的情绪下集合起来的，就是“反对国民党”，这是他们唯一连系的心理中心。民盟到底是一种政党的做法，还是一种运动的做法呢？就过去情形观之，似属于后者而非属于前者。民盟的历史已有数年，而其出头则为前年的政协时期。不过在过去，一般人似乎有一种印象，即政府来借重他们时，有了“民盟”，不来借重他们时，就没有“民盟”了，所以有“和谈”，民盟就大大热闹，没有“和谈”，民盟就冷冷清清的无事可做；这情形至少在过去是如此。照近来的趋势看，他们似已企图改向政党的做法一途发展。中国社会上的封建味道本来还很重，民盟的领导人物还大都是前一代的老辈。我们若将民盟的领导人物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政团是非常脆弱的。我们不能不承认：像张表方（澜），沈衡山（钧儒）等几位老先生，实在都是过去的人物了。民盟领导人物中实际政治经验最丰富的当推黄任之（炎培）先生，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黄先生也是过去的人物了。张君劢先生（现已脱离民盟）在政治生活方面，他是一个宪政学者，一个最好的政

论家，然而他只是一个论政的人物，而不是一个从政的人物，他至多只宜于任国会议员，而不宜于掌行政责任。张东荪先生也不适宜从事实际的政治生活，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他在政治方面最能贡献的还是在思想及言论方面。若以现代的标准言之，严格说来，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物中，适宜于实际政治生活者，恐怕只有罗努生(隆基)先生一个。罗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笔都来，有煽动力，有活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可惜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从各方面分析，民盟实是一个貌合神离的团体，而所以能勉强集合起来，完全是由于实际的政治环境逼成的。但单靠对国民党的一种不满情绪来维系一个政团，这显然是一种极其脆弱的结合。照我个人的观察，民盟诸君子，可以共患难，不一定能共富贵。这句话或许说得太率直，我们将来再看吧。

至于现在一般人都说民盟太左，成为了共产党的尾巴，关于这种批评，我认为无甚价值。凡是进步的政治集团，当然是比较左的；世界大势如此。成为了共产党尾巴一点，纯然是恶意的侮蔑。要知实际政治不能完全摆脱权术，从战略上说，民盟和共产党互为呼应，实为必然，两者的目的都要削弱国民党，在这个前提下，两者当然要并行联系的。假如一定要说如此就是民盟被共产党利用，则我们也未尝不可说，民盟也利用了共产党。故此事不足奇，亦不足为民盟之病。只要国民党一日保持其政权上的优势，民盟与中共可能继续维持其连系的步调。但是一旦国民党

在政权上已不占优势时，在那个时候，中共与民盟恐将分途而未必再能互相呼应了。

这里不得不提到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大谜：为什么曾屈辱地顶着“尾巴”之称的民盟，会在1957年乃到1978年都成了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因为即使只用共产党一家的标准来衡量，也绝不能说他们的态度是最坏的，比如史良前主席之所为。可能有的一种解释是，他们太大也太活跃了一点，而这一状况，在不同的历史时刻是具不同的价值的。

在文章的最后，他谈到自身。对于中国的自由思想分子，即几十年来不断被人提起，且颇为鄙视地与美帝扯在一起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作了他独有的分析与估判：

在今日中国的自由分子一方面，除了民盟，民社党这些组织外，就是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分子了，这批自由思想分子，数量很大，质亦不弱，但是很散漫，从无足以重视的组织。这批人所拥有的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只是一种道德权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权力的力量；只是一种限于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而非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

自由思想分子能否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他认为：

自由思想分子的彼此相通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自由思想分子的长处是背脊骨硬，交情可以拉得长，其短处则为胸度狭窄，个人主义。

因为“相轻”及“自傲”在中作祟，所以在自由思想分子中很难产生领导人物；政治活动是必须有组织和纪律的，但是因为自由分子的相通大都是道义

的，不是权力的，所以很不容易发挥组织的力量。这些是自由分子根本上的弱点。

联想到 1958 年这批“自由思想分子”相竞表态，相竞揭发的场面，储安平会对他上面的这段议论难过的。他还认为：

今日中国极其需要自由分子的抬头，但事实上自由分子的抬头非常困难，这与国民党二十年来的统制有关。国民党二十年的统制对于自由思想分子的抬头的限制，是三方面的。1. 政治方面的限制。这点大家都明白，不必再解释。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本保障，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其它自由自然都谈不到。2. 经济方面的限制。政治活动必须有充裕的时间和财力，八年抗战，把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弄得个个生活不安，精神和智慧完全消耗在柴米油盐这些琐事上，以致大大削弱他们在政治方面所能发挥的积极力量。3. 在思想散布方面的限制。二十年来党化教育的结果，使青年都未能得到合理的教育。党化教育的目的原是要大家信奉三民主义，做国民党的孝子顺孙，不料国民党自己不争气，越搞越不象样，弄到青年大都厌恶国民党。厌恶国民党不要紧，党化教育给青年的并不是一种理性教育，青年在理性方面未能得到应有的教化，于是感情的部分因不满现实而日益泛滥。自由思想是重理性的，必须在理性上有修养，始能接受自由主义的熏陶。情感泛滥的结果是趋于极点，不是极点的右就是极点的左。但现实环境逼得青年左，于是青年越来越不易保持其冷静的头脑而对各事作沉着的思想。在国民党，可谓自食其

果，而在自由主义的传播上，也同受其害。同时，党化教育的做法是收罗奴才，放任浪才，杀害人才。我称那些只知享乐百事不管的青年为浪才。浪才越多，对于自由主义的传播也是一种限制。自由主义是最讲是非的，那些浪才什么都不管，那还管什么是非呢？

至于这一特殊成份对中国的命运所起的作用，储安平给出的是书生气十足的结论，也是1957年受到抨击最多之处：

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则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因为大家怕共产党，怕他们那一套杀人放火的暴行；无论这种畏惧是不是出于一种误会，总之大家在畏惧共产党。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国民党的腐化已是众目昭彰，有口皆碑，无论三民主义这块招牌如何，总之人民对于国民党已难维持希望的信心。在这种两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取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

在结尾处，储发平表现出只有他才具有的一种郁悒中的顽强——他并不乐观，储安平天生就不是那种憨敦快乐的人。但他不沮丧，不放弃努力，怀着一种不是出于利害而是出于认知与领悟的使命感，将辗转挣扎、苦苦撑持视为当然。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品性，差不多终其一生。该文的这一结尾，则几成谶语：

中国在最近的几年之内，一般情景还是很黯淡的；说得远一点，则我们这一代，大概也已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后代造福”的时代。然而我们可以

牺牲自己，而不可以不为后代造福。今日中国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大都在苦闷地忧虑着国家的前途，但他们实不该止于消极的焦愁忧虑。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

2周以后，在1947年2月22日的一期上，梁漱溟以他那独有的即使有99%同意也要把那1%弄个一清二楚的脾气，写来了不同意见。《观察》历来极吝于版面，除首页头条文章用新5号字通栏排出，第二页与第二条即改为两栏，到了第三、四条，已变为5号字三栏，至于不署名记者写的通讯，一概为6号字七栏——因为连续阅读这种排得密密麻麻的文字，笔者本人三日之内即患了爆发火眼兼偏头痛——对这提出针锋相对意见的一文：

尊作拜读，其中大半可以同意，但尊见与事实不符者亦不少。尊作有涉及漱溟之一句话，也要在此声明否认……

储安平居然用老5号字加框通排。这种殊荣，就《观察》而言，是绝无仅有的。而对于无数来自读者的颂扬文字，仅偶然挑选其中含有建设性意见的，用7号字登在刊尾，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风格。

《观察》初创时，储安平曾对笄移今（他是该刊最大的股东，一人即认48股，林元26股，徐盈19股，马寅初、梁实秋、钱钟书、杨绛等都是2股，储安平本人仅1股）说过：“办刊物若想成功，紧要关头要站得起来。”这条行事准则，与今天的“紧要关头要稳得住劲”显然相悖。联想到储安平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仅70天就做不下去了，或许可以理解为，当头上飘

着的旗帜变了，他在准则上竟无丝毫应变能力，显得多么书生气。

而在当年，他对此确是信守不渝的。

最突出的一件事是 1947 年 5 月 24 日，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查封《文汇》、《新民》、《联合》三报一案。查封的罪名完全是政治性的：

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

着令于明日起停刊，毋得违误，此令。

这三家报纸与《观察》有什么关系么？用储安平本人的话来说，“其中一份不常看”，至于另外两份：

坦白的说，我对于文汇、新民两报的作风，有许多地方是不敢苟同的。不敢苟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两家报纸的编辑态度不够庄重，言论态度不够严肃。我很少在文汇报上读到真正有份量的文字。

这样的报，由它封掉好了，与《观察》何干？但储安平信守“站起来”的原则，他出来呼不平了：

查封报馆，而且一封三家，这本来是一种希特勒式的作风，报载中国现在正由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主席领导我们步入民主之路，大概若非走投无路，绝不致走此一着。我们站在同业的立场，不能不向被封的文汇、新民、联合三报同人，表示我们最大的同情。

这样明白的表态，在当时报界已属罕见，储安平仍觉不足，为了信守他的“原则”，竟然犯了直到今天报界还认为是决不可为之的大忌——除非上方宝剑在手（或在颈）——把抨击的矛头指向同行，并且是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大公报》。先翻

学潮报道的老账：

在这次学潮中，大公报所表现的态度，实在不孚众望……5月20日南京发生了这样壮烈的惨案，这样震动全国而有了强烈政治意义的新闻，大公报还不肯编在第二版要闻中，这是什么编辑态度？同时，象南京5.20惨案这样一个严重的新闻，大公报竟用“首都一不幸事件”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标题，这是什么编辑技术？至于说到评论，该报5月21日的短评论南京惨案说：“不幸执行禁令者在方法上未能充分体会在上者爱护青年的本心，率至演出惨剧……”全国青年听着：你们同意大公报的话，承认今日在上者还有一点爱护你们这批青年的意思吧？你们承认，当有人用木棍铁棍在你们头上劈打下来，这就是爱护你们的表现吗？在5月19日的社评中，大公报视学生的请愿为暴力的革命，5月22日的社评中，认为“学生近来的行动”“太天真幼稚”了，认为“青年人太简单了”，认为学生在请愿中“充分表现其行动的儿戏性”，并且甚至认为今日之学潮，直为“小孩玩火”。我读大公报前后几十年，实在从来没有看到大公报有过这样违反民心的评论。当然我不能在这儿指出，这次大公报在学潮中所表现的言论，如此灰色，不能领导当前的潮流，也许与王芸生先生的适有北行有关。假如王先生在上海，在他的主持下，我相信大公报在学潮中所表现的言论决不至摇摆怯弱到如此程度。不过这次大公报在上海及南京两地的采访同人，都甚忠实、热忱、前进，此可由他们的报道中

见之。他们的努力，多少替大公报挽回一部分读者的感情。

看到这里，今天的读者，特别是30岁以下的读者和报界中人也许会问，储先生是不是得过三报的什么好处，欠着人家的情哪。至于跟大公报，没准有点过节，这下子可逮着了机会。

至于大公报对于这次三报被封所表现的态度，我们也不能不出一言。在5月25日大公报第四版上，只以三号字的标题，平平淡淡地刊出文汇等三报奉命停刊的消息。大公报的编辑先生大概对于电影明星及歌唱明星都是非常发生兴趣的，凡是外国一个电影明星有了一些什么新闻，大公报照例要加上花边登出来。在大公报编辑标准中，大概象一个城市中同一天封了三家报纸这样一个消息，其重要性还不如一个电影明星的私人轶事。大公报对于文汇等三报的被封，始终未发一言，以示同情。5月25日是星期，该报例刊“星期论文”，为什么不写一篇短评呢？25日不写短评，为什么26日不写一篇社评呢？今日为28日，文汇等三报已被封4日，大公报对此始终不置一辞。且不说别的，至少站在同业的立场上，也应当写点文字，向当局抗议一下。大公报所以默无一言，是认为文汇等三报应该被封呢，还是吓得不敢说话呢？还是幸灾乐祸坐视不救呢？上述三因，必居其一。我觉得大公报这次的措置，显然失态，至可遗憾。

最后我不得不声明一、二。我和《联合晚报》里的

同人，一个都不认识，甚至连他们的姓名我都不知道。《新民晚报》的高级负责人中，有二、三位是我的朋友，可是彼此皆忙，虽然同在一地，我和他们已有整整8个月未见过面。《文汇报》里边，仅和总主笔徐铸成先生前后见过四次面，都是寒暄。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赐一覆^①。独《大公报》里面，我的朋友最多。单说在大公报编辑部服务的，就有6位先生是本刊的撰稿人。但是我们今日所检讨的问题，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恩怨的问题。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我们今日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

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凶吉安危了。

类似这样的话，“今日之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寄托在

^① 这里指的是1946年《观察》初创时，储以主编身份分别向包括卞之琳、吴世昌、李青纯、宗白华、胡适、马寅初、曹禺、梁实秋、傅斯年、钱歌川、杨绛等在内的48名学界精英发信，请求应允作《观察》的特聘撰稿人，无论本期有稿与否，都将其名字印在封面上。为避免精英们因怕麻烦而不复信，储安平将“同意担当”的回信预先打好，回信信封也写好并贴足了邮资，精英若同意，只签上名字即可。发出的信只有徐铸成一人未复。照上文看，储安平可能又追发了一封，依旧未复。

1988年，笔者就此节直接请教徐铸成先生，这位年届80的前辈报人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我那时可是有点左倾幼稚病，认为他搞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帮国民党的忙，最后终会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就没有回他的信。当时就是那么一种逻辑。后来三报被封，大公报落井下石，只有2个人站出来说话，一是密勒氏评论报的John Powell，一是观察的储安平。”

我们肩上”云云，对当前办刊人而言恐怕是很遥远的了。文人们最习惯的是做喉舌，若做得不够安份，最常听到训词是：中央还没定下的事，要你多嘴！

储安平却是很多嘴的，而且不以轻挠个把县长或者司局长为然。他要么不出言，言既出，就是要害。比如军人从政。中国历来的逻辑，哪里有老子打了天下而让别人去坐的道理？！《观察》于是刊文，介绍“黄埔将领中出任省主度的第一人”、东北保安副司令官兼任吉林省主席的梁华盛，直指他如何在“一介武夫，不懂政治”的谦词下，“将一省视为自己囊中之物，将民众视为沐浴恩泽的子民”，说他“除了享乐方面尚且在行（如买汽车、修温水游泳池）之外，经济、文化等均放胆瞎指挥。文章最后呼吁：假如中国不能进步到民选省主席，至少希望中央不要再把军人放在行政官的位子上。”

这不过属于小气候政治。对于经济问题，正当政府发布“黄金紧急措施方案”，想将日前高价抛出的黄金平价买进时，马寅初又跳了出来。他不会不记得他被监禁的两年和软禁的两年，但这位在台上直斥财政部长孔祥熙，并为四大家族算出17亿家产的教育家、经济学家，又公开出来就最要害的问题唱对台戏，告诫普通百姓：“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而《观察》也原文照登。

马寅初疾呼：“黄金倘使真集中在政府手里也就算了，倘使一转、二转，转到私人手里，又何必？现在中国的情形，黄金已经集中在几个人手中了^①，多数人手里的少量黄金不必再

^① 当时政府已穷得无外汇供科学家出国参加会、无外汇供学生出国留学。但宋子文的三位小姐全在美国养大，大学已届毕业，尚不会讲中文。

送给他们。”“现在交出黄金美钞，就换军火进口；军火进口不要紧，还要杀人。如果爱国，就不要拿出来。他给你的法币，不是他拿出来的，而是机器轧、轧、轧印出来的。你拿黄金美钞换法币，傻瓜！为了自己为了国家，都不要拿出来。如果另有好的政府上了台，而这个政府又真正能为大多数小百姓造福，那时再拿出来也不算晚。”

我们今天已经没有马老了。其实，1958年之后，就已经不再有他了——虽然他顽强地活过了百岁，只为让讨厌他的人多点不舒服。对于今天政府出台的各种金融措施，小百姓只有发呆的份。或者说，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口袋不够鼓，也只有认瘪的份。今天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肯出来为大众解释一下低工资与高等级福利的奥秘，没有谁愿意象马寅初一样不去当财政次长而告诉大家为什么会有黑白灰三种外币市场，为什么会有国库卷、外币兑换券，为什么金价会奇高（卖出）又奇低（买进）。当然，就算有了密室里的，甚至讲坛上的马寅初，也没有《观察》了。

考察一下《观察》的封面，实在是很有趣的。它非常简陋——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封面，更不必说五套色或者七套色的封面女郎——《观察》用不着靠她们招徕。它的封面本身就是目录页，作为刊物支柱的48名撰稿人的名字，期期保留。在封面的中上方，是一枚以掷铁饼者为图形的刊徽，四周书以英文 THE OBSERVER（观察）和 INDEPENDENT NON PARTY（独立的、非党派刊物）。在首页头条文章的上端，再次打出带纹饰的刊名，标出该期撰稿的人学术身份和“储安平主编”五个2号字。

这一形式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复刊，当然届时已

有若干改变——这是后话。

储安平办刊的招式层出不穷，但有几条是信守的，曰“一要人抬刊物（比如这48位特聘精英），二要刊物抬人（比如漫画家方成，就是在《观察》的提携下从无名青年一步变为专栏画家的）；曰“我要办得人们以在本刊上发文为荣”。为此，他对文章把关甚严。一次，马寅初转来他的一名身为立法委员的学生的稿。储安平自己觉得不大行，为慎重起见，又拿去问金融专家笪移今，笪也觉得差了点。储安平把稿退了。为此，马老发了不小的脾气，连连骂道：“看不起我，把我的撰稿人从封面上拿下来好了！”当然最后稿也未用、名也未拿。

1947年3月，一场剧坛上的争论，在《观察》上摆开。先是李健吾的一部戏《女人与和平》在辣斐上演之后，被许多人恭维，很热闹了一下，接着曰木写文章批评。这批评，用剧作者的话说，“把洪深先生和许多好心好意的朋友都骂在里面了……是我要他们那样做的。根据是什么？不是作品。我告诉朋友们说，辣斐冷了许多，为重新争取营业、冲破难关起见，希望随便写几个字在报上凑凑热闹。”应该说，这招认是很诚恳的，楼适夷的反驳纯正而犀利：

……朋友们所以捧场的原因，只不过想多骗几个观众，给辣斐热热场子，并不是作品本身有什么了不起。一个作者不藉作品本身来争取观众，而必须借助于庸劣的商业广告已经大可怜了，而更可怜的那许多捧场的朋友，他们的时间、精力，他们对于读者与观众的信用和责任。我亲遇到过一位写过捧场文字的朋友，自述其被拉而不得不应酬的苦衷，而那本戏的本身，他是看不到一半就溜走了的。这种小心得

不敢得罪一个朋友而大胆得罪千万读者和观众的“圈内”人，我想今后是应该考虑考虑了。……今天的话剧所以搅得那么悲惨，那种死拉观众的营业路线是应该负责的。象李先生之流的话剧运动者，眼睛死死盯着上座的场子，完全放弃艺术路线，纯正的、艺术的、优美的作品不敢搬上舞台，而明星和噱头又搞不过姚水娟和大世界，进步与落后的双方观众都拉不住，这就是话剧剧院闹得如此冰冷的真原因。即使《女人与和平》赚了钱，辣斐还清了债，然而纯正的、承受了进步传统的新话剧又何在呢？

在1957年对储的批判中，屡屡提到他的“反共面目”、“坚决反共”的行为。这就很难解释上面的一组剧评文章了。因为，按一般观点，李健吾是属于自由派中间分子，而楼适夷不但是立场鲜明的左派，还曾是中共党员，并一直与地下党保持着联系。

储安平当时的共党朋友不算少：徐盈、杨刚、顾诘刚等，当然身居要职的国民党朋友也很多：沈昌焕、李惟果……。笄移今是储安平最密切的伙伴了，在他逃亡期间还是最后几期的主持人，但笄从未向储谈过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储是否知道，哪怕仅仅猜到了？二人之间从未挑明过。

那么，储安平编《观察》时与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关系呢？

1948年11月，《观察》发表了一篇张申府的文章《呼吁和平》。那时，《评战犯求和》虽然尚未发表，但“歼敌30万”的辽沈战役已经打完，“歼敌55万”的淮海战役已在布署之中。毛泽东那著名的“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的论断不日即将作出，而

蒋介石的引退与“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正被认为是一项阴谋。“和平”已成为“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需要的东西”。

这一切，想来无论储安平还是张申府可能知道的都不甚确切；或者说，这一切都是后人的评价，当时是不可能如此明晰的思路的。总之，《呼吁和平》上了48年11月那一期的头条：

今日呼吁和平，有百是而无一非。一个国家绝无可以百年内乱或百年戡乱的道理。与其将来全国人死去一半再言和，何如今日趁早作和平计，替国家保留一点元气，使人民得喘一口气？兵犹火也，佳兵不祥。不论什么方面，如果不管眼前人民的切身遭受，而只求一个不尽可知、不必可靠的将来，那不过是一种不仁也未必智的冒险。

这可真是不折不扣地替蒋介石帮忙。文章一出现，20年代即加入共产党的施复亮立刻通过笄移今找到储安平，请他到红棉酒家吃工作餐。据笄移今回忆，储安平平静地听完施复亮的意见，什么都没有说，只在下一期的头条，登了施的一篇从经济管理方面抨击当局的文章。《观察》从此再不言和平，尽管当时类似的呼声（或曰见解），在知识分子群中是相当普遍的。

说到这里，对《观察》的介绍还不及什一。读者或许可以隐隐感到，刊物办到这个份上，有志于此者是很难不上瘾的。这似乎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储安平没有在解放前夕随大批进步文化人避祸香港的道理。因为他当时的确足够进步，处境也足够

危险,而且香港方面也确实派了著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刘清扬到处找他。笔者开初倾向于认为储安平的城市过深,他不打算与任何党派交往过密,更不愿欠谁的情,以保持自身最宝贵的独立。现在看来这可能是过虑了。他只是简单地舍不得他的刊物,如此而已。既然有好几万理解你,支持你,渴望听到你的声音的人在连买米都需东拚西凑的时候还买你的刊物,岂有忍心抛下他们一走了之之理?他坚持着,直到本章开头讲的那“查封”事件发生。

这是他生命的峰巅,此后他再也未能比这攀得更高。对此,他自己可能根本没有感觉,甚至至死都不这样认为。

这是无法争辩的问题,因为一个,尤其是一个为世人所瞩目的人的沉浮线,通常总是由后人而非当世人所能绘出。当世人是看不到那只有后人才能指出的冷峻的现实的:他已失了优势——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随意发宏论;却还存着劲头:办一份人人瞩目的精英刊物,无论局面怎么恶劣。他当时显然不认为会比那时更恶劣的局面了:通讯断绝、交通断绝、米价已在一周内涨了十多倍。

这是颇带几分傻气的。其实,这种傻气,若缀以堂堂皇皇的收尾,哪怕只如阿Q般带着几分滑稽的凄凉的收尾,倒也罢了。最要命的是什么都没了,感受没了、激情没了、热辣辣的快乐与活泼泼的仇恨也没了;没了倾心相爱、没了暴跳如雷,连临死前的嘶叫也没了……你被闷住了,被平庸、被废话、被种种不知包藏着什么的腻歪,而且完全在不知不觉中。

辉煌从此不要再想,只剩下聊胜于无的追求。

不过,还应该有什么(或曰蹦跶)么?

五

【勉强】①谓力不足心不愿强而行之也。

《礼·中庸》：或~而行之。《汉书·严彭祖传》：君以不修小礼曲意，云贵人左右之助，经意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按：彭祖性廉直，不事权贵，此所云勉强，盖欲其曲意交结贵人也。又曰日语谓勤学为勉强，即勉力之义。日本商店称格外克己亦曰勉强，则为曲意俯就顾客之意。②犹怂恿也。《汉书·卫山王传》：日夜纵吏王谋反事。纵吏犹言勉强也。

——《辞海·1936年版》

储安平没有再回上海，他是在北平迎接解放的。

那时，各党派和各界人士都很活跃，民盟总部（工作委员会）3月5日就迁到北平了，比中共中央还早了20天，不少学术性团体已纷纷转变为党派性社团，大家都准备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加盼望已久的政治协商会议。

储安平在这前后生平第一遭加入了党派，而且不入则已，一入就入了两个，九三学社与中国民主同盟。两边都有他尊敬的、甚至堪称往来颇为密切的老朋友：九三那边是许德珩许老；民盟是费孝通——今天也已是费老了。储安平当时虽然这样向袁翰青解释：“两边都请，不好意思，两边都参加吧。”私下里实在是很有点小小的得意的。

看来那时民盟已不以他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对他们的唐突为意，不过后来储安平也很少参加这边的活动。有一种说

法认为这是由于民盟人才济济，储安平在这里很难脱颖而出——不象九三，那里大多是一门心思作学问的夫子。1959年戴了帽子之后，这两个党派倒都未将他除名，这一举措。造成今日仅余5名不予改正者全部为民盟盟员这一现实。

储安平搬出藏身的府学胡同，住进了当时专门招待高级民主人士的北京饭店。不久，周恩来亲莅该旅舍，一一看望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新老朋友。储安平不是没有经过大场面的人，此时却深为感动。他后来对袁翰青说：“真想不到，周先生亲自到我房里，而且谈得很高兴。”

整整一批就算不能称为高贵，总可称为自由的心灵，就这样一下子被俘获了。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周的无以伦比的个人魅力；再一个就是，他们太高兴啦：在经过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分裂、动乱、屈辱和牺牲之后，一个和平、独立、统一、光明的局面终于盼来了！而且其中还包含着自己的努力乃至功劳^①！这巨大的快乐，冲淡了这批民主人士心中的戒备、芥蒂，或许还包括他们独有的理想与判断力。满心欢喜的储安平这时显然忘了他对于“中共搞经济恐怕不行”的担忧，也不再顾虑他断言过的“自由的有无”。新政协就要开会啦！民主联合政府就要组建啦！新中国就要成立啦！

政协新闻界的代表共有14名，胡乔木打头，储安平名列其中。其实在这之前，他就已经结识了“乔木同志”。乔木对储安平的评价及任用意向，无论在50年代还是80年代，都高于储的那批非共产党文化人老友——虽然据称他们已相识多

^① 这一想法或许可以与一位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最后提着枪进城的老共产党员干部（他可能不怎么认字，身上却有七、八处枪伤）的说法相对照。对于民主人士，他的评断是：“他们的功劳如一根毫毛，把他们拔去也如一根毫毛！”

年、共同受过英美教育，甚至都具有自由主义色彩。这些人当然也有赏识他和愿意用他的时候，但当需要揭他、贬他、踩他、乃至在 30 年之后还不肯公开回忆他的时候，是很拉得下脸来的。恰如 1953 年，当梁漱溟与毛泽东在会上发生争执时，喊叫着让他滚下台的，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民主党派的朋友。

当时《观察》被封已有 10 个月。胡乔木、胡绳等在此期间曾就复刊事请示周恩来。周的意见十分明确：“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复刊！”这一连串的举措，储安平想来是知道的。因为在 7 月间平沪两地交通恢复之后，他曾有信给林元，极为高兴地告诉他：“经中央批准，《观察》要复刊了！”读者此时可以看出，他已不再坚持完全民办、不受党派制约的原则，正在从思路到语言，一步步适应新的社会风习。

到了 1949 年 11 月，也就是第一次政协会议闭幕、中央人民政府刚刚选出这一重大时刻，《观察》在被查禁 11 个月之后正式复刊。

与原刊相比，封面上朴拙的“观察”二字未变——储安平竟然没有想到请毛主席、周总理，哪怕九三的许老、民盟的沈老提个辞；首页的撰稿人身份介绍未变，刊标也还在，只是没有了周遭的英文 THE OBSERVER 与 INDEPENDENT NON PARTY，虽然表明了一种不屑沾洋的气概，从形式美角度看，却秃秃的没了样子。加花饰的首页刊名也还在，不过去掉了“储安平主编”几个字，虽然依旧由他主编。

最为有趣的是，复刊上来第一篇就是《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和编辑方针》。这可不象储氏风格，不知这位新接受任命的主编当时是正吃了一点批评还是有什么人劝他顶好取这种姿态开场。他让步了，费边社信徒历来讲究 COMPRO-

MISE；这又很象他的风格。至于标题的措辞，虽然储安平一生对文辞美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但这种简直能把读者吓退的用语，也只有在这一时刻才用得出。另一个不能不提醒读者注意的变化是，这类天经地义应由主笔写的文章，署名却是“本刊同人”。这里看不出储安平对他三年前提出的“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项基本原则有什么修正，在这复刊词里，他的自责是不大着边际的——这或许正反应了他此时认识上的不着边际：

我们的内心是空洞的、徬徨的，我们有理想，但这个理想是抽象的、笼统的、没有具体内容的；我们有热情，但这股热情是虚浮的、飘荡的、没有一定寄托的。

我们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国家变好，但由于没有得到正确教育，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阶段。因为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况，并没有靠拢共产党。……

这篇文章是否出自储安平之手，有些地方很值得怀疑。比如文中有“蒋介石这个法西斯大流氓”、“舔美帝的屁股”种种用语，似不象储氏之所为。如果真是他写的，也只能用诸如“入乡随俗”、“上什么山唱什么歌”等等俚语来开脱了。而对于这种陋习，如果连储安平一类的人都不加以抵制而混迹其间，至使 18 年后优美精致的汉语弄到只剩下“火烧”、“油炸”、“踏上千万只脚”，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下面的一段话，给人的感觉是，不但出自他的手笔，还出自他的内心：

我们还愿在此进一步告诉所有国内国外的人们：今天的中国人民，是全心全意地拥护中共和毛主席的，这种拥护完全是自发的，出于真情的。在过去，我们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受尽了帝国主义者侵略、欺侮、污辱，但是今天，我们这4亿7千9百万中国人在中共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站起来了。在国内，由于长时期的反动封建统治，我们的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已经腐败溃烂到了极点，到处是恶势力，到处是不合理。若干爱国之士，左思右索，东撞西摸，总找不到国家的出路，总找不到国家的生机。但是现在，由于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一切旧的、腐烂的、黑暗的、都将全部加以拔除，使新的、健康的、光明的，洒遍在中国的大地之上。这真象是一次奇迹，但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接下来的是我们在文章首页上引的那段话：

毛主席及许多中共领袖先生的阔大深厚、人民解放军的严明坚强、中共同志的刻苦耐劳，使中国人民倾心折服、一致景从。帝国主义还想在中国觅求什么“民主个人主义者”，一方面暴露了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未死，一方面也说明他们没有真正了解今日中国的实际情形。

考察储安平的一生，除非万不得已，他是不大会作违心的捧场之语的。从上文可以看出的是，他，以及相当一批类似的先生们：在换上中山装的同时，差不多也换了一个头脑，一副心肠。有趣的比照是，中山装并不是中共的创造，蒋总裁和党团系的人都着中山装。储安平们为什么不在彼时而到此时才

换装呢？

不管怎么说，这确实是储安平与中共合作得最好的一段时间。从那时起到8年后的“向党猖狂进攻”，再到17年后的“自绝于党和人民”，景况已大不同。是他变了对方未变，还是对方变了未变——这两个相反的命题都可以翻作当代政治用语：前者是“阶级敌人贼心不死，将矛头指向我们一贯正确的党”；后者是“在不断深化的革命形势下，顽固分子拒绝改造”。可见在储安平的下半生所处的这个风云变换的伟大时代，对人的估评多么具有服务于形势的随意性。

在这篇复刊词里，储安平特别强调了工作方式的改变：

我们将充分建立集体主义的工作态度。各种编辑工作将在集体讨论的方式下进行，对于文章的内容彼此能有交换意见的机会，使编辑工作不致流入自流。

取这样的工作方式，真是难为他了。储安平一贯的作风是大权独揽，刊物事无巨细，一概一抓到底。据林元回忆，“直到搬到四川北路（那是《观察》的鼎盛期，发行量已到25000份，外加一套《观察丛书》）编辑还只他一个人，我是唯一的助手。”储安平亲自定题、阅稿、复信、改字、直到终校。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连每周五清晨将版送往机场（周六全国同时见报），也是他亲自去。林元还记得他们二人深夜从印厂出来，到附近的西餐馆吃宵夜的情景：每人一客西餐，外加一只煎蛋——连只是一只而不是两只这种事，也由储安平亲自定。很难想象复刊后的集体主义工作方式是由于他自己的选择，因为思想产品本无“集体”可言，这点安平知道得比谁都清楚。有什么主编就有什么刊物，主编的思想、趣味乃至习性，就是他那本刊物的

思想、趣味、习性，本不言自明。强调集体，实际上是抹掉主编的主体性的一种堂皇的托辞，但若厚道一点，也不妨看作是风气使然。不过话说回来，刊物办到今天，上面那番话也“可以休矣”！因为今日有幸与读者见面的任何铅字印刷品，全可铁定地认为是集体作品。虽然党曾一再教导“文责自负”，而且几乎每个作者交稿时都把这条绝望地强调再强调，稿子最终总难免被“集体”一番。比如诸位现在正读着的这篇文章，就必定是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在位置上的人“彼此交换意见”之后“集体”决定的结果。

复刊之后，果然面目一新。

首先作者队伍变了，试比较原《观察》第10期(1946. 11. 2)与复刊后的第10期(1950. 3. 6)的作者：

原《观察》		复刊后	
戴世光	清华大学教授	吴景超	清华大学教授
陈友松	北京大学教授	瞿宁武	南开大学研究生
韩培德	武汉大学教授	陈治文	南开大学
萧萧权	前燕京大学教授	许 诚	不详
戴文赛	燕京大学教授	费孝通	清华大学教授
陈瘦竹	国立戏专理论 编剧组主任	郢瑞、白磐	不详
		田 欣	南开大学学生
		肖玉之	东北银行工作
		李有文	大学讲师
		陈醒民	华大政治所所员
		黄开枬	同济大学学生

再看文章内容：复刊后的《观察》频频出现诸如《向党干部的学习高潮开始》《山西忻县专区干部学校教导工作的初步经

验》、《劳动先锋马星祥谈 50 年大生产》、《挖出我的思想根源》等文章。党内理论家胡绳开始给《观察》供稿。他的文章既有老《观察》的风采又具新《观察》的精神：《孙中山从美国走到苏联》。郭沫若的诗作也第一次出现在《观察》杂志上——《我向你高呼万岁》：

斯大林元帅，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 70 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

.....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胁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

不朽的马克思和你同在，你和马克思一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恩格斯和你同在，你和恩格斯一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列宁和你同在，你和列宁一样永远地不朽了！

.....

一部分老撰稿人依然活跃在复刊后的版面上，当然文章已不同以往。吴大琨教授提出，《怎样把我们的经济学提高到毛泽东阶段》。在吴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应该说，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后来的调整等等都还没有发生，作者本人当然一时无法对“经济学的毛泽东阶段”作一界定。从行文看，他所指的似乎是中国的经济学者应该达到的政治思想高度和实际上的不足：

我们中国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在过去乃至今天是不是已经完全了解了并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并

把我们学习的水平提高到这个阶段呢？能够肯定地对这问题作“是”的回答的朋友们，应当是更少的。

这一论断，从文章上看，不是建立在对毛泽东经济学（如果有的话）的研究上，而是建立在对毛泽东本人政治素质的判断上。当然，这一判断，用今天的观点看，是过于天真烂漫了：

毛泽东主席是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国的现实革命条件，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或者狭隘经验主义的方法来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全国的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必须努力地对我们的学习水平提高到毛泽东阶段的理由。

费孝通教授圆熟的风格在复刊后的《观察》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在《知识分子与政治学习》一文中，他是这样论述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的：“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脱离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结合在生产中”。但“在意识上他们倾向于个人主义，他们赖以生产的本领是知识，是脑力劳动，有类于小生产的手艺工人”。由于这种“白领阶级”“缺乏集体主义”，虽然“基本上是被雇佣者，既然不易有集体力量来保障他们的职业，就只有顺从和谄媚雇主来免除失业的威胁”，虽属劳动阶级，但往往“出卖了阶级利益而向雇主投降，在实际政治运动中，反而站在剥削阶级的阵营里”。并且由于“受了个人主义的毒”，而“观念上不能彻底，不能有远见”……

可悲的是，这不是唯一的一篇，《什么叫搞通了思想》《不改造就落后》《从往上爬到大家互助》《进步的包袱》……。作为原《观察》最早的和最经常的撰稿人，费教授显然还在勉力支持他的老友主持的刊物。卖力尽管卖力，但立世立言是不是有点过于疲软了？迎合的笑容是不是有点过于甜腻了？这不禁

让人想起龚自珍的一句诗：文格渐卑庸福近。

漫画此时也变了风格，虽然漫画主笔依然是方成。在这幅画中，读者可特别注意马、列二人及党的干部向前伸出的方向绝对一致的手指及走在闭着嘴的工人与张着嘴的干部前后的那巨人的脚印。从画上看，这穿皮鞋的人是从后边超到前边去了，且个头极大，谁呢？不会是导师幽灵吧？但幽灵连影子都没有，怎么会有脚印？

旧日《观察》的风采也不是一点都没有，如在第8期上推出的一则“献刊购债”，就颇具储安平式的机巧：由《观察》献出200个“3月定户”，“把收到的刊费去购买公债，读者先生一方面帮助本社多购，一方面自己又订阅了刊物，公私两利”。这一计划后来兑现了七、八成，可见《观察》那时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但这已明显属于小打小闹了。

复刊后办了13期，不得不收刊了，当然用的不是这个字眼。登在最后一期上的，是一篇短短的“改组声明”（1950年5月16日）

《观察》社同人为使自己的工作对于读者和人民有更多的、更有系统的贡献，决定将本刊加以彻底的改组。《观察》出版至本期止，即告结束。此后本社同人将加入新组织的《新观察》半月刊工作。《新观察》半月刊是一种综合性的国内时事刊物，由新华书店出版，其内容如下……

这一行动35年后用《新观察》“自述”的口气说起来，已另具一番风采。在这自述中，储安平与原《观察》已不见一点痕迹：

1950年7月，我诞生了。一位历史学家和几位有经验的编辑，为我塑造了最初的形象。……我生在一个变革的时代，

我本身也在不停的变革之中。仅仅半年时间，历史学家走了，来了一位新闻记者；不久，新闻记者又走了。这时候，一位女记者和一位女画家又将我的形象改造了一番，我成为一本时事、政治、通讯报道和文学、艺术、生活的综合半月刊——“活泼清新、图文并茂、上下古今、无所不谈”^①

.....

文中所提到的历史学家是黎澍。用他自己的话说：

1950年以后，我就开始成为党中央宣传机关的工作人员，到1960年调出为止，我所作的工作只有一件，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1950年5月1日创刊的《新观察》当然属于黎澍的这一工作期之内。据林元回忆，当时政府待《观察》的老职工颇厚，全部按干部待遇，具体工作安排在新闻、出版系统，北京上海随便选。林元选择北上加入《新观察》。他清楚记得，黎澍曾通过储安平频频催他尽快成行。想来这时两位主编可能正在共同努力筹备新刊。

但《新观察》的办刊方针与工作方式，恐怕既不是储安平、也不是黎澍所能定的。待林元到了北京，已经是黎澍要通过他一次次请储安平到社里来的局面了。储来得很勉强，到后来则根本不露面了。从他的爱刊如命外加刚愎自用，到此时闭起眼睛、硬起心肠不再作任何他想，不知要咽下多大的痛苦。这时已到1950年底。

他显然是带着与这位编过《文萃》的中共地下党员的深深的隔膜离开的。他不知道，而且他永远不会知道黎澍的见解

^① 这四句话出自乔木。

了：

“将近半百年历史的《申报》办下去有什么不好？非要改成《解放日报》；《观察》也非要换个名字收编，气量之狭小，无以复加。”

储安平随后即被任命为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他当时或许有重打鼓另开张再干它一番事业的心愿，因为不少人都记得他曾经提过的各色各样的建议。他甚至亲自蹲在总店的门市，打算过问书籍上架等事宜——这都是后来人们怀着对他的怜悯而当作笑话谈起的，可见当时就不曾被认真对待。他的努力象是碰在一块巨大的软泥墙上，全部吸收进去而无任何反响。

1952年，他被改任为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在这一任上，也未见有特别的作为。34年后，一位他当年不曾觐面的部属，湖南岳麓书店总编辑钟叔河再版了他的《英国采风录》（距初版已有40年）。钟叔河怀着一丝难于察觉的伤感写道：

谨以新刊本书作为对这位抗战期间在湖南从事过教育工作和新闻工作，在50年代又担任过新中国出版局长的前辈知识分子的纪念。愿他安息。

据说为出这本书，钟叔河还特地征求也曾在英国当记者，并且跟储安平还很可以谈谈的老友萧乾的意见。萧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储把英国说得那么好，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再版无疑将再一次误导青年。听了这番意见，钟叔河还是决定出。不幸的是这本前发行局长的书只印到3000册（聊可告慰的是今天中国的好书大多是这种命运），连他的前妻、他的子女和学生都没有见到，足见几十年了，有着亿万读者的中国

图书发行工作依旧令人莫名其妙。

到了1953年，“上边”曾对前边讲过的收编行为有了一点反省，有意成立“新观察社”，由储安平任社长，戈扬任总编辑。不料这一方案立即遭到具体工作人员的反对，其中以与他共事最久的林元最为激烈。他们是不是出于政治考虑，不愿呆在非党人士的“麾下”？要么就是储安平那种自己不要命连带别人也一同不要命的干法让人受不了？再就是他的不知怀柔，用今天的术语说是不懂“感情投资”着实伤了一批人的心。其实储安平并不是没有感情，只是没有悟到这也可以当作“本”来赚取利润而已。作过《观察》南京通讯员的冯覃燕至今记得1949年他结婚时，突然接到一封北平来信的情景。“那是正在流亡的储先生写来的，真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消息。他抱歉说无法来参加婚礼了，只好简单地写封信祝贺。”50年代初，也就是储安平在发行局长任上的时候，冯覃燕到北京求职，“储先生到车站接我，那时每位局长配备一部三轮车，车夫兼勤务员。接到之后，储先生让我坐车先回他家，自己说了一声‘还有事’就步行走了。”

1954年，他开始以全国人大代表、《新观察》特派记者身份赴新疆采访。此行看来并非出于乔木单独的决定，而是与安平本人充分商议的结果。读过《观察》的人都知道，储安平对新疆和新疆问题有着特殊的兴趣。他曾在伊犁骚乱前后长篇连载一位不知名的投稿者的长篇目击报道，又不顾别人的反对，出版《观察》新疆专号。他一定渴望亲眼看看新疆，特别当这片广袤与骠悍的土地和平解放之后。

他去了，精神十足——储安平在有事可作的时候总是精神十足。《新观察》总编辑戈扬清楚记得每每在寒冷的清晨送

他上飞机的情景。为这次采访，专门给他配了一部车和一名助手，储安平对此相当满意。他的报道一篇篇发回来，在《新观察》、也在《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连载，接着还出了单行本。然而，除了“乔木同志感到很满意”之外，这批费时费力不小通讯几乎没有任何反响。人们当时就没太注意，到今天差不多已经忘干净了。这情形不知储安平本人有没有感到。他只是一味忙着，把孩子们丢下无人照料。^①

就在这一片匆忙之中，1956年来到了。

和1976年一样，1956年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一年。就在这一年，私有制在中国被消灭；至今还使人捉摸不透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来了。

六

【谋】 móu^①计策、计谋。《出·大禹谟》：“弗询之谋勿庸。”《三国演义》：“某与吕布同乡，知其勇而无谋”……^④图谋、营求。《左传·宣台十四年》：“贪必谋人，谋人，人亦谋己。”谋略：计谋策略。《三国志·吴志·陆逊评传》：“子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

——《辞海》

在1957年春天的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分别会见各界人士。在与新闻、出版界人谈话的时候，他老人家突然转

^① 储安平的次子从上海来投奔他。吃饭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桌上多了一个孩子：“这小孩是谁？”他问。“是望德呀！”大家齐声答。当父亲的这才恍然大悟。

向光明日报的代表,问道:是不是共产党员?那次出席觐见的总编辑常芝青,他站起来,说:是,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说: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此时是3月10日。

考虑到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的同时还是伟大的谋略家这一事实^①,很难断言他那时究竟是确实不知道光明日报由谁人主编,还是明知故问。因为,第一,光明日报向来就不曾由非共产党人士编过,先后离任的前两届主编胡愈之与邵宗汉,都是身份不常而不是从未公开的CP;第二,早在9个月前,在他《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后,中宣部就已经紧锣密鼓地活动着,为光明日报物色总编辑。在这个讲话里,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一年后的局面:

现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其中有些人对我们还有很多意见。……形式上没有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实际上,这些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就是反对派,在外交、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要改善。我们要让民主党派人士,谈出自己的意见,只要说得有理,不管谁说的,我们都接受。

^① 李维汉有一段委婉而精采的论述:解释为什么谋略会伴随毛泽东一生(起码是1927年或1935年之后的一生。当然张国焘不这样看。1921年他就发现这湖南乡下青年好设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他便得意地笑起来。”)。

毛泽东同志一生几十年都是在战争和斗争中度过的。对于战争,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政治上同反动派斗争(此处的“反动派”,或许应包括不同阶段的、本营垒内的政治对手,如张国焘、王明等。——笔者),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策略同样非常英明,可以说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这些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对他脑子不能发生影响。

要说话，总得有块地盘（大众传播媒介）。那时还没有《世界经济导报》，也没有《现代人报》，不知谁首先想到了光明日报^①，而且是非共产党员办的光明日报，于是开始物色主角。本来，第四届总编辑的第一人选是徐铸成。当时，这位倔脾气的老报人正经历着他那份缘抗日而创刊的文汇报的第三次停刊：第一次是在1939年，被日伪停掉的；第二次是1946年，国民党停的，这在前一节已经说到；第三次停在柯庆施手里，时间是1955年，公诸于世的名义是“自动”。

1956年夏，徐铸成正带着他文汇报的原班人马，北上首都，在与柳湜、叶圣陶（这两位是当时的教育部长）和谐的合作中，轻轻松松地编着一张周二报纸《教师报》。姚溱找到他。

“喂，心情怎么样？”这位当年的宣传部副部长问。

“很好，很惬意。你瞧，住在乡下，有一部小车，没事就到处玩玩。”

嘿，昧心之论！你这人一辈子办报，现在一周两张的专业报纸，你过得了瘾、安得了心？”

“的确安心。既然说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文汇报停就停吧。现在教师报对我不错，就安心在这里做了。”

姚溱不再与他打迂回，单刀直入解释形势：光明日报决定完全交给民主党派，章伯钧仍任社长，常芝青撤离，中央的意思叫他接任总编辑。面对这足够诚恳的交底，徐铸成也以实言相告：

“做事总要有一个班底，不能一人唱独脚戏。现在我的人

^① 后来，又想到何不让文汇报复刊？于是文汇报1956年10月复刊。这两份报纸，在1957年春均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夏天以后，则作为“资产阶级方向”的代表，受到首当其冲的批判。

马都在教师报，让我光身一人去上任，这台戏唱不了。”一再谢绝。

“好，那就不勉强了。”姚溱说。

徐铸成拒绝了，中宣部开始进行第二人选方案。这次是乔木出马，亲自登门征求储安平的意见。

虽然又同龄又是小同乡，与他这位被封过三次的同行比，储安平是“嫩”多了。英国派头的他不认“班底”说，也不以“上无常操”，或者“上下一日百战”为然，那是上百、上千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有政协吗？有宪法吗？他只认 fair play（费尔泼赖）。他不用拉拢谁，也不用提防谁，包括，比如说，常芝青。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天真，令人心恻。

在谈话中，乔木特别提到《观察》，提到他成功地编这本刊物的时候，联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希望将来主持光明日报，与这批旧朋友还要多联络，鼓励大家多写文章、多说话。乔木接着还特别补充说，过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虑邀些帮忙。

虽然出自 Prof. Laski 之门，安平毕竟是中国人。他潜在的虚荣心，他对“三顾茅庐”之恩德的顾念，再加上他 1949 年之后实质上的不得志，都决定了他的欣然受命。乔木接着的作法也是颇具人情味的，先安排他到青岛去度蜜月（此时正值他鳏居 10 年之后的第二次新婚）：

“把新疆的采访写完，上任的事以后再说。”乔木亲切嘱咐。

他去了，并在海滨写作，直到秋天。1956 年 11 月，他收到章伯钧的信，称经“各民主党派公推”，请他出任光报总编。他于是也一本正经地复了信，表示接受。今天可以肯定的是，这“公推”显然不过走走形式而已——中国八大民主党派近 40

年历史,类似的形式不知走了多少——但这次,应该说,“策划”与“走”的双方,都没有丝毫恶意,虽然这已成的局面并不是人人都满意的——这点,储安平当时就有了察觉:

我当时有这样一种感觉,章伯钧并不欢迎我作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对我的态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过去太没有私人渊源,而党的推荐我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也不好拒绝。

读者在这里可将储与胡、章二人的亲疏作一个比较。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斗争中,他主要罪名之一竟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章罗联盟骨干分子”。

1957年初,按照乔木“联络老朋友”的指示,他去了一趟上海,从他后来所作的交待看,一到上海,就去拜望徐铸成。

当时,文汇报奉中宣部之命复刊已近半年,那场著名的关于电影的争论,正闹得火热。当时,宣传工作会议虽然还未召开,“双百”的提法已经传下来。徐铸成很兴奋,但也有不少疑虑。两名小同乡都不再提10年前之嫌,反复切磋这8个字的含义。此时正主持着一张报的徐铸成处处显得比较保守,而即将接手另一份大报的储则“冒”得多了。他不同意“争鸣”只限于学术界,觉得应该扩展到政治领域,鼓励大家多讲话。他断言:“百家争鸣是全面的,电影讨论只是一个局部。如果电影都不能谈,还谈什么百家争鸣?”

读者在前面已知道储安平办观察的劲头,对他在此刻所作如是说定觉毫不足奇。有趣的是直到30年后,在1986年一次软科学的闭幕式上,当一位开明的中共高级干部此观点再度明确提出时,与会群众竟欣喜若狂,于是引出郑重的否定与又一次的再否定,直到今天尚未了局。

当时，储氏新的出任已在上海传开，原光华同学决定聚会作东请他。据赵家璧回忆，晚饭约在7:00，大家左等右等，等到9:00这位老学友才匆匆赶到。坐定之后，没吃几样菜，就被一部小车接走了——其红火与煞有介事至此。

几乎与此同时，在1957年那乍暖还寒的季节，毛泽东为说服党内接受“双百”的“亲莅巡说”，也正在紧运行中。在自主演说极为萎缩的中共内部^①，享有巡说特权，并运用得极为漂亮的，只有伟大领袖一人。看来他对此也颇自知。终其一生，这法宝只在三次极为关键的时刻拿出来用过。这是第一次，以后的两次分别是1966年发动文化革命前夕和察觉了林彪班子的“不轨”之后。

先是在9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而且开宗明义就谈到今天谁都不大敢碰的“言论自由”：

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讲话，我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有人问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批评得倒，也该倒，证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

接着和文艺界人士谈话。当时有一种风气，一篇文章的好坏，不看文章本身，只看“上头”对这篇东西的态度。在那次会上，大家很想摸摸主席对陈其通等四小“左”的态度。毛泽东的反应干脆利落：

^① 其萎缩的程度实属世界罕见：德高望重的人大副委员长与孩子们联欢时，还要拿着稿念。这情形最近略有突破，如赵紫阳总书记在十三大之后与记者的公开会见。

说我说陈其通四人的文章是好的，真奇怪，我说是要放的么！

当时显得最为开明的康生立刻为这句话作注：“这是他们对‘双百’政策有怀疑。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正适合他们的胃口。”

在与新闻出版界谈过话之后，又会见高等院校校长，开场第一句话即为：马列主义从来就是主张百家争鸣的。

这位巡说人接着去了天津，这次是对党员干部：

对百家争鸣没有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看完全不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

三天之后，老人家又到了上海。这里有他的好学生柯庆施，而且下面这番话，就是在柯庆施主持的会上讲的：

同知识分子问题、科学艺术问题有密切的联系，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问题。关于这个方针，我们还需要在党内作许多宣传解释工作。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太危险了。百花齐放，放出些鬼来怎么办？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我监督你，我还用你监

督呀？你民主党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我主张收。中央认为主张收的意见是不对的。……不但在纯粹的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

接下去到了南京，会见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的党员干部。此时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没有谁能否认，在这一连串的会晤中，毛泽东雄才大略、博闻强记、风趣幽默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至于与会的大多数，如果不看他们毕恭毕敬的迎送，不听他们当时报以的掌声，仅从他们四个月之后的作为来反观，当时多半只有跟着傻听傻乐的份。

与这轻松融洽的气氛相对照，对人民日报的批评显得分外严厉，除了上文所引“死人办报”，还有：

宣传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宣传会议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省委书记会上为什么听错了？这叫“各取所需”。最近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中央开了很多会议，你们参加了，不写，只是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我们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谁来参加会。

在这一阵紧似一阵的批评中，毛泽东提到了光明日报：

对当前政治情况的讨论，光明日报连发了几篇，都是当前重要的政治情况（如“为放而放”）这些情况编辑部应该讨论。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铸成觐见毛泽东时的那番景象，也就是本章开头所说的那次会见。这次没有储安平，但常芝青与邓拓都在场，还显得特别受冷落。那次会见，徐铸成迟到了，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听到康生的介绍，老人家立即伸出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你们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翻翻别的报纸。”

当时徐铸成正被上海市委“反击”得心灰意冷，听到主席的这番赞赏，“我心中翻起热流，感到无比温暖幸福。”

这时康生宣布，有什么问题要主席回答的，请提出来。

徐铸成赶紧端出他心中最大的结：“宣传双百，心中无数，抓紧一点还是松一点，该怎样掌握，请主席指示。”

读者此刻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曾经考虑到“鸣放”的高度和深度，徐铸成此时根本没有触及，更不必说提出诸如民众对权力机关的监督与批评等等的了。他只是向党中央主席请教，如何更好地宣传中共的方针。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只讲了一番片面性的问题。在说到鲁迅、李希凡、王蒙等人都有片面性之后，突然说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片面性比较少。”那时姚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名干事，在座的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但这位小姚不但被特别指定到北京参加会议，还受到这样的当众称赞，足见毛泽东要

培养自己得心应手的理论家的心愿在那时就埋下了。历史已经证明，姚的文字果然在后来的每个关键时刻，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徐舍不得放过机会，仍旧追问：“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说，是征求高价的批评，让人们畅所欲言，说的不对慢慢再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他在这里并不敢强调严正的批评（如马寅初的“人口说”）对党对国之宝贵，只问说错了能不能不压，而且限定了政治思想领域。

毛主席回答道：“你的意见很对、很好。”

徐依旧不放心，举出因电影讨论而遭围攻的实例，追问：“请问主席，这时我们应该怎么应付？”

徐铸成不愧老资格报人。他的这个问题之足够咄咄逼人，不在语气，而在回答者无法用含混的语言大而化之，毛泽东当然不会被问住，他在几乎不能回避的时候还是避开了：

“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批评及反批评的小结，这就叫正、反、合，这就叫辩证法嘛，你同意不同意？”面对如此玄妙、又如此高屋建瓴的答案，徐铸成还能说什么呢？他于是点头称是：“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预告了共产党的整风：“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就是小民主上再加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

毛泽东下面的一番话很难不令人感动。他诚恳地“交底”，说他的思路：“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谈话，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马他们的文章，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

此觉得有好好说说的必要。”他承认共产党的拿手好戏是打仗、专政，“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全国性办报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研都是这样，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他并且嘱咐：“开会的时候，就是要党内党外的人在一起，共产党不要关起门来开会。”这不可能不给人以党内党外不分彼此亲如一家的印象。

4月30日，毛泽东落下了他这场伟大的战略布署中最后的也是最浓重的一笔。

那是“五·一”节前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自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大家帮助党整风。他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宣战。”他还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并责成专人就民主人士的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问题专门开会征求意见。

这次时间地点选得可谓匠心独具：春天已经到了，第二天就要过节，伴着巨大的红灯笼，被告知以“阶级斗争结束”！想来也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中，毛主席才会亲切地使用这样的字眼——这字眼后来传到我们主人公耳中，又从他口里说出来，成了十恶不赦、万劫不复的罪行：

“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五·一”节之后，再未见毛泽东出来。用今天的眼光看，颇似临战前的寂静。

1957年4月1日，储安平正式上任。完成这一形式的，正是对他“不好拒绝”的章伯钧。请看他自己的回忆：

上午9:00，章陪我去了光明日报，到了报社，各

部主任都在欢迎我们。章伯钧说：“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停了两三分钟，他又和别人闲聊了几句，坐了五、六分钟，他就先走了。

接着当然是新任总编致辞。储安平此时抛却了1946年办《观察》时的作派，不再强调自由、民主、进步、理性。他开场的一番话至今光明日报的老职工都记得：

“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们还记得，在后来的编辑部大会上，他也一再重申：“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以后若是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

他开始上班了，那时，共产党支部在光明日报的活动是地下的，组织生活总是在下班后进行，而且是在常芝青家。但民盟的组织生活在报社内完全公开。4月9日，储安平回娘家一般地参加了民盟支部的组织生活，还发表了讲话：

4月1日来时，心情很平静而从容。和大家相处如家人感觉。为什么？是否胸有成竹？是否有大政方针？是否拉了多少稿？是否摸了底？我却什么也没有。只准备和大家商量。受党的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待人，向人学习

在讲了对这张即将接手的报纸的印象之后，他又说了一番其实不该在这种场合下说的话，后来都成了揪住他打个不停的辫子。不能说他对这种“受命于非常时刻”之凶险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对凶险将来自何处显然估计错了地方：

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无困难，这是规律。民主党派多，一定要挨骂。我们要估计到这些困难，做得尽

力，骂也不怕。

办报就在风浪之中。是否符合事实，风浪也不怕，要登。要精神。要沉得住气。

接着，他开始一一拜望各民主党派的宣传部长和大学里的著名教授。前者属于例行公务，如民进的冯宾符，农工的严信民，民盟的罗隆基、萨空了，民革的王昆仑等等。后者当然都是一些声气相通者，包括数十年旧友：袁翰青、金克木、杨人梗、费孝通、钱伟长、彭子冈、王恒守等等。这些人后来当然也一个不漏地同时被激发起来，又同时遭到反击。就在这前后，他开始与编辑部的同人交谈——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他“见了94位同志，其中26位是个别谈的。”虽然这在后来也成了罪行：“施展卑鄙伎俩，企图从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这个环节上来拉拢、收买青年、篡夺党的领导，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准备下后备力量”，不过，这种干劲，在光报创始至今的十多位总编辑中是绝无仅有的——当然，这也有说道，“反革命热情高涨”云云。汉语的遣词与思维逻辑到了这个份上，真该是“无声胜有声”了。

当时，常芝青还未撤出，作为原任，储安平对他起码在表面上是很尊重的。比如第一次向社长章伯钧汇报工作，就是在与常及总编室主任高天充分商量并取得一致意见之后。但此时他一定感到当初勇气十足的单枪匹马上任是有些唐突了。这感觉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毛主席共产党这种宏大的气势面前，他的班子有点力不从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也是他后来最大的罪状之一——“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党）鼓励大家鸣放，而光明日报在鸣放的报道上落在后面，”费孝通当时是这样描述他的：“很起劲，把光明日报看成他办的企业。”

他开始拉人。首先盯住的当然是大公报，他就商于常芝青，能否在保证光明日报领导层有4名共产党员的前提下，请王芸生在这要紧的时刻帮一把。然后是亲自出动拉人，为光报拉有学问、有能力、有影响，还要有色彩的人。最先盯上的潘光旦与费孝通——他这时肯定已经完全忘掉费先生50年代初在他复刊的《观察》上发的那一串既无学问也无色彩，而且自己决不会将其选入文集的那些准垃圾，他更看重他真正的人，而不是作给人看的人。他向他们交待政策——“政策”是储安平者流说了算的么？这实在滑稽，也实在堪怜——拉稿，责备费先生不该把《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那样的好稿给了人民而不给光明。他计划给费专辟一个专栏，甚至要将费调到光明日报社，已到问费一个月拿多少薪水的程度。

他深感光明日报缺乏笔政人才，罗隆基向他推荐陈新桂，说这是民盟总部干部中，理论水平比较高的一位。储进一步打问此人为人作风如何，是不是容易共事。罗隆基说：“这一点要说清楚，陈这个人很直爽，有话就当面说，不顾别人的面子下得了台下不了台。”这种特色（或称缺点）储安平是绝对不在乎的，但章伯钧不同意，只得作罢。后来事态发展证明，陈新桂确是一名干才。他的言论与态度，仅从57年暮春的版面上看，如果不是最突出，也仅次于章乃器。反击时那些常用的词对他都失去了效用，只好给他套上一顶无可无不可的帽子“荒谬绝伦”。

他还曾与章伯钧多次权衡，能不能在社委会之下设个常委会，要么多设几名副社长？他还想成立社委会的顾问团和编辑部顾问组……尽管时刻想着“分寸”，想着各种势力的协调——这事实实在在够累人的，而我们中国人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

这上面了——他的急切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简直到了不避嫌的程度。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他的这些想头，没有一个兑现，包括他带着几乎孩童般的快乐执意要发表的钱伟长夫人与周培源夫人推荐来的一篇小品文《公开征求拼音专家，请将左文译成拼音文字》^① 储安平直到辞职的时候，还是单枪匹马一人。

5月7日，在向章社长作了全面汇报的基础上，他第一次在编辑部全体大会上公开他的改进报纸工作的几点意见。

首先，他提出在新的政治形势下要更进一步把光明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报纸。

怎么办？他提出双轨。一方面团结、组织和联系全社会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另一方面努力反映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和要求。他认为，“光明日报应该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进行监督”。布置要闻部的工作时，他要求他们多“搞人民生活(物价等)问题的报道，要主动去发掘，体现政治监督，代表普通百姓讲话”。或许是在与高级编辑人员谈心时，他曾发表过，“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一类评述。可以认为有所指，也可以认为是一般议论，到后来都被原封揭发出来，令与会者个个义愤填膺。

^① 这篇征求译为拼音文字的小品文的标题是《施氏食狮史》：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氏适市，适十硕狮适市，是时氏视是十狮，恃十石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试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食时，始识是十硕狮尸，实十硕石狮尸，是时氏始识是事实。试释是事。

对他的办报方针的批判是严厉的，已没有丝毫可回护的余地：全盘否定党的领导下的成就，怀着重大阴谋，实践一套完整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至于双轨，那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要搞的当然是单轨，是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的另一条轨道。

应该说，储安平提出的种种方针，不会是他信口开河，老实讲也没有多么了不起的独创性，其内核，主要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在4月里召开的第七次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李维汉明确提出，“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后来这一精神衍化为让光明日报与人民日报唱对台戏。李维汉作人一生唯谨，很难想象这种字眼会由他首创。遍查文献，终于找到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过，这种严肃又戏谑的话，还是出自毛泽东。但李维汉的态度是明朗而坚决的，他坚信“对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一个根本性的安排。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与的权利义务范围之内，享有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和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不仅是党的政策要求，而且是宪法赋与的权利。”而且，作为一种信条——如果不说是策略的话——从理论上讲，他也并没有改过口。不仅在1957年4月间如此，就是到了夏、秋、乃至到了他口授自己的回忆录的80年代中，也是如此。不幸因为汉语的无比丰富以及多义性，上面的一段话，在不同的局面下，是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的。

接手光报，储安平最拿不出办法的恰恰是他最看重的社论；对此，他曾向各民主党派宣传部门彻底交底：

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

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社务委员会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委会授权。在没有授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

此外，对于始自延安新华日报改版，而降至 1957 年甚至降至今日都不惮其迂的“问题写作”，也成了他“改进”的目标之一。对于报纸通过“搞问题”而指导工作，他并不是不知道，但他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已有所不同。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鼓励大家独立思考，对报纸指导工作的要求已经减少了。”他对报纸的理解是：“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对于重大问题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他的底气似乎太足了点：“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

那么，他此刻是不是不再认为“（共产）党是我的后台”了呢？应该说并不是。笔者甚至倾向于认为，自 1949 年至今，很少有谁的言行不认为“党是我的后台”的。就比如读者诸君正在读着的这篇文章的写作与发表，就是“党是后台”的直接结果。问题党不是一个人；就算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死了的人；就算是死了的人，也总有不只一篇白纸黑字的文章留在世上。储安平太相信党对他作为一个囫圇个的、有思维与创造能力的活人来相信的程度了，更忘记有人或许还会想到他的祖父、他的师傅、还有他在国民党里的私人朋友。以此来对储安平智力水准下判断是不公正的。他太着迷了，迷到犯傻的程度。

或许并不是这样，他其实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考虑进去

了。但他答应下来的既然是“做事”而不是“做官”，就顾不得那许多了。而且，就在他主持光报的短短的70天中，这种情绪也没打算隐瞒，几乎所有的人都记得他说的那番颇带了一点感情的话：

光明日报让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办，这句话说得很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么样，看看我到什么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进。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风浪，担一担斤两。我要看碰上多少暗礁。

共产党向全社会正式通告自己的整风，是在5月1日，即毛泽东天安门城楼座谈会的第二天。也正是从这一天起，被伟大领袖和中共的诚意所感动，觉得再沉默就太太太对不起党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包括他们之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开始正式鸣放。

头几天，大家不怎么想动；或者说，还不知该怎么动；要是 对中华文明的路数比较熟悉，就知道，这时大伙正不约而同地按照中国的老例，先看看再说。真正着急上火的，只有那些自以为对帮助党整风负有重责的人，如储安平、钦本立等。为发动鸣放，或者换句话说，为了“把报纸引向资产阶级方向”，他们真是煞费苦心。储安平“最恶毒的”九大城市座谈会的主意，就是在这绝境中逼出来的。

到了5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开始召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各部门、各省市和各高校，也都档次递降地依样召开，请大家帮助党整风。一开始，当然还是启发，鼓励；渐渐地，有人发言了；渐渐地，发言愈加尖锐起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则把其中最“精采”的送上版面，虽然后来储安平遭到众口一词的指斥，说“什么‘恶毒’他登什么”。这实在有

点冤枉他了。他只是追求言论自由，追求不受限制地表达这一原则。某些重要的反驳意见，如马寅初认为“高校就应该设党委，没有党委书记我这个校长没办法做”这类言论，他都照登。

今天的读者大约只知 1957 年有右派却不大知道他们怎么个“右”法。择其要而述之：

1. 党委治校抑或校委会(教授)治校(黄药眠)；
2. 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作风(章乃器)；
3. 民主党派参加协商应有名有实(罗隆基)；
4. 文教界共产党员负责人不称职^①(陈铭枢)；
5. 共产党以党代政，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黄绍纭)；

党政不分，中央是根(杨玉清)；

6. 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李伯球)；

党员特权造成党与非党之间的墙与沟(龙云、张云川)；

7. 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协制度需要改造(叶笃义)；
8. 三大主义(官僚、教条、宗派)限制新闻自由(张友鸾)；
9. 要求人生三大事：物质生活保障、精神的民主与自由(章伯钧)；

10. 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是政治设计院(章伯钧——这话最初是毛泽东讲的)；

11. 群众鸣放得越彻底，党的威信就越高，把鸣放重点放

^① “不称职”说当时遍及各界，如经济界。原话为：听说一些领导财政的同志曾公开宣称，根据几年来的经验，总结出来这样一条规律，即是国家的财政收支如果不能平衡，势将导致物价上涨和物资供应的紧张状态。其实这是经济常识。连这样的常识也要从亲身经历里面去总结，我们的财政政策就未免过于盲目了，我们的财经工作也未免太儿戏了(陈振汉)。

到基层去(王造时);

12. 成立平反委员会(罗隆基——他作此语的出发点是怀疑现有的党政机构自我改善的能力);

13. 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大学学生);

14. 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套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荣子正);

15. 我们对当前经济科学的意见。这是陈振汉等六位经济学教授特地聚在一起认真讨论之后准备上呈的,事后对他们进行的概括性批判为:“会上六人都发表了意见,污蔑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教条主义。国家经济工作中有很大缺点错误却不准公开讨论。企图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国家的经济建设,说政府应该吸取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来制定政策,制定经济政策时应请经济学家参加设计,政策制定后应公开讨论监督。”(陈振汉、徐毓楠等);

16. 共产党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不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群众不敢信任共产党,因为他们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若你们再不争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路,总有那么一天了。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大家也不会卖国(葛佩琦——这就是后来被概括的“要杀共产党”的那段话的原版);

17. 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定息不是剥削。(章乃器);

18. 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储安平);

.....

储安平的这个发言是在6月1日作的,差不多是统战部座谈会闭幕的前夕了。储安平自己已交待:

解放以后，一般说来，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5月30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6月1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6月1日发一次言。我31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31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下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伯钧同志说我的发言稿罗隆基看过，并无此事。

尽管储安平是一个风头很健的人，笔者依旧倾向于相信他确实直到5月31日还不想到会上去说话——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无话可说。但当一顶顶高帽送到头顶，一声声恳挚的要求送进耳廓，他让步了。而他一旦决定讲，就想博个满堂彩。用后来章伯钧的评价，就是“现行政治上的一些人，大都只说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要汽车，干部、房子之类，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

在那天的会上，他不但持有照本宣读的发言稿，这稿还是打印好、估算好版面，并特别注有“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发言稿”，“希用原题、原文勿删”字样的一份交报馆直接发排的成稿。

他期待的效果出现了。会上即博得一片喝彩，会下更盛传不衰。大家都记得马寅初当时即用手拍着椅背，连称 Very good, Very good! 第二天，在见报的同时，中央台全文广播。他以少有的亲切对孩了们说，“来，听听，这是爸爸昨天在会上的发言。”他不知道的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那篇给党内干部阅

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已发下半个月,此时正是文中早已点明的“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顶点在哪儿呢?至今未见任何权威性的文献加以说明。若将随后批判的火力的强弱及对人头处理的宽严作参考,高潮应是那个与治蝗虫的农药同名的“六六六”事件了,即6位教授在6月6日应章伯钧之邀紧急聚会,讨论鸣放形势。对照他们当时所怀有的悃诚,和后来对他们的解释,只能说,“足令历史带泪看”。章伯钧先介绍学校的局面,请大家研究民盟在运动中应该如何工作。费孝通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情绪激烈,情况十分严重。老师若去给学生领头,事情就闹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完了。曾昭抡认为形势一触即发,共产党大意不得。钱伟长特别指出学生在到处找领袖,期望着教授们站出来说话……他们决定这时候一定得出来,不能让共产党进退不得,要帮助真正继承了列宁衣钵的“毛公”,要帮助共产党稳住局面。

此时,距人民日报那篇晴空惊雷般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发表只有2天;李维汉那突然换了一副面孔的总结发言。也将在2天后作出。他们怎么会料到,毛泽东对“六六六”的理解竟是这样: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

李维汉去世前的一段回忆,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局面

形成的过程：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发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

在这场较量中，很值得共产党骄傲的，是那段几乎每个中国人在文化革命中都背得滚瓜烂熟的语录——“阳谋”：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

这确是事实。毛泽东的警告在1957年1月即已作出：

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

但怎么解释4月30日天安门城楼上的座谈会呢？怎么解释那几乎征服了所有文化人的谈笑呢？从4月30日到5月15日，只有半个月，究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者不过什么触动，使他一下子暴躁起来，而酿成这半个世纪都未必缓得过劲来的悲剧呢？

李维汉这样回忆在5月10日前后“向主席汇报”的情景：

……及至听到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怎么估计罗隆基这几句话对毛泽东的伤害也不过份。这伤害不仅仅在于诸如谁打天下、谁坐天下，交椅怎么摆等等要命的问题，而在于它是一个旧伤疤，伤害一直可以追溯到1910年末，追溯到他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①。更不可以忽略的是，这伤害也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加予的，张国焘、罗章龙、王明、张闻天，也许还有别的人，总之，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洋教育的人，没准都让他十分不舒服过，特别在他们还没领教他的手段而“放肆得很”的时候。当然，当他们只在

^① 当时周作人教授对青年毛润之很是忽视；图书馆的高级职员也因他用龙飞凤舞的字体书写卡片而面斥；当胡适得知他不是个大学生而仅仅是一名图书馆助理员后，便拒绝和他交谈；对此，毛曾在给家友人的信中流露：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

他的智慧下活动，他可以称赞，甚至尊重他们；要是想反，他就要让他们看看，究竟谁“大”，谁“小”；谁真有学问，谁“书读得越多越蠢”。对这批衣冠楚楚、满口洋文、爱洗澡、爱吃药的秀才们随意嘲弄，打趴下再拎起来，拎起来再打下去，可以说是伟大领袖终生乐此不疲的游戏。

5月上、中旬，相当一批亲随已经窥知了毛泽东的意图。党内文章一下达，高级干部们心里都有了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于是东施效颦，也残忍地玩弄起那些“不可一世的高级知识分子”来。比如人民日报依旧在发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如不但统战部的座谈会仍旧开，新闻界等还新召开了会议；如几次三番催促储安平之流发言；甚至担心右派品种不齐，有意制造一些。请看李维汉的回忆：

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会被划为右派。

但当时一些已知情的中共高干确实有意保护一批人，究竟是有组织的布置，还只是出于他们个人的友情，今天就不得而知了。今日学界盛传的是，田家英——他是毛主席身边的大秘书，文化革命刚刚开始就自杀了——特别着急，急得火烧火燎，一再提醒他30年代就相识相知的老友曾彦修，让他快快闭嘴。不过曾彦修对此予以明确否认。他清楚记得的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些“过激鸣放”把他吓坏了，比如“到人事科抢档案”、“到天安门示威”等等。他觉得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只好就商于田家英，问能不能把他从这里调开。田的回答是：“你胆子太小了，要放手发动群众，根本还没有发动起来嘛！”他又去找

当时文化部主管出版的副部长陈克寒，陈也说：“没发动起来！真有什么事也没什么不得了，怕什么？！”曾彦修记得很清楚，这时确实已不是5月初而是5月底。曾彦修认为，这是大家把田家英类似传说中的另一次事先警告安到了他的头上，那次是对张闻天；时间是在2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那次，田家英与胡乔木苦苦劝说张闻天不要发言，张还是发了，从容而坦荡。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柯庆施此时心情可能相当复杂。他特别关照文汇报，凡是北京方面来的给人戴帽子的稿，都要事先与他通气。那位老黄牛一般只知干活，不善言词的文汇报老人严宝礼的名字就是北京点了而由柯庆施勾掉的。这一义举，并不表明柯庆施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与作用有什么与毛泽东不同的见解；如果非说有，也只在用语方面有了一点突破。他独到的评价是：中国知识分子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

李维汉也有要保的人，他只好耍起小技巧：

工商界座谈会开始于五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

不会有人出来保护储安平。《这是为什么》中的一句话：——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

台”——已经规定了他此后无可更改的被批斗的地位。社论发表的当天下午一时半，储安平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这时候，他那“经民主党派一致推举”的可爱形象已不复存在。史良当天即就“党天下”稿向她认为应负有责任的章伯钧兴师问罪。章伯钧此时对储安平的了解显然比两个月前勉强接受他的时候多了一点。他的回答是：

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拎出卢郁文^①来，卢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才有定评。

接着，6月9日，储安平的老朋友袁翰青等人去看他。在被问到“打算如何就‘党天下’问题写检讨”的时候，储的回答是：“可以写，检讨自己对‘知无不言’是有界限的这一点认识不清。如果知道，就不说了。”袁说，如果这样，你还是别检讨了。

11日，人民日报点民盟的名：“可注意的民盟动向”，费孝通来看储。此时，本文男主角的“心气儿”似乎还很足。费孝通回忆：

谈到“党天下”的发言，他拿出一叠信来，说许多人支持他的发言，表示颇有群众。并谈及要一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席才能当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要他再当

^① 卢郁文，民主人士，在鸣放阶段几次提醒向党提意见要实事求是，不应只讲缺点不讲成绩。后来据称为此接到漫骂威胁的匿名信，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笔者至今倾向于这是一场类似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文章发表后，倾接南京大学郭罗基信，称：“我要告诉你关于卢郁文的恐吓信，并非国会纵火案式小把戏，确有其事。直到1958或1959年才查出来。写信人名杨秉功，是我在北大历史系的同学。杨被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

总编辑,就得选他当副主席。这次不是真心要辞职。

笔者接触到这份文献时,很是吃了一惊。直到那时,储安平引以为恨的,不是别的,而是他代表不了民主党派,不能把已经开始了的事情做下去。他可能还不知道,这股“气儿”,无论出于无知,还是信念,或是别的什么,总之,只要你是活在那个时候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的,就得给你泄泄。

6月上旬以后,所有储安平与之沾边的机构,开始或分别,或联合对他进行批判:最早的是民盟光明日报支部(6月11日),接着是社务委员会(6月15日),然后是民革和民盟的联合大会,再后是九三的常委会(6月21日)。

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专门声讨右派分子。储安平此时已不能不“向人民投降”,并以此为题作了一个4000字的发言。用今天标准看,虽不十分诚恳,把自己骂得是够惨的了。而且这检讨是他主动要求作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特别看重他自己的人民代表资格。但在别的会上——或者说在别的气氛或情绪下——就不是如此了。据他的同人对他的描述:

……不顾会上许多同志揭发的大量事实,储安平的发言都是捧着一份过去他在别的会上交待时准备好的书面材料,照本宣读,且只谈光明日报的具体业务,避免回答政治问题。

这时还是夏天,到了冬天,作为收尾,九三学社与光明日报联合举行了千人批判大会。那次,专门请了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水平高的孙定国同志作重点发言。在孙的发言面前,“储安平理屈词穷,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

读者或许有兴趣知道一下“章罗同盟”。它属于右派分子

中最高定罪，储安平被说成是该盟重要成员。据千家驹回忆：

毛泽东认为“右派”的猖狂进攻，以中国民主同盟与农工民主党表现最为恶劣，“其源盖出于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云。

“章罗联盟”这个毛泽东钦定的罪案，其实完全是一场冤案，真可以说是千古奇冤！章伯钧与罗隆基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副主席，我和他们两人都很熟，与章伯钧的来往尤为密切。凡是对民盟内部历史稍有所知的人，谁都知道章罗两人在民盟内部极不相能，互相水火。

反右斗争以知识分子为重点，罗隆基是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被划成右派，大家是可以理解的。至于章伯钧，他自命为“左派”，在整风初期，他没有发表什么实质性的言论，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为了要使章伯钧上钩，特地多开了几次政协座谈会，一定要章伯钧发言，章伯钧就抛出了“政治设计院”的谬论。这一下就被抓住辫子。“章罗联盟”的名词是毛泽东定的，说他们两人结成“联盟”来“反党”，要取而代之！这在稍知民盟内幕的人无不认为滑天下之大稽！真叫黑天冤枉！

在1978年的摘帽决定中，体现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一科学精神，只因“真理标准讨论”那时尚未真正渗进这一领域，故言语之间不免还有“凡是”味道：

“章罗同盟”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在向党猖狂进攻中是互相呼应的，都是企图在我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但没有发现二人在组织上共同策划、进行阴谋

活动的事实。

反右斗争的最强音是毛泽东本人发出的。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这名曾以他的谋略令一批又一批中国精英人物倾倒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领袖,作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报告。这篇文章如今已经收在他印制精美的选集里,发往全世界。一位执政党的领袖,这样品评他国度之内本来就极为稀缺的知识分子,无论就时间还是就地域而言,都可算是一个创举。而这创举的后果,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看到了:

……这一百天,时间有很大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

……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

……

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

……

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

叫“梁上君子”。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

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之后也是要受整的。

从夏天到秋天到冬天，心里“七上八下”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后来被划的与未被划的，总之在前一段有翘尾巴之嫌者，开始努力表现，以实际行动或自保。笔者在这里已不忍心摘录所有这些学者、教授、名流们横七竖八的相互揭发、质问、攻讦……象在一片巨大的，四周围满了观众的沼泽中，他们踩别人的时候，对自己的上升都怀着一丝希望，殊不知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一同沉没。他们的表现没能争得站在坚实地面上的人一援手，只给自己留下永远不可告人的悔恨。

这是一个尸横遍野的战场。中国的文化人在这里写下他们最悲惨的也是最耻辱的一页。

七

【命】梵文 Jiva 的意译，即“灵魂”。耆那教名词。分受物质束缚的和不受物质束缚的（即解脱的）两种。受物质束缚的“命”，又区分为动的和静的两种。前者存在于动物、人等有生命体中，后者存在于地、水、火、风等无生命体中。

——《宗教词典》

60年代初的一天，梁漱溟只身踱步，踱到厂桥棉花胡同。

那天天气很好，胡同里也打扫得干干净净。

他缓步走着，用他那常年素食者几乎悄没声儿的脚步。自从1953年与毛泽东当众发生激烈争执以来。这位对人生抱着炽热又冷峻态度的哲人，整日价以“学习”为业，他画卯的地方干脆就叫“学习委员会”。

他是去看储安平。他们二人曾为同道——鼓吹已成陈迹的第三条道路；他曾冷眼看这小子潇洒地周旋于政界与学界之中，也见过他如何正在兴头上被兜头泼上一瓢冷水。如今他又去看他，这几乎小他20岁的昔日闻人已匿迹很久了。

他来到甲12号门旁，敲门，无人应。再敲，依旧无人应。如是者四。换了任何一个人，此时都会转身走掉了，不巧访者恰是不达目的不肯轻易放弃的努力的梁先生，于是又这么周而复始地敲了下去。

门终于开了。高大、清瘦、几乎面无血色的储安平出现在门口。见到20多年的老友，他没有一丝热烈的表示，只说了一句：“不想见人，叫门是从来不应。”

客人被让进一个不算宽敞的独院，三间正房、两间厢房。令这位老北京惊讶不止的是，墙边拴着一只羊。

家中静悄悄的，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书和字典摊在桌子上，不见报纸，不见杂志，只有一帧他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孤零零挂在墙上。他们坐下来，东拉西扯，可惜梁先生在1987年回答笔者的追问的时候，具体内容都不大想得起来了，只记得储安平最后送给他一套完整的《观察》：

“再也没有凑得这么齐的一套了。这是我自己保存的最后的一套。”储说。

当时，梁漱溟只感到某种“精神分享”，正如看到一本好

书、萌生出一个好想头要迫不及待地告诉心心相印的朋友一般。他没想到这或许是一种沉甸甸的托付；也没深究，这闭门养羊的汉子为什么对自己一生中仅有的那闪光的一瞬已不再眷恋。他收下了，想着“为老友代存”吧。不料到了1966年夏，在他也被深夜的敲门声惊起之后，眼见这老友的珍物，与他三代京官的祖上留下来的全部古玩字画，一同焚于红卫兵点起的火堆中。

他不知道，也许就在那个、或者和那个同样躁动的深夜，储安平正挤上一路又一路公共汽车——或许他没有乘车，而是一路踩着新从树上飘下的落叶——来到京西青龙桥边，那发自冀北山麓的潮白河水（京密运河），正在两堤的夹拥中汨汨淌过。

九三学社。座落在西四颁赏胡同，门面不太、院落深深。夜深了，还有人走出走进，“西纠”（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学习当年老八路，号上了他们的房子。这里现在是西纠的司令部。九三的老朽大都被轰走了，只留下几个人值班。

十一时，电话铃突然响起，留守的李义拿起听筒，对方是颐和园派出所：

“有个储安平，是你们九三的吧？”

“是，怎么回事？”

“打算自杀哪。现在人在我们这儿，快来领回去吧！”

当时机关正有一部车。请示了西纠之后，在一名小将的监督下，忙驱车赶往发事地。在派出所设备简单的小屋里，李义看见了本文男主人公，他低头坐着，上下透湿，脚边汪了一洼水。

“在桥头转悠半天了，我们一直盯着他。这不，刚跳下去，就救上来了。”民警说着，口气淡淡的，“你死不了，那水才齐胸……够冷的，快回去吧”

李义几乎认不出他了，不在衣貌，而在神情，象被剥光了示众一般，流贯在这位前总编辑全身的，是一种绝望的畏葸与沮丧。这怎么能是人称“小大英”^①的储安平呢？不是1946年的他，不是1957年的他；60年代初也不是这副样子呀！^②

作为“大”右派，九三给了储安平尽量好的待遇，每月100元生活费，没有惩罚性劳动，也没有点卯般的例行训斥。当然，他要求工作，要求过不止一次。每每听到又有给右派摘帽的文件下发时，也曾打探过自己被摘的可能性。虽然次次都遭到拒绝，但却从未失去过外表的平静。在这期间，孙承佩曾出面联系商务印书馆，问能不能拿些书稿请储安平校。商务欣然应允，双方合作很融洽。储安平得到报酬后，郑重地交到九三总

① 一种英国香烟，又称“红锡包”，对储氏之神气十足打趣。

② 在这里，李义的回忆与赵家璧的回忆略有出入。赵家璧记得1959—1960年间，他作为上海政协学习团的一员，到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接受培养。到京后，他去看老朋友，其中当然包括储。归来后即在小组会上提起，组长也立即上报。第二天副院长和教务长即找赵谈话，让他私下多去几趟，以老友身份劝劝储，早一点出来，主动找共产党，请共产党为他摘帽。领受旨意，赵后来果然去了十多次，而储并不知道他是“被利用了，有目的去的”。据赵回忆，“那时大右派都出来了，帽子也摘了，储脾气很犟：不出，不找共产党，不找统战部，也不去找九三。想来李与赵所记忆的大概是储的不同时期的情绪表现：李在先，赵在后，梁在更后。到了这时，储安平可能已经心如槁木，用他女儿的话说：整个堕落了，来往的都是什么人？牧师、送羊草的！”

部。他认为，他已经从机关领到生活费。这笔钱不可再收^①。但他很少笑，李义甚至想不出微笑着的储安平是一副什么样子。他给人的印象是好端架子，似乎在努力保持一种尊严，哪怕让人觉得疏远的。至于北京话所谓的“心气儿”，李义不认为这前途并不乐观的著名右派已经没了，因为在1961年纪念“七·一”的时候，储居然还冒出这么一句：“四十周年纪念灰溜溜的，共产党没把国家搞好。”

“上车吧！”李义说。路上，储安平一句话也没有讲，即使当车子开进城，李义叹着气说：“你这是干什么呀？不该想不开嘛！”的时候。红卫兵小将也一路向他宣传党的政策：“每个人都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党会给出路”云云。

回到九三学社已是11:00。院角厨房边上有间小南屋，平日没人，烧锅炉的有时住住，红卫兵们没看上，那时正空着。

“就先在这儿住下吧。”李义说。

这时管事的一位女性副处长也来了。对于此人，别人说起她来不怎么叫名字，而是称某某的夫人，我们在这里权且称她为A夫人。A夫人吩咐一名干部到储家去给他取衣服。那人去了，一进门，满满一院子红卫兵，屋里屋外抄得乱七八糟。

“你们这么些人在这儿干什么？”那干部问。当时能以这样的口气向小将作这种内容的提问，俗称“吃了豹子胆”。

“我们在等储安平，他现在在哪儿？”

^① 世间，包括他的亲属，都认为储安平在钱财上“特别扣门”。据此节看，他的“扣”，其实是界限清楚——该拿多少拿多少，想阔气自己挣去。对于特别困难的人，他并非铁石心肠、见死不救，如他的勤务员的生瘰疬病的妻子，就一直无偿住在他的私宅。在他的观念里，施舍就是施舍，不是对上帝的敬畏，也不为买来世的幸福，更不是谁对谁的义务，只是强者对弱者的扶助，是人类同情心的表现。

“在我们机关，他自杀了……”

“死啦?!”

“没有，跳下去了，水太浅……”

小将们一阵大笑。笑毕问明他的身份和来意即帮着找衬衣内裤，还有大衣。把他送出门，为首的一个问：“我们还等他吗？”

“这我可不知道。谁让你们来的问他去吧。”

他回到九三，敲敲小南屋的门，把衣物递进去。“谢谢。”储安平说。这是那夜他说的唯一的一句话。

他们不知道，储安平其实死过，短暂的死，如果我们把大脑的思维活动的中止称作“死”的话。那是1947年春，他因胃部手术而被“施用闷药”。就在他的思维即将终止，亦即“死”的即将来临的时候，他曾有过十分清晰的感受，并且立即用文字记录下来，希望“能够成为医学心理学家或普通心理学家的一份有用的材料”——他绝不会想到，40年后，后人会反复推敲他这篇即兴纪实，以对他的“失踪”给出一个论断：

……大约在吸到第三口或第四口时，我便开始感觉到一点一点“黑”起来。这情景很难描写。……我的感觉是好象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仿佛走入了非洲的一个大森林（实际上我并无走入非洲森林的经验，此处亦是一种假借），走一步黑一步，越走越黑。

我曾经在新闻片中看到过纳粹罪犯被施绞刑的情形。在这时，这个记忆骤然地引起我心理上的一种联想作用。无论是从我的思想或是从我的过去而言，我原无将我自己和那些纳粹要犯联想到一起的可能。这个联想的发生，虽然是由于我看过那张新闻片

的关系，而形成这个联想的中心则为“权力”一事。无论在当时或者现在事后的分析，这种联想显然并不牵涉到任何道德上的问题，或者政治上的成败的问题（政治上的成败本是相对的）。这个联想的中心思想，只是说，那批曾经赫赫一时有大权力的人物，这时竟毫无反抗的能力，其生死完全操之于他人掌中，而将在顷刻之间结束其生命。我们平时，凭这支千钧之笔，发挥我们的理想，陈述我们的抱负，替一切受难的人们呼吁，抨击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扫荡各式各类的人渣，保持有一个虽然飘渺而不可捉摸但其坚硬却胜过钢铁的意志，而在这时，整个的生命（包括寄托在这个生命上的智慧、意志、理想、权威、品格），都操之于他人，一切听人摆布，自己失去了任何表示意志的能力，甚至即将失去任何表示意志的机会，心里充分感觉自己的生命，一秒一秒更接近“死亡”——在那种情形下，亦不能自己地发出一种对于人生的轻微感伤！

从这里看出，储安平对于死的最大的恐惧是在不受物质束缚（即解脱的）那部分。他几乎压根没想到喉管折裂、颈动脉阻断、没想到断气前可怖的痉挛与抽搐。他对死的恐惧在于精神与意志尚存，而居然无所寄附。那么，当即使生命依旧存在却无可寄附的时候，这生命还可贵么？这死还可惧么？

在我当时的心理上，一方面占据着由于有如上述有关“权力”一端而迸发出来的感想，一方面又同时联想到一切被迫即将丧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而迸发一种深沉的同情。我所谓“一切被迫将丧失其生

命的那些人们”，所指范围极广，通常最主要的部分即那些因犯罪而被判死刑或因政治见解不同而被处死刑的那些人们。罪犯罪犯，原都由于现代社会的罪恶；而由于政治上的斗争或忌妒因而被人或公开或不公开的处死，更是人类社会里最可哀痛的不平事情。当 they 从囚房提到刑场，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之路时，没有人可以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究为如何，而他们自己显然也不再获有机会向他人报告他当时的心理。无论电刑、绞刑、或执行枪决，行刑的本身虽只是一霎那之时，而自囚房至刑场这一段，总是一段可怕的、不堪想象的路程。当我被闷药的药性一秒钟一秒钟地逼近死亡的境界时，我深深体会到那些不幸的人们的内心的悲哀。除了少数例外，没有人不是留恋他们自己的生命。然而他们竟活生生的被人强制结束他们的生命。无论他们是否热泪盈眶，他们的悲哀终是一种绵绵无尽期的悲哀。

在 1966 年，当他一步步向青龙桥走去的时候，感受肯定已与此不同。他或许已经不认为“哀莫大于心死”，而是“哀莫大于心不死”了。

我说我当时有一种“轻微的感伤”！这感伤是属于人性的感伤！……一切引起联想的，都是一种属于人性的联想，而非利害的联想。最明显的就是关于我的孩子。我是一个离婚多年的男子，可是我有很可爱的孩子。我的女孩性情柔和，知趣识礼，年龄虽小而已表现一种善于治家的本性。我的最小的男孩，则天资颖慧，聪明伶俐，具有一种使任何人一和他接触便

会喜欢他的魔力。我非常爱他们。可是这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有关利害或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项，在当时曾经占据过我的心灵，就是关于国家的前途。我当时曾经确切的感到，万一我此去一闷不醒，最后使我不能“瞑目”的，实莫过于今日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走上轨道一点。因之我在事后感到，对于一个真正的忧国之士，我认为在1945年8月至1946年2月之间年老寿终者，实不失为一种人生大福。因为那时抗战终获胜利，政协亦庆成功，而为日后发生的种种纠纷与悲观，尚未显露。在那时死去，可谓心情宁静，无所遗憾。到现在，假如我们竟然因病身故，实有死不瞑目之感。

安平作此文时不过一个报人。到了1966年，不但连这小小报人也已不是，还背负着即心灵足够粗砺，也不可能不时时感到耻辱。这他在1957年就当众招认过：“当全国对我进行严厉的批判、我开始看到我自己错误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无比沉痛，感到无地自容。每天邮差同志送报纸信件到我门口，我自己都没有脸到门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不敢讲我姓储，常恐医生怀疑我就是那右派分子储安平。”这抽紧的心可以说一刻也没有舒缓过。那么，到底是什么支持着，又让他活了将近10年却在最后一刻终于支持不住了呢？我们今天能找到的答案只能是对国家前途尚存的期望，和由于预感到这人类大悲剧的即将来临而生的绝望。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还有自1947年以来就有的对“受物质束缚的命”之终结的坦然。

我终于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我的知觉了，就

象一个小孩在哼着山歌时忽然睡了一样。

但他失败了，当青龙桥民警行使公务，将他从水中拽出的时候，已注定了他再得不到“永久的安宁”，而是辱上加辱。但在那清冷的水中，他究竟还想到了什么？有没有类似张东荪教授在监狱里自尽前用双手拉住套在颈上的绳子一类的行为——并非智力活动的结果只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映？他又被扯回人间，当他在九三学社小南屋温暖干燥的角落里蜷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实际上已向“生物习性”让步？

第二天，他交了检讨书（自杀经过及对这一错误的认识），向红卫兵和九三值班人员提出“能不能不回家，就住在这里”，并要求把一批银行存单交社机关保管。

前边已经说过，储安平在银钱上是十分精细、精确、乃至近乎苛刻的。他的两任妻子都没有管过他的钱；他的儿子因为不愿开口向他要零用钱（以免受辱），十几里路步行上学，以省下车钱买些少年人渴望的杂物；而在高中毕业以后，为尽早经济独立，大学也不肯考——这又伤了他的心，储安平的儿子居然不念大学！

不知他当时准备交到社里的钱是个什么数，这对他是很重要的，因为可能包括《观察》解散时，流落到国境以外的股东们的股金（董事会决定交他保管），还有国家收购他一所大房子（现阜内鲁迅博物馆）的报酬。他曾去找过他的次子，请他保管，这个被深深伤害过的孩子一口拒绝了。至于A夫人，当然不会接受，就算她有这份侠义心肠或说对事物的分析能力，也不愿担这种责任：想留在这里，把机关和红卫兵司令部当作避风港么……

她如实向统战部汇报了。当时在那里主管工作的，想来既

不是李维汉，也已不是徐冰和薛子正。回复是明确而坚决的：“储安平，大右派，保护起来，不合适。放到社会上经受锻炼。”

A 夫人将这一决定向储安平作了口头传达。

如果在这前后发生的另一个细节不是这样而是别样，我们的故事可能要全部重写；储安平的小儿子刚刚来过，他给父亲送来了简单的行李。尽管苦苦的哀求转达了，这名年轻的音乐学院钢琴系（而非作曲系，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教师还是拒绝见他。

这最后的打击是沉重的。或者换句话说，他此时已经受不住哪怕轻微的一击——特别是来自他最爱的人。

他不能怪他们，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他只有怪自己。他对他们的爱是放在对自己的钟爱之下的，并且包含了太多的训导与功利——正常的男子不会这样作丈夫与父亲。

这里当然也不包括他的第二任夫人，虽然他与她的恋爱曾闹得沸沸扬扬，以至引出那么多社会讥评与长者干予。但她既然是为他的名声与地位而来，自然会随着他名声地位的丧失而去。

他也不能怪他的长子。他几乎没有扶养过他。这个没有受足教育就参加了志愿军的少年，得到的赠言是：“初中文化，参军最合适。没本事，就保卫祖国去吧！”他在1957年夏就登报与父亲断绝了关系，比章伯钧的儿子还要早。

他的女儿是爱他的，这个心地淳厚的姑娘。她本是储家最进步、最不带任何批判地热爱新中国的一个，但在父亲的问题上，她的表现最“右”就是不贴大字报、不在会上表态、清队的时候坚决拒绝发言。出事的前两天，她还打发丈夫把新培育出的无子西瓜给父亲送去……可惜储安平是个重男轻女的典

型，对家中新生的女婴，他居然说过“弄死得了”一类的话。

所有的一切，都好象已经很远很远了……

他把行卷卷好，面对着一张张写满了忏悔及恳请组织保护的认罪书，坐在那里发呆。

A 夫人的声音传了进来，“轰出去，一定得把他轰出去”，说得又清脆又利索，他听得很真切。

他站起身，把行李夹在胳膊底下。

10 月的北京阳光明媚。他跨过那扇曾经那么意气风发地进进出出的小门（他曾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还曾任机关报《社讯》的主编），朝那满是黄军装、红袖标与铜扣宽皮带的街上走去。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踽踽走出胡同的当儿，A 夫人即用电话把她自己的这一让阶级敌人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考验的革命行动通知了不知什么人。

接着，发生子我们在本文最前边描述过的那一幕。也就是说，他回到了家、放下了行李，以后……^①

抄他家的有两类人，分属北京 4 中、91 中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中或小。第一类是政治性扫荡：这家伙可是红太阳亲自点了名的阶级敌人；第二类显然比较看重经济问题，他们从另一个敌人，家住地安门的郭牧师处发现他存在他那里的存单，他们或许是这样想的：好家伙，自己手里还不知攥着多少钱呢！

他的失踪几天之后才被发现。报上去，报上去，先是文革

^① 据叶永烈文，划右后在长城脚下放羊时，储安平结识了李汝苍。回城以后，李先生成了文化界几乎唯一与他保持来往的朋友。1966 年 8 月 3 日一个清晨，李汝苍在自家门下发现一张从外边塞进的小纸条，上面只有 7 个字：

汝苍：我走了！安平

想来这大约是他没有走成那次。

领导小组的暴怒：“出逃！查！”接着周恩来知道了。这次由若干名军人组成了一个调查组，整整找了近2年。虽然作了死亡结论，虽然银行也已同意亲属出据证明可以提取存款，但所有的老朋友都在苦苦追索，因为“查无人、死无尸”！也许……也许有一天……他还顶着右派帽子哪！

他们有许多许多话要告诉他，他们想让他知道他离去后的一切；工人对解放军的大规模武斗、英雄纪念碑前如雪的白花、中共新任总书记关于“党政分开，党不可多干政”的郑重宣布这不就等于说了“党天下”是要不得的吗？还有那位可能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希望名垂千古的改革者，1988年夏，当他会见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的时候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左’的错误持续了20年。”他说了，他是这样说的。老友，老友，你听见了么？

但他们似乎更应该向他祝贺，他走得好，走得干净，走得是时候。伴着他离去的，虽然没有眼泪，没有哀乐，也没有反复推敲过的悼词，可他是挺着腰板，站着走的。他走的时候是个人，而不是一块招人痛，惹人爱，却是想怎揉就怎么揉的抹布。

1967年章士钊到香港。在那里，他读到一首感情诗，那是一名老报人写的，讲他自己1957年的一场梦。在这梦境里，宜兴出产的一名报人蹈海而亡。章士钊慨道：铸成殆将不免矣！

但徐铸成活着，至今沉静地坐在他上海的寓所。

他们忘了，储安平也是宜兴人，他也主编过报纸——70天。

或许，这飘泊无魂的灵魂为潮白河所拒，却为大海容纳了？

几乎与本文成文同时，储先生生前钟爱的幼子，前文曾提到的储望华——他目下就教于墨尔本大学音乐系——写了一首题为《生命之歌》的诗。也许他当时想到父亲？当然也许没有：

那是
生命的火花
曾迸发于
梦与醒的交界
它
诚然是微弱的
却照亮了
灵魂的深谷
犹如一颗
划破黑夜长空的
流星
虽瞬即逝在
地平线的尽端
却
永运永远的
流连于
宇宙的无限。

1988. 10

在这里，谨向储安平先生的老朋友笄移今、冯覃燕、林元、袁翰青、李义、刘啸虎、彭影尘、梁漱溟、黎澍、徐铸成等诸位先生及在我查找文献过程中给以大力帮助的雍桂良、周家珍、徐任民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评国共两党

储安平

一、一场烂污

在全国空前骚动、朝野争议多日之后，政府终于放弃了他那“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限价政策！这是二十年来这一个政府第一次在人民前面低头的一个纪录！在这二十年中，这一个政府，凭藉他的武力，凭藉他的组织，凭藉他的宣传，统治着中国的人民，搞到现在，弄得民穷财尽，烽火遍地。这次，在全国人民不可抗拒的普遍的唾弃下，他终于屈服了一次！

过去一个月真像是一场恶梦！在这一个月里，数以亿计的人民，在身体上、在财产上，都遭受到重大的痛苦和损失。人民已经经历到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可怖的景象。他们不仅早已丧失了人生的理想、创造的活力、以及工作的兴趣，这次，又伤失了他们多年劳动的积储，并更进一步被迫面临死亡。每天在报上读到的，在街上看到的，无不令人气短心伤。饥馑和恐怖，愤怒和怨恨，笼罩了政府所统治着的土地。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金圆券”，抢购抢购，逃卖逃卖，像大洋上的风暴，席卷了整个社会的秩序。抢购是一种“无言的反叛”，这是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受尽压迫、欺骗、剥削，在种种一言难尽的苦痛经验中所自发的一种求生自卫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是自发的，所以这种行为能同时发生在政

府统治区域中的大小各地；因为这个风暴已是全国性的，所以这个风暴已经威胁到政府政权的安全。中国的人民是可怜的，在政府种种秘密的监视下不能有什么大规模的组织，因之也不能发生任何足以左右政府政策的有效力量。这次的全民抢购，骨子里的意思是人民不相信这个政府，然而可怜的久在淫威之下的中国老百姓从来不能正面站起来对政府表示不信任；全民抢购从政治的观点来说也只是一种人民不和政府合作的消极反叛，然而只要是真正威胁到了人民的生存，即使是一种消极的反抗，或者如我前面所用的一个名词“无言的反叛”，但也足够震撼政府的命脉。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这是一次崭新的教训。

“纸币”本来只是一张纸，它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的价值都系于发行这个纸币的政府的信用。有一个“市民”曾在上海各大报纸登载大幅的广告，质问一般市民：为什么美国人民有了美钞不去抢购呢？为什么英国人民有了英镑不去抢购呢？为什么中国人民拿了金圆券就要去抢购呢？这问题真是问得漂亮！可是我们反问一下：为什么中国人在以前（在十月三十一日以前）有了美钞英镑并不一定要去抢购物资呢？为什么在中国的美国人英国人有了中国的金圆券，也一样的要把它用掉，不要放在手里呢？稍稍一想，这里面自有道理。严格的说来，要以改革币制来解决中国当前的经济危机，本来是个幻想。发行法币的是这个政府，发行金圆券的也是这个政府，这同一个政府，法币的信用既然不能维持，难道金圆券的信用就能维持了吗？有人认为这次的改革币制和最近的放弃限价，都是为了人民。实际上真是如此吗？老实说，无非因为当前的经济情景实在太不像样，有点可怕，假如不改，恐怕政府要站不

住了！改吧，改吧，乱七八糟先改它一下，暂时麻醉一下人民；后来弄到全国抢购，乖乖不得了，看上去可能要出什么乱子，威胁政权，所以只好放弃限价。这一切，说得漂亮是解除人民的苦痛，骨子里还不是要安定自己的政权？而在改革币制时，政府命令人民将平时辛辛苦苦积蓄的一点金钞，一律兑成金圆券；政府只要印刷机器转几转，可是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了。政府拿这些民间的血汗积蓄，去支持他的戡乱，使所有国家的一点元气，都送到炮口里轰了出去！上海的老百姓都在回想他们在敌伪时期所经过的一切，日本人管得再凶，也没有弄到连饭都没有吃，连买大便纸也要排队的程度；日本人逼得再紧，也没有把民间的金银收完——就靠这点元气，胜利后各地慢慢恢复各种小工商业的活动。现在呢？一切完了，一切完了，作孽作孽，每一个吃亏的老百姓心底里都在咒诅，有一肚皮眼泪说不出来！

七十天的梦是过去了，在这七十天中，卖大饼的因为买不到面粉而自杀了，小公务员因为买不到米而自尽了，一个主妇因为米油俱绝而投河了，一个女儿的母亲因为购肉而被枪杀了，还有不知多少悲惨的故事报纸上没有传出来。我相信这些人都是死难瞑目，阴魂不散的。许多良善的小市民，都听从政府的话，将黄金白银美钞兑给了政府，可是曾几何时，现在的金圆券已比八一九时期打了个对折对对折了！惨啊，惨啊！冤啊冤啊！一个只要稍为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疾于中吗？

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原刊“观察”1948年）

二、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在6月1日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须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份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即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

想法,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孓小民都能融融乐乐

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1957年整风时,储安平在这篇发言原稿上特别注明:
“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发言稿”“希用原题,原文勿删”字
样。)

政论选辑

储安平

失败的统治

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后垂二十年。二十年执政的结果：一般人民的物质生活，愈来愈艰难；一般社会的道德生活愈来愈败坏。国民党有主义，有理想，当初也是满怀热血，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何以执政二十年，反弄成今日这样一个局面：不仅党的声誉、地位、前途、日见衰落，就国家社会，也给弄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其中症结，实堪研究。

一个政党执政的成败，原因既多且极复杂，非执一言所能论议；然其成败之键，必有最基本的原因可寻。作者以为国民党执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所采用以维护其政权的方法；只此一着，毁坏全局。政党要获取政权，原为题中必有之义：在野的要想法获取政权，在朝的要维护其既得的政权；中外古今，无有例外。但欧美政党，恒以施政的政绩来维护其政权：国防务臻安全，外交总替本国说话，政治力求清明，经济尽量求其繁荣，一切在交通、教育、治安、卫生、房屋、休闲各方面，无不用最大的力量向最好的目标做去。所以欧美各国，无论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执政当局，总是处处为国家的前途着想，时时替人民的福利打算。就是苏联，其政体虽然另树一帜，但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励精图治，倒底把国家弄得像个样子，在国内，能

使人人衣食不愁，在国际上，能够打退强敌的侵犯。只要政绩良好，人心自然归附；人民拥戴政府，政权自然不愁动摇；而朝野分头努力，国家因亦可底昌盛康乐之境。

不幸中国国民党走了另外一条路，他只知以加强“政治的控制”来维护其既得的政权。我们先看这二十年来，我们的国家有什么进步？言军事，我们根本谈不上“国防”，人家已走进原子和雷达的世界，我们还停留在步兵和机关枪时代。言政治，这几年来政治的技术大有进步，德国式的集中营和英美式的参政会，无不随时应变，应有尽有，但政治在本质上则愈来愈开倒车：贪污流行，效能低落，自由缺乏保障，民生一无改善，而政治道德则尤见江河日下。言交通，二十年来我们曾铺了多少铁路，造了多少轮船？甚至到现在为止，不仅还不能制造一架飞机，甚至还不能制造一辆汽车。言教育文化，二十年来我们的科学发明在那儿？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在那儿？音乐和绘画有何成就？其尤甚者，一般的教育水准及文化水准是在向上升还是在往下降？至于经济建设，土地改革，这一切有关民生的大问题，大都空言多于事实，计划多于实效。然而二十年来我们的执政党倒底在做什么工作？一言蔽之，这二十年来国民党只聚精会神在做一件事，就是加强消极的政治控制，以求政权的巩固。养许多兵，是为了巩固政权；一切党团的组织、活动、训练，是为了巩固政权；特务和各种检查制度的施行，是为了巩固政权；就是公路的开阔、电话网的布置，也无一非出自军事及治安的观点，其目的仍是为了巩固政权。二十年来，只有这项消极的政治控制工作，吸引着国民党无比的兴趣和重视，表现着国民党最大的勇敢、决心和魄力。二十年来，我们做百姓的，只有这一个项目，使我们到处听得到、看得见、嗅得

着、并感觉到它的紧张、严密、认真、和不放松。但是也就在这一个项目下，这二十年来，不知消耗了国家多少金钱，雇用了国家多少人力，浪费了国家多少智慧，糟塌了国家多少光阴！当前的执政党既倾其全力于消极的政治控制，必然大大影响他在积极方面的种种建设工作。所以，二十年来，我们的交通和水利没有高度的建设，土地制度没有革命性的改革，耕耘的方法和耕耘的工具依旧墨守陈规，种子和肥料毫无新的改进，人民的居室依然黑暗而污秽，民间的代步工具仍然滞留在原始阶段，一切近代的机器生活从无机插入乡村，保健事业和社会救济有名无实，疾病与贫穷仍弥漫全国，一般人民生活的方式、生活的环境、生活的能力、生活的苦痛、以及生活的观念，毫无改变，毫无进步。凡上所述，俱属琐碎，而无一非建国元气所系，但从来没有见到政府有兴趣和决心推行过任何全国性的温和的社会改革。二十年来中国的执政者，只有在征税和壮丁两件事上才思及人民，此外人民在政治上几不复占到任何重要地位！历观往史，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不顾人民而犹能长久维持其政权者。不顾人民苦乐的政府，必然失去人心；不为人民福利打算的施政，必然不能使国家社会得到健全的发展。政治生活中本来潜有物理的作用：政绩腐败，人心怨愤；人心怨愤，政权动摇；政权动摇，执政者的控制势须加紧；压制越紧，反动更烈。如此循环，互为因果，而终必全盘倾溃，不能收拾。

抑有进者，太重视消极的政治控制，必然同时促成道德的堕落。政治控制是以力取人而不以德服人，主使这种政策及执行这种工作的人，必为无道不德之徒，流风所至，遗害难言；这是一层。其次，在一个以力而不以德治人的社会中，有骨气的

人，心难甘服，于是偏激者“逼上梁山”，中庸者洁身自好，柔弱者颓靡消沉。国家尽失梁栋，社会无复正气。其三，在唯力是视的社会上，断无是非公平可言。我们看这几年来，国人的意见，政府置若罔闻，而美国一言半语，当局无不重为考虑，因为美国有飞机大炮和金钱；无党无派小党小派的人，喊破了喉咙也是白费，而共产党的意见，就不能相应不理，因为共产党有枪杆；甚至教授罢教，政府可以听其自生自灭，而工人罢工，有司不能不管；一切只讲强力。只讲强力的社会必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同时亦即为一个乱的社会。其四，要求政权巩固，自然不愿政局发生不必要的波澜，于是老朽之辈，虽庸碌一无成就，亦可尸位十载而不易，“忠实”之徒，虽恶行多端，众口所诛，亦仍能安如磐山，行其所行。贤不肖不复有别，而国家取士之道尽失！

在一般国民党人的心目中，以为今日党的生存问题，其重点莫过于敌党之消灭。作者则以为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今日国民党的问题不是如何对付敌党，自然更不是如何消灭敌党，而是自己能不能认认真真硬硬扎扎赶快做几件像样的事情。今日一般人民所要求者，是（一）没有房子住的能有房子住，（二）没有衣服穿的能有衣服穿，（三）没有饭吃的能有饭吃，（四）能让他们和平地安于他们的工作，乐于他们的工作。今日一般知识份子则更进而希望国家有尊严，有前途。假如大家有屋住、有衣穿、有饭吃、能乐业、人心自然归附，社会自然安定，国家自然结实，国际上自有地位，整个国家的前途自然充满着光辉与希望，而今日批评政府者，亦必将拥戴政府之不暇。今日之世，未有国家垮台而政党可以站住者，亦未有人民贫穷而国家可以富强者；富国先富民，兴党先兴国。要挽回党的颓局，

当前的执政党必须赶快改变作风，换条路走，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做几件福国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二十年的时间不算短；二十年的历史说明单靠消极的政治控制维护不了既得的政权；这条路走不通，越走越近死路。一个执政的政党，必须以政绩来维护其既得的政权。能如此，国家有利，党亦有利；否则，国家也许有前途，而党决决无前途。

（原刊“观察”第一卷第三期）

二、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

(一)

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有一种广泛的好感。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两种成份。在战争中，美国援助我们，鼓励我们，支持我们；除了在日后发觉的雅加达会议一次以外，美国没有背负过我们。我们赖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乃得咬紧牙关，撑过最艰苦最黑暗的日子，以期获取最后的胜利。美国一般社会平时所有的那种浅浮、放狂、享乐的生活方式，向不为世人器重，但在这次战争中，美国所充分表现了的那种令人难以相信的活力，使全世界获有深印象：美国男女竟然不仅仅是“公子哥儿”，亦复为有血有汗的英勇斗士。无论是美国国内的生产速率、社会管制、团结合作，或在全球各区战场美人所表现的冲刺力、组织力、以及勇敢坚毅的牺牲精神，俱有超度成就，赢得全世界的敬服。罗斯福总统不仅使大局从逆势中扭转过来，并且赖有他所独具的崇高的人格和理想，使这个战争，从一个实际上纯然是一个利害冲突的战争，变成一个有理想、有原则、有灵性的战争。他所领导的大西洋宪章

以及他所号召的四大自由，成为了无论在前方后方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生活的千万男女心灵上所共有的一个神圣的鹄的。当中国的政府、人民、军队、依然被驱于中国西部的山谷地带时候，罗斯福总统去世的噩耗传来，不知引起中国多少男女的悲悼哀思！中国人感激美国，器重美国，甚至崇拜美国！这种广泛普遍的友情，在国际历史中亦不多见。

但是这种感情在过去短短几个月中，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复杂的，然而却是苦痛的。我们不满意目前美国种种对华做法，但我们不忘情在战时美国给予我们的同情和援助；我们无可抑止地仍然缅怀故罗斯福总统的崇高伟大，但我们明白今日之美国已非昨日之美国。这诚然是一个不幸的变化，不幸这又竟然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变化。

(二)

在过去数月中，美国对华政策，引起各方面的批评和指摘。美国在华活动，大别可分两项，一为美军驻华，一为参加调解。先说美军驻华。美国驻华的理由，根据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总统声明：

“为了积极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此次战时经常的合作，为了符合波茨坦宣言，并且为了清除在中国境内日本势力残留的可能性，美国特定一种确定的义务，使日军缴械和撤退。

“因此，美国曾经，并将继续，协助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使被解放地域的日军缴械和撤退。美国海军现留华北即是为了这个目的。”

在同一声明上，又说：

“美国已经为了恢复因日本侵略东北而首被破坏的和平，被迫付出巨大代价。除非在中国的日本势力完全清除，除非中国取得一个统一、民主、与和平的国家地位，则太平洋的和平即使不被破坏，也将遭到危险。这是美国暂时保持在华海陆军力的目的。”

我们根据上引美军驻华理由，陈述下列意见：

1. 在理论上说，世界和平不可分。美国牺牲了多少生命，耗费了多少物资，其目的在求世界的和平。凡是以威胁或破坏世界和平者，美国有发言的权利和义务。这个理论，我们不欲否认之。在战时，中国和美国同为盟国，并肩抗敌，这是事实。这个事实，我们承认之。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承认美国有在中国境内使用武力以协助中国国民政府使日军缴械和撤退的权利和义务。

2. 美国驻华的理由，既为协助中国国民政府在中国境内使日军缴械和撤退，则我们认为，此项使中国境内日军缴械和撤退的工作，显然应以中国国民政府为主体，美军处于协助的地位；充其量，中美双方平肩协力共同合作，使日军缴械及撤退。

3. 但是我们愿意知道，在日军缴械和撤退的工作上，中国国民政府有未充分发挥他全部的心力和能力，以尽他应尽的义务？我们同样愿意知道，日本受降已逾一年，日军的缴械和遣散的工作，迄今有未全部完成？如已完成，是否美国即可认为“在中国的日本势力完全清除”，而撤退驻华美军？如其尚未完成，何以中国国民政府不先尽其全力以从事他应负担的日军缴械和撤退的工作，而反以其力量从事于国内其他与日军缴械撤退工作无关的军事行动？

4. 假定美国容许中国国民政府不先尽其全力以从事他应负担的日军缴械和撤退的工作,而分用其力量从事于国内其他与日军缴械和撤退工作无关的军事活动,我们不得不认为:此即足以表示美国谅解、默认、甚或鼓励中国国民政府得先不履行其对同盟国并肩对日作战中所应负责任,而以其全部力量从事于自相残杀的内战。

5. 中国现在事实上已是一个全面内战的局面。在这一个内战中,无论美国有未在任何形式之下给予内战中的两造之任何一造以任何直接的支持,但至少,美国有未考虑过:美军驻华、物资转让、经济贷款,以及其他行为,在事实上,足以使今日中国内战中两造的任何一造在心理上得到一种倾向内战的鼓励?美国有未考虑过在这方面美国所负有的道德责任?

6. 假定美国认为:即使“在中国的日本势力完全清除”,而中国尚未“取得一个统一、民主、与和平的国家地位”,美国是否仍将“暂时保持在华海陆军力”?统一与民主是两件事,假定中国业已统一,而并不民主,则美国是否继续“暂时保持在华海陆军力”,直至美国认为中国既统一而亦民主时为止?

我们即使在十分心平气和的检讨下,亦不得不说:美军继续驻华确是一种不合事宜的行为。美国也许认为,在华驻军,可以有助于中国的和平统一。但事实上,这个假定无法成立。这几个月来,中国的“和平”绝无任何足以令人安慰的进步,内战的范围和程度反而与日俱深;这足以表示美军继续驻华绝无助于中国的缔造和平统一的工作;美军继续驻华这一行为,仅仅使在中国内政上业已非常复杂混乱的局面,因此增加若干更多的意外的纠纷,同时并因此引起许多在中美国民邦交上所不必要的批评和指摘。在理论上,除了战胜国驻军战败国

以外，我们亦绝难承认，乙国之国内和平，可以以甲国之驻军而赢致之。

(三)

其次论参加调解。根据上文所引同一声明，美国参加调解中国内争的目的，是要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强盛、团结、民主的中国”。调解的原则则为：

“美国认清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是一个一党政府，并且相信，假使这个政府基础能扩大，包括国内别的政治分子，则中国的和平、团结、与民主的改革将被推进。因此，美国强调主张国内各主要政治分子的代表的全全国性会议协议办法，给这些分子在国民政府中一种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

这一段文字在政治方面的主要意思，就是希望修改二十年来中国一党训政的政治，使之从一党专政的国家变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该声明最后并说：

“中国如照上述路线走向和平与团结的时候，美国准备以各种合理方法援助国民政府，重建国家，改善农工业经济，建立军队组织，足以为维持和平与秩序而尽其国防上与国际上应有的责任。

“在推进这类协助之中，对于中国在合理条件之下为了用于中国全国的健全经济及中美间的健全贸易的发展而计划的向美要求信用贷款及借款，美国准备加以有利于中国的考虑。”

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总统发表的对华声明，确是非常公正、合理、友好的；它符合今日绝大部分中国人民的愿望。

今日中国人民所要求者，在政治上是民主自由，在经济上是民生改善。我们要求终止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为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除了这些基本民权的要求，中国人民并进而要求政府（无论执政的是甲党或乙党）能对人民负他在政治上应负的责任。消极方面要肃清贪污、提高效能，积极方面应有所建设，这些建设并应与他执政时间的久暂成为比例。在经济生活方面，中国人民切迫希望政府能施行若干全国性的温和的社会改革，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准，限制一切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中国人民非常切望在政治及经济方面都能得到改革，发生不流血的革命；而要努力寻求这些改革，目前最切迫的要求是和平安定。内战绝对打不得。打内战要死人，要烧房子，要掠夺农民嘴里的米粒；打内战使币值愈来愈贬低，工商业愈来愈萧条，一般国民的情绪愈来愈消沉；整个国家因内战而陷入于恐惧、怨愤、悲观、麻痹、苦痛、绝望的境地。这是全无意义的大消耗大浪费，这是误国害国、灭国的大悲剧！

上面这一段最简单的陈述，我们相信就是今日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呼吁和要求。但是我们正视今日中国的大局，不要说

毫无开国规模，甚至亦无建国气象，一切活动作为仅仅是在撑持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当前中国政府上的最有声色的滑稽杰作，就是政府说的都是甜的，做的却是辣的。当政的人物嘴里天天在喊民主，但是一切真正的民主活动，在中国却普遍而无例外地在各种不同方式的压迫下，遭受限制、阻碍、取缔、和威胁。这简直是不可理解并亦不可信的作风。在现行政治风气下，贪污已经成为常态，不贪污反成为变态。公家机关的腐败黑暗，已至难以想像的程度。然而人民除叹息并默默地忍受外，竟无一点有实质的反抗能力！经济生活愈来愈恶劣。蒋主席今夏在牯岭声称，如若中国尚有一人无衣无食，即是国民党的革命使命尚未完成。这真是仁者之心！可惜国民党执政二十年的结果，本来有白米吃的，现在已无白米吃了；本来可以一天吃两餐饭的，现在只能吃一餐饭了；本来穿长衫的，现在不穿长衫或是穿不起长衫了；本来有房子住的，现在没有房子住了！我们看，在中国广大的农村里，不知有多少人沉沦在饥馑和寒冷的死亡线上。就是在这不夜的大城市里，街头巷尾，也到处都是无食无宿的流民乞丐。在这样一片锦绣山河的土地上，竟有万万以上的人民，过着与畜生生活无殊的生活。而在这样一个悲惨的局面下，还要从事内战，活生生的把人民的血、肉、皮，掺着人民的汗、泪、血，建筑少数人的“权力之殿”！人道！人道！人道何在！政治家的良心何在！

一如上面叙述的这样一个落伍、黑暗、悲惨、无人道的国家，假如美国确是关切中国的前途，关切中国人民的幸福，显然不是美国所希望，并所能坐视的。美国参加中国的和谈，在政党的纠纷上，企图调解国民党及其反对党之间的冲突；在统治的精神上，企图使中国变独裁而为民主；在国家的內容上，

希望中国和平、统一、民主、繁荣。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是中国之幸，美国之幸，世界之幸。调解党争的本身显然不是一个目的，调解党争的目的，仍在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进步、繁荣。同时，今日中国全盘的政治问题，不仅仅是党争问题；不是党争的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中国的政治问题。解决中国党争问题仅仅是改革中国政治问题的一项，甚至可以说，这一项，确是非常迫切的一项，但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一项。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项目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劳苦大众的生活，培植中产阶级的力量、鼓励开明进步而有现代化头脑的民主自由分子的抬头。中国的乱，在经济上的原因，是大家太穷了，绝大多数百分比的人民都沉沦在生活的水平线之下；在政治上的原因，是中产阶级没有力量，没有组织；在道德上的原因，是有抱负、有操守、有能力的人无法为国家服役。（为国家服役绝非任官之谓。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假如环境允许他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他对国家所能有的贡献，未必即在一个部长之下。）对于这样一个总括的目的，美国既然过问中国问题，就须一方面调解目前中国政治上最切迫的党争问题，一方面亦须从根本上压迫政府作事实上的种种改革。一切民主活动，只要合理而无损于社会的安全，应当容许其存在。但是我们回顾过去几个月中，美国对于为作者所重视的一部分，可谓一无努力。在法律上，美国承认的中国政府是国民政府，美国当然尊重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我们绝对非常公道地同情：美国之欲支持国民政府，诚亦事理之常。但是，美国之支持国民政府应该是有条件的。易言之，美国之支持国民政府，必须这个政府真能向民主之路进行。而我们历观往事，而视实际，我们实难发见任何足使美国必须支持今日中国这样一个政府的理由。

(四)

再进一步说。在原则上，我们根本反对任何一个外国来过问中国的内政。但是我们政治上那些人物，自己没有能力，二十年的统治造成了今日这样一个局面，到头要外国人来“调解”，使外国人要来“调解”，甚至使中国问题竟成了莫斯科三国宣言中所包含的一端，我们全中国人民的人格尊荣，实在给那些台上的人物剥光剥尽了！但是尊荣是一种感情，而政治却是一种现实。我们很含羞地说，假如因外国的插入过问，而使中国人民获得和平、民主、自由，则亦不失为一项“满意的交易”。不幸今日中国人民，已被动地做了一次“无所获的抛出”。1766年美洲的独立革命，产生了一个新的自由民主的美国，但历史家告诉我们，1766年美洲的独立革命，同时也促成了一个近代的自由民主的英国。乔治三世时代的英国是最反动顽固的。美洲殖民地的税收，要由威司敏斯特决定，这一原则，广泛地说，就是人民的意志权利一无保障，统治权悉操于少数专制人物的掌中。赖有英国军队在美洲殖民地吃了败仗，于是皇党的威风大杀，人民的力量抬头。在中国，单说抗战期间，亦有同样的事实：“武汉时代”在当时中国政治上，却成一个局面，另有一番风气，时实正承南京沦陷，徐州被围之后。1944年中国军队自长沙至贵州作疯狂的溃败，日本进叩贵阳之户的时候，政府威风稍敛，民气一度昌扬。历史说明：一个以军队为统治资本的政府，当他每打一次胜仗，他那捏紧不放的心理亦必随之增强。所以鼓励这种政府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就无异鼓励这种政府加强他加紧控制的倾向。在另一方面，现在美国

是有钱的国家，中国是贫穷的国家；美国是强大的国家，中国是衰弱的国家；假如美国在此时间、欲使中国为其尾巴，成其工具，是直乘人之危，非尽友邦之道。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美国人，横冲直撞，任意殴打学生，调戏妇女，碾死行人，简直目无“中国”。我们的政府，在外交上，一味的跟着美国走；在经济上，没有钱就向美国要；在内政上，请美国参加和谈，我们几乎可以夸张地说，今日中国在精神上实已亡于美国了！我们不欲否认，美国之过问中国政治，倒头还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但是美国一方面为了他自身的利益，同时也须真为中国的幸福前途公道打算。能如此，中国人民会得在心底里感激美国，否则，美国必将失去众多中国人民对于美国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就是多年以来美国的政治家外交家所要获致的。

（原刊“观察”第一卷第十一期）

三、论上海民乱

本年七月，上海市政当局，认为摊贩有碍观瞻，妨害交通，决予取缔。据吴市长十二月一日广播：“警局对摊贩处罚，第一第二两次违章设摊者处以罚款，第三次给予拘押。”又称：“当市府决定取缔摊贩时，亦会充分顾及彼等（摊贩）之生计问题，故给予八、九、十、三个月之限期，勒令于此时期内，迁地营业，或另谋生计。”在最近三四个月中，一般摊贩，因为政府将予取缔，生活发生问题，大都感觉忧虑不安。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警务当局，开始严格执行命令，拘捕小贩。被拘小贩，据报载约达七八百名；分押黄浦老闸两区分局。适值寒流袭沪，气候骤降。被捕小贩家属，送衣送饭，狃于积习，诸多干格。同时谣传被捕小贩已有数人因饥寒死于拘留所中，群情激愤。十一月三十日清晨，被捕小贩家属多人，前往黄浦分局请愿，要求释放。其后闻风往者，愈聚愈多。警务当局，运用各种警卫方法，防止弹压。在这激荡的骚动中，若干商店被群众捣毁，全市歇业，交通阻断，警察鸣枪多次，多人受伤。全市陷入极度的混乱、动荡、恐怖、不安；详细情形，业见报载。这次骚动，延续至四十八小时之久，牵连的地区几占上海全部商业区域。直接参加这次骚动者，约在五万人左右，间接

受此次骚动影响者，约在一百万人左右，而同情关怀这次骚动者，至少在三百万人以上；这些还都是最保守的估计。

我们对于这次骚动，默察其间因果趋向，不无感触。第一，这次骚动的性质，不仅仅是经济的，亦复为政治的及社会的。摊贩摆贩，为了生活。市府决心取缔，摊贩设摊如故，此非藐视政令，实为生计所迫。市府虽然“给予八、九、十、三个月之限期，勒令于此时期内，迁地营业，或另谋生计”，但“迁地”一节，当局迄未指定地点；同时摊贩经营，全靠闹区，如另迁他地，是否仍有“营业”，亦为问题。至于改业，国内经济萧条如此，遍地失业，空言改业，谈何容易。摆摊的人数所以越来越多，殆是说明找寻职业之不易，走此一着，聊以糊口；市府虽宽以时限，但市府给予摊贩的，只是改业的“时间”，而非改业的“职业”。政府若能解决摊贩的职业问题，则摊贩何乐而不改就他业？这种由摊贩事件所反映的广大失业问题，牵涉到政治不安，币值不定，工商濒危，百业萧条；时论已多发挥，此处不赘。但此次骚动，除了经济意义以外，还包含有政治及社会的意义。就政治意义言之，今日人人需要和平，而内战烽火遍地，一切人力财力，都用以维持少数人的权力利益，竟将绝大多数人民的死活，置之不顾。政府官吏，发威作福，仗势弄权，贪污百出，无人过问，独子子小民，摆一个摊子，混一口饭吃，亦所不许，严为限制，人孰得平？据党部当局报告，骚乱群众中有呼“为什么不让我们做生意”，“为什么不让我们吃饭”等口号者。此说果确，则这些口号无不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同时在这次骚动中，亦流露着阶级的意识。大商店的被打，跳舞场电影院的被打，过路汽车的被打，都是出于一种贫者仇视富者的心理。然而凡此现象，未曾不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就后者论，贫富阶级的悬殊

本不合理，贫民阶级开始了解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并以行动表示其意志，足以说明中国社会已有进步。就前者论，我们一向认为二十年来国民党的“训政”，无甚成就可言，而现在一般民众居然敢公开抗议“为什么不要我们吃饭”，国民党当局亦大可引以为骄，因为“训政”的目的，乃在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识，行使政权，而人民所以要取得政权的目的，终其极无非是为了要保障人民的权利与幸福。现在一般人民，受了二十年的“训政”，终于能提出“为什么不要我们吃饭”，我们竟因此不得不承认国民党训政二十年，非一无成绩可言者。

第二、地方党政当局，都将此次骚动，归之于“异党”的阴谋。我们始终认为，这一次骚动，完全是逼出来的。在这次骚动的后期，是否有外力参加，我们没有充分根据，可作论断；但这次骚动的发生，完全是自发的。党政当局认为，骚动的第一天（十一月三十日），摊贩即已释放，则此事件应已过去，而第二天（十二月一日）骚动的程度和范围，反较第一天为烈为广，显有“暴徒”从中阴谋煽动。我们以为若就群众心理来观察，此亦事理之常。因为群众的感情一旦掀起，这种感情必须达到最高点，始能下降。骚乱的第一天，群众的情感刚被掀起，群众感情一被掀起，感情的发扬即愈来愈高，所以第二天的骚动情势，较之第一天反更严重。在第二天的傍晚，一方面地方当局采取了最严厉的处置，（即“格杀不贷”），同时群众的感情，已因经过三四十小时的宣泄，达到高潮，所以自第三天（十二月二日）起，全部骚动，戛然而止。我们很怀疑，假如这次骚动，确是有“异党”在后面作严密而大规模的发动，这样一个严重的局面，是不是能在一夜之间，从最高潮一下子回复到原来的平静局面。以常情推测，在政争如此剧烈的今日，在任何社会骚

动中，“异党”之插入，事属难免。但若谓此事纯为“异党”之阴谋造成，如非失之夸大，亦属有欠公允。至于就“异党”煽动一节而论，我们亦可附带一述我们的感想。我们一向主张民主法治，我们绝不同情任何政党，任何集团，任何个人，从事于破坏社会治安，有损公共福利的行为；凡此皆法所不许。但就政治的观点言，在野党派，借机生事，以与执政党为难，实为事理之常。在野党如不处处与执政党为难，他将永无取得政机之一日。无论英美，莫不皆然。执政党唯一对付的方法，就是励精图治，拼命建设，提高效率，改革政风，以政绩和事实来对付反对派，来赢致人心。即以摊贩事件而论，摊贩要生活，如其政府能有办法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则何来此次的骚动；“异党”纵欲借机生事，亦将无机可借；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所以党政当局，应当将注视此案的重心，转个方向。不要单在消极方面攻击“异党”，应该反躬自问，求其在我，多在积级方面，做一点建设工作，改善民生；民生改善，社会自可安定，国家自趋太平，而执政党的政权，亦易巩固。

第三、在此次骚动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而为其他任何社会骚乱案件所无者，即凡谈论此次骚动事件者，大都对政府表示不满。不过我们在此应当说明，“不满政府”与“同情摊贩”应为二事。先就一般人对于摊贩的态度来分析；从正面说，有许多人是同情摊贩的，因为摊贩设摊，无非迫于生计，其情已极可怜。从反面说，在此次的“摊贩事件”中，无一人对于摊贩表示指摘。不仅社会一般輿情如此，就是官方态度也是如此。无论是吴市长的谈话，或市党部、市参议会、江苏监察使署等重要机关主管人对外的谈话，都无直接指摘摊贩的言论。由此可见，大家在良心上都承认着一个原则，即人人总得有饭

吃，总不能逼人饿死。因为大家在良心上，无法否认此一原则，所以大家不得不想到一个极为实际而又极为严重的问题，即今日中国没有饭吃的人实在太多了。目下中国，不知有多少人在饥饿线上挣扎着：寒无衣，饥无食，住无屋，病无药。我们不能不承认，二十年来的统治是一个“失败的统治”。无论是国民党员，不是国民党员，看到今日中国的局面，无不叹息焦虑。经济愈来愈近破产，社会愈来愈趋不安，而劳民伤财，人人咒诅的内战，仍在进行。我们相信，凡是尚有一点良心血性的人，对于现在国家的局势，定必感觉苦闷，感觉愤懑。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次骚动中，人人不满政府，批评政府。一般人不满意政府，批评政府，怜惜摊贩尚在其次，主要的因为我们的国家太不象样，当前的危机太多太危急了。人人在要求着政府能立下决心，拿出办法，来挽救当前国家的危机。

此外尚有一点，我们愿意附带一述者，不满政府不一定是地方行政长官。一个地方行政长官，他只能在其职权范围以内，尽其职责。若以指责整个政府的理由，指责地方行政长官，或者要求一个地方行政长官负起非一个地方行政长官力量所能办到的责任，均欠公允。就原则上言，这次上海市政府在取缔摊贩一事上，无可非议。而且在这次骚动中，我们对于吴市长的处置，不能不加以公道的称颂。社会应当充分明白，当吴市长全力制止警察当局使用武力对付群众时，他本人也是受着他下属的不满和抗议的。然而有远见的人不能不承认他这种处置，具有高度智慧。在这样一个混乱激荡冲动中的骚动，造成“惨案”，易如反掌；设若如此，其后果诚难想象。我们所唯一批评吴市长者，即在这次骚动中，吴市长对于“暴徒”“阴谋”，强调过度，不免有损政治家的风度。关于警察，群情指摘。我

们觉得这种指摘，亦属感情太重。一般下级警士巡官，他们也未尝不在自我良心和服从命令之中，感觉苦痛，以他们月入之微，职责之重，社会对于他们的要求不免过高。这一切如众所非议的情形，警察本身，不能全负其责，其中大部牵涉到社会风气及全盘政治的问题。我们现在愿意总结言之，这次上海群众骚动，实含有极严重的意义；假如这仅仅一种地方事件，我们绝无意思浪费这许多篇幅加以论列。我们认为这次上海的民乱，就是一种国家将要遭遇革命的象征。我们如此看法，其意非谓这个将要来临的革命，将由这次骚动中的人物发难完成，而是说这个将要来临的革命，其客观的社会条件，已一天成熟一天。我们读报，这几个月来，这种大规模的骚动，何止上海一地？广州、福州、杭州、重庆、以及湖南、江西各地，叠见不解。大公报高唱“要变不要乱”之论；既然不变，那就势必于乱了。这次上海的民乱，对于当局是一个极其明白重要的教训。当局将因此项教训而加紧其政治控制，抑或反躬自省改进政治，那就得看执政当局的智慧、修养、及造化了。

（原刊“观察”第一卷第十六期）

四、中国的政局

(一)

大局已到了穷则变的阶段；虽未变出，确已穷极。

在最近几个月中，南京的高级核心人物，在心理上已起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自国民党执政以来所未有的。这个变化就是：他们已深切感觉大势之日非了。迫使他们心理上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种的：马歇尔的离华，共产党的不妥协，一般舆论对于政府的抨击，民心的涣散，经济的崩溃，军事上的没有把握。南京显已沦入黯淡与苦痛之中。

在国民党的心目中，今日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然而他们很少反省：今日共产党势力之所以如此膨大，到底是谁培植出来的。我们可以一一分析。先说青年。青年本来纯洁，对于政治初无成见。只要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一切上轨道，国家有前途，他们自然拥戴政府。但是政府种种表现，无不使人失望；这已是了不得的大危机。而还要花样百出，“帽子”乱飞，无异火上加油，以至造成今日青年清一色的厌恶南京政权的局面。再说中年人。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员、

知识分子、工商界人。现在这一批人，一股脑儿对南京政权没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痛恶绝；抗战以来对公教人员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员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的贪污作弊，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物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今日全中国人民，对于现政权，可谓人人离心，个个厌恶。现政权中的人，恐怕也未尝不顿脚叹息：为什么这些人都“左倾”了！假如不满政府就是“左倾”，那末老实说，在二十年来国民党这种统治作风下，假如还不“左倾”，那这个人即使不是奴才，也是个大大的糊涂虫。就思想左倾而言，思想左倾和信奉共产主义本为两事；思想左倾不一定就是附和共产党。但在共产党与国民党政争之中，一切不满现政权的情绪，其无异间接增涨共产党的声势，确为事实。共产党是有组织的，一般人是没有组织的，没有组织的人之渐渐被有组织的人吸去，已为事理之常，而当局还采行“逼上梁山”政策，遂使一部分人在感情上愈来愈和共产党接近。不论这些不满国民党的分子和共产党有无连系，或在感情上是否附和共产党，总之在国共的斗争中，凡此皆对国民党为大不利。然而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国民党，反对国民党，痛恨国民党的？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自己。今日国民党脑子里所想到的是如何消灭共产党，然而他两只手所做的却无一不是在培植共产党，替共产党制造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形势。可是在这样一个极为明显的大势之下，现政权当让不让，可和不和，应改不改，要做不做，还是迷信武力，图以武力解决一切。不幸得很，现在已经开始感觉武力解决不了一切！武力肃清不了病入膏肓的贪污风气，武力振作不了推拖鬼混的行政效率，武力挽救不了已如堤决的经济危机，武力

收拾不回麻痹死去的人心，甚至武力也决定不了前线的战局。美国军火快用完了，日本军火也维持不了好久，自己制造则远水不救近火。虽然大帅出巡，而未必有补于士气，因为将军们都吃得饱饱的，而士兵们已无意为少数人送命了。

(二)

据我们观察，现政权业已失去挽回这个颓局的力量，最近且已失去挽回这个颓局的自信心。就政治说，从抗战末期起，政治上的主动攻势，迄在反对派一面，特别是中共一面，国民党始终处于招架的地位；直到国大开会前一两个月，国民党突然争取主动，但国大一开，局势大僵，最近喧染政府改组，闹了几个月也无甚成就。再说军事，军事之不可恃已如前述，而二月十七日蒋主席在中枢纪念周上论及临沂之战时说：“不管是共产党自行撤退或国军进攻，总之现已占领”（二月十八日大公报），在过去蒋主席的演说中亦从无如此的语气。经济更是束手无策，上海的金价跳到九百六十万，南京还在指派人员，组会研究。出口补贴，令甫十日，即行取消，简直不怕痛，自己打自己的巴掌。最近又想抛售救济物资，现政权的穷形极相，实已毕露。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由民选出来的政党，为了顾全本党的前途，搞下不时，早就漂漂亮亮的下台了，但在一个以武力争得政权的国家，一个执政党，即使在最无办法的时候，还是要挣扎维持其政权。挣扎是人情之常，就看如何挣扎。在正路挣扎，成败另为一事，要亦不失为种努力；若走错了路，则所有的挣扎，都成了一种浪费和罪行。据我们的观察，现政权的挣扎，显然并未针对病源。举例言之，现政府目下努力的

是改组政府。但我们不知照现政权最近两三月来努力改组政府的做法，这种改组，在政治上有何意义？还是想以此使国内人民一新耳目呢？还是为了对友邦一种表示呢？在我们看来，目前这种改组，无甚意义。第一，要改组政府无非要刷新政治，振奋人心。那就得大公无私，唯贤是用。被延揽的人总要德才孚望，能胜重任。可是现在政府所拉拢的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有的是臭而不可闻也，有的根本在算盘子上没有地位。拉这些人入府，不足为国民党之助，反足为国民党之累；不足以见国民党开放政权之诚，反足以见国民党开放政权之伪。这是就改组论改组。第二，要使改组政府获得成功，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同时改革政治作风。而在我们看来，改革政治，远较改组政府为重要。一般人民所期待的不是随便换几个部长，添几个委员，而是改革政治的根本作风。老实说，单替国民党设想，国民党果有决心打开当前的局面，振奋人心，则改组政府，尽不必向党外拉那些不相干凑凑数的人，国民党里面未尝没有优秀开明的自由进步分子。给他们权力，给他们机会，接受他们的观点，接受他们的作风，全国耳目，也会一新。今日国人，深受“训政”之赐，政治的经验与政治的认识，确已不如中山先生制订建国大纲时所认为那样的简单幼稚了，他们所要求的不再是政府外表上的改变而是政治本质上的改变；何者为假改革，何者为真改革，他们洞若观火，一目了然。但是事实上国民党有无此种远见，有无此种胸怀，有无此种决心，我们简直怀疑。就说最近上海发生的劝工大楼血案，还不是一套老办法？工商界人平时对于民主运动，本来不甚关心，处于旁观地位，可是给这一打，又平空替政府增加了许多反对派，真是目光如豆，愚不可及。一方面通令保障人权，一方面在北平大举逮捕。我

们别的且不说，就说蒋主席所提的四项诺言，若能兑现，人心亦可渐渐拉回过来。诚则灵，只要国民党有诚意，有决心，民心未尝不可收拾。传说当局对于目前局势，非常明白，忧虑焦愁，倍于常人。但是觉悟而无行动，这种觉悟仍是属于私人的，而无任何政治上的价值。二十年的时间不算短，病得太深，走得太远，要拉回来，须费大气力。我们怀疑现政权的人物有没有这大气力。

(三)

共产党是要获取政权的。一个政党当然要努力获取政权；争政权是一个政党的常情，政党不想争取政权才是天下大荒唐。共产党的坚主组织联合政府，只是他们的一个步骤，并非永远满足于这个联合的方式。能用政治谈判方式，插入政权阶层，徐图后举，自然最好；否则只好硬硬头皮用武力来夺取。我们在原则上是反对一个政党蓄养军队，以武力来夺取政权的；为中国的元气设想，我们也不希望共产党采取武力革命的方式。但这是就理论而言。就事论事，共产党的不肯放下枪杆，也未尝不能使人同情，因为在国民党这种政治作风下，没有枪，简直没有发言权，甚至没有生存的保障。所以国民党主张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共产党则主张先政治民主化，然后军队国家化，各人的出发点都是由于双方的猜疑，而双方猜疑的根据则为过去种种事实。在政协阶段，共产党表示愿意还军与国，但须得到保障，这就是所以中共和民盟要连合在国府会议中取得否决权的背景（当时民盟力劝共产党放下军队）。后来这个计划固未实现，就是实现了，共产党到底放不

放心交出军队，还是一个大疑问。

计划中的联合政府，至今未能实现，实在说，即使联合政府成立了，参加各方面如何合作，如何发挥有效能的政治力量，还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们相当赞成成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我们希望在这个联合政府里，发生一种政策上的制衡作用。在这个拟议中的联合政府中，共产党（即使联合民盟）原只是一个少数派。容能 ch ck，未必能 balance。但因为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坚强的党，是一个有整套不同于其他政党的政治计划与政治作风的党，所以在政治做法上，在这个联合政府中，或能发生一种领导作用。现在人民实在太穷太苦，政府应当推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籍以改善今日一般穷苦人民的生活情形。今日的国民党成了维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机构，要希望他能顾到一般底层人民的生活，不啻缘木求鱼。我们希望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后，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一切社会主义的政策，其目的都在为最广大的的穷苦人民造福，国民党为了要争人心，虽非所愿，亦难固拒。共产党最可怕的一点是统制思想。但共产党既以争“民主”为号召，加入联合政府后，必不致倾向统制，国共双方且均欲尽量提倡“民主”，以博民情。今日中国一般人所追求的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包括意志自由），这两样东西在以国共两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中或能勉可得之。我们期望这个联合政府者在此。

在过去一年多的和谈中，共产党一直把持攻势地位。他们一再要求和平。国共双方对于“和平”究竟有无诚意？有人认为国民党是有诚意的，有人认为共产党是有诚意的。我们认为国共两方面根本就无所谓诚意不诚意。我认为只有“顾到自己，也顾到对方，更顾到国家”这才算是“诚意”，专门替自己打

算,都是为私,绝不足以语“诚”。即以“和平”而论,以前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最近国民党的“就地停战”有什么不同?最妙的是双方的主张停战,据说都是为了人民。既然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国民党的“就地停战”没有什么不同,则为什么共产党要求“无条件停战”时,国民党不接受,国民党要求“就地停战”时,共产党不接受?原来停战与张三有利时,张三即要求停战;停战与李四有利时,李四即要求停战。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老百姓只是他们的幌子。现在我们看得很明白,共产党对于“和平”是越来越不发生兴趣了!要和平,从前是“无条件”的,现在是有条件的了;或者从前的条件低,现在的条件就高了;从前共产党反对美国调解,主张美苏英根据莫期科三国宣言共同调解,可是现在,共产党宣言反对任何外国的调解了(二月二十二日合众社延安电:周恩来谈话)。在过去和谈一年中,在共产党自身看来,他们也是失望又失望,苦痛又苦痛的。但周恩来氏返延后提出的和谈两前提,他们又何尝不知道其事之甚少可能。既无可能而仍提出,也是有意使马歇尔和南京方面难过难过而已。共产党是现实的,所提和谈的前提,在我们看来,也只是一种幌子。即以国大及国大通过的宪法而论,周恩来氏既然同意由沪去京,至少表示共产党有一种“有条件的”参加国大的可能。假如共产党参加国大,通过的宪法其内容容有变更,但共产党之不参加国大,并非为了宪草,而是为了宪草以外的其他条件没有讲好。要是讲好了,还不是一样可以参加国大?而且去冬国大之所以开得成,也是因为政协承认了那批旧代表的原故。要知这批旧代表,本无承认之理,但绝无承认之理者,政协那些代表们也居然承认了——只要自己的党得到利益,牺牲人民亦竟不顾!去冬国大之能开得

成，至少与政协的承认这批旧代表有关；而关于这点，共产党也是同负其责的。老实说，宪法不宪法，共产党并无太大的兴趣，共产党真正的兴趣，还是在军队和地盘两者之上。就军队论，他们显然不愿再接受过去整军协议中所规定的国共军队的比例了。就地盘论，他们有他们的价钱。他们在过去至少希望得到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要具有三个条件：第一，要能自给自足。第二，要交通工具便利。第三，要四地能连为一气。不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地点，他们不要。那四个地方，他们不说，但是照上开三个条件，似乎是指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四省。然而要南京给他们这四个省，在南京看来，这不啻要南京的命了。

(四)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于共产党的内情，我们自承所知不多，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近几年来，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困难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个政党当他在艰困奋斗的时候，总有他一股生气和生命的力量。不过上年他们在苏北一带的作风，却大失人望。苏北的作风，究竟是中共的政策改变了呢？还是中共在延安一带是一种做法，在苏北这一类地带又是一种做法呢？还是苏北一带的作风非出自延安的命令而是下级干部干出来的呢？我们未能了解。但是中共必须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共产党。他的党员是中国人，他所企图起而统治的一个国家是中国。中国有中国的民

性，中国有中国的传统。完全不顾他们所属于的这一个国家的民性传统，必将减少他们成功的希望而拉长他们离开成功的距离。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其广泛笼统的名词，就经济生活方面言之，共产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其间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已。就实行社会主义而言，今日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并不反对，毋宁说是很期望的。今日一般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心目下，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实际上，今日中国的知识阶级，除了极少数一些人外，大都都已沦为“无产阶级”了。这是国民党的恩赐！知识阶级的领导重心仍然在一般教育界文化界中，然而今日中国的教育界文化界中人物，那一个不是已经到了虽然尚未饿死而早已不能吃饱的局面！而且知识阶级，大都有理想，有理性的。除了少数自私分子外，那一个不承认贫富的悬殊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所以共产党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原则，并不可怕。一般人怕的是他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做法。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言论自由，那还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同时，要实行民主政治，必得有一种公道的精神。所谓公道的精神，一

是好的说他好，不好的说他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相信的。就前一点论，譬如说我们这批自由分子，不讳言，都是受英美传统的自由思想影响的，但我们一样批评英美，抨击英美。同时，苏联或延安有好的地方，我们一样称颂他们的好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见共产党批评史大林或苏联？从来没有看到左派的报纸批评毛泽东或延安？难道史大林和毛泽东都为圣中之圣，竟无可以批评之处？难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都圆满得一无可以评论的地方？就后一点说，我们虽非共产党党员，但一样尊重共产党的党员，只要他确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义，忠于他的党，忠于他的理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业，我们都在心底里对他尊敬。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他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勱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点作风有关。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前年英国工党竞选胜利以后，我替东方杂志写过一篇文章，结论说：假如英国工党执政成功，则使世人明白，实行社会主义不一定要走莫斯科的路线。英国工党一方面推行社会主义的政策，但同时仍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假如共产党能在政治生活方面，修正其政策，放宽其尺度，则将更能增加他们获得成功的希望。我们对

于共产党，私人方面无恩无怨，我这一番意见，我并不认为仅仅是一种消极性的批评，毋宁说是一种积极性的建议。

(五)

现在再来观察国共以外的一般自由思想分子。“自由思想分子”这个名词，本来是很笼统的。若从“思想”的角度来说，则中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可以说是自由思想分子。若以政党为别，则不仅国民党中很有一些开明进步的自由思想分子，就是在共产党中，恐怕也有这种分子。马歇尔的声明中曾抨击过共产党里的极端分子。按照逻辑说来，根据马歇尔的声明，则共产党中也是有温和的自由分子的。据我们所知，恐是有的，问题是数量的多少，以及在那种严密的党纪下能否自由表示其意志而已。本文是一篇论述政治形势的文字，所以我们在此讨论“自由思想分子”，大体上系指国共两党以外的自由分子而言。在中国，散布于国共以外的自由思想分子，为数极多，不过他们较为散漫，甚少严密的组织。其中组织较大的就是民盟。我们现在先就民盟作一个大概的论述。我们可以拿两句话来批评民盟，即“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民盟是一个很勉强集合而成的政团，民盟里的人物，各有各的教育背景，各有各的政治看法，各有各的历史环境，他们只是在一个相同的情绪下集合起来的，就是“反对国民党”，这是他们唯一连系的心理中心。民盟到底是一种政党的做法，还是一种运动的做法呢？就过去情形观之，似属于后者而非属于前者。民盟的历史已有数年，而其出头则为前年的政协时期。不过在过去，一般人似乎有一种印象，即政府来借重他们时，有了“民盟”，不来借重

他们时,就没有“民盟”了,所以有“和谈”,民盟就大大热闹,没有“和谈”,民盟就冷清清的无事可做;这情形至少在过去是如此。照近来的趋势看,他们似已企图改向政党的做法一途发展。中国社会上的封建味道本来还很重,民盟的领导人物还大都是前一代的老辈。我们若将民盟的领导人物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政党是非常脆弱的。我们不能不承认;像张表方(澜)、沈衡山(钧儒)等几位老先生,实在都是过去的人物了。民盟领导人物中实际政治经验最丰富的当推黄任之(炎培)先生,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黄先生也是过去的人物了。张君勱先生(现已脱离民盟)在政治生活方面,他是一个宪政学者,一个最好的政论家,然而他只是一个论政的人物,而不是一个从政的人物,他至多只宜于任国会议员,而不宜于掌行政责任,张东荪先生也不适宜从事实际的政治生活,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他在政治方面最能贡献的还是在思想及言论方面。若以现代的标准言之,严格说来,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物中,适宜于实际政治生活者,恐怕只有罗努生(隆基)先生一人。罗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笔都来,有煽动力,有活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可惜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从各方面分析,民盟实是一个貌合神离的团体,而所以能勉强集合起来,完全是由于实际的政治环境逼成的。但单靠对国民党的一种不满情绪维系一个政团,这显然是一种极其脆弱的结合。照我个人的观察,民盟诸君子,可以共患难,不一定能共富贵。这句话或许说得太率直,我们将来再看吧?

至于现在一般人都说民盟太左,成为了共产党的尾巴,关于这种批评,我认为无甚价值。凡是进步的政治集团,当然是比较左的;世界大势如此。成为了共产党尾巴一点,纯然是恶

意的侮蔑。要知实际政治不能完全摆脱权术，从战略上说，民盟和共产党互为呼应，实为必然，两者目的都要削弱国民党，在这个前提下，两者当然要并行连系的。假如一定要说如此就是民盟被共产党利用，则我们也未尝不可说，民盟也利用了共产党。故此事不足奇，亦不足为民盟之病。只要国民党一日保持其政权上的优势，民盟与中共可能继续维持其连系的步调。但是一旦国民党在政权上已不占优势时，在那个时候，中共与民盟恐将分途而未必再能互相呼应了。

(六)

在今日中国的自由分子一方面，除了民盟、民社党这些组织外，就是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分子了。这批自由思想分子，数量很大，质亦不弱，但是很散漫，从无足以重视的组织。这批人所拥有的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只是一种道德权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权力的力量。只是一种限于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而非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马歇尔在中国时，曾竭力鼓励这一批真正自由思想分子组织起来；无论马歇尔如何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形，马歇尔到头还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头脑，所以他还是隔一层的。自由思想分子不易形成一个坚强的组织有各种原因：一、过去自由思想分子的彼此相通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自由思想分子的长处是背脊骨硬，交情可以拉得长，其短处则为胸度狭窄，个人主义。中国有句话：“文人相轻，自古已然”；自由思想分子的重心人物大都是文人，即使今日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都受过现代文化的洗礼，但那个“相轻”的老根性，尚未完全洗

脱，譬如这次民社党和民盟的脱辐，政治上的看法固为主要的
原因，人事上摩擦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事政治，必须有
政治家的修养。第一要看得远，认得清；大的要争，小的就不
该争。第二要有气量，唯气量大，才能放弃自己的成见，抑平自
己的感情，牺牲自己的利益，如此才能顾全大局，争取目的，团
结合作，开创前途。政治活动不能没有领导人物，但是因为“相
轻”及“自傲”在中作祟，所以在自由思想分子中很难产生领导
人物；政治活动是必须有组织和纪律的，但是因为自由分子的
相通大都是道义的，不是权力的，所以很不容易发挥组织的力
量。这些是自由分子根本上的弱点。二、今日中国极其需要自
由分子的抬头，但事实上自由分子的抬头非常困难，这与国民
党二十年来的统制有关。国民党二十年的统制对于自由思想
分子的抬头的限制，是三方面的。1. 政治方面的限制。这点大
大家都明白，不必再解释。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本保障，人
身自由没有保障，其他自由自然都谈不到。2. 经济方面的限
制。政治活动必须有充裕的时间和财力，八年抗战，把教育界
文化界人士弄得个个生活不安，精神和智慧完全消耗在柴米
油盐这些琐事上，以致大大削弱他们在政治方面所能发挥的
积极力量。3. 在思想散布方面的限制。二十年来党化教育的
结果，使青年都未能得到合理的教育。党化教育的目的原是要
大家信奉三民主义，做国民党的孝子顺孙，不料国民党自己不
争气，越搞越不象样，弄到青年大都厌恶国民党。厌恶国民党
不要紧，党化教育给青年的并不是一种理性教育，青年在理性
方面未能得到应有的教化，于是感情的部分因不满实现而日
益泛滥。自由思想是重理性的，必须在理性上有修养，始能接
受自由主义的薰陶。情感泛滥的结果是趋于极点，不是极点的

右就是极点的左。但现实环境逼得青年左，于是青年越来越不易保持其冷静的头脑而对各事作沉着的思想。在国民党，可谓自食其果，而在自由主义的传播上，也同受其害。同时，党化教育的做法是收罗奴才，放任浪才，杀害人才。我称那些只知享乐百事不管的青年为浪才。浪才越多，对于自由主义的传播也是一种限制。自由主义是最讲是非的，那些浪才什么都不管，那还管什么是非呢？

自由思想分子虽然受着上述种种限制，而客观地说，这批力量目前正在日益滋长之中。但我们还不能将这种力量的滋长归之于他们的努力，而实系由于时代的使然。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则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因为大家怕共产党，怕他们那一套杀人放火的暴行；无论这种畏惧是不是出于一种误会，总之大家在畏惧共产党。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国民党的腐化已是众目昭彰，有口皆碑，无论三民主义这块招牌如何，总之人民对于国民党已难维持希望的信心。在这种两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我们说过，今日中国这批自由分子是很散漫的，他们的力量都是源于道德的。凡是道德的力量，常常是无形的，看不见，抓不着，但其所发生的力量，则深入而能垂久。这股力量在社会上有根，在人心里有根。不过若从目前中国的政治局面看，这种仅仅限于道德方面的力量显然失之消极。今日绝大多数的人，既不满意国，也未必欢迎共。绝大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这个要求是时代逼出来的。我们认为中国在最近的几年之内，一般情景还是很黯

淡的；说得远一点，则我们这一代，大概也已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后代造福”的时代。然而我们可以牺牲自己，而不可以不为后代造福。今日中国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大都在苦闷地忧虑着国家的前途，但他们实不该止于消极的焦愁忧虑。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

（原刊“观察”第二卷第二期）

五、大局浮动 学潮如火

大局浮动到了极点。到处不安，到处忧惧。旧局面正在瓦解之中。

一个局面趋向瓦解，总由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所致。一个局面的瓦解，非日一之事。在开端时，昏庸之统治人物恒不以为意；但当它挟狂风以骤至的时候，台上的人物遂惊惶失色而莫知所措。近一月来泛滥全国的米潮和学潮，无不表现当前局面之岌岌不可终日。我们早就认为这次政府的改组，无甚意义。现在改组已逾一月，改组后的政府在任何方面尚无任何作为。张群内阁一上台，物价就抢先贺喜。米价在半个多月内陡涨至一倍以上。上海、杭州、无锡、芜湖、宣城、合肥、吴兴、衢县以及远至四川的成都，无不有抢米的风潮；甚至堂堂首都，亦竟不免。孑孑小民，不惜冒一死以挣扎其生命，这说明民间疾苦已经严重到什么地步！抢米行为不限一地，竟然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普遍现象，这说明我们的国家已经乱到什么程度！到处骚动，到处愤怒。政府害怕人民革命，然而政府似乎无一不在逼着人民要起来革命。

这次各地学潮，原因不一。教育经费问题，教授待遇问题，学生副食费问题，男女分校问题，会考问题，人权问题，

校长问题，迁校问题，护校问题……一连串的“问题”。本来是一些个别的局部的问题，经过多日蔓延演变的结果，据今天（十九日）报纸记载，似又进了一步变成为一个更扩大更严重的问题，在南方变成为一个“抢救教育危机”的问题，在北方变成为一个“反内战”的问题。这次学潮开端于教授的要求改善待遇，“停教待命”，其后接上几个大学的学生为争取他们本身各别的目的，请愿游行，而现在则在一种更大更普遍的呼吁与要求下，形成一种狂风暴雨式的全国罢课局面。从中国的南部到北部，东部到西部，几乎整个的国家都受到这种学潮的激荡，沉沦在一种无底的动乱与忧惧之中。我们无意在此就每一学潮一一论评，我们认为从整个大局的观点来观察这如火如荼的学潮，其意义远为重要。我们首先要问，这种汹涌澎湃的学潮，其包含的政治意义究为何如？我们认为在这些学潮底层，都潜伏着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即今日一般青年学生对于现状的普遍的不满。今日一般青年学生对于当前局面实在怀有一种澈头澈尾的高度反感。我们先就教育本身来说，为什么多年以来，军费党费团费以及一切有政治性质的费用，动辄巨亿，而独独对于教育经费如此吝薄？为什么那些达官贵人，汽车洋房，享受优裕，而一般公教人员却不能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生活？为什么教育不当教育办，要任命那种有党办党有官做官的人物来做大学校长？为什么不能让青年的智慧思想自由发展，而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加以限制？为什么不能在根本上来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整理课程，充实设备，增加经费，培养学风，使青年在校四年，在知识上能有所得，在做人上能有所立？今日一般青年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是衣履不周，三餐不饱，身体疲乏，精神萎

顿，而一想到来日，则中尤心徬徨，莫知所往。在快要毕业的阶段，没有一个人不感到自己空虚，没有一个人不感到前途茫茫。这些还是在学校围范以内分析。要是再将视线放远，看到国家一般情形，更是绝望苦痛，欲哭无泪。八年抗战，幸未覆亡，国家总算乘此得到一个翻身的机会，为什么不好好努力，埋头建设？没有一个国人不在呼吁和平，没有一个国家同情中国这种内战，为什么内战不能停止？物价这样涨，涨到骇死人，为什么一天一天的过去，政府当局总是没有一点办法？为什么有些人的财产越来越大，而一般人则越来越没有饭吃？为什么政府对于那些最大多数的穷苦百姓，总没有一个办法来改善他们的生活？为什么在今日这种社会上，那些一肚皮草的逐臭之徒，反可招摇过市，优游自如，而一切有智慧有人品的人物，反而在水准之下的生活中挣扎？这是不是社会的不公平？为什么政府容许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为什么汉奸大到像周佛海，竟然不死？为什么只要有枪杆子的人，翻来翻去总是“忠实同志”？为什么种种贪污不法的事情，报纸抨击，众口指摘，而政府对于这些案子总是雷大雨小，不能痛痛快快惩办一下？为什么有些人只要愿做尾巴，便可分到洋房，配到汽车，做到大官，占到地盘？整个局面，混沌沌，良心丧尽，道德荡然，纲纪废弛，人心麻痹，人人只知混水摸鱼，取巧为私，国运日敝，民生日蹙，凡此种种，对于那些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青年，请问何能使之甘心！请问何能使之甘心！……无论从国家大事，或者到个人生活，今日一般青年的情绪是苦闷，徬徨，失望，愤怒。他们看不到一点光明，看不到一点希望。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在内心中渐渐郁成一团怒火。这一肚子气，这一肚子火，碰上机会，自然得发泄出

来。这是多年以来他们耳闻目击身受种种反感所累积而成的一种反应。反感越多，累积越久，在发泄的时候，其情绪也就越激烈，其态度也就越倔强，其意志也就越刚毅，而其汹涌澎湃，奔冲激荡的力量，也就越凶猛而难于遏止。

英大交大两校学生的赴京请愿，在当时看，实已构成极度紧张剧烈的场面。但事态发展到今天（十九日），英大交大事件在这个还在发展中的学潮中，显然业已退到次要的地位，而仅仅成为这次整个学潮中的一个序幕。但我们即使就以旬日以前当局对于英大交大两校学生的请愿，澈夜奔走，如临大敌，甚且不惜拆断铁路，阻止请愿学生的前进为例，亦可想见这种“恶性学潮”是如何的使南京当局心惊肉跳。各校学生请愿，都有他们各别的请愿目的，这些目的，若就整个大局的观点来说，大都是微末不足道的。但是当局对于当时英大交大的请愿，所以心惊肉跳，乃是因为这些学潮，在表面上，虽然只限于它本身所揭示的要求，但从一种更广大的时代背景来看，它还包含着更重要的政治意义。英大学生在杭州车站所表现的力量，并非纯粹来自那几百个英大学生；同样，交大学生在上海北站所表现的力量，亦非纯粹来自那一二千个交大学生：几百个甚至几千个，那是看得见数得清的。看不见数不清的是在那些学生的后面，还有着一个人更大更不安的社会。为学潮所连带反映的那种社会的不安，才是使当局所以为之震颤恐惧，日夜不安的原因。他们深恐此波引起彼波，尤怕因学潮而引起其他更可怕的风暴。果然如他们所恐惧的，这几天的学潮比英大交大请愿时，范围更扩大，性质更严重，来势更凶猛。照这两天（十八、十九）报纸消息，学潮显然已从局部的变成为全面的，从分散的变成团结的，从

不公开提到政治问题而趋向公开提到政治问题。历史上的事实，有时恒非当时所能预料者，共产党的拆毁铁路竟亦大有助于国民政府，目下以京沪杭为中心的学生运动，业已携手，若非津浦铁路不通，恐怕南北两地的学生亦已携手同行。这次这个全国性的学潮，南方先走了一步，现在北方正在接踵而来。照蒋主席的谈话以及国府公布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政府对于学潮似将采取严竣处置。我们除了感觉当前的学潮似乎正在发展扩大之中，尚未达到最高阶段之外，尚难预料这个学潮将在什么时候以及何种情形之下始能结束。只是我们愿意向政府进一言者：凡是一个社会现象，必有这个现象的原因。不在原因上补救解决，一切处置徒然使事态更趋恶化。要知今日中国的学生已非严厉斥训或强力弹压所能骇退得了。政府必须在学潮中获取教训。政府必须明白，无论学生本身承认或不承认这点，这次学潮的主要意义乃为对府政过去及现在的作风表示不满。他们显然在示威，在抗议。用着愤怒的呼声，愤怒的眼光，并以一种挨饿吃苦的精神，来诉斥并鞭策台上的人们。他们明言或默言，大家一致地要求和平，要求民主，要求使国家像样，而进入于康乐富强之境。在台上的人们要知今日中国没有一个人不讨厌你们，仇视你们。你们无论到什么地方，绝大多数人在心底里都以白眼报答你们。只是你们有权有势，有枪杆，有钞票，一般老百姓虽然受你们压迫，受你们欺骗，受你们侮辱，受你们剥削，但在你们的淫威之下，无可奈何你们。在这种局面下，学生挺身而出，对国是表示一种抗议，实亦为他们在这个时代中所应肩负的责任。他们所以能肩负这个责任，一方面因为青年都怀有理想，都追求光明，都有一种不平则鸣的性格，一方

面亦因他们幸而能有一种组织，在集体中表现其意志，以幸免头颅与身体脱离的危险。每当我们目击青年学生游行示威时，无不衷心激动，热泪盈眶。这些青年何不幸而生在这样一个腐败黑暗的国家，竟使他们不能安心在校读书，冒暴雨或烈日，自清晨至深夜，声嘶力竭，奔走终日，会不顾一己之疲乏与饥饿，凭着一股热血，以寻觅国家的光明。我们生在这样一个腐败黑暗的国家内，亦何幸尚有这一批热血青年，能责无旁贷地起来呼唤我们国家的灵魂！南京学生饥饿请愿的主席团说：“现在公教人员和老百姓不敢喊；他们不敢喊，我们要替他们喊出来！”（十六日文汇报）这是多么勇敢的一句宣言！今日这一代学生，无论是他们的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处理能力，或是宣传能力，都远非二十年或十年以前的学生所能比拟。他们已建立他们的尊严。在多年多种的锻炼下，他们不仅完全成熟，而且他们那样沉着坚韧，竟非中年或老年人所能想像。他们有感情并有理智，并且能使他们的感情约束于他们的理智之中。政治上的种种现象诚然常常使人失望悲观，然而赖有这批青年，才使我们在黑暗中看到一点国家新生的希望。我们承认学潮的起伏足以增加社会的不安，但要使社会得到安定，先须使人心能平。要使人心能平，决不是大官的训话或一纸命令所能奏效，这要执政当局拿出良心和办法来，一一见之实行。今日中国最迫切需要者，实莫过于执政当局之能够牺牲他们已得的一部分权利，唯有这样，人心才能平，社会才得安定！今日这批青年都是来日建国的梁栋，如何使这批青年的力量不致在消极方面消耗，就全看政府当局如何的领导这批青年。

（原刊“观察”第二卷第十三期）

六、学生扯起义旗 历史正在创造

我们在上期本刊论评学潮，叙至五月十九日止。我们当时陈述三点：一、这次学潮的主要意义是对现状不满；二、目下尚在蔓延之中；三、学生非强力所能慑服。现在忽忽又过一周，在这一周间，大局发展，和我们前述三点，大致吻合。就第一点论，学潮已从非政治性质转入政治性质；就第二点论，不仅在京沪平津一带，罢课声援的学校越来越多，就是远至昆明广州各地，最近亦均纷纷响应；就第三点论，国民政府虽于十八日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而十九日上海依然有五千余学生饥饿游行，二十日南京六千余学生依然在水龙、皮鞭、木棍之下冒死请愿，同时北平万余学生亦仍在“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下游行全市。日来各地当局虽已开始以行动来制止学潮，学生被捕被殴之事，络续发生，但是学生情绪依然高涨，心中愤怒只有更甚。

这次学潮，最初是局部的、个别的、分散的。自从中大学生倡导“吃光运动”以后，遂使学潮在横的方面发展开来，形成为一个学生间的共同问题。京、沪、杭、平等地学生大都响应这个运动。其后上海学生又改名为“抢救教育危机运动”，俾使这个运动的目标更加扩大，意义更加严肃。“吃光

运动”和“抢救教育危机运动”，多少已牵涉到了政治问题，因为学生没有饭吃与当前教育的种种危机，无不与内战问题有关。北方的学生在这个时候直截了当的提出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认为“饥饿源于内战”，要活非先停战不可。这个“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立刻为南方学生所接受。南北两地的学潮发展到这个地步，目标趋于一致，步骤亦渐统一，而真正成为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学潮，遂开始在南北两地，并肩迈进。

当学潮公开涉及政治问题以后，政府即认为学生的行为已越出应有的范围，并认为此次学潮，完全受人利用。政府对于学生这种指摘，我们难于同意。一个青年在求学时代，他虽然是一个“学生”，同时也是一个公民。法律并未规定，一个人要是入了学校读书，他就将丧失他公民的资格。现在的大学生，大都已过法定年龄，他们绝对有过问国事的权利。今日国人，大都不满现状，对于内战，尤其痛恨。因为在这种内战的局面下，无论是国家的或者是个人的前途，都被内战打得一干二净，没有一丝生路。我们曾在上期本刊分析今日青年学生苦闷失望愤怒的种种原因，并谓这种种原因逼得他们不得不挺身而出；而最近王芸生先生在“我看学潮”一文（见本期观察文摘栏）里，叙述这次学生喊出“反内战反饥饿”的背景，尤其针针见血。学生在中国业已传统地成为了政治上的寒暑表，在过去，学潮的激荡无不反映当时政治的腐败和黑暗。在这种全国怒吼的局面下，当局不反躬自问：为什么那些学生要喊出“反内战反饥饿”的呼声？为什么全国的学生都那样万众一心地游行示威？还是一味训斥学生；训斥不足，施以残暴；这种能度，绝对不能使人同情。我们亦

绝不承认，此次学生请愿，系受他人利用。学生目击国家危急，身受饥饿苦痛，痛中思痛，一切罪恶皆源自内战，起而呼吁，起而反对，为什么一定要说他们受人利用？老实说，在今日这种局面下，假如还要受了他人的利用，才喊“反对内战”，我们真要向苍天呼号：“人心何在”了！

政府又用了许多大罪名加诸学生，认为学生的行动，破坏交通，妨害秩序。关于破坏交通，姑以交大学生赴京请愿一事为例，交大学生实难担负破坏交通的罪名。交大学生本拟购票乘车（十四日大公报第四版），晋京请愿。为什么政府不准他们购票？公务员可以购票，商人可以购票，农人工人可以购票，为什么学生就不能购票？赴京游览可以，赴京访友可以，赴京经商可以，为什么去教育部请愿就不可以？从法律观点看，交大学生购票赴京，并不犯法，为什么政府要命令车站拒绝购票？政府禁止学生购票，在我们看来，无宁说是政府在破坏交通。交大学生认为政府剥夺他们购票乘车的权利是非法的，自然心有不甘。政府既然蓄意破坏交通，他们只好自己出来维持交通；自驾火车，离沪驶京。本来只要他们的火车一开，交通亦即不难恢复。不料政府一不做，二不休，又拆起铁路来，致使交通陷于停顿。无论如何，交大学生绝无存心破坏交通之意，事实上破坏交通的是政府，而现在政府反将破坏交通的责任，加诸学生，孰能得平！再说社会秩序，政府定出了一个“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维持社会秩序”而要“临时”定出“办法”来，大家想想看，这个“社会”还谈得上什么“秩序”。在我们看来，所谓“社会秩序”，决不仅仅是指汽车可以在马路上驶行，火车可以在铁轨上驶行而言。“社会秩序”的意义非常广泛，其中最主要的

是要使人人安全，都有饭吃。去年五月上海的客饭只有五百元，今年五月上海的客饭涨至四千元，请问政府有没有维持这个“社会秩序”？深夜捕人是维持秩序吗？任意搜查是维持秩序吗？现在有许多人消失得无形无踪，亦没有看见政府负起责任来维持这个“社会秩序”。社会本来是比较安定的，就因为政府无能缺德，所以弄到今日，社会越来越没有秩序。今日扰乱这种社会秩序的决不是那些学生，制止了学生的请愿游行，也未必就算维持了社会的秩序。政府不尽其本身的责任，停止内战，稳定经济，而独独以妨害社会的秩序的罪名加诸学生，是不能使学生心服的。

政府认为学生请愿，是“聚众威胁”。我们认为“聚众”则有之，“威胁”却未必。学生手无寸铁，政府有的是骑兵宪警，学生对于政府，何“威胁”之有？乡间的百姓，看见军队来了；要米不敢不拿米出来，要柴不敢不拿柴出来，要他们去挑箱挖土，他们不敢不去挑箱挖土，这才是“聚众威胁”。政府认为学生请愿，便是“聚众威胁”，未免夸大其辞。有人又劝学生要体谅政府。老实说，假如政府处处体谅人民，不要人民去当炮灰，不要征人民的食粮，人民那有不体谅政府的道理。“体谅”是相互的，在过去，人民“体谅”政府已“体谅”到有许多地方的人民连裤子也“体谅”光了，我们还是希望政府赶快体谅体谅人民，先把这个万恶的内战停了下来再说吧。现在人人饿得慌，他们一天到晚只想吃饱，他们还有什么闲心情来和政府有意为难？

总之，我们认为这次全国的学潮，完全是政府逼出来的。学生意志绝对是自发的，而非被动的；他们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而非卑鄙的；他们的精神绝对是勇敢的，而非怯懦的。

钱端升先生说：“今天的学生，比我们的学生时代进步多了。第一、现在的学生了解人民痛苦，已与人民痛苦连在一起。第二、现在的学生无领袖欲，群众化了，无个人风头，所以组织力强。第三、学生的见解进步，老实说，已走到我们的前头。我们完全同意钱先生的看法。我们在上期本刊就说过：“今日这一代学生，无论是他们的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处理能力、或是宣传能力，都远非二十年或十年前的学生所能比拟。他们已建立他们的尊严，他们不仅完全成熟，而且他们那样沉着坚韧，竟非老年人或中年人所能想像。”从前的学生运动，是学生跟了先生走，现在则是先生跟了学生走了。我们看这次学潮，在南京，中大的教授虽然发动于前（要求提高教育经费等等），结果是学生一开动就跨过了教授一大步。在北方，学生走在前面，教授不甘落伍，虚心而又热情地牢牢地钉在学生的后面。在上海，教授似乎永远被学生所遗弃了。这是青年人的骄傲，也是中年人的悲哀。也就这一点，更足证明今日学生之绝不轻易受人利用。在这次学潮之初，学生似乎都是为了自己的问题，然而经过水龙先生、皮带先生、木棍先生、石子先生的教训，学生在心灵上又骤然跨前一步、孕育出一种更为崇高更为伟大的精神。他们了然他们在今日这个时代中已肩负一种新的任务，亦即历史的任务。他们现在正企图以他们的热血来转旋这个天地！南京学生饥饿请愿团的主席会说过：“现在公教人员和老百姓不敢喊。他们不敢喊，我们要替他们喊出来！”本刊北平通信亦说，北平的学生都以为这一次的学潮，就是一个“新五四运动”的序幕，他们要替人民呼喊。他们已深深觉得，单单为了自己的利益争，这个争是渺小的，必要替广大的人民争，这个争才是伟大的。

现在全国的教授，特别是北方各校的教授，都站在学生的后面，全国的开明的进步分子，也都站在学生后面，这是一个坚强的阵线，一幅动人的图画，一首伟大的史诗。从各种形势看，当局显已开始用铁腕来冲散这一个阵线。我们尚难逆料一切前途的演变。但是我们相信，当学生在极端的团结之下，意志坚定，组织严密，胸脯挺起，脚跟站牢，这一条铁练，绝不是木棍所能打得断的，这一股洪流，绝不是几辆警备车所能拦得断的。我们绝不相信政府能把天下的学生都捉进监牢。我们看，五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被捕的学生宣传队，那样义无反顾，从容地走上警备车的神情，这是多么壮烈的场面。被捕的八九十位学生，在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里，依旧慷慨高歌，声闻户外，这是一幅多么感人的情景。我们坚信，在当前这种黑暗危急的局面下，学生将永远发挥其力量，以挽救国家的命运。在这样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终会爆出光彩夺目的火花，而新的中国就在这火花中孕育生长！

（原刊“观察”第二卷第十四期）

七、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

五月二十四日，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查封文汇、新民、联合三报。令文如下：

“查该报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本市为戒严地区，应予取缔，依照戒严法规定，着令该报于明日（二十五日）起停刊，毋得违误，此令。”

这被封的三家报纸，在一般人心目中，都是左翼报纸。所谓左翼报纸，大体上是指这家报纸在思想上比较前进一点，在言论上比较激烈一点。按照出版法规定，报纸的负责人是“发行人”。据我们的看法，这三家报纸的发行人，大都只能算是经营商业的人物，他们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还是如何能够多赚几个钱的问题——进一步，希望多赚几个钱，退一步，至少希望收支平衡，能够维持这一张报纸。若说他们有“颠覆政府”的意图，那真是捧了他们。至于这三家报纸的编辑人员，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大都是些比较进步而有独立意志的民主分子。这是很正常而且很自然事情。一个国家若想进步，便需要多几个这种分子。假如一个国家的人民，个个都是唯唯否否，请问这个国家还有什么生气？我们所以能

够抵抗日本，苦战八年，不为暴力屈服，就靠我们国民有这一点独立意志。若说“左”，老实说，这三张报真不够“左”；若说激烈，这三张报亦不够激烈。要是比起南京那位泼妇骂街的反共专家某大炮，文汇新民等两报上的文章简直是“温吞水”。我很坦白的说，我对于文汇新民两报的作风（我不常看联合晚报），有许多地方是不敢苟同的。不敢苟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两家报纸的编辑态度不够庄重，言论态度不够严肃；我很少在文汇报上读到真有重量的文字。

我认为这三家报纸被封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他们的言论，而是由于他们的新闻。这被封的三家报纸都有一个共同的脾气，就是专门喜欢刊载那些为政府当局引为大忌的新闻。他们所登的大都是事实，无奈今日发生于社会各方面的事实，都是政府所不愿让大家知道的。政府所愿让大家知道的事情，统统已归中央社独家发表了；假如这三家报纸专门刊载中央社的消息，我敢拍拍胸脯担保这三家报纸绝不致被封。无奈中央社的消息许多人不要看，而且不要看中央社消息的人愈来愈多，而这三家报纸的编辑部同人，又都不识时务，自以为负有神圣的新闻使命，拚着命要在中央社的新闻眼以外去找新闻。不幸他们所登的新闻，政府越顾忌，读者越要看。政府既无力在根本上防止那些“新闻”的发生，于是只好设法来制止那些“新闻”的发表。

这次学潮，当局弄得焦头烂额。查封报馆，而且一封三家，这本来是一种希特勒式的作风，报载中国现在正由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主席领导我们步入民主之路，大概若非走头无路，绝不致走此一着。不过我们不承认这被封的三家报纸有任何“阴谋”要煽动学潮，甚至“意图颠覆政府”。当然，报

纸在任何公共生活中都是要发生一种消息传播的功绩的，但我们不承认，有了这几张报，就可以掀起学潮，没有这几张报，就可以消弭学潮。据我们所知，文汇报屡有查封之说，恐怕还是因为上海幸而有这位开明民主的吴国桢市长，所以文汇报至少还能出版至五月二十四日。这次大概正如 The Evening Post 主笔先生所感觉的：“政府的重要领袖们多少有点孤注一掷的情绪”，而终致出此一着。三报被封的理由是“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及新闻”，对于这个理由，各有各的看法，我们亦无意在此辩论。只是我们要公开宣称：我们在同业的立场上，不能不向被封的文汇、新民、联合三报同人，表示我们最大的同情。查封已经是一个事实，我们希望政府善为补救，设法使上述三报早日复刊，以恢复民主国家新闻事业的常轨。

关于大公报对于这次学潮所表现的态度，我们亦愿略加论列。在这次学潮中，大公报所表现的态度，实在不孚众望。英大事件和交大事件都是局部问题，姑且不说，就是十五、十六两日南京中大金大两次饿饥游行的新闻，不编在第二版中，亦还勉强可以说得过去。可是五月二十日南京发生了这样壮烈的惨案，这样震动全国而有强烈政治意义的新闻，大公报还不肯编在第二版要闻版中，这是什么编辑态度？（按：二十一日该报第二版因参政会开幕，新闻确极拥挤，但假如大公报重视这次学潮的话，该日该版其他零星新闻，都是可以腾让出来的。）同时，像南京五二〇惨案这样一个严重的新闻，大公报竟用“首都一不幸事件”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标题，这是什么编辑技术？至于说到评论，该报五月二十一日短评

论南京的惨案说：“不幸执行禁令者在方法上未能充分体会在上者爱护青年的本心，卒至演出惨剧”。全国青年听着：你们同意大公报的话，承认今日在上者还有一点爱护你们这批青年的意思吗？你们承认，当有人用木棍铁棍在你们头上劈打下来，这就是爱护你们的表现吗？在五月十九日的社评中，大公报视学生请愿为“暴力的革命”，五月二十二日的社评中，认为“学生近来的行动”“太天真幼稚”了，认为“青年人太简单了”，认为学生在请愿中“充分表现其行动的儿戏性”，而且甚至认为今日之学潮，直为“小孩玩火”。我读大公报前后十几年，实在从来没有看到大公报有过这样违反民心的评论。当然，我不能不在这儿提出，这次大公报在学潮中所表现的言论，如此灰色，不能领导当前的潮流，亦许与王芸生先生的适有北行有关。假如王芸生先生在上海，在他的主持下，我相信大公报的言论决不致摇摆怯弱到如此程度。不过这次大公报在上海及南京两地的采访同人，都甚忠实，热忱，前进，此可于他们的报导中见之。他们的努力多少替大公报挽回一部分读者的感情。

关于大公报对于这次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所表现的态度，我们亦不能不出而一言。在五月二十五日大公报第四版上，大公报只以三号字的标题，平平淡淡地刊出文汇等三报奉命停刊的消息。大公报的编辑先生大概对于电影明星及歌唱明星都是非常发生兴趣的，凡是外国什么一个电影明星有了一点什么新闻，大公报照例要加上“花边”，登出来（请阅最近数月大公报第三版下半面，其事数见）。在大公报的编辑标准中，大概像在一个城市中同一天封了三家报纸这样一个消息，其重要性还不如一个电影明星的私人轶事。大

公报对于文汇等三报的被封，始终未发一言，以示同情。五月二十五日是星期，该报例刊“星期论文”，但为什么不写一篇短评呢？二十五日不写短评，为什么二十六日不写一篇社评呢？今日为二十八日，文汇等三报已被封四日，大公报对于此事始终不置一辞。且不说别的，至少站在同业的立场上，大公报也应当写点文字，向当局抗议一下。大公报所以默无一言，还是认为文汇等三报应该被封呢？还是吓得不敢说话呢？（文汇报被封后，大公报对于学潮的新闻，已有改变）。还是幸灾乐祸，坐视不救呢？上述三因，必居其一。我觉得大公报这次的措置，显然失态，至可遗憾。

最后我不能不声明一二。我和联合晚报里的同人，一个都不认识，甚至连他们姓名我都不知道。新民晚报的高级负责人中，有二三位是我的朋友，可是彼此皆忙，虽然同在一地，我和他们已有整整八个月未见过面。文汇报里面，我仅和文汇报的总主笔徐铸成先生前后见过四次面，都是寒暄。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赐一覆。独大公报里面，我的朋友最多。单说在大公报编辑部份服务的，就有六位先生是本刊的撰稿人。但是我们今日所检讨的问题，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恩怨的问题。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今日我们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无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

（原刊“观察”第二卷十四期）

八、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 采取步骤表明态度

七月一日纽约下午报 (PM) 刊载合众社中国区经理伦道尔所撰一文，指责“蒋主席之姻亲使美国公司遭受损失而致富”，其言有曰：

“蒋主席之姻亲能获得二万五千美元之外汇以输入化妆品，而化妆品为中国政府所颁布之紧急经济措施中所严格禁止入口者。同时美国进口商则无从获得三十一万美元之外汇，以输入能使中国工厂复工之机械器具。中国政府之购料机关，曾输入大批明令禁止之奢侈品，例如汽车、收音机、电气冰箱、及照相材料，以供私下分配。同时美国公司则申请中国煤矿复业所需之抽水机之入口执照，而竟未获准。中国豪门第一家，即蒋夫人之昆仲及远亲等所办公司，则能藉其与政府之关系获得特权，并向在中国历史悠久之美国公司之经销商勒索。豪门利益之支派不胜枚举，例如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及孔祥熙所办之中孚公司，宋氏弟兄皆蒋夫人之手足，而孔氏则为其姊丈。宋子文所经营之南洋烟草公司，其另一兄弟宋子安之中国建设公司，蒋夫人之弟兄姊妹合办之金山公司，宋子文宋子良所办之中美橡胶公司，宋子文所控制之扬子电力公司，宋子文之中加公司，蒋夫人之外甥孔令侃所经

营之扬子建业公司，其他远戚疏亲所办之公司，亦不胜枚举。遭受不道德方法失去代理人之美国厂家，据悉计有西屋电气公司，该公司之经销权已由历史悠久之店号转予孚中公司，威利斯汽车公司可贵之吉普车经销权，亦由其美藉代表让予宋家。美国安纳康达铜矿公司则在宋家压力之下，取消其美藉代表。其他类似情形尚不知凡几。”

年来美国报章杂志所刊指摘中国局势的文章很多，而伦道尔此文，其性质实较其他指摘中国现状的文章为严重。第一，伦道尔此文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广泛空洞的指摘，他文内所涉及的都是有姓有名的人物以及具体的事实。第二，伦道尔此文所涉的不只是政策上的问题，而已涉及了政治道德上的问题。第三，伦道尔此文所涉的人物，包括曾任中国前后十年以上的两任行政院院长，并涉及国民政府主席的夫人，我们认为此文已经不能仅仅视为是一个批评任何私人的问题，它实已涉及中国国家的荣誉。正因此种理由，我们对于此事不得不出而一言。

我们认为国民政府以及“蒋主席之姻亲”，其中以孔祥熙宋子文两氏为代表，对于伦道尔此文，不能不出面有所表示。伦道尔此文的主要动机当然是替美商争取利益，但该文所涉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商的利益问题。孔宋两氏虽然先后曾任中国行政院院长达十年以上，但我们不能谓为一个行政院院长卸任以后即无经商之自由，但伦道尔此文所涉及孔宋的部分，并不是一个行政院院长有无经商之自由的问题。伦道尔此文所涉的问题，约如下述：

(1) “中国政府之购料机关曾输入大批明令禁止之奢侈品”，“以供私下分配”的问题。

(2) 有助于中国工商建设之正常器材，无从获得外汇及入口执照，而用以购买化妆品及奢侈品者，反能获得外汇及并能入口的问题。

(3) 豪门“藉其与政府的关系获得特权”，向外商“勒索”，并以“不道德方法”压迫正常商人的问题。

我们认为伦道尔文中所述，或者是事实，或者是虚造，二者必居其一。假如是虚造，我们认为伦道尔此文对于孔、宋两氏及蒋夫人，已构成严重的毁谤状态，孔宋等氏对于伦道尔应提出法律控诉，藉以维护其私人的名誉。同时，因为孔宋两氏曾先后担任中国行政院院长多年，而蒋夫人则为今日中国国民政府主席的夫人，国民政府应即循外交途径，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责令伦道尔及刊载伦道尔此文的下午报正式向中国政府道歉。假如伦道尔此文所述，确系事实，国民政府应对此事严格惩处，俾在外交上维护国家荣誉，在内政上以申政府的纲纪。

因此我们建议政府对于此事应即迅速采取适当步骤，以澄清国内国外因伦道尔此文所引起的混乱的观感。我们建议由监察院单独组织，或由监察院会同立法院及参政会会同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办理此事。在欧美，当国会自身发现国家机关或政治人物发生重大过失或不道德的行为，或外间舆论对于国家机关或政治人物的行为所有指摘时，不论此种指摘发自国内或来自国外，而那种过失或行为足以损及国家的尊严及荣誉者，国会常常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彻查此事。我们认为政府应当采取下列步骤：

(1) 彻查国民政府购料机关自胜利以后自国外购入器材用品之全部单据，查究是否有为伦道尔文中所述“曾输入大

批明令禁止之奢侈品，例如汽车、收音机、电气冰箱、及照相材料，以供私下分配”之情形，并公布彻查之结果。

(2) 政府曾经明令禁止奢侈品之输入，但事实上，奢侈品之输入并未绝迹。其中单单汽车一项，最新式之汽车时有输入。上海报纸对于此事屡有记载。政府应彻查此种明令禁止之奢侈品究由何人在何种方式下输入，并追究其责任。

(3) 政府应即公布自胜利以来核准外汇之全部情形，其中包括：(一) 申请人全部名单，(二) 核准购买外汇者之全部名单，(三) 核准之数目（包括申请人原申请之数目），(四) 核准之理由。

(4) 政府应查究为伦道尔文中所举之豪门，有无（藉其与政府之关系”，获得“特权”，其所获得之“特权”，其内容与性质又如何？

(5) 政府应令伦道尔负责供给更多之材料与证据，以证实其所指摘之事实。并要求伦道尔文中所涉及的若干外商如西屋电气公司，威利斯汽车公司及安纳康达铜矿公司等，提出材料及证据，藉以决定伦道尔文中所述者是否为事实。

无论如何，对于伦道尔此文，即使为了政府自身的名誉，政府亦应采取步骤，表明态度。除非政府默认现政权的存在确是仅仅为了维护少数特权阶级的利益，政府对于伦道尔一文不宜默无一点表示。我们愿意借此向政府进告一言：八年以来，中国绝大多数的人民，牺牲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健康，以及他们应有的幸福，从事抗战，以争取国家的生存。但是我们争取国家的生存，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要替那些特权阶级保护并扩充他们的利益。现在中国的一般人民都在饥饿线上挣扎，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则被摒弃于购买圈外，沉沦

在生活的水平线以下。不仅民怨沸腾，到处是“反饥饿”的吼声，据我们所知，就是在国民党党团内部，最近也发生了“这个党到底是代表那几种人的利益”这样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现实环境，看来是越逼越紧了，事实上已不容许豪门逍遥自在。假如政府自身缺乏勇气，不能采取剧烈措置，其结果那就势必只有等待别人来采取措置。只是要铲除豪门，须知孔宋只是豪门的代表，豪门却不限于孔宋两家。一切既成的豪门及正在生长中的豪门，具应在铲除之列。同时铲除豪门只是一种消极的行为，单单消极的行为无补于今日国家的大局，豪门在性质上是一种特权阶级，我们必须同时在根本上消灭一切足以产生特权的制度。豪门的象征是少数人饱死，多数人饿死。我们一方面铲除豪门，一方面需要努力改善一般人民的生活。今日中国政治，如其不从解决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问题下手，则社会将永远不能得到安定，一切建国的工作亦即无从获得成功。

（原刊“观察”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九、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 的访华报告

美国前驻苏驻法大使蒲立特 (William C. Bullitt)，本年七月，衔“生活”“时代”发行人亨利鲁斯之命，来华考察，十月十日在“生活”杂志发表访华报告 (China-A Report to the American)，长达万言。中央通讯社不惜工本，全部用电报拍回，各报纷加披露；官方及官方的报纸一致颂扬。吾人披诵之余，谨述其意见如下：

第一、我们统观全文，蒲氏的中心思想是反苏防苏。蒲氏以这一个中心思想为出发，他认为目前最有“统治中国的威胁者”就是苏联；他认为中共是“苏维埃强权政治的工具”，他认为苏联意欲利用中共这一工具把中国沦为“苏联的附庸”；他痛责故罗斯福总统在雅尔达会议中的错误；他认为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杜鲁门总统演说以前的美国政府一直采取着“可笑的态度”；他叙述马歇尔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使中国政府与共党签订了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协定，但是“苏联的计划是利用马歇尔所斡旋的停战时间，尽量把共军自华北运往东北，而把接收自东北日军的大量武器，配备共军，利用停战时间，到中共军队装配齐全的时候，苏军再行撤退”；他又叙述马歇尔使华失败返美后，美国对华抱旁观政策，

停止在军火上及财政上支持国民政府，但“苏联在另一方面却装备了我们的敌人”——蒲氏此处所谓“我们的敌人”，显系指中共而言，这表示蒲氏业已认为中共同时亦为美国的敌人——，蒲氏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政策”；蒲氏认为假如史太林控制了东北，“对于中国将来的发展，关系异常重大”，最后对于美国本身也有严重的后果；因此，蒲氏认为美国必须对于国民政府作立刻的全盘的援助，“仅仅取消美国对华禁运军火的命令还嫌不足”，蒲氏认为杜鲁门总统应该像罗斯福总统在邓克尔克撤退后英法严重缺乏枪炮弹药时所做的一样，采取迅速的行动”：蒲氏述及现在美国有数十万吨积存的弹药，弃置在世界各地，任其霉烂生锈，他主张将这些物资宣布业已不适美军使用，作为废弃，然后以一元作价五分，售给中国。同时为避免中国的“通货膨胀瞬即会像脱缰之马”起见，美国政府应即在后此的三十天内贷给国民政府七千五百万美元。除上述立刻的援助外，更就经济财政军事方面作全盘的援助，以三年为单位，在三年以内，由美国贷给国民政府十三亿五千万美元，其中六亿元作为三年计划中的信用贷款，用以购买美国的物资，如美棉、烟草、小麦、石油、汽油、以及机车、铁轨、卡车等，另六亿元为三年计划中军事方面所需的费用，用以装配旧的军队、训练新的军队，再加一亿五千万美元作为外汇平衡基金。这是蒲氏援华方案的纲要，而所以要全力援华，其目的乃在“把每一个武装共产党徒驱除于中国领土”，“阻止史太林霸占中国”。

我们无意在此讨论蒲氏所攻击苏联的种种事实是否正确的以及蒲氏所建议的各项办法能否实现，我们在此所欲讨论者，乃是蒲氏的议论的动机和态度，是否健康，是否公道？其

间牵涉到许多问题：一、蒲氏不愿中国沦为苏联的附庸，然则蒲氏是否意欲把中国沦为美国的附庸？二、在过去几年中，到底是苏联控制中国的色彩浓厚，还是美国控制中国的色彩浓厚？三、今日美国，如蒲立特先生者，因为恐惧苏联，主张全盘的援助国民政府，反苏反共，但过去几年中，美国在中国势力的膨胀，以及这次像蒲立特先生这种建议，是否可以使苏联感觉愉快，感觉安全？凡上三题，蒲氏一字不着。蒲氏一开头就说：“防止任一国家统治中国而动员其四亿五千万人民来对抗我们，这是最关美国切身利益的事情”。蒲氏既然可以如此说，苏联又何尝不可说：“防止任一国家统治中国而动员其四亿五千万人民来对抗我们，这是最关苏联切身利益的事情”？蒲氏可以说：目前有统治中国之威胁者是“苏维埃帝国主义者”，苏联又何尝不可说：目前有统治中国之威胁者是美国帝国主义者？蒲氏可以说：“我们（美国）必须采取行动以防止苏俄统治中国而动员其人力来对抗我们”，苏联又何尝不可说：苏联必须采取行动以防止美国统治中国而动员其人力来对抗苏联？假定苏联亦发表与上列蒲立特所宣称的相同的议论，至少在我们看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间并无任何轩轻。然而假如每一个国家，都恐惧别的国家控制中间某一个国家，大家都要“采取行动”以防止对方国家统治这某一国家，则世界还有什么和平？实际上，在最近几年中，美国之在各方面牢牢的威胁着中国的独立与自主，业已成为一个世人共同感觉的事实。蒲氏在他的文章中，建议由美国贷款给中国，卖军火给中国，替中国训练军队，帮中国打垮共产党，监督贷款的用途，管理军队的给养，而且主张“派麦克阿瑟将军于现有职务及权力以外，加上大使衔

的总统私人代表的称号，飞往中国，和蒋主席拟订一个共同的计划，以防止苏联的征服中国”……蒲氏之企图由美国来控制中国，已极明显。蒲氏一方面不愿中国陷入史太林的“掌握”，一方面却企图使中国陷入自己的掌握；一方面在事实上美国业已独霸中国，一方面蒲氏还在大声疾呼，宣称苏联企图“独霸”中国，蒲氏这种议论，实在有欠公允。就我们中国人自身来说，我们久已苦痛于我们有一个落伍的腐败的政府，在二十年的统治中，把国家搞得越搞越穷，越搞越弱，越搞越乱，以致引起强邻的窥伺。我们自己心里明白，一个略有野心的国家，不论是过去的日本和英国，或者今日的美国和苏联，那一个不对中国转念头，打主意？不过彼此的方式不同，程度不同吧了。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权利指摘对我们有野心的国家。老实说，美国和苏联，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大家都想牺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国成为他们的卫星，成为他们的附庸。而在这种情形下，蒲立特先生有什么面皮猗猗然一面倒的抨击苏联？蒲立特先生为什么要援助中国，他有什么理由要独爱于中国？拆穿了说，他不过是要利用中国，正如他在他的文章里开头所说的，动员中国的人力来对抗苏联，以保障美国的利益吧了。美国有钱，美国企图用金钱来收买中国，要中国人替美国牺牲，为美国而死；除此以外，他还有什么理由要独厚于中国，要借钱给我们，援助我们？统观蒲氏全文，我们认为蒲立特先生的整个出发点是偏的，而他的动机是自私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第二、蒲立特先生主张援助中国，实际上，他要援助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的国民政府。理论上，政府本来是代表国家的；但在历史上，政府常常是不代表国家的；目前的中

国，就处于后一种情形。就对外关系上讲，今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愿意反美，也不愿意反苏，都主张同时与美苏友善，甚至希望中国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中国有无能力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这是另一问题，但至少表现于近两年来中国的言论者大多数人都不愿中国成为美苏双方任何一方的尾巴。但是中国的现存政府，因为要维护他们个人或集团的权势利益，他们坚决排斥共产党，因为排斥共产党，连带仇视苏联；因为仇视苏联，所以一味的投入美国怀抱，甚至一部分人幻想挑拨美苏之间的感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做法，并不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所附和。至于在内政上，中国现存政府之业已失去人心，其明显确切，一如在太阳底下的影子，无须我们再在此处浪费笔墨。魏德迈将军在致美国援华会柯立芝夫人的函件中声称：中国人民只求能供给粮食与居住之任何政府，对于倾向苏联一举所包含之种种复杂问题，不暇顾及。（美国新闻处华盛顿十月十六日电）魏德迈将军这种观察是正确的。对于中国一般穷苦的老百姓，国民政府也好，共产政府也好，或者其他什么政府也好，他们都“不暇顾及”，他们所急切关心的是能让他们活得下去，让他们有果腹之粮，御寒之衣，以及躲避风雨的房屋。这同时也就说明：这二十年来的中国执政的人物，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尽其应尽的职责，甚或根本对于这种基本问题，没有作任何有分量的努力。二十年来南京的官员所发生兴趣的，是政局的演变，权势的得失，而非一般社会经济生活的改革与改善。今日中国人民生活的艰苦与凄惨，业已到达为一个大文学家所无法描写的地步。在内地城乡以及偏僻的角落里，民生的艰苦，更不必说，就是在这个远东第一豪华的大都市里，

到晚上十一点以后，许多街道上，在那冷冰冰的容易招致疾病的水门汀走道上，躺着手脚蜷缩的无数贫民，就在这萧瑟的秋风之中，获取他们为维持他们像游丝一样的生命所必须的睡眠。这些人本身并无罪孽，然而他们却过着罪孽的生活；即使我在此叙述我每晚所目睹的这种凄凉景象，我亦仍然不禁热泪盈眶，悲从中来。然而一切对于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真正具有兴趣具有抱负的人物，他们无法获有机会为祖国服役，而掌握权力的人则仅知如何巩固并发展他们自身的权势与利益。在政治生活方面，他们依然不能获得我们应有的各种基本的公民自由，而且一般反对派人物经常生活在恐怖与不安之中，政府经常用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来限制反对派的活动和存在，而其方则花样百出，巧妙无穷。然而政府还要扯着许多冠冕堂皇的大旗，表示政府的倾向民主和决心实行宪政。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二十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本文作者认为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没有路轨，可以向外国买钢轨枕木，无法耕耘，

可以向外国买种子肥料，要发展工业，可以向外国买机器原料，要改革币制，可以向外国贷款，唯有道德的堕落，非一时所能回复，也非向外国借贷所能改善。因此我们很公平地说，这个政府确已与人民脱节！与人民的需要脱节，与人民的福利脱节，与人民的意愿脱节。在法律上，它迄今仍然是国内国外所公认政府，但在政治上，它已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不能满足中国人民。这个政府不仅已与人民脱节，而且照目前的情形来看，这种脱节的程度，也将愈来愈深。在它的统治下，人民将愈来愈没有希望，饿死的人必然愈来愈多，自杀的人也必然愈来愈多，而原有一块钱的，在它的统治下，亦将渐渐变成为五角，变成为二角五分，变成为一角二分五厘，以致终于变成赤贫。这个政府业已成为中国人民所不能忍受的政府，但这样一个政府，就是蒲立特先生主张美国支持援助的。蒲立特先生建议援助的，就是这一个“政府”，而并非中国这一个“国家”。蒲立特先生所以主张援助这个政府，就因这个政府是反苏联反共的，蒲立特要使这个政府成为美国的工具，代美国来驱使中国的人民为美国牺牲，为美国而死。

蒲立特先生的动机既然如此，既然企图利用国民政府为保护美国利益的工具，因之他便大捧其国民政府及其领袖人物，一面倒的敌视中共。蒲立特先生可没有想到：共产党究竟是在怎样一个情形之下才能膨胀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本文作者个人的看法，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今日这样膨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来政治清明，民生康泰，中国何致弄到今日这样民穷财尽的地步，替共产党造机会？假如二十年来政治开明，胸度开阔，何致要把许多人迫

到左派方面去，替共产党增加声势？假如二十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致使许多人觉得前途茫茫，心中徬徨，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我个人很率直的说，我认为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是“共产党之母”，它制造共产党，它培养共产党。制造共产党培养共产党的因素不先消灭，那里能消灭共产党？照现在的样子，消灭了一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十个共产党，消灭了十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一百个共产党。在蒲立特先生的建议里，他建议由美国来训练中国的军队，供应中国的军队，指挥中国的军队，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兴起与膨大，并非由于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脆弱，反过来说，并不因为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增强后，共产党就将消灭。今日中国的问题之不是军事所能解决者，已为识者所公认，而这个曾经两度做过一个大国的外交大使的人，仍然这样近视，这样糊想，我们真是替近代人类社会文化水准的低落伤心！蒲氏又建议大宗贷款中国，以解救中国的财政危机。他主张在三年内贷给中国信用借款六亿美元，用以购买美国的食物、原料与机器；他实在是间接替美国货做买卖。我们不相信在这种混乱的行将崩溃的局面下，单靠外国的贷款就可在根本上稳定中国的财政，改革中国的币制。在抗战中，政府曾经发行大批关金，企图稳定当时日益贬值的币制，但今日的关金价值如何？前车不远，昭昭可鉴。我们认为整个的局势不趋稳定，一切改革币制的努力都属白费。因之我们认为，在蒲立特先生的访华报告里，不尽他的动机是偏私的，就是他的看法也是不健康的。

总之，蒲立特这篇文章并无任何可取的建议。他是一个反苏人物，他之有他这一套，实极逻辑，而他之能洋洋洒洒

发表其意见，在美国的立国精神下，亦极自然。然而我们要注意的，是他这篇文章在政治上却是一种投机。照最近各种趋势观察，美国殆将改变自马歇尔返美以后以迄于今的那种袖手旁观的政策。美国政府之将积极援助国民政府，虽其方式、数目、条件如何，尚不可知，但援助之来殆无异疑。蒲氏在这个时候，发表这种建议，又于来华以前，先访东京，其间极微，至堪寻味。

(原刊“观察”第三卷第九期)

十、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不得准其入学之不妥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海新闻报载该报十一月二十日南京专电：“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开除后，必须呈报教部，并由教部通令全国各专科以上学校，对此项开除学生，不得准其入学。此项规定，因日久不免忽视，现教部已重申前令，飭令各专科以上学校今后应严格执行，绝不准通融，以整学风”。我们认为此事深有不妥，爰为文论述，并为青年学生呼吁。

一、学校开除学生，总不出下列两种原因：或者认为该生学业太坏，不堪造就；或者认为该生品行不端，不堪训诲。社会生活中不能没有惩戒，超过了某种限度，自然应该予以处罚。但是今日中国一般大学，关于课业及训育的标准，并不一致。先说课业。有的学校学术水准高，有的学校学术水准低；有的学校功课严，有的学校功课宽；有的学校以学生有无特殊心得、是否能融会贯通来衡量学生的造诣，有的学校只以机械的考试、学生是否能背熟笔记或教科书来决定学生的成绩……在这种差别里，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今日中国的一般大学之间，甲校与乙之间，乙校与丙校之间，丙校与丁校之间，甲校与丁校之间，在学术水准及学生程度上，是有距离的。因之，在甲校或许是一个“低材生”，但这个在甲

校不过是一个“低材生”的学生，可能转到了校之后，却变成了丁校的“高材生”；至少，这个学生在甲校是被认为成绩低劣者，他到了校后，不一定同样被认为不堪造就。这一点，我相信无论教育部当局或一般供职教育界的人士，不致认为我们这种说法为无据。因之，在甲校因学业太坏而被开除的学生，他的实际程度，不一定比丁校的在校学生来得坏。但程度远不及这个甲校开除学生的丁校学生既然仍可在大学读书，而程度比在丁校在校学生程度好的学生，反而因甲校之开除而不得转入其他学校，永远剥夺了就学的权利，我们认为这是不公道的。再说操行。今日中国一般大学，由于各校的历史、环境、以及主持的人物的不同，在训导方面，其标准和作风，也并不全国一致。有的学校采取严格管理制，有的学校采取自由发展制；有的学校所希望培植的学生就是上课下课、按部就班的学生，有的学校所希望培植的学生就是有创造力有新理想的学生；有的学校对那些对于国家大事关怀热心的活动学生，总是不甚放心，处处加以管束，有的学校则对于有领导力有活动力的学生，中心赞赏，处处予以鼓励和指导……因此，同样一个学生在甲校可能成为校方最顾忌的学生，但在乙校可能成为校方很赏识的学生；同时同样一个行为，在甲校校方可能认为这个行为超越了常轨，破坏了本校的秩序，但在乙校可能变成一个“人才”；在甲校，他的才智迤被埋没，在乙校，他竟然获有机会发挥他的才干。同时，一个学生，他的品行，（包括的他思想、胆识、组织能力、服务精神等等），在甲校可能被认为不堪训诲，而到了乙校可能被认为后生可畏、大有作为。因之无论从学业或操行的观点看，要使一个学生，被一个大学开除后，全国其他大学便

不再准其入学，这是不合理的。教育的目的在发挥理性，理性的目的则为求合理，求公道。因之我们认为教育部规定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的学生，全国其他专科以上学校不得准其入学，这一规定，与“教育”本身的意义，背道而驰。我们希望教育部对于这种规定，能重作考虑。

二、在从前君主时代，地方上出一件命案，就成为了一件“大事”，有时可以因此丢官甚或搬动脑袋。共和以后，民命反而越来越不值钱了，试看今日，民命与蚁命，究有何异！在学校里，情形亦正相仿。在我们做学生的时代，可能一年之中没有一个学生记大过，两年三年中没有一个学生被开除；开除了一个学生，那就全校骚动，极端严重。可是现在，学校开除学生已是家常便饭，不仅如此，而且现在又有了新名字，叫做“集体开除”，一开除就是十几个或几十个；学生成了韭菜根，一刀切下去就是几十根。我们不知道这还是教育的权威“涨价”了呢，还是学生的价格“贬值”了呢？从前开除一个学生那样郑重，现在开除一个学生甚至几十个学生这样轻易，难道现在的学生，无论就学业的原因或品行的原因，真的那样不堪造就吗？假如说真的学业不行，为什么不在录取的时候，将录取的标准尽量提高？假如说品行不端，然而各校训导，平时对于学生在做人做事方面，究竟有没有切实的指导。三四十年来中国的新教育，名为德智体三育并重，但体育不过做到开运动会，德育不过做到上纪念周。现在的学生，伙食这样坏，有的学样十几个人或几十个合住一间宿舍，基本的营养、空气、日光都不够，还讲得上什么体育。要学生帮政府忙的时候，如发动青年从军等类，于是把学生大大捧一阵，学生要是对于国事有所表示，而不利于政府时，便

把学生大大打一阵，这还讲得上什么德育。三四十年来中国的新教育，大体上说来，不过是一种“书本教育”而已。按时上课就不扣分数，考满六十分算及格，读完多少学分升级，读完四年拿到文凭。请问今日中国有几个大学能注意到做人做事的道理？有些大学，比较有一种优良的传统，学生沐浴在这种传统里，经过四年的薰陶？使他在做事做人上渐渐地得到一种正常的训练；或者一个学生幸运地亲近了一位优良的教师，受了他的影响，在性格上渐渐定型。但就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看，这种情形是占极少数的。（规定各大学设立导师，但是中国大学里的导师是“带兵式”的，或者保甲长式”的，凡是教师都是导师，每个导师带上几十个学生。不说在各种条件上根本无行“导师制”的可能，因之有导师而不知其所属的导生有多少者，导生经年犹不知其导师为何人者，就是中国导师制的真正目的，亦不过是要叫这个导师管管几个学生，不要他们乱惹是非，闯出乱子。所以结果中国大学里的导师制是有其名而无其实。）至于一般大学里，除了上课、考试、分数、文凭外，还有什么做人做事的训练？一年复一年，墨守陈规，一批一批的毕业，糟踏了青年的生命，糟踏了国家的光阴。现在许多学校，这样容易地开除学生，可是学样当局是否已经尽了“教”与“育”的责任？在目前这种教育制度之下，大学的主持人，纵然有这方面的理想，但事实上又是否能够有所作为，贯彻他们在这方面的理想？同时政府当局所行所为，又是否能够激发青年向上，能使青年身心安定？大环境恶劣如此，却希望学生乖乖如彼，其可得乎？青年容有错误，也当网开一面，让他有条路走。越是开除学生容易，越不能实行一校开除他校不收的办法。这种一

校开除他校不收的办法，是迫人堕落，迫人自杀，迫人走险，其结果与教育的本义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对于教育部这个规定，不能赞同。

三、但是教育部为什么要有这种规定，而且认为此项规定，日久不免忽视，又要重申前令，飭令各校严格执行，绝不通融，以肃学风？假如全国专科以上学校的学术水准和训导作风都是一致的，则施行这个统一的办法，犹有可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如此，此事教育部非不知之，但仍有此种规定，而且重申前令者，据我们的观察，其动机不是教育的，恐怕仍然是政治的。政府显然企图用这种严峻的措置，以压制对于现实日益不满的学生情绪，希望学生只管书本，不管国家。我们认为政府用这种严峻的手段来对付有热血而无凭藉的学生是不公道的。而且在原则上，我们反对政府用一切以政治控制为出发点的办法来控制教育。政府应当让大学学生在学术上自由发展，在思想上自由发展，在公共生活的训练上自由发展，只要这种发展是合理的，合法的。我们不能希望青年人像老年人那样保守消沉，我们也不能希望青年人像中年人那样稳定谨慎，青年人可贵的就是那一股活力，这种活力就是国家的活力。没有活力的国家是一个死的国家，没有活力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社会。政府应当自疚自省，尽量刷新政治，缔造一种光明而有朝气的社会风气，使一般纯洁而有理想的青年在这种有光明有朝气的的大环境下，潜移默化，培养成为建国的良才。我们对于年来各大学学生的活动，素极注意，对于各大学学生自治会竞选这一类事情，亦不惜篇幅详加报导，这就因为我们认为：今日这一批青年在这种校内活力中所受的民主的训练，与二十

年以后中国政治的趋向大大有关：历史家及政治家的任务就在要能看到每一个社会现象它在日后所可能发生的社会影响。我们衷心希望政府当局能创造一种新的风气，以这种新的风气来积极地激发青年的抱负，薰陶青年的操守，而不要单在消极方面以种种方法来限制青年的活动，削弱他们的活力。

(原刊“观察”第三卷第十六期)

十一、国大评论

(一)、训政问题

这次国大开会的情形很糟，糟到连国民党的党报都不得不出面指责。据我们所看到的京、沪、津各地报纸所载有关国大会场情形的记载，字里行间，大都含讽带讥，印象不好。有人认为国大有二千多人在一起开会，会场秩序不易控制，一切情形难望理想，这是第一次的民主学习，大家应将期望的尺度放宽一点。不过我们应当指出，天下的事情，不象样也有一个不像的限度，在限度以内，大家可以原谅，超过了某种限度，便使人难于默缄。像这样一个二千多人的会议，要希望每一议事，每一发言，都按规就矩，有条有理，自然未免求之过高。但是动辄起嘘，随便喊打，亦未免失之过份。国大代表来自各地，所受教育，程度不一，我们亦不能希望每个代表的发言礼貌，都能符合水准，但报载居然有人高喊“他妈的民主”，则未免相去更远。本人目睹会场情形，一言不合，四座喊打，意气之徒，直奔讲坛，若无职员劝解，定必扭成一团。偌大一个会场，东一簇，西一簇，乱哄哄，气

冲冲，尽管主席嘶哑喉咙，要求维持秩序，可是无人理会，一片喧嚣，一团乱糟，使我们这些旁听之士，除了微微一笑之外，简直无感可想。我们细加分析，造成这种不体面的情形，一部分是知识问题，一部分是修养问题；而两者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教育问题。就知识言，本人亲耳听到一个代表发言，谓“国大有修改宪法之权，如其我们这次不修改宪法，就是我们没有尽我们的责任”。此种逻辑，不知何来。修宪之案，均须三读通过，举行二读会时，有一代表大嚷，说上次业已通过，（所谓“上次”，实际上是一读会。）为什么还要讨论？有人告诉他议案须经三读，始能过，这位代表还是不服。国大代表，不远千里，进京开会，而不肯在事前稍为补充补充自己的知识，严格言之，可谓有亏职守。就修养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讲理，喜欢打的朋友何必竞选国大代表？要讲理就得听反对的意见，不愿意听反对的意见的人何必竞选国大代表？民主国家的会议代表，都应具有某种水准以上的教育素质。我们应维持这种水准，我们应提高代表的素质以符合这种水准，我们不应降低这种水准来迁就代表的素质！

这次国大开会之糟，业已众口一辞。但是大家都在议论国大代表的品质，而很少有人追究一个失败的国大的责任应由谁负。本人认为这次国大开会情形如此之糟，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国大代表所负的责任小，二十年实行训政的国民党应负的责任大。议会的成就如何，就得看议员的素质如何；议员的素质如何又得看选民的素质如何以及国家政治上的风气如何。选民的素质高，产生出来的代表的素质自然也跟着高；国家在政治上的风气好，选举的成绩自然也跟着好。国民党训政前后二十年。经过这二十年，本来是三十岁的人，现在

已经五十岁了；本来二十岁的人，现在四十岁了；本来是十岁的孩子，现在也变成为三十岁的人了；至于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差不多完全是在国民党的训政阶段中长大的。在这次的大选活动中，无论选民或竞选人，大多数都是在二十岁至五十岁之间的公民，这些选民与竞选人的素质的高下，不能不说与二十年来国民党训政的成绩无关。当初中山先生遗教，认为“由国民革命所产生之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生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所以训政的目的，即在训练人民如何行使选举、罢免、创制、表决四种政权。然而我们现在从国大的选举以及这次国大开会的情形来看，国民党训政二十年的成绩究竟在什么地方？众所周知，这次国代和立委的选举，弊端百出，弄到发生命案、选官被控、绝食抬棺，笑话之多，开中外古今纪录。选举的成绩如此，国民党对于这二十年来“训政”的这段历史，何以交代？再说代表素质，今日国大代表的素质，难道都是理想的吗？难道都够得上国家的水准吗？假如国内还有素质更好的公民，何以那些素质更好的公民无法产生，因之使国家的政治水准得以随之提高？国民党对于此点，有何自解？我们很坦白的说，从这次国大选举和国大开会情形来论，国民党二十年的训政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了？国民党要是有勇气，对于这点应当坦白承认。也许他们看到这二十几天来国大的情形，内心里也在惭愧。但惭愧是消极的。过去的虽然过去了，假如国民党能够从过去的失败中得到一种教训，则过去的失败犹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失败。行宪以后，实际上掌握权力的党还是国民党，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拿出良心来，拿出勇气

来；全盘改变作风，真正替国家做点事情。只有以国家为第一，才能大公无私；只有大公无私，才能在政治上有所成就；只有有成就的人、团体、党派，才能在这时代的洪流中立脚！

(二)、总统问题

关于总统问题，我们要分几点来议论。

一、在现实政治里，第一任总统是蒋主席，几乎成为一个不移之局。四月四日蒋主席正式表示不愿出任总统，一笔惊人，于是各方揣测丛生，有的认为这是一种“姿态”，这也不但不是一种消极的表示。据我们所知，蒋主席这一着绝对不是一种“姿态”，这也不但不是一种消极的表示，而且相反，正是一种最最积极的做法。这是一着棋，一种政策，绝不是“姿态”，而是一种“决定”。何以言之？原来在政协时代，大家制宪，都以蒋主席为对象，想用各种方法来限制他的权力，因为当初大家假定，将来的总统一定是蒋主席。蒋主席宣布不出任总统，这是一种战略，企图使围扑他的人扑了一个空。据说这是蒋主席在牯岭静思以后的决定。蒋主席是喜欢负责任的人，宪法给总统的权力加上种种限制，这一点，就蒋主席的性格来说，是他受不了的。同时，至少在蒋主席看来，在目前的政治局面下，仍须由他来主持，总统既无权，他只好改任有权的职位，这就是早在一个月以前，本刊四卷四期所载蒋主席可能不做总统，改长行政院这一报告的根据。所以，不做总统做行政院长，绝不是消极的表示，而是十分积极的决定。无奈国民党的党人不了解他这一政策，这一谋略，还

是哭哭啼啼的认为要是他们的蒋总裁不出任总统，他们的党就完了。听说蒋主席这次非常生气，认为他的党人不仅不能帮他的忙，甚至还不能了解他。但是结果呢，各种实际形势，仍然要求非由蒋主席出任总统不可，而其救济的办法是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总统以非常的大权。蒋主席不愿出任总统，本来是为了总统的权力太小，现在“权力”的问题既然有了补救办法，蒋主席自然可以“俯顺与情”，出任总统了。这就是这次总统之选所生的曲折的一个最客观最正确的分析。而在这个分析之中，我们应可得到一个结论：蒋主席不拟出任总统，必长行政院，这多少还近于“人迁就制度”的精神；现在，为了要蒋主席出任总统，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以大权，则就又走着“制度迁就人”的老路了。

第二、大家都说，现在中国，除了蒋主席，还有什么人可以出任总统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着两个问题：一、在现实的国民政府政局里，还有那一个人能有像蒋主席所有的那种通筹全局的权力呢？二、竞选就是一种比赛，也可以说是一种挑战（Challenge）。现在有那一个人敢起而与蒋主席挑战（竞选）呢？（陪选另作别论）由这两个问题，引起了一个更重要更基本的问题，这一个更重要更基本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进而研究的，即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除了蒋主席之外，竟然没有一个人，在声望和权力方面，可以勉强和蒋主席侔与并列的地位呢？十几年来，社会上对于中国的政局有一种笼统的印象，认为当局御人，常采“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办法。我们看，在党务和教育方面，这一面有一个陈立夫，那一面就有一个

朱家骅；财政经济方面，这一面有一个孔祥熙，那一面就有一个宋子文；军事方面，这一面有一个何应钦，那一面就有一个陈诚；派系方面，这面有一个CC，那一面就有一个政学系。使各方面都造成一种均势的局面，大家都环绕着一个人，任何方面都再也跳不出第二个全国性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形，据我们所能了解的，对于要真正实行民主政治，实在是一种基本的、十分严重的缺陷。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全国性的领袖必不能仅限于一人。所以我们看，在英国，保守党有保守党的党魁，工党有工党的党魁，两个党魁在个人的才能上容有高下之分，而在国家的活动中，都能保持独立的地位，所以一旦邱吉尔内阁垮台，艾德礼也一样能起而组阁，掌握国家的大舵。在美国，现在正忙大选，我们看，共和党、民主党、第三党，都各拥有全国性的领袖，一旦事势需要，均可起而执政。假如一个国家，只有一个领袖，或者只容许产生一个领袖，这种国家绝对不够条件推行真正的民主政治。现在蒋主席业已当选为总统，我们希望以后政府当局，能多替国家培养几个政治领袖，特别是反对派的领袖。

第三、纯粹从政治制度着眼，这次我们选举总统，是很滑稽的。我用“滑稽”两字是因为我想不出其他任何更适当的字眼。总统选举法里虽然规定可以自由签署提名，实际上那是给无党派的独立人士一种机会，以便没有党藉的独立人士亦可竞选总统，至于政党方面，按照各国通例，其候选人仍应由政党提出。这次国民党没有提总统候选人，由签署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也没有发表竞选演说，这些已是出乎常例，而最妙的，国民党里竟然有两个人出来竞选总统。这算什么一回事呢？我们学政治学的人简直没有法子解释。而尤其妙的，

居正最初表示竞选总统，其后又说不能竞选了。不竞选，且罢了，还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余不揣庸朽，偶听朋友劝告，出面竞选总统。嗣经记者围绕，率作片面谈话，虽曰吹笙引凤，识者已窃笑矣。兹幸经本党全会深切研究，郑重决议，一致恳请总裁出面应选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舆论既有所归，讨论衷于一是，余身为党员，应即服从党议，再不作竞选言说，以淆视听。”读了这个声明，简直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居氏身为司法院院长多年，总统之选，何等郑重，而忽竞忽不竞，真是使人迷惑；而结果呢，读者也许不免要捧腹大笑，因为居氏仍旧是竞选了！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说一句话：即今日政治上的人物，是如何的随便！政治如此，安得不使今日一般青年对于政府失望！

第四、这次参加国大的政党，除国民党以外，还有青年党和民社党。这两个党这次都没有人参加竞选总统，这也是奇怪的事情。组织政党的目的何在？曰，希望掌握政权便可实现本党的政策耳。竞选总统，本党不提候选人，而去支持他党的领袖，政党史上，事不多见。去年四月，国、民、青三党共同执政，共同拥戴蒋主席，是犹可说，现在行宪，三党各自独立，法理上的立场已变，那还能承袭三党共同执政时代的作风？曾琦还要发表声明，说什么总统要具五个基本标准，五个附带条件，真可谓“其臭不可闻也”。假如这批臭虫都赶不出中国的政治舞台，请问中国的政治那有清明进步的一天？

(三)、副总统问题

第一、关于副总统，国民党一党有四位候选人，其不合理，正如国民党一党有二人竞选总统一样，已详前论，此处不赘。严格言之，国民党应当只提一个人出来竞选副总统，现在搁起不管，听他们去自由竞争，无非顾全事实。由此可见，今日中国的政治，一切还是以顾全事实为主，以顾全制度为次。在这种政治作风之下，还谈得上什么实行“宪政”！

第二、关于选举副总统，在国大代表之间，我们最容易听到的一种论调是：“糟糕，这几位候选人都是朋友，叫我倒底选了那一个好呢？”我们愿意告诉代表诸君：“你们错了！人民选举你们，是委托你们，要你们替他们挑选一个最好的副总统，你们不应当从“朋友交情”的观点来作投标取舍的标准。你们这种话，初听好像没有什么，细加研究，就十分严重，因为这牵涉到你们对于“代表”职责有无基本的认识了。”

(四)、宪法问题

第一、国大一开，就有许多代表要求修改宪法。宪法不应修改，此处不谈，而会场上所以闹得如此一团糟，归根结底，还是吃了宪法一百七十四条的漏洞的亏，宪法一百七十四条文云：

宪法之修改，应依下列程序之一为之：

一、由国民大会代表总额五分之一之提议，三分之二之

出席，及出席四分之三之决议，得修改之。

二、由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之决议，得拟定宪法修正案，提请国民大会复决。此项宪法修正案，应于国民大会开会前半年公告之。

上文第二款，立法院依法议决之修宪案，应于国民大会召开之前半年公告之，这是十分合理的，其目的在使国人注意，有充分讨论之时间，并使国大代表及政府当局都能明白一般舆论的背向。但是同条第一款为什么不作同样的规定呢？政府当局都能明白一般舆论的背向。但是同条第一款为什么不作同样的规定呢？这是一个漏洞。宪法是国家大法，绝大多数的公民没有机会表示意见，由二三千个代表一下子便可随便修宪，这是很危险的。假如一百七十四条第一款，也规定由国民大会代表总额五分之一所提议的修宪案，应于国大召开前半年公布，至少这次国大召开后，便不致因修宪问题弄得“满屋皆嘘”了！

第二、政协时代，按照张君勱的主张，将四权散布于人民，人民直接行使四权，是谓国民大会，即所谓化有形之国大为无形之国大。其后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坚决反对，国民党与非国民党终于妥协，保持国民大会之形式，而减削其权力，使其职权仅限于（一）选举总统副总统，（二）罢免总统副总统，（三）修改宪法，（四）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这次国大召开，总统副总统尚未选出，第二款“罢免”一项自然谈不到；新的立法院尚未成立，第四款复决立法院的修宪案也谈不到；宪法尚未实行，利弊得失尚不可知，一般意见都不主修改，所以真正的任务，乃在选举总统副总统

统；除了选举总统副总统外，并无其他权力。但国大代表，不甘寂寞，一开会就要求讨论国事，听取施政报告。从法理的立场言之，凡此皆与宪法规定不合；在宪法的条文中，国大代表并无此种权力。政府当局宣称，此次召开国大，即为行宪之始，而不料国大一开，国大代表本身即做了破坏宪法的行为，同时政府居然接受国大代表的要求，各部会首长一一到会报告施政，亦即不啻政府也跟在国大代表的后面，从事破坏宪法。所以这次的国民大会，在政府的原意，也许视之为行宪之始，而事实上，这次的国民大会，却变成为毁宪之始，国大代表和政府步伐一致，领导毁宪，这一点是使一切爱护宪法的公民，都引为遗憾的。

第三、国大代表要求修改宪法，主要的动机是认为国大的职权太小，要设法增加国大的权力。就人情言，他们这种心理我们是极能了解的。可惜国大代表忘了一件事，即他们只站在“国大代表”的角度上看国大，而没有从整个国家制度的角度上看国大。为欧美民主国家上下议院所有的种种职务和权力，在现行宪法上，已分由监察立法两院行使，无需再半空中杀出一个国民大会来分权。这个国民大会在现行宪法中，本来是一个很特殊的组织。为什么有这个组织呢？最初因为中山先生的遗教中，有“国民大会”这一名目。张君勱主张人民直接行使四权，即称之为“国民大会”，其实，人民行使四权，就是人民行使四权，直截了当，还叫什么国民大会不国民大会呢？这无非是为了顾到国民党的面子，保存了中山先生“国民大会”这一个名称。后来因为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反对，故仍使国民大会变为有形，而改变了它的职权。这就是现在“国民大会”的来历。现在许多人，包括国

民党和政府里的开明分子，想来想去，这次国大代表的选举，已在宪法颁布之后，即然竞选国大代表，理应当对于国大代表的权力，有一了解。假如认为国大代表的权力太小，太空，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则当初为什么不去竞选立委，而却竞选国大代表？在国家的整个制度中，国民大会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不站在国家整个制度的角度来看，却仅仅站在自身权力的角度来看，闹着要增加国大职权，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不合理的。

第四、国大通过了一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理由是现在是一个“戡乱”时期，应当给予总统以非常的权力。我们对于这种理论，不敢苟同，理由如下：（一）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算不算是宪法的一部分呢？假如认为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是宪法的一部分（四月十九日王世杰在国民大会上解释，谓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是一种宪法的补充条文，既称为宪法的补充条文，当然也就构成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则我们认为：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这个根本大法理应笼罩到一个国家无论在战时、或在平时的一切统治的原则，决不能说，这部宪法，平时可行，战时不可行。美国在最近三十年中，两次参加世界大战，我们也没有看到一到战时，美国宪法便要增加补充条文，授总统以特殊的权力。假如认为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不是宪法的一部分，则为什么要由国民大会来通过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欧美各国在非常时期，虽亦有授权行政首领以若干特权，但此种权力，均由立法机关所赋予，国民大会非立法机关，由国民大会来授权行政首领，于制不合。（二）目前政府已把共产党称为“共匪”，动员戡乱。我们现

在即从政府的立场来说，则我们认为，政府出兵清剿“共匪”，和政府派一团兵到太湖去剿匪，在性质（nature）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匪”的数目的多或少，“匪”的组织松或严，至于政府出兵剿“匪”这一行为，其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假如今日政府打“共匪”，要增加什么“临时条款”，授总统以非常之权，则岂不是将来政府要派兵到太湖、洞庭湖、鄱阳湖去围剿湖匪时，也须增加什么“临时条款”，授总统以大权吗？要是这样，则我们的国家也就永远没有回复到平时的可能，我们的宪政也永远不能走上正轨了。所以就纯粹的法理立场，增加“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其理不通。（三）中国今日需要努力者，即是要大家来推动，使这个国家进入于法治境界。要讲法治，即须尽量使制度法律化，人造就制度，不要制度造就人，不要因人立制，不要因人授权。假如我们随随便便，今天一个特殊条款，明天一个特种法律，这样下去，我们永远不能达到法治的境界。所以在任何理由之下，我们认为国民大会通过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都和宪政的精神不符。

（原刊“观察”第四卷第九期）

十二、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

北大、清华、师院、燕京四大学教授九十人的来函，已刊本期投书栏。编者另接北大一个学生来函，内云：“目前的情势愈来愈严重，陈雪屏吴铸人一再扬言学运由共党操纵，并竭力分散师生之间的团结，煽动学生与难民之间的仇恨。吴铸人并公开警告出席学生集会的三教授（指许德珩、樊弘、袁翰青三先生）。这虽是恫吓性质，亦未始不可能造成闻一多事件的重演。”这个学生又说：“各种事实的教训，已充分证明：要在现政府下求改革，只是一个幻想”。

这一年来国内的情形变化相当大。军事上的变化和经济上的变化是大家看得到觉得出的，大家看不到觉不出的是一般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情绪上的变化。去年五月六月，南北各地都沉沦在排山倒海的学潮之中，那时参政会正在南京开会，一部分参政员作最后的一次努力，希望促成国共之间的和谈。一般社会，包括学生在内，亦都衷心希望和谈恢复。希望和平不仅仅是为了任何个人的利害。大家都是为国家着想。其后参政会开会的情形一天比一天使人悲观，极端分子在会场中占着压倒的优势。那时我们就接到北平方面的来信，说这是大家（包括教授和学生）对和平最后一次的呼吁，这

个阶段一过，学生的情绪可能要转入另外一个更积极的阶段了。去年七月作者在北平耽了三个多星期，听说许多学生都“走”了！其中甚至有快要在大学毕业的学生，也丢开一切，头也不回一回地走了！他们觉得在“这一个”区域里耽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他们已不愿再将精力和时间浪费在那种毫无实际效果的呼喊上，他们决定去做一点更实际的工作，做一点更有效的工作。当一些朋友谈到这些情形时，一方面在心底里佩服这些青年有勇气，有决心，一方面都叹息当前的环境竟把青年逼成这个样子。有一位先生忿忿地说：“走的都是最优秀的！走的都是最优秀的！”。

这一年来，就学生一部分说，最触目的现象，是学生与政府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敌视的程度越来越深。在政府一方面，只要学生一有什么活动，就恶意相视，咬定他们受了共产党的利用；在学生一方面呢，则对于政府，已老老实实，直截了当，指这个政府是一个反动的政府。政府和学生，实际上已俨然成为敌人。为什么会弄到这个样子呢？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政府实在使人太失望了。作者对于国民党二十年来的执政有一个一贯的看法，用一句话来点穿：即政府什么都不管，只管他自己。一切措施都是以他自己的利害为出发点的。假如政府要修一条铁路或筑一条公路，那就因为这条铁路公路可以给他运兵；假如政府要兴建一个广泛的电话网，那就因为这个电话网可以加强他的政治控制；假如政府在财政制度上有什么更张，那就因为这样一来政府可以多征一点税，多弄一点钱；假如政府颁布一个新的法律，那就因为这个法律可以防止人民若干活动，或作为政府某种行动的一种法律根据。总之，一切都为政府自身设想；凡是和

这个政权没有直接利益的事，它都没有兴趣，或者装聋作哑，或者敷衍了事，或者乾脆不管。人民没有饭吃，他管吗？他不管。人民没有衣穿，他管吗？他不管。人民没有房子住，他管吗？他不管。政府只保护富人，不保护穷人；政府只管束穷人，不管束富人。在重庆时代，威而基、华莱士要来了，就实行清街，一切没有饭吃的穷人都在被清之列，以免有碍观瞻；国大开幕了，下关和浦口的难民都被驱逐出去，以致发生蚌埠的抢案。大家恨豪门，要求动用他们在国外的财产，可是政府不敢碰一碰既得利益阶级的利益；大家要求实行民生主义，使耕者能有其田，可是政府没有决心，不敢有损地主阶级的利益。这样的统治怎能叫人拥戴！一天一天的过去，一年一年的过去，没有一件事使人看了顺眼，没有一件事使人听了高兴。一切公共的舆论都不以改变政府的作为，官做他的官，党办他的党，脸皮老老，肚皮饱饱，这叫人怎能服气！不仅一般青年学生越来越趋极端，就是一般中年人，据我们所了解的，心情和思想也都一天一天的在转向变化：本来对于政府感觉失望的，慢慢儿的对政府感觉绝望了；本来对于政府感觉绝望的，终于对于政府“不望”（不再存什么希望）了；本来无所谓的人，现在也一点儿一点儿的左倾了；本来稍稍左倾的人，现在也一点儿一点儿左得利害了；本来绝对仇视共产党的，现在也在努力了解共产党了；本来不大喜欢共产党的，现在也渐渐对共产党表示同情了。这一种变化是一种没有声音的变化，然而却是一种重大的变化。这一种变化，决不是基于任何人的利害而发生的，这是一种客观的环境所促成的。而且，我们还应该说，这种变化正在“时间”的推进中加速其程度。本刊四卷七期刊有一篇读者投书，说：

“北方情形已成等待局面，倒过来了！一般空气很紧张，但在表面上却很平静。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似的。”这最后的一句，极堪玩味。据我们所能感觉到的，现在北方一般青年的心情，都在期待着一个“新的社会”的来临。为什么大家期待着一个“新的社会”的来临？就因为今天我们所见所闻，不满意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社会上各种恶势力、恶习惯的根基实在太深了，这使我们简直不敢希望在这种现状下可以把一切不合理的事情改革过来。最近国内一般言论界，大都非常消沉，这消沉是一种可怕的消沉，这转向也是一种严重的转向，可惜政府不努力去了解这种消沉，不在根本上设法挽救人心的转向，而仍然走着老路，一味的想以强力去压伏人心！

在这一个无声的变化中，惟一可以觉察到的，就是学生的态度。在这一年中，学生运动有几个引人注意的特征：第一、学生已经成为了人民利益的发言人。综观年来学生运动所争取的，归纳之不外两点，一是人人要有饭吃，能够活下去，这就是他们所喊的“反迫害”。他们所争取的内容，已不仅仅限于他们自身的权利，他们的呼喊业已成为一种“时代的声言”。第二，在学生运动的技术上，他们业已到达为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就是他们所常常歌唱的“团结就是力量”。他们的团结程度，确为前所未见。政治是有物理性的，压迫愈大，反抗亦愈大，他们的如此团结亦可反证当局压迫的利害。不仅是一校一地团结，他们业已做到了全国团结的程度——至少在精神上，他们的团结是全国性的。所以一校出了事，他校立刻响应，几个学校宣布“联防”；一地出了事，别地方的学生立刻响应，呼吁、控诉、捐款、全力支持。第三、勇敢，坚定，他们完全成熟。他们在现实的分析，理想的追

求，办事的能力，奋斗的精神上，均已表现出惊人的成就；他们已隐然成为一个推动时代的巨轮。

这样一个情形下，政府如何对付学生呢？据我们的观察，政府对于学生已怀有一种超出常态的恐惧心理，因之政府对于学生的态度，完全陷入一种变态的状态之中。政府业已有一种牢不可拔的成见，认为学生的一切具有政治性的行动，都是受共产党利用的。在这一个大前提下，于是政府对于一切“闹事”的学生，完全不把他们当作“学生”看待。我们看，这一年来，只要学生有什么公共集会，政府便是出动大批军警，架起机枪，如临大敌。上海（同济）的案子，成都的案子，北平的案子，政府用刺刀，枪柄，麻绳，木棍，石子，机枪，马队，飞行堡垒来对付学生，造成极度紧张的空气，引起社会极度的不安，发生令人难以相信的残暴行为。学生无论闹得如何凶，讲到后来，学生总还是徒手的，以有武器的军警来对付没有武器的学生，无论如何总是残忍的。成都的警察甚至用刺刀在女学生的阴户里拌搅一下（见本刊上期成都通信），实在惨绝人寰。只要一个政府稍为有一点人道的精神，我们相信绝不致用这样残忍的手段去对付学生。

我们认为政府遇到学生有所抗议时，应当很冷静地考虑学生的抗议有无理由。我们并不偏袒学生，认为学生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或者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学生年轻，富于理想，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有时不免失之过高，而且在大众的情绪下，感情亦不免容易冲动。但是从大体上说，学生常常是站在正义一方面的。他们希望人人能活得下去，难道我们可以说他们错吗？他们维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难道我们能够说他们做得过分吗？他们不满意这个政府，难道这个政府是能使人

满意的吗？今日政府所要做的，所应当做的，不是防范学生，不是压迫学生，不是打击学生，而是自己反省，自己改革。政府应当自问，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是否可以使人民满意，如其不能，人民当然有权利表示反对。这是现代政治潮流中的不移之论，没有什么稀奇。假如政府希望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应当多听一些人民的意见，多做一些使人民满意的事情，尽量减少人民的苦痛，增加人民的福利。政府果能如此，还有什么人要反对政府？就是有少数被野心家利用的学生，要闹也是闹不起来的。

这次第二个“闻一多事件”正在制造之中。我们认为这种事件，即使替政府着想，也是万万发生不得的。政府希望安定，但是政府难道觉得今天的局面还不够动荡吗？政府今日的处境还不够危急吗？政府已经做了许多错事，远者不论，即以近事而论，国代和立委的选举，都增加了政府及国民党自身的离心力量，这次副总统选举，又发生了这样大的风波，这事的后果目前还没有露骨表现出来。假如什么地方还要再发生类似闻一多的事件，我们敢说立刻要闹出大乱子来。我们希望政府及各地地方当局，能够慎重处置，不要操切用事。闯祸容易，收拾乱子就难了。

（原刊“观察”第四卷第十期）

十三、评翁文灏内阁

从五月二十日总统就职的一天算起，经过十天以上的时
间，到五月三十一日，所谓“行宪首届行政院”的组织工作，
才告完成。我们谨就此事发表评论如下：

一、在这次行政院的组织过程中，这个过程本身，饶有
政治教育作用。如众所知，这次行政院院长一席，总统本来
属意张群，其次则属意何应钦。张何都谦辞不就，才邀翁文
灏出长政院。在过去，我们看到外国一些国家（最好的例子
是法国），总统邀张三组阁，张三辞谢，邀李四组阁，李四辞
谢，或者一个奉命组阁的大臣，邀此人入阁，此人辞谢，邀
那人入阁，那人辞谢，心中十分罕纳。因为在中国，照过去
大家所看到的，只见你抢我夺，唯恐做不到大官，那有请他
做大官而居然不做的道理？这次请张群做，张群不做，请何
应钦做，何应钦辞谢不就；这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可说是
新鲜的事情。张群何应钦为什么坚辞不就，原因很多，此处
不暇详论；我们在此处至少有一点可以说的，即张何两人，都
觉得这个行政院院长，不容易做，没有把握。没有把握就不
敢随便受命，这点极为重要。所以这次张何的坚辞不出，至
少使一切热中仕途的人物，或者我们应当更广泛一点说，使

一切人民，认识一点，即做官要负责任。调子高一点说，做官要对国家负责任；调子低一点，做官也得至少对自己的声名前途负点责任。没有把握做好，干脆还是不做。对于国家政治言，这是一种新风气，这是一种新教育。同时，十余年来，中国政治上最有权力的人当然是蒋先生。想做大官的人，最后一关都得要获得蒋先生的同意；蒋先生要派什么人担任什么职务，在通常情形之下，也很少有人辞职不就的。但是这次希望张群蝉联，张群却坚辞不就，请何应钦出长，何应钦也表示万难胜任，弄得这个行政院院长，一天两天三天的过去，始终提不出人来。对蒋先生言，这也不失为一种新的经验。

二、我们在这次行政院的组织过程中，看到中国的政治，毕竟还落后得很多。总统虽然是五月二十日就职的，但是总统的选出却为四月二十日之事。新总统产生后，旧的行政院即提出总辞。按照欧洲各国常情，新阁应在一两天之内组织完成。假如在时局特别动荡的时候，新阁甚至希望能在数小时之内组成，使国家的神经中枢不致因政潮的波动而中断太久，便可应付瞬息万变的局面。我们的新总统和过去的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是一个人，按照正常情形，新的行政院院长人选应于总统就职的当天或第二天，由总统咨文立法院，请求同意。这次新的行政院院长人选，直到总统就职后的第五天（五月二十四日）才提出来，这种情形假如发生在外国，早已成为极度严重的政治危机了。不仅如此，院长人选的提出既已如此迟慢，而翁文灏院长的组阁工作，竟达一周之久，亦属少见。而且这次翁氏的组阁情形，与欧洲一般内阁制国家的组阁情形，很不相同。在外国，我们以法国为例，总统受

命某人组阁，此一任命组阁之大员，必须在数小时或十数小时内决定他的“内阁”组得成或组不成，便向总统覆命。假如组得成，他当然是首相，假如组不成，他便必须辞谢，由总统另邀他人组阁。所以此人是不是首相，还要看他的组阁工作顺利不顺利而定。这次翁氏出长行政院，是先做“定”了行政院院长，然后再进行组阁的工作；这是和外国一般情形不同的。

三、因为张何不干，结果跳出了一个翁文灏，这在一般人说来，是出了冷门。就一般观感而言，翁氏出长政院，要比张何出长政院，情形好些。现在一般人最讨厌的就是八面玲珑、遇事敷衍的官僚。官僚最不愿意得罪人，但是怕得罪人就干不出什么事情来，大家总觉得张群圆到有余，劲道不足，所以不一定希望他再做下去，希望愿意做一点事情的人上台做一下。何应钦本人的性情，尚称平和，但他是一个军人，中国人现在都不愿意军人过问行政，所以何应钦出长行政院，一般人也不欢迎。翁文灏的廉洁，是没有问题的，他过去的作风，亦比较朴实。由这样一个人来试试，就事论事，在现局面下，还不失为一个比较合式的人选。不过这次翁氏组阁，不仅没有引用新人，而且完全是旧瓶旧酒；除了副院长顾孟余和秘书长李惟果两位有重量的新人外，其余几乎全是原班人马，这点实在使大家失望。我们并不是说，在翁氏所发表的这一个名单之中，完全没有清廉自守、饱学有识之士，但是这里面也不见得个个都有良好的政绩，能孚国人之望。不管人民对于政府的观感如何，至少政府自己总应当利用这一个时机，调整人事，使人耳目一新。大家都希望有新人出现，并希望新人越多越好，因为大家对于当前这个局面

实在厌倦灰心，总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花样。可是搞了十天，结果还是这样一个名单。是不是没有新人可用呢，还是现在这一付班底就是最好的班底了呢？我们对于这事，简直弄不明白？我们甚至不能了解翁氏这次出长行政院的目的究竟何在！我们看这个名单，那儿有一点“翁文灏内阁”的味道？不仅人是旧人，最妙的是大都蝉联原有的部会。这样一种组阁，可说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没有个性(character)的组阁，或者我们也可说，这个内阁，就是一个没有张群的张群内阁。为什么翁文灏上台，而带领的仍然是一个张群内阁呢？一个新的内阁总理上台，带领的竟是一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旧内阁，我们很少听说过。组了一个星期的阁，倒头还是这样一个名单，真是怪事。

四、关于行政院院长的成败问题，我们一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局面下，任何人来做行政院院长也都是没有办法的；谁上台就谁倒霉，谁来做就谁牺牲。现在分两层来说。第一、我们认为，除非行政院院长有左右大局的权力，否则他就没有办法来打开当前的局面。在理论上，行政院院长在国家的制度里，是一个负有极大责任的人，也就是说，握有极大权力的人，但是实际上，他到底有多少权力呢？现在政府要打共产党，要打共产党，自然就得用军事，在外国，首相对于军事的得失是负全部责任的。而在中国，我们的行政院院长对于军事方面有权力过问吗？没有。假如在军事上没有办法打垮共产党，为了爱惜国家的元气，解除人民的痛苦，就应当和共产党和谈，化干戈为玉帛，可是今天做行政院院长的，有这个魄力使这个战的局面变成为和的局面吗？不像。假如真正要实行宪政，最起码的条件就得使宪

法上面所规定的各种基本民权，获得有效的保障，但事实上，人民究竟有无真正的人身、居住、言论、信仰、集会、结社的自由，其权操于党部及特务之手，行政院院长有办法把这种权力从党部和特务的手里转移过来吗？没有办法。行政院院长是一个政务官，而且是政务官的头儿，然而事实上，中国的行政院院长常常只是一个事务官。他所能有的权力，远比他所应有的权力为小，他所能做的事情，远比他所应做的事情为少。假如一个行政院院长，他没有权力来决定整个的局面，他怎能有力量来维持这一个局面，或者打开这个局面？

第二、我们认为，今日任何人上台，除非他有办法结束当前的内战，否则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善当前的局面。要建设就得先求安定，要安定就得先解除人民的苦痛。现在一般农村之间之最大苦痛是征兵征粮，假如内战不停，征兵征粮能够停止吗？一般市民阶级最大的苦痛是币值低落，物价日涨，假如内战不停，币值能稳定吗？物价能不涨吗？要改善一般社会的情形，就得增加生产，大规模的着手建设，但是在这烽火遍地的局势下，谈得上建设吗？战火不停，政府只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谈不到全盘的改革。战火不停，政府只能消极地东拉西扯，剜肉补疮，谈不到根本的建设。建国，建国，那里会在烽火中建起国来！现在一切的毛病出在内战，一切的困难出在内战，这个僵局的“结”就是内战，只有停止内战，才能救活中国。但是由于前面所述，行政院既没有决定大局的力量，他有什么办法能使战乱变成太平？他既没有力量使战乱变成太平，他有什么办法来稳定物价着手建设？现在的行政院院长只是一个账房先生，他充其量只能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零用中，撙节一点，他有什么权力可以使这个破落

的门户变为一门昌盛的人家。翁氏出长政院后，做事情也许可以认真一点，一切中国官场的虚文俗套也许可以减少一点，整个的行政情绪也许可以提高一点。但是要希望翁氏来转折乾坤，改变局面，那假如不是一种幻想，就是一种奢望了。

五、事实的分析是令人悲观的。但是就国家的前途看，我们今日有一点是所能做所应做的，就是我们应当使一个行政院院长是一个行政院院长。这就是说，行政院院长应有其独立的政策。就行政院院长和总统的关系言，应当是总统支持行政院院长的政策，而非行政院院长执行总统的政策，就行政院院长和立法院的关系言，按照宪法，行政院院长应对立法院负责，但行政院院长仍然可以在“坚持自己的政策”和“辞职”之间选一条路走，自己的政策不为立法院同意等，即挂冠而去。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上台又下台，两个上台又下台，政策才有改变的可能，局面才有打开的希望。行政院院长固然要努力赢取总统的信任和立院的支持，但行政院院长最要紧的是要知道人心的向背，得到民间舆论的拥戴。假如前前后后的行政院院长都能有这种作风，合则留，不合即去；则即使总统的意志和立院的意见，不与人民的要求符合，迟早也会迫使他们跟上民间的公意的。整个的局势和人心业已动荡到了极点，我们当然希望内阁能够稳定。但是希望内阁不要和人民脱节，较之无条件的企求内阁的稳定，尤为重要。翁氏出长政院，一般说来，都没有什么异议，我们当然希望翁氏多少有一点成就，但是假如翁氏失败了，我们也不一定就认为是翁氏个人的失败。大势如此，这已不是翁氏等一两人所能撑支得了的了。

（原刊“观察”第四卷第十五期）

十四、政治失常

最近政府有几件事情做得实在不成体统。第一件我们要说的当然是十一月十一日行政院通过的“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政府在八一九发行金圆券时，规定黄金一两兑换金圆券二百元，美金一元兑换金圆券四元，这次的修正办法改为黄金一两兑换金圆一千元，美金一元兑换金圆券二十元，将金圆券贬值了五分之四。政府在发行金圆券时，大唱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调子，并且说谁破坏了金圆券，谁就是国家民族的敌人！现在，我们看，政府自己率先破坏了金圆券，政府自己先就做了国家的民族的敌人！当十月杪十一月初全国骚动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当局宣布即将有“更好”的办法颁布，所谓“更好”的办法，大概就是这个金圆券发行的修正办法了，其中决定将民间缴兑的金钞吐还出来，以便取之于民者，仍用之于民。然而吃进去的时候，黄金一两只兑金圆券二百元，美金一元只兑金圆券四元，现在吐出来时，黄金一两却要金圆券一千元，美金一元却要金圆券二十元，一“取”一“用”之间，赚上了五倍，这笔没本钱的买卖真不坏。抗战末期，政府财政困难，宣传黄金储蓄，可是到真要支付黄金时，却来了一个六折，凭空扣去四成；这事大家当还记

得。现在旧戏新编，又要一手。多年以来，政府把人民当着一团米粉，捏在手里，要圆就圆，要扁就扁。良善的老百姓，一再吃亏，心里恨透，可是没有办法。再说八一九政府的经改办法，规定人民所存金银外币，一律须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逾限而未兑者，即视为触犯刑法，现在又允许人民持有金钞，并将金钞的价值，提升五倍，以前服从法令的，信任政府的，都算倒了霉，不为一方面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方面不啻叫人民以后不要再相信政府。事实也一再证明：相信政府的最初总是给政府利用了一下，以后就给政府扔下不理睬了。修正办法第十一条又说：“凡以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指定之银行，存期满一年者，除照章计息外，并得于存款时以兴存款同额之金圆券向存款银行兑换金圆。在金圆未铸成前，得按规定比率兑取黄金或银币。……”一年之后的情形如何，谁者不敢说定，而一年以后的金圆券贬值到什么地步，尤其不能想像，假如今天真还有人到中央银行去定期存款，此人殆为白痴无疑。所以这条条文，撕破了脸皮来说，就等于要化两千元金圆才能兑到一两黄金；这叫做吃一半，真是算盘精极！

第二件我们要说的是翁文灏内阁的辞职问题。这件事也出乎常情之外。我在十一月三日写了一篇论翁阁辞职的文章，可四日中英文日夜报一律报道，翁氏坚辞，并已不到政院办公，翁阁的总辞书也全体盖章，即将送府，翁阁之辞，似成定论，深恐文章刊出时，已成马后炮，所以在付印前数小时又临时抽了出来。不料我的文章刚抽了出来，翁氏却又回行政院去办公了。这次经改失败，翁氏的责任无可推诿。真正的来说，这个大责任假如要由翁氏一人负之（财政部部长当

然有责任，但财政部隶属于行政院，在政治上，政策的失败，行政院院长的责任远大于部长的责任，故此处不独立论财长的责任)，有欠公道，因为拆穿了说，翁也不过是一个财房先生，既不是当家人，也做不了多大主。但就宪法的原则言，这件事总是要翁负责的。所以从政治的责任言，翁的一辞二辞三辞坚辞，都对。问题是他虽坚辞而当时竟未能坚辞到底。这次经改的失败，其性质不可谓不严重，其影响不可谓不广远，无论就个人的操守言，或就政治的责任言，翁氏绝无继续负责的可能。严格言之，就是十月卅一日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有关经改的补充办法一事，亦属不当。内阁的存亡，主要就看它所执行的政策的成败，政策既败，内阁即垮。八一九的经改办法，政府亦已自承失败，在此种情形下，行政院应当立刻呈辞，任何补充或修改的办法，都应由从任来决策办理。当翁氏上台之初，胡适之先生捧场，谓翁氏有勇气。我觉得当时翁氏并不是有勇气接受那个阁揆大任，他只是没有勇气拒绝总统这个组阁大命吧了。翁氏既无勇气拒绝任命于前，亦无勇气坚决呈辞于后。不错，当前的局势是危急的，政务不宜一日无人主持，但是从宪法原则来说，这个责任是关于总统的，而非关于行政院院长的。易言之，时局既然紧急，总统便应早日另定阁揆之选，已经呈辞并且理在必去的行政院院长，不能因为总统的迟疑不决而勉力维持下去。至于总统先生，行政院院长既然有这样严重的政治责任，其辞呈应无不批准之理；因为假如这样一个有重大政治过失的行政院院长，还不使之去职，则所谓“政治责任”也者，岂不成了好听的空话？翁氏一辞再辞，总统一留再留，已足充分表示总统对翁氏信任之重，以及对僚阁气度之厚，假若一味坚留，则

既破坏宪政的原则，亦置纲纪于不顾，无论从那一角度来看，都是不当的。

第三件我要批评，而为一般人不注意的，就是中央所赋予傅作义的权力的问题。按照报上的记载，要点有二：一、以后华北军政各事，傅氏可以全权处理，不须事前请示中央；二、假如傅氏所颁布的法令与中央所颁布的法令有抵触者，以傅氏所颁布的法令为准。凡此记载，虽未见之正式公报，但也未见政府有何否认更正，想为事实。这个问题十分严重。举例言之，宪法第四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议，不得变更之”。现在假如傅氏要变更中华民国固有之疆土则中央是否承认傅氏之变更为合法？宪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假如傅氏所颁布的法令，有与宪法抵触者，则是否仍以傅氏所颁布者为准？凡此都大有问题的。退一步言之，上面的例子或许不成立，因为只说傅氏的法令与中央的法令抵触者，以傅氏的法令为准，并未说到与“宪法”抵触的情形，如与宪法抵触者，自然无效。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宪法第一百十六条明确规定：“省法规与国家法律抵触者无效”，第一百十七条说：“省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无抵触发生疑义时，由司法院解释之”。宪法明白规定地方法令不能与中央法令抵触，抵触者无效。假如今天中央有人主张傅氏的法令如与中央的法令抵触者，应以傅氏的法令为准，这种事情完全是违宪的。在正常情形下，地方法规与中央法律抵触发生疑义时，应由司法院解释之，现在假如硬性承认傅氏法令与中央法令抵触时，即以傅氏法令为主，这是犯了司法的完整，也是违宪的。

大局越来越紧，各种现象日见失常，但失常也有一个失

常的限度，当权者虽然希望保持他们的政权，但政治的常规则究竟不能不“永矢咸遵”。上述三事，都是犖犖大者，实际上，近来当局各种措置，大都有失体统。我们平日的职司，就是议论政事，然而处此危局，几乎无政可论，无政足论，仰望长空，费笔三叹！

（原刊“观察”第五卷第十三期）

十五、施用闷药前后的心理与感觉

这是一篇记录。我草拟这篇记录的目的，在希望这篇文字能够成为医学心理学家或普通心理学家一份有用的材料。事实上，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需要这样一种材料，或者这样一篇记录对于他们是否有用。因之我对于应否草拟此稿，猜疑不决。最后还是出于主治医师的鼓励，他认为这种经验非人人所能得到，有机会得到这种经验的人又未必具有高度的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能把这种经过记录下来。他认为这不是一种寻常的经验所以鼓励我把它写出来。

这篇记录包括“感觉”与“心理”两个部分。关于“感觉”部分，我想凡是用过闷药的人，他们当时所感觉的大致不会有太大的距离的。至于“心理”部分，则要看各人的教育，职业、性格、环境等情形而定。

关于我的病症及投住医院的经过，此处一概从略。我和我的主治医师约好于三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时施行手术。我并在前一天知道，我们将施行全部麻醉。在十三年以前，我曾在沈克非大夫的主治下，割治过盲肠炎。那次用的是局部麻醉。我在那间四周都是玻璃窗的宽大的手术室里，在那没有一点声音的寂静的严肃的空气里，听到那低微而清晰的剪刀

声音。这次我似乎乐于施行全部麻醉，藉以减少我对于痛苦所发生的恐惧情绪。

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一。这是江南最标准的春天，满天的好太阳，我在上午八时三刻以前，在病房里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于八时五十分被抬进手术室。这的主治医师周寿祥大夫早已完成了他所需要的准备工作，坐大椅子上等候我。当我被抬进手术室时，我以很愉快而自然的表情向他招呼“早安”。

我被抬上手术床后，各种工作即开始进行。直到此时止，我还不知道施行全部麻醉，是用打针的方法，还是用嗅觉的方法。我非常希望知道闷药的有效时间是多少。他们说五分钟。我说五分钟内可以完毕一切手续吗？主治医师说五分钟内可以完毕。我虽然不再追问，但是心中很疑惑。他们的意思顾然是企图安慰我，表示手术在很快的时间内（五分钟）就可以完毕。事实上，手术的时间曾经延长十分钟至十二分钟之久。假如他们当时告诉我手术需要十分钟始可以完毕，或者可以提高病人相信的程度。

另一位医师开始在我的口部四周涂油，并将脸罩罩住我的脸部，只留出鼻孔让我呼吸。我此时已知闷药将用嗅觉的方法施用。我那时唯一的希望，（在这儿，我只用“希望”两字，不用“要求”两字。因为“要求”是一种含有“意志”成份的表示，“希望”则仅是一种“感情”成份的表示。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被安排在一种不能让我有任何“意志”的环境之中！）是希望闷药不要用得太早，以致手术尚未完毕，而闷药药性业已终止。但是在我自己觉得一切尚未准备完毕时，他们已经向我施用闷药了。我在一种微微的无可奈何的心情中

被动地吸嗅闷药。

据我自己的估计，从我吸嗅闷药至失去知觉时止，只有三四分钟的时间。三四分钟是一个极其短促的时间。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间里，心里状态纵然十分复杂，因为时间太局促，所可能引起的心理活动，毕竟也是有限的。我现在尽我的能力来记述我当时所体味到的奇异的感觉和当时的种种心理状态。

关于闷药的气味，我还不能用“痛苦”两字来形容。假如我在此用（痛苦）两字，我势须责备我自己近于夸张，因为这种气味是可以忍受的；虽然这种气味至少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气味。大约在吸到第三口或第四口时，我便开始感觉到一点一点“黑”起来。这种情景很难描写。平时我们在白天，或是在有或强或弱的灯光的夜晚，即使闭上眼睛，但多少还有一种（光）的感觉。除非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闭上眼睛后，才觉得当前确是一片“纯黑”。在那时，我的感觉，似乎只有真正在“一团漆黑”的夜晚闭上眼睛时的感觉，仿佛近似。但是更进一步剖析，上述比拟还不能完全尽意，因为我们即使在一团漆黑的夜里，闭上眼睛后，觉得一片“纯黑”，但这种“感觉”，似乎还是眼睛为主的感觉，换言之，即那种感觉，这是一种经过“视觉”的判断的结果。而我那时的感觉，似乎已经超出“视觉”的范围，而是觉得整个的脑袋所感觉的是一片“黑”。而且这种“黑”的感觉，因为闷药在一口接一口地吸嗅下去，所以一步逼一步，愈来愈深。我们平时在电灯光下，骤然之间电灯灭了，那时候所感觉到的“黑”，还多少有一种“光”的比例作用在内，从原来的有光程度，变到骤然的无光程度，遂觉当前一片漆黑。而

我那时所感觉的“黑”，那种难于形容的黑，是愈来愈黑，一阵紧一阵的。我们通常总爱用“如堕入深渊”四字来形容这种情景，但这四个字并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感觉。实际上，我们也很少人有过真正的堕入“深渊”的经验，普通用“如堕深渊”来形容一种心情，多少只是一种象征的用法。“如堕深渊”，就逻辑上讲，本有一点一点“下沉”的性质，而我那时，固然并无“下沉”的感觉。“下沉”是一种自上向下的活动，而我那时并无自上向下下沉的感觉。我的感觉是好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仿佛走入了非洲的一个大森林的样子（实际上我并无走入非洲森林的经验，此处亦是一种假借），走一步黑一步，越走越黑。

我曾经在新闻片上看到过纳粹罪犯被施绞刑的情形，在这时，这个记忆骤然地引起我心理上的一种联想作用。无论是从我的思想或是从我的过去而言，我原无将我自己那些纳粹要犯联想到一起的可能。这个联想的发生，虽然是由于我看过那张新闻片的关系，而形成这个联想的中心则为“权力”一事。无论在当时或者现在事后分析，这种联想显然并不牵涉到任何道德上的问题，或是政治上的成败的问题（政治上的成败本是相对的）。这个联想的中心思想，只是说，那批曾经赫赫一时有大权力的人物，这时竟毫无反抗的能力，其生死完全操之于他人掌中，而将在顷刻之间结束其生命。我们平时，凭这支千钧之笔，发挥我们的理想，陈述我们的抱负，替一切受难的人们呼吁，抨击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和扫荡各式各类的人渣，保持有一个虽然飘渺而不可捉摸但是坚硬却胜过钢铁的意志，而在这时，整个的生命（包括寄托在这个生命上的智慧、意志、理想、权威、品格），都操之于他人，

一切听人摆布，自己失去了任何表示意志的能力，甚至即将失去任何表示意志的机会，心里充分感觉自己的生命，一秒一秒更接近“死亡”——在那种情形下，亦不能自己地发出一种对于人生的轻微感伤！

在我当时的心理上，一方面占据着由于有如上述有关“权力”一端迸发出来的感想，一方面又同时联想到一切被迫即将伤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而迸发一种深沉的同情。我所谓“一切被迫即将伤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所指范围极广，通常最主要的部分即那些因犯罪而被判死刑或因政治见解不同而被处死刑的那些人们。罪犯犯罪，原都由于现代社会的罪恶，而由于政治上的斗争或忌妒因而被人或公开或不公开的处死，更是人类社会里最可哀痛的不平事情。当他们从囚房提到刑场，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之路时，没有人可以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究为如何，而他们自己显然也不再获有机会向他人报告他当时的心理。无论电刑、绞刑、或执行枪决，行刑的本身虽只是一霎那之时，而自囚房至刑场这一段，总是一段可怕的不堪想象的路程。当我被闷药的药性，一秒钟一秒钟地逼近死亡的境界时，我深深体会到那些不幸的人们的内心的悲哀。除了少数例外，没有人不是留意他自己的生命的。然而他们竟活生生的被人强制结束他们的生命，无论他们是否热泪盈眶，他们的悲哀终是一种绵绵无尽期的悲哀。

我说我当时有一种“轻微感伤”！这种感伤是一种属于人性的感伤！然而这种感伤竟很“轻微”，主要的功用应归之于我们的常识。因为常识告诉我们，这不是“死”，而是一种知觉的暂时的停止。所以一切引起的联想，都是一种尽于人性的联想，而非利害的联想。我当时几乎纯然没有一点涉及

私人利害问题的联想。最明显的是关于我的孩子。我是一个离婚多年的男子，可是我有很可爱的孩子。我的女孩性情柔和，生趣识礼，年龄虽小而已表现一种善于治家的本性。我的最小的男孩，则天资颖慧，聪明伶俐，具有一种使任何人一和他接触便会欢喜他的魔力。我非常爱他们。可是这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有关利害或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项，在当时曾经占据过我的心灵，就是关于国家的前途。我当时曾经确切的感到，万一我此去一闷不醒，最使我不能“瞑目”的，实莫过于今日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走上轨道的一点。因之我在事后感到，对于一个真正的忧国之士，我认为在1945年8月至1946年2月之间年老寿终者，实不失为一种人生大福。因为那时抗战终获胜利，政协亦变成功，而为日后发生的种种纠纷与悲观，尚未显露。在那时死去，可谓心情安静，无所遗憾。到现在，假如我们竟然因病身故，实有死不瞑目之感。

以上是我在施用闷药那短短的三四分钟以内的心理活动，事实上，在那后半段时间，心理活动已渐渐趋于衰颓。最初的一阵“黑”的感觉过去后，意识一点一点柔弱起来。（此处还不能用“迷糊”两字，这时意识还是很清楚，但不活跃，故用“柔弱”二字）我遵从医生的吩咐，嘴里轻轻地数着“一、二、三、四”。心头似乎有一阵轻微的难过，左脚脚趾部分曾有发麻的感觉。在那快要失去知觉之前的极度短促的时间里，我还意识到我的两手不知如何安放才好（我这时心性微微有一点紧张），后来就有两旁两个人将我的手捏住。在我知觉尚未丧失之前，我还感觉到医师已用一种液质在施行手术的地位四周涂抹。这时我已渐渐地快要丧失知觉。当时

我似乎对于一切都自愿地同时又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自愿”指自愿施行手术而言，“无可奈何”指用闷药后情形而言。前者属于意志部分，后者属于感情部分。）我没有放弃的只有一点，就是嘴里仍继续的在数着“一二三四”。我那时又忧虑，不要一切都已失去感觉，而独独我的神经不能停止，则我仍将要受到手术的痛苦。这当然是一种由于没有经验而发生的过虑。至少那时，我是一切“听天由命”了。数着数着，我似乎竭力叮住这个“一二三四”，以挣扎“我”的存在。但是我终于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我的知觉了，就像一个小孩在哼着山歌时忽然睡着了一样。据医生告诉我，我最后还要经过嘴里乱哼，手脚抽动，表示心头非常难过的一个阶段，如此以后，全身筋肉才开始松弛，真正失去了知觉。但是这一个阶段，我自己已经不知道了。

当我已被闷昏以后，甚至说一个人死去以后，究竟他的灵性仍旧有无活动，我不易作确定的回答。关于一个人死后究竟仍旧有无灵性一节，亦即通常一般人所涉及的有无灵魂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至少到今日止，尚无任何确切的结论；而人死了又再活，以便叙述其死后的经验者，其事显亦不多。我这篇记录，其中有两点与张东荪先生即将在本刊发表的一篇监狱回忆录中所记他自杀的经验，可以互相印证。这儿先说一点。据东荪先生报告，他某次自杀以后，他“觉得”非常舒服，好像一个身子很轻，在云端里飘着似的。他既然自杀了，何以又“觉得”非常舒服，好像身子在云端里飘着，这似乎说明人死后多少还有一部分灵性的存在。我亦似乎感觉，我在被闷昏以后，仍有一种灵性的活动。不过这种灵性活动

的内容、性质，及情形，我于醒后亦不能详细记忆。我至少在刚刚醒的一霎那、确是感到我在昏睡中似乎仍有灵性的活动。而且我觉得在昏睡中的情境，极其甜蜜，而且极可留恋。至少并无任何苦痛，似乎即永远停留在那个境界里，亦是很好的。假如我于刚醒的时候，即运用我全部的脑力来捉捕我在昏睡中的种种情境，是否有所收获，关于这一点，我很难答复。我当时至少并未企图这样做，同时我当时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势须斫伤我的脑力。我只能很不确切地说，我似乎感觉，当我在昏睡中，仍旧是有一种灵性上的活动的。

我终于醒了过来。当我醒过来约摸十分钟种后，我立刻在极度疲倦的情形中，睁开眼睛看我的手表，时为十时二十分。因之我估计我醒来时，大约为十时至二时十分之间。易言之，我至少在昏睡状态中延续至一小时之久。（据医师报告，在施行手术期间，继续施用闷药，故至此时始醒。）我醒来时，正巧外面有哭声，我第一个反应是：“隔壁的人开刀开死了，我开刀没有死。”而立刻接着而来的第二个修正意见：“隔壁的人死了，（因为不一定是由于开刀而死），我刚刚是上了闷药，现在醒过来了。”这个反应是很单纯的；即我庆幸我自己的没有死。但是据我自己的分析，我不承认我这个反应是出于一种意识的活动，而只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应。（我愿意在此表示，关于这部分的解析，恐怕有不少需要斟酌的地方，主要的原因是我在这方面没有学力上的根基，故引用名词（term）或有错误之处。因之我这篇记录，还只能算是一种 raw material，心理学家如欲采用时，尚须详为订正。）何以言之？

因为施行手术是我自愿的行为，而施用闷药无伤生命则为一种常识，故我绝未发生任何对于“死亡”而起的恐惧，因之醒后也不致有庆幸未死的意识。所以我认为我那时庆幸自己没有死，并非一种智力的活动的结果，而只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应，为一种生物所有的自然反应。此处即欲述及与东荪先生自杀经验可以相互印证的另一点。东荪先生在自缢之后，被他人解救时，发现他的两手在拉着套在头上的绳子。既欲自缢，而何以在自缢后又要将两手去拉开头上的绳子？由此可以证明，一个人在意志的支配下，可以求死，所以在社会上有各种自杀案件的发生，他们都无“意”于生，唯求一死。但是作为一个“生物”，人是不愿意死的，所以蓄志自缢者，于自缢后，仍以两手去拉头上的绳子，这完全是一种生物的自然行为，与意志无关。

这有一事可以证明我当时之私幸未死，完全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应，即我当时一方面有私幸未死之感，一方面我尚未恢复我的意识，因为当时我甚至对于我究竟身在何处一节，亦茫无所知，而对于以前一切事情也是一片模糊。大约经过四五分钟的有意思索后，我才大约想起我自己是睡在一个医院的病房里，其后一二分钟，我又努力睁开眼睛一看墙壁上的颜色（墙壁上白下绿），以求证实我确是睡在病房里面。

在醒后最初的五六小时内，整个的人感觉非常疲倦，昏昏欲睡。此时发生一件意外的插曲，即在我醒后远不及一小时的光景，我的助手照例挟了一包稿子来医院看我，履行我们习以为常的接洽工作。他或者未能知道我是刚刚上了闷药才醒过来的，但是无论如何，由于星期一上午是每期的最后发稿时间，当时有一篇稿子非我看过不能付排。事实上，在

任何情形之下，我当时都无力阅读即使是一封短信，何况是一篇稿子。我当时非常虚弱，面色惨白，我甚至即使闭上眼睛，亦觉光度太强，故须用手遮盖着我的眼睛。结果我只好招呼我的助理读给我听。（我实在很希望他能够读得响一点，藉以节省我因听而需要化费的精神，不过我并未如此表示。）他显然未能了解我当时是虚弱到如何程度，并拆读若干来信，我也竭力支撑地听下去。我相信这一个插曲增加我脑力受伤的程度。

在当天下午四时以前，我始终在沉睡状态之中。闷药的气味，那令人不快的气味，（近似火油的气味）时时逗留在我的嗅觉里。令人厌恶。一直到晚上九时以后，我才忘记这种气味的存在。

在下午四五时，我大体上已清醒之后，忽然怀疑到刚醒时我所听到的哭声，是否仅仅是我当时的一种幻觉。事后追问看护，始知当时有一个病房确是死了一个病人，而所发的哭声确是一种真正的出自内心的悲哀的哭声。

（原刊“观察”第2卷第9期）

办刊志趣与甘苦

储安平

通本
雅容
景世
年成
書目
自集

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一)

本刊筹备多月，历经艰苦，终于今日问世。创刊伊始，兹让一述我们出版这一个刊物的志趣、风度和立场。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多的读者。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面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我们感到现在大多数人只知追逐权势，追逐利欲；人人以一己为先，国家的祸福竟成为末要而少人过问。是非不明，正气不张。许多人常在一种行动下，流露他们爱国的情绪，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及人格上，表现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尽他们对于国家的责任。但是抗卸外敌，自强图存，显非单凭感情所能济事，而建设国家，改革社会，尤需有众多的能够咬得紧牙关、站得住脚跟、挺得起胸膛的人民。环顾海内，种种现状，固足使人疾首痛心，而瞻望来日，尤使人不胜疑惧忧虑。在这样一个混沌悲痛的历史中，有志之士，实应挺身而出，不顾一己的得失毁誉，尽其天良，以造福于他所属的国家。这诚然是一个充满着祸乱灾难的痛苦时代，但这也是一个大足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和情操的时代。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乐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但是这个刊物也不仅仅是一个论评时事的刊物。我们还有另一个在程度上占着同样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对于一般青年思想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多年以来，青年实在烦闷。在多年的烦闷中，意志软弱的，渐渐趋入麻痹、消沉、及自我享乐的道路；刚强的则流于偏激。今日大多数青年，不是偏狭行动，厉气凌人，就是混混沌沌，莫知其前程何在！我们瞻念国家，中心忧惧，莫此为甚！我们都是爱好自由思想的人，所以就政治上的信仰而言，我们对于青年，一无成见，他们信右信左，尽可信其所信；而且他们能够信其所信，无宁且为我们所鼓励并器重者。我们所欲言者，即思想的出发较之思想的归宿，远为重要，所以信从一种政治上的思想，必须基于理性而非出于感情；而于重视自己的思想自由时，亦须同时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此外，在做人的根本条件上，我们期望每个青年都有健康的人生态度——人生的目的非仅图一己的饱暖而实另有所寄；都有现代化的头脑——思想的方法现代化，做事的方法现代化。我们国家一线前途，全系于今日一般青年肩上。行动、偏狭，强横，都是以造乱而不足治乱；自私、麻木、消沉，带给国家的是死气而非生气。我们极望这一个刊物所发表的文字，它所包含的看法、态度、气息，能给一般青年读者以有益的影响。

(二)

其次，请一述我们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亦即本刊同人共守的信约：

一、民主 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归，无可抗阻。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设施措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政府必须以人民的最大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同时，民主不仅限于政治生活，并应扩及经济生活；不但政治民主，并须经济民主。

二、自由 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人民必守法让法不暇。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为维护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应该使人民的身体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增加国家社会的福利，而自由即为达到此种优性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必是一个奴役的社会。我们要求人人获得各种基本的人权以维护每个人的人格，并促进国家社会的优性发展。

三、进步 我们要求国家进步，我们绝对反对国家停滞不前。不跟着世界大势前进的国家必将遭受自然的淘汰。我们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业化，但要民主政治成功，工业化成功，先须大家有科学精神，现代头脑。我们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各方面的全盘现代化。我们希望人人都有现代化的头脑。唯有现代化了，才能求得更大更迅速的进步，才能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共同生存。我们反对一切的停滞不前，故步自封，甚至大开倒车。停顿、落后、退步，

都是自杀。我们要求中国在各方面都能日新又新，齐着世界主流，迈步前进。

四、理性 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的理性。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凭藉冲动及强力来解决纠纷，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动辄用武。我们完全反对这种行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完全失败。我们要求政府及社会各方面能全力注意这点。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我们要求一个有是非有公道的社会，我们要求各种纠纷冲突都能运用理性来解决。唯有这样，才能使一切得到合理的发展，才能加速一切建设的成功。

我们谨以右陈四羲，作为我们追求努力的鹄的，并本此以发言谕事。我们的态度是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只要无背于前面的四个基本原则，在这一个刊物上面，我们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其作者负责；而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谕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发刊之始，谨述其志趣与立场如上。尚祈全国贤达，不吝指教，惠予匡助，本刊幸甚，国家幸甚。

(原刊“观察”第一卷第一期)

味
神
始
精
民
由
今

二、辛勤 忍耐 向前

——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

本刊年出二卷，每卷二十四期。一卷出完后，休息两周，以为同人整理之需。第二卷第一期定三月一日出版。

我们除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以外，在这一卷中，未尝有一字涉及本刊自身，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先让读者自己就本刊的言论、风度、水准、内容、获取一个大概的了解。在这半年中，我们得以许多前辈、朋友、读者的爱护关切，使我们增加不少工作的兴趣和努力的勇气。在这第一卷的最后一期，我们谨一述本刊诞生的经过及半年来的各种情形。

发起 筹备 诞生

在三十四年冬天，我们有几个朋友曾在重庆编过一个周刊——“客观”。在精神上，我们未尝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那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十六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须发六万余字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这未免是一次过份的冒失，因为创刊号於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而我们决定主编，犹为十月八日之事，实

际上其间只有三四个星期的筹备时间。那时正是抗战刚告胜利，政治酝酿改变的时候，多年以来，在“抗战第一”的大帽子下遮盖着的许多积怨，我们这时秉笔直书，亦确能言所欲言。我们愿意毫无夸张地说，那时确有许多读者，每星期都在等候着星期六“客观”的出版。——这些读者后来都成为“观察”的读者，今日“观察”在四川及西北一带有广大的销路，一部分亦应归因於“客观”的影响。有许多朋友至今或者未能明了为什么我们骤然放下“客观”，另立“观察”。我们无意在此追述那些业已过去的琐碎事情，只能就原则上补叙一笔。我们平常有一种基本的理想，即立言与行事应当一致。假如一个言论机构，在纸面上，它的评论写的头头是道，极其动听，而这个言论机构的本身，它的办事原则和办事精神，与它所发表的议论不能符合，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失败。假如我们主张政府负责而我们自己做事不负责任，要求政治清明而我们自己腐化，这对于一个怀有高度理想的人，实在是一种难於言说的苦痛。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嘎然放手。

但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天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贯彻我们的精神。

第一次的发起人会议于1946年1月6日在重庆举行，

决定刊物的名称、缘起、及征股简约。关于这个刊物的生命能否维持，当时我们笼统地建筑在两个假定之上：一、国内拥有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当时国内还缺少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在抗战中，昆明重庆等地都有水准很高的刊物，但因战时邮递困难，环境限制都未能遍及全国）。假如我们自己确是不偏不倚，秉公论政，取稿严格，做事认真，则各方面的前辈及朋友，无论识与不识，一定乐于支持我们，为本刊写稿。二、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於党争之外的，只要我们的刊物确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优高，内容充实，则本刊当可获得众多的读者。我们经过慎重的考虑并与各方取得初步的接触后，决定以全付力量并持久决心来创办这个刊物。我们认为象这样一种工作，有以全付精力去努力的价值。我们认为今日中国实极需要有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得到一个说话的地方；有了这个刊，并可以鼓励一般自由思想学人出面说话。而我们之所以要想供给大家一个说话地方，并鼓励大家说话，实因我们深切相信，这种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见，对于今日中国的言论界实具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此种稳定的力量正为今日中国所迫切需要者。

关于编辑部分的筹备工作，大体上都是在重庆办理的。我们拟了一张“拟约撰稿人名单”，分别函洽。函洽时，一共附去印件三件：一、缘起，二、“拟约撰稿人名单”，三、拟就之复信。函附“拟约撰稿人名单”的目的，乃在使收信人於考虑允任或不允任时，获得一种参考材料。拟就之复信，则请收信人在“遵约担任”或“不克担任”上作一符号，可免

另写复信之烦。但是我们认为单单这三种印件还不能表示我们的诚意，我们大都另外附有私人亲笔的来信，以最大的热忱要求允诺，共同为国家的福利努力。

五) 拟约的撰稿人原不止於那张名单上的几十位，但因我们對於撰称人负有赠阅刊物的义务，所以不能不竭力缩减。在那张拟就的名单上，有一小部分仍未发函，主要的原因是地址不明。允任撰稿人的意义是双重的，第一表示愿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义上支持这个刊物。接洽的许多先生中，只有一位先生复函“不克担任”，有八位先生迄无复信，(各信托人转致，是否转到，不明)。其余大都函复“履约担任”。并除寄回印就的复函外，另附私人函件，鼓励我们。有许多刊物常常不得到本人的允诺，就将其名字印在刊物上，作为“特约撰稿人”，我们深不以此种态度为然，故凡非确实函允担任者，我们未敢贸然将其姓名列出。我们不用“特约撰稿人”一词，一律称为“撰稿人”，目的在使本刊的撰稿人在精神上能和本刊发生更关切的感情。现以第一卷而论，封面所列七十位撰稿人中，已有三分二给本刊写过文章。

事务方面的筹备工作，较为艰难。第一是股款不易措筹。我们预定的股额是一千万元，当时(1946年1月)根据上海方面的报告，我们估计每期的总成本是五十万元，如有六百万元，即可着手，(二百万元为开办费，四百万元为八期的周转金)。措筹此数应无困难，但事实上不若想像的那样顺利。我们这批朋友，多是以教书为生的。读者一定充分明了，在抗战的八年中，教育界人员是如何在饥饿线上挣扎。所以到真正收款时，常常止於“口惠”。其间还遇到使人极其难堪的事情。

但是也有令人感动的事情。我有一个学生竟然徵得了他父亲的同意，卖掉了几亩祖田，来助成我们的刊物。还有好几位“客观”的读者，知道我们另筹“观察”，愿意入股。我们那时筹款非常困难，但是我们还是请他们再为考虑。我们表示：一、一般公务人员都非常艰苦，若是生活优裕，略出余力，以助文化，自然不失为一种义行，但若仅从生活零用中，节省出钱来入股，我们实在感觉不安，不忍接受；二、现在社会诡诈百出，读者和我们向未谋面，似亦不能单凭我们的文章就相信我们，我们劝他们慎重出之。结果还是有一位读者在薪水中抽出了五万元入了一股。

我於去年三月中旬，由渝飞沪，只带来一小部分股款。那时物价激涨，一般言之，似非有二千万元不能出刊；但是我们连一千万元，尚感不易。正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在去年四月五月，南京方面两次以高级公务员见委；但我实乐於有这样一个艰苦的时期以锻炼自己的情操。我们做人做事，说不该半途而废，见异思迁。就在这一个远东第一豪华的大都市里，我落寞地守了好几月。这些日子是黝暗的，但我还有着一盏明亮的灯，这盏灯挂在我的心底里，吹不灭，抢不掉；这盏灯发射光亮，冲散着周围的昏暗。

到六月中，股款渐渐像个样子，七月底，大体已近收足。事务方面的第二件大事是“房子”。在上海，房子就是金条。以我们这了了之数，绝对放不得手，但是没有金条弄房子，几如登天之难。后来幸得朋友之助，租到了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间，总算贯彻初衷，未出金条，月付租金二十万元，说定以半年为期。刊物出了几个月，前途如何，较有眉目，到那时，我们容易放手做事；所以只租半年，我们也接受了这

个条件。

各事进展到八分程度时，我们开始发函约稿。我们最初原想在七月出版，但是酷暑将至，学校放假，各地复员，我们深感此时出刊，“天时”不利。考虑再三，决定守到九月一日创刊。这个夏天确是一个热闷的夏天，但是也是一个富有生命的夏天！

庚

申

立

发行 定阅 财务 (略)

.....

作者 读者 编者

编辑经验是一种苦痛的经验。读者的立场、胃口、期望、要求，各各不同，任何一个刊物，都无法使每一个读者完全满意。读者对于一个刊物的要求，都是从他个人的角度出发的，而一个编者，他必须从全盘着眼。举一个最普通而最为一般人所忽视的例子：京沪一带的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大后方的读者的阅读心理，有很大的距离。通常一个刊物编者，最容易犯一个毛病，即只顾这个刊物发行地带附近的读者，而忽略远的读者。我们这个刊物是全国性的，发行数的一半都在后方远地，我们在地域上必须以全国的读者作为对象，而不偏重於某一地区的一部分读者。

我们这一个刊物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刊物。自由思想的主要精神，就是容许各人陈述各人的意见，在今日这种“两趋极端”的局面下，我们认为最最需要提倡这种“自由”与

“宽容”的精神。所以我们一再申述我们的传统：只要无背於本刊发刊辞中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意见不同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非非得编者同意不可。我们最注重者，是文章的内容与态度，亦即文章的水准与风格。许多人认为我们的文章，各言其是，无统一的论调。在我们自己，我们不以此为病；甚至可以说，我们且以不一致为贵。（假如以后我们有几个朋友发表意见相同的文章，那也仅是偶合，而非设意如此者。）记得有两位读者曾来面谈，问本刊有无具体主张及能否对於青年作进一步的具体指示（指组织而言）。关于第一点，我直接了当的说：我们无具体主张；关于第二点，我说我们无意为此。曾在或将在本刊上写文章的人，他个人或许对於国事有具体的主张，但是“我们”，或者说本刊，至少至目前为止，还谈不上这点。我们自承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我们有我们的基本原则，基於这些基本原则，论评国事。但我们做的是一种言论工作，而非组党工作。中国“热心”於组党的人太多了，你一个党，他一个党，我们认为在中国现行局面下，党派的林立徒然增加政治的紊乱。就编者个人而言，我极其赞同张东荪先生所言：士的使命在“干政”，而不一定要“执政”（见第十三期张文）。“干政”就是一种“舆论”的做法，而“执政”必须是一种“组党”的做法。我们无意组党，所以我们谈不上“具体主张”；我们无意组党；所以我们无意担任组训青年的工作。我们做的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替“国家”做的，不是为了“我们”做的，我们绝无意思要本刊的读者成为我们的“群众”。我们的目的乃在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我们认为替国家培养这

种“种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

许多读者感到本刊的“份量”太重，太严肃，甚至说太枯燥了。有的说本刊不够“刺激”，说“刺激”的文章太少了。关于这点，须分层说明。第一、本刊是一种高级刊物，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在本刊的基本编辑方针上，中学生不在我们的读者对象范围之内。）一个高级刊物是显然无法“轻松”的，我们绝对拿定这一方针，不稍动摇。其次，我们是一个理性的刊物，我们绝不感情发言，一切感情冲动的文章，概所不取。就事论事，本刊过去确曾发表了几篇“斤量”相当重的文章，在我们看来，有时严厉的八个字，其斤量远在看似泼辣而实无重量的八千字以上。不过这几年来，大家太苦闷了，以致人人都希望读到所谓“刺激”的文章，感情越冲动的文章越容易吸引读者，但此与本刊的基本精神相背，我们无意如此，更无意仅仅为了吸引读者而向此方面发展。我们创办本刊的目的是替国家造福，我们绝不忘怀我们最初的动机。因此，据我们的一般印象（我们尚未做过读者调查的工作），本刊的读者，大部分是三十岁，或者至少是二十五岁以上的读者。我们不拟迁就读者的口胃而改变我们的方针。第三、一般读者都感觉本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即没有时事短评，因而使这个刊物大大减低了接触现实的程度。关于这点，我们完全承认，并亦充分同感。我们愿意在此坦白陈述我们的困难，而困难的症结，在于人力的限制。不仅本刊的撰稿人都在外埠，就是本刊的发起人，也都散处各地。这种时事短评，要认真写，因可由一个执笔，而必得至少有两三个人经常讨论，才能避免过偏或不及的弊病。现在全部的编辑责任都在编者一人肩上。要约稿，要复信，要阅稿。退稿不算，

就是单单发表的稿子，每一篇稿子要读三遍。第一遍是初读，大体决定可用与否。第二遍是精读，间或修饰其文字，并计算其字数。在发稿之前，还要最后认真地读一遍。特别是通信，要做大标题小标题及文内子题，平均一篇通信，至少花费三小时始能编好。而最主要的，是编者不仅仅是主编这个刊物，实际上是主办这个刊物，我十分之六七以上的精力还是化费在事务方面。调度款项、核结账目、管理人事、购买纸张、兜拉广告、各种设计、校阅大样，以及对外一切有事务关系的事务，这些都是我的责任。

自从本刊创刊以来，我每日工作的时间，平均在十一小时左右，有时多至十三小时。半年以来，我们虽然心情宁静，意志坚定，但是身体疲乏，精神困顿，我们宽已尽心尽力；而这一切固然是为了我们的理想，为了我们的国家。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编者已无余力构思，也无必须的时间以获取为撰写时评所必要的情报与根据。我们又不愿草率落笔，宁缺毋滥。我们自己也知道这个缺点，但我们腴腆地说，至少在第二卷中，我们还无法增设时评的一栏。

我们过去退掉的稿子很多。有前辈的，有多年友谊的朋友的，有股东的，有撰稿人的，有读者的。有第一篇用第二篇退者，或第一篇退而第二篇用者。有一次，有一位前辈，我们向他求了四五次稿，他确是爱护本刊，在忙中抽暇给我们写了一篇，而我们仍未能刊载。在人情上讲，退稿确是一件不甚愉快的事情。但是我们对于稿件的取舍，绝无偏私，而且我们事实上稿子常感不敷，但是为了刊物，应退者还是照退。我们希望各方面能鉴谅我们。至于本刊篇幅，绝对公开，毫无门户之见。在第一卷中，在投稿中录用的文章，共为三

十五篇，约占所刊文章总数百分之二十五（通信及尾页犹不在内）；第十四期新疆专辑就是投稿。这个数字足以证明我们用稿绝无成见，只要文章在水准以上，无不采用，特殊有价值的文字，甚至为之出一专辑，亦所不辞。

有许多人批评本刊每期的作者履历介绍，我们在此解释几句。一般刊物每期都可由编者写一编辑后记，编辑后记主要的目的在介绍本期作者。但这种介绍，时有失之“肉麻”或轻重不匀之弊。我们仅仅简单地刊出作者的身份或职业，实是一种比较大方的作风。有人以为有许多作者已经大家知道，无须介绍，或无须每次介绍。但其间包括几个问题：一、有一部分作者虽然大家知道，但也有一部分作者，读者对之尚不十分熟悉。何人应介绍，何人不应介绍，并无客观的标准，故我们一律介绍。二、京沪平津一带的读者，也许对于许多作者均极熟悉。但大后方的读者，未必熟悉。本刊遍布全国，不能亦不应仅以东南一带的读者情形为标准。三、有人主张每一个作者第一次为本刊作文时，介绍一次，以后即不必再为介绍，但是在理论上，我们无法承认每一期的读者都是读过以前各期的。每期有每期的新读者，所以每期的作者均应介绍。四、在编辑技术上，假如只介绍第一次给本刊写稿的作者，则这一期也须只有一个新作者，而我们决不能在介绍作者的那个方框里冷冷落落地只排一行，稍有编辑经验的人，即知绝无此种做法。批评这一点的朋友，大都根据其自身的知识程度或社交地位而有种意见，但我们当事人是从全盘着眼的。而且我们这样做法至少并不“伤雅”，我们愿意让这个办法成为本刊的一种刊例。而且我们愿意再报告一点：这个办法对于我们的业务，未始无助；内行的朋友们甚至还赞

赏着我们这种做法。

编辑部分需要报告或解释的，已如上述。我们愿意在此向所有为本刊写稿的先生及各地的特约记者表示最大最热烈的谢意；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本刊未由获得为本刊所已获得的那些荣誉。我们要求各地的撰稿先生及特约记者，继续支持我们，源源以大稿见惠，充实本刊的生命。在编辑方面，伍启元吴世昌两先生给编者很多帮助。创刊以前一部分稿子是伍先生代约的。创刊时，伍先生正在上海候轮赴英，我们共同讨论最初几期的编辑计划，他并作许多有实质的协助。其后吴世昌先生复员东下，他经常提出建议，并在各方面协助，以迄於今。

自第二卷起，我们又增约了胡适之先生等几位为本刊撰稿人，均经函允担任，并此附告。

办 事

我们的办事基本精神是负责、迅速、公平。不过在中国社会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於希望贯彻这种精神了。我们自己检讨，实在愧惭得很，一切还不能做到理想的地步。

先说我们和作者的相处。我们对於作者，都是最尊敬并最热诚的。我们向作者索稿，从来不写“八行”信，从来不叫人代笔。我们每次去信都是真挚的，而且大都是长信。说实在话，有时一位作者给我们写四千字，但我们前前后后所给他的信，恐怕有时竟不止四千字。有些作者有时或者不免要感到我们迫稿迫得太厉害了，但是我们相信，当他一想到我们一切都是忠於一个刊物，或者会同情我们，原谅我们，而

不加责怪。作者的来信，我们大都立刻作复。稿子来后，大都立刻汇奉稿费。当我在筹备时期，常常上午九时收到稿子，上午十一时就立刻跑到银行里去将稿费汇出了。那时也毕竟比较空闲，常常在收到信件的十分钟以内，就写了复信，立刻跑到邮局去。（当我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行为，几乎近於疯狂！）现在事情一多，时间已不够用，但重要的信仍旧立刻作复，延搁的情形难免没有，大体上不多。对于稿费，我们相信为本刊撰稿先生们，不甚关心，但在本刊一方面，我们必须时常顾到作者的利益，我们已提高过三次。就中国社会情形说，稿费的菲薄是最不合理最不公道的。我们自愧尚无力量作何改革，我们每次提高的数目，均极寒酸，我们仅仅只能使作者获有一种印象，即我们确是在认认真真的努力事业。

一般读者和我们的信函往还，可分两部分来说。一是写给编者的，一是关于订阅的。关于投稿，不用的稿子我们大都立即退回，甚少耽搁。可用的，稿费亦提前汇出，只有可用而在最近一、二期中尚无刊出可能的，则稿费延至刊出后再寄出，此因本刊经济有限，稿费项的周转金数目不大，故未能无限止的一律先付。关于建议改善内容的信件，我们大都一一保留，供为参考。编者个人过去的习惯是“有信必复”，近来事实所限，无法一一遍复，所以凡无特殊需要者，即不再复。编者愿意在此对于过去惠函诸君，一并表示谢意。最使编者困恼的，便是若干读者提出种种问题，或关大局，或添人生，如要复，非一万或八千字不能毕辞，在这种情形下，编者实在无法答复，只好写一封短信去道歉。

关于定户的来信，本社也尽力查复或照办。定户的来信

是本社同人目前最感繁重的一项工作。有的是改地址的，有的是改寄递方法的，有的是补购以前的刊物的，有的是中途收到要求赠补的，有的是续定的，有的是托代购其他书籍的。每一定户，当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后，他当然希望我们立刻将他所嘱咐的事情办好。但一切困难都由於一个单纯的事实，即绝大多数的定户来信时，都不注明他的定单号码。续定刊物，必须知道他以前的订费至何期截止，始可前后衔接，补购刊物的须在他名下上账，至於更改地址或更改寄递方法，更须知道他的号码，以便寻觅目标。我们现在有二千七百余名定户，要在二千七百余名中去找寻一个人，何等困难。要是再写信去问，则往返需时，读者总觉得我们服务不周。现在我们有一个职员，专门负答复读者来信之责，他有时整整一个下午只能复三封信！这真是不合理，不经济！有的读者来信，字迹潦草，甚至他们的签名及地址，无法辨识，以致无法答复，在读者是不满，在本社更是不安。有时读者从银行汇款订阅，常常不注明起寄期数及寄递方法，甚至根本不注明汇款人姓名及地址而又未另函通知者。（關於此点，也许是解款的银行将汇款人的附言单失落了。）以致读者久候无复信，而本社亦苦无法作复。有些读者的刊物中途间有邮失，或被他人擅取，来函责难，我们只好再补他一份。……像这类事情，日有数起。我们特为陈述，希望以后定户惠函查询，务须注明定单号码，如其定单遗失，可阅封套上所贴签条上的号码，以利查复。我们愿意为读者服务，并尽量提高服务的效率，谨请读者协力合作。

本社过去在办事上最弱的一环是发行课（定户课与发行课分开）。前已言及协办发行的职员是兼任的，事实上未能全

力灌注，因之各地同业来函，时有搁置不复之事。我们对此极感不安，已分函各地同业致歉，并说明正谋改善。现已另聘职员，专任办理，希望以后各地同业来函，能够随到随复。

關於本社同人福利，我们尽力顾到，自从去年八月成立以来，迄今为止，已调整过两次，（编者自己的薪水，从未调整，现在还是拿去年八月份的数目）每次调整的数目虽然有限，但是因本社经济有限，一方面要顾到同人，一方面也不得不顾到社本。每次调整都是我们自动的，并非出於职员的要求。本社职员對於这个事业，有兴趣，有热忱，物质生活虽苦，精神生活却很愉快。

關於我们对外应付的款项，从无拖欠或延搁之事。过去二十四期中的稿费，除有二三笔因去函作者询问汇款正确地址，以便查理。纸张费，广告费，印刷费，都如期一一照付。承印本刊的印刷所老板，他说他做了二三十年印刷生意，还没有遇到像我们这样的顾客。我在任何忙碌的情形之下，总於应该付款的时候，在社里恭候他来取款。

此外，还有一件事应该在此报告，即在过去半年中，本人从未参加任何政治的集会或活动。此事包括着两个原则一、一个刊物要维持他超然的地位，这个刊物的编者必须是真正绝对超然的，二、我们这个刊物是全国自由思想份子的共同刊物，这个刊物所代表的理想是全国自由思想份子的共同的理想，这个刊物绝不应成为编者个人活动的工具。大家支持这个刊物是为了要支持这一个理想，而非支持任何个人；任何个人都不该利用这个刊物以达到他为了他私人利欲的目的。

尾 语

在这严冬的寒夜，我已费了整整两个通宵，向社会报告我们这半年来的经过。行文至此，东方微白，实已不胜倦困。滔滔今日，有多少人能一往直前地为理想而生活，有多少人能咬紧牙关从事这样一种清寒艰苦的事业。读者先生，让我们大家鼓舞起来，挺起我们的胸膛，睁开我们的眼睛，冷静我们的头脑，坚定我们的意志，来从事具有新理想的新社会事业。大家来鼓励我们，协助我们，支持我们。我们愿在这儿毫不害羞地向广大的社会宣告：我们认为我们今日所做的一种工作，就是一种真正的“建国工作”！

（原刊“观察”第一卷第廿四期）

三、艰难 风险 沉着

——本刊第二卷报告书

我们以愉快的心情宣布：本刊第二卷业已出齐。本社社例，每卷出完后，休息两周，以为同人整理之需。第三卷第一期定八月三十日出版。

这半年是一段风暴的日子。无论经济环境或者政治环境，都使我们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只是我们虽在精疲力竭，然而心情却极安静。我们认为只有以单纯始能应付复杂，以沉着始得克服困难。我们能够撑过这段日子，应归功于作者的支持，读者的爱护，和本社同人的合作。

开 支

我们仍旧先从业务方面说起。这半年使我们最透不过气的，就是各种开支的激增，纸成为目前本刊最大的一笔支出，在每期成本中占到有分之四十左右。在第一卷结束时，纸价尚未超过五万元一令，但到第二卷第一期付出时，纸价狂涨到每令十五万元左右，在短短的半个月内，纸价的上涨竟达三倍以上。二卷一期以后，纸价继续上涨，自十五万到二十万、二十五万、三十万，目前则在三十二万元左右，较之

第一卷结束时，纸价上涨八倍。本刊是一个纯粹民营的刊物，既无政治集团在后指使，亦无经济集团在后支持，平时用纸都是向市上纸商零购的，因之纸价激涨，对于本刊实为一种难于忍受的打击。

排印工及装订工一再涨价，上涨的比率也不在纸价之下，其统计如下：

种 类	二卷一期起	二卷十期起	二卷十五期起
五号字排工 (千字)	一万八千元	二万四千元	四万三千元
六号字排工 (千字)	二万一千元	二万八千元	五万元
印工(每令)	三万二千元	四万三千元	八万元
封面印工 (千页)	一万一千元	一万五千元	二万七千元
订工(每册)	二卷一期起	四十九元三角	
	二卷六期起	五十九元	
	二卷十期起	七十八元五角	
	二卷十三期起	八十八元五角	
	二卷十七期起	一百十五元	
	二卷二十二起	一百卅一元六角	

本刊每期出版，便在上海大公报封面地位刊载广告一次。二卷一期出版时，大公报的广告费每行仅二万六千元，现在则涨到每行七万元。本刊稿费二卷一期时千字一万至一万二千元，现在提高到千字三万至四万元。本社同人的薪金，现在较之二卷一期出版时，亦提高至百分之二百以上。检查上

列数字，本刊各种开支，二卷结束时较之二卷开始时，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以上。而本刊的售价，二卷一期时为一千五百元，现在为三千元，仅增一倍。在第一卷中，我们还经常保持两页地位的广告，藉以增加本社的收入。自第二卷起，因为要增加文字的容纳量，广告所占的篇幅，已自二页减为一页，甚至连一页也没有，所以本刊目前广告收入，已降至微不足道的地步。

销 路

然而我们能够有这样困难的情形下支持下去，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销路的增加。我在第一卷报告书中曾经提到，当我们创刊号试印五千份时，即使是我们最关切的朋友，甚至亦怀疑本刊是否能够销行到三千份。当我们后来印到一万份时，在出版界中有经验的朋友们，一致承认我们单在这方面，已经是一种成功。因为照一般估计，像我们这样一种刊物，销行到一万份几已达到了它“可能的发行数”。我们然希望一路向上加，但也不敢存太大的希望。因为我们深切了解当前的环境太艰难，许多条件都是不利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刊物的发展的。从政治环境说，本刊是一个政论的刊物，许多意外的阻碍自在意料之中。就教育程度说，本刊是一种高级刊物，自不能像软性刊物之那样易于吸引读者。就经济情形说，现在一般读者的购买力非常薄弱，特别是公教人员和学生，而本刊的读者，公教人员和学生占很大的比率。再从业务环境说，交通如此困难。邮资一再加价，都是影响刊物的发行。只是种种不利的情形难如上述，而实际上，第二卷本刊的发行数，

始终在很稳健的增加状态之中。本刊第一卷最高印到一万份，其后降到七千份，其中原因曾详第一卷报告书（一卷二十四期）。所以二卷一期出版时，我们很谨慎地只印八千份（其后再版一千份）。因为第一卷时期，各地同业拖欠的货款太多，所以自第二卷起，采用“现批”政策，不先汇款来的，即不发刊。又因为第一卷时期，印数与实销数常常脱节，故自第二卷起，严密管理，印数多少，纯视实际需要，决不多印，以减浪费。就在这样发行紧缩印刷紧缩中，本刊的发行额仍然逐步上升。到二卷十一期，已从八千份升至一万一千五百份。二卷十三期因有评论学潮的文字，我们放胆增印至一万二千五百份，二卷十四期印至一万四千份。实际上，我们虽然增印至一万四千份，但仍不敷市场上的需要。别处不详，单在上海二卷十三、十四两期，都是在出版后两天之内全市抢购一空的。二卷十四期后，发行数继续增加。至二卷二十期，增印至一万六千份。二卷二十一期发行时，一万六千份已不敷分配，但因邮资加价及售价加价的原因，我们采取保守态度，暂不增印，以观外埠各地发行的反应。迄至本期，复增印至一万七千份。

实际上，在发行方面，由于种种限制，我们并没有能够达到最大限度。第一、我们为稳扎稳打起见，采取“现批”政策，凡不先汇款来的，我们一律不批。或者汇款已完而未续汇的，我们即停止寄刊。此种办法，虽然稳，但亦势必因此放弃了一部分市场，第二、我们规定货是不能退的，因之各地同业实际可以销一百册者，也只头批七十册八十册，这个情形也大大减低了我们可能的发行数。第三，有少数地方的同业，高抬本刊售价。据我们所知，当本刊售五百元时，贵

阳昆明一带已售一千五百元，本刊售一千元时，贵阳售八千元一册。此种情形，对于当地的读者固为极大的剥削，对于本刊的销路，也有不良影响。第四、在若干地方，本刊遭受不合理的压迫，如长沙、衡阳、芷江、济南、太原、三原、建瓯、沈阳等地，本刊均被禁售；对于本刊当然也是一种打击。

（四）在发行上，本刊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分布普遍，关于这一点，今日国内恐怕没有一个刊物甚至一个报纸，可以和本刊比拟，平津出版的刊物大都局促于华北东北一隅，上海一般刊物的发行，亦多以京沪东南一带为主要市场。我们很难相信兰州、成都、贵阳、昆明的读者能看到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大公报有上海、天津、重庆三版，三版若合为一体，其分布之广，便约与本刊相似，但若三版各自分开，我们便难相信台湾的读者能看到重庆大公报，昆明的读者能要看到天津大公报，西安的读者能看到上海大公报，本刊虽在上海发行，但其分布并不限于东南一隅；以京沪杭为中心的东南一带，在本刊的发行额中，仅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都是分布在华北、华中、华南、及西南西北各地的。这是本刊在中国出版界中最特殊的一个情形。

定 户

直接定户是一个刊物最基本的读者，也是最忠实的读者。每一个刊物都希望获得更多的直接定户，在巩固刊物发行的基础。当本刊第一卷结束时，我们曾经进行过一次征求定户的工作。我们的办法是，在平时不零零碎碎的征求定户，到

每卷结束时，才征求一次。我们所以如此，一则本社同人平时很忙，已抽不出时间向此方面努力；二则零零碎碎的征求定户，看不出征求的成绩，集中一次做，容易看出征求的结果；三则旧的一卷业已结束，新的一卷即将开始，在心理上这个时期最适合征求定户。上次我们征求定户，大体上向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我们想经过本刊撰稿人的帮助，在各学校征求一批学生新定户，二是我们吁求本刊原有的直接定户，就他们的同学、同事、朋友、亲戚之中，替我们介绍几个新定户。我们最初对于前一方向怀有很大的期望，因为本刊撰稿人遍布国内各大学，他们对于本刊大都关切，假如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们以为可以征求到一批新的学生定户。不料事实与理想相反，这一方向征求的结果，几乎可以说是全面的惨败。无论在那一个大学，我们都没有能够得到任何收获。这事实使我们第一次开始了解：今日一般学生是生活在何等贫穷之中。各方面的来信都说学生没有钱定阅刊物。那时我们定阅还只先收二万元。二万元在当时充其量只合到战前的一块钱。我们很难相信，在战前，大学的学生竟会拿不出一块钱。然而现在，大学生拿不出二万元却是一个普遍的事实。这事实也深深影响了我，使我在五月学潮中对于学生抱持同情。这次我到北方来，我和学生接触的结果，使我相信，要他们拿出几万元来订一份刊物，已近乎一种奢望。可是第二方向，即吁求本刊原有的定户给我们介绍新定户，却又出乎意外地获得可观的成就。竟有不少读者，那样热情地无条件的支持我们，替我们分头介绍。他们真是尽心尽力，竭诚竭忠。有不少位读者附来长信，慷慨陈辞。他们认为，在平时，是我们在服务，他们在享受，而他们欣慰他们亦终于获得一个机

会，让他们也能对“观察”尽一点力量。他们认为，假如一个人永远只是享受他人的努力，坐视他人的努力，那是一种不可恕的自私，因之他们非常高兴他们也有机会略尽一点义务。这些信件，使我们极度感动，并且获得更大的力量。我们深切感到：在这种混沌的，常常令人悲观的中国社会里，仍有着公道的存在。我们并且认识：这一种无私的同情与援助，就是我们社会的一种进步！

（略：刊物定户情况）

现在第二卷业已结束。我们援例在此向全国各地广泛征求新的定户。我们仍旧愿请本刊原有的定户，能替我们介绍几个新定户，我们并欢迎原有零购读者直接定阅，变成我们的定户读者。读者先生：我们在期待着你们的支持和合作。

编 辑

关于编辑部分。第一卷结束时，我们打算自第二卷起，增加篇幅至三十二页。在我们的编辑计划上，自第二卷起，我们打算增开“读者投书”，“观察文摘”，和“观察漫画”三栏，并扩充文艺的篇幅。在此种计划下，原有的二十四页自然不敷分配。但就在第一卷出完，休息的两个星期中，金潮泛滥，百物齐涨，其中纸价的上涨最可骇人。在这种情形下，扩充篇幅的计划只得收起。但原定增辟的投书、文摘、漫画三栏，则决计使之实现，文艺篇幅无法扩充，而刊载学术理论文章的“特稿连载”一栏，不得不暂时取消。“尾页”也随之取消。并腾出一页广告地位以容纳读者投书。照目前情势看，恐怕我们将在一段很长的时期里，无法考虑任何涉及增加篇幅的

计划。

一般说来，第二卷的言论态度较第一卷为积极。“专论”部分，学理的文章减少，触及现实的文字的增加。我们极愿保持这个趋向。“观察通信”亦较第一卷时期为能配合时事。“读者投书”。据各方面报告，甚受欢迎，甚至本刊所刊的读者投书，并已成为其他刊物发表的论文中所引用的材料。本刊所刊“读者投书”所以广受欢迎，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短，二则因为大体上每封投书尚能言之有物。不过我们总觉记者投书还是冗长的多，所发表的投书，大都要经过删节修饰的功夫。我们希望以后记者投书，书量简短，即使仅有一句，亦无不可。“观察文摘”未能做得理想，总因人力有限，篇幅有限，所以选摘的范围太狭，也无法每期都有。

稿子经常不宽裕是一件事，稿子选择的水准又是一件事；这两件事应该分开。照我们大约统计，全部来稿中，刊载的约占百分之四十，退还的约占百分之六十。我们自信我们用稿在大体上还能保持客观的标准，避免偏私。稿件用还与是否是“撰稿人”或是否是“教授”并无必然关系，“撰稿人”中的稿件也有许多退还的，外来的投稿，只要重量够，我们极愿采用，并给以应有的地位。比如二卷十期所刊钟伯平先生的“学潮平息以后的认识”，就是投稿；这篇文章应当刊第一篇，我们就给它排第一篇。我们十分欢迎全国作者读者惠稿。共同来充实本刊的内容。

本刊是一个政论刊物。刊物本身的性质注定了它是无法逃避现实的。因此环境越艰难，本刊所可能遭遇的风险也越大。在五月学潮的一段动荡环境中，我们几乎每一期都是处身于死亡的边缘上的。我们当然欣幸我们终于平安无事，但

是来日大难，真正的困难恐怕还在后面。我们说过，我们愿以单纯应付复杂。我们将继续本着我们的良知，发为言论。我们相信我们一切发言的动机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国家的前途。我们愿意在此吁求政府当局，尽量放宽宽容的尺度，容许国内继续有无私的公正的言论。

本刊自第二卷起增加漫画一页，由孙方成先生执笔。读者对于刊漫画的批评，我们还不甚清楚。相熟的朋友如钱钟书萧乾等先生都曾表示称赞。然而孙方成先生和本刊的合作，却近乎传奇。我们在第一卷中，曾经采用周东郊先生的投稿，并为之出了一个“新疆变乱记略”专辑。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用稿及对人都能尽力做到无所偏私。第二卷中类似的情形就是孙方成先生的漫画。在第一卷快结束时，我们收到孙先生投来的两帧画并不好，但其中略略有一点点“味道”。我就约他来谈，并请他将他过去所爱的画稿全部带来。他的通信处是由一个朋友转的。他并没有照约定的时间来，但终于在过了几天以后来了。他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化学，毕业后曾在黄海化工研究所任实验工作五年。可是他忽而希望在漫画方面寻觅他的前途。他带了一点仅有的旅费便到上海来了。他说他在上海人生地疏，到上海后第一个给他同情的是西风社的黄嘉音先生。我检查他的画稿，大部分都是我不喜欢的。但是我发现有两帧，造意和技巧都已够得上英美报纸上的漫画的标准。我考虑了一下，我便答应给他一页地位。我只说了一句话：“我希望你能了解，象观察这样一个刊物，给你一页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很感动。他默默地说：“我了解这点”。最后他走时，我劝他，我希望他专心替“观察”画，不要再向别处投稿，因为“一个人的意思只有这未

一点。一个人的精力应当集中，集中便有成就”。本刊所载的漫画不完全是成熟的。然而我知道孙先生已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并尽量做得最好。我当初决定给他一页地位，仅仅是因为我在他的画里发见一种“希望”。我们在生命中奋斗了多少年，可是我们很少遇见有力量帮助我们的人，给我们热情，给我们鼓励。在这个社会上，不知有多少青年，仅仅因为无法得到一个机会让他一试，就此埋葬了他的天才！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一个坟墓，充满了冷酷，充满了阴沉，它只毁灭人，它不创造人！我是在这种情绪下毅然给这个漫画家一页地位，让他一试。而我所以在这篇报告书中化费这么多字记述这段经过，亦仅仅因为我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凡有力量帮助他人的人们，能够对一切有希望的青年及其事业，给他们鼓励，给他们支持；至少给他们一试的机会。

本刊立场编制，大体上业已定型，我们在此已无新的事情需要报告。原定自第三卷起增开的“观察一周”，经同人考虑后，决计展缓实现。但自第三卷起，将增设“书评”一栏，业已经约好几位先生分别担任。

事 务

一、一年以来，本刊各期幸能按期出版。无论是过新历年或旧历年，中秋节或端午节，印刷所及装订所尽管放假停工，我们总在事前作适当的布置，以免脱期。去年过旧历年时，印刷所放假至五日之久，但本刊亦未脱期。一切能在事前知道的问题，我们都设法解决；最困难的是临时突发的问题，有时使本社同人手脚无措。譬如自六月中旬至七月中旬，

上海的印刷业及装订业，经常在罢工状态之中。有时正巧我们要上印了，印刷所罢工了，或者正巧要送装订所了，装订所罢工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本社同人只要有法可想，总是多方设法，以求按期出版。装订所送刊，经常分为三批，即星期四晚上送一批，星期五下午送一批。有时星期四晚上的一批送了来，我们照例是先将直接定户的刊物连夜封好，有时再将一部分外埠同业批销的包好。可是星期五突然接到通知，说装订所罢工了。以致定户的刊物虽然全数发出，而同业批销的刊物却大部分不能发出。最不巧的，同一地点的同业，有一部分凑巧在星期四晚上打了包，其他一部分原定在星期五上午打包的，临时因装订所罢工，无法寄出，以致该地同业，一部分早收到，一部分迟收到，以致引起误会。这种情形虽属意外，确是遗憾。我们希望各地同业赐予体谅，我们并将努力避免再发生同样的情形。我们愿意向读者及各地同业诚然表示，在一切可能的环境下，我们必定竭尽我们的能力，总期各地读者及同业都能按期收到。

二、关于售价，本刊大体上要比其他刊物定得低些，并涨价涨得慢些。譬如别家售二千元时，本刊仍售一千五百元；别家售二千五百元或三千元时，本刊才增售至二千元；现在有许多刊物已售四千元，本刊只售三千元。（本期篇幅增加，改售四千元）。即使有几家刊物目前售价仍与本刊相等，但因本刊广告篇幅少，六号字用得更多，本刊容纳的文字数量至少要比别的刊物多五分之一，我们亦仍然可说本刊的售价较他家为低。其实就开支说，本刊开支要比其他刊物略重，但因销路较大，所以售价虽低，亦能维持。我们认为办刊物不是做买卖。我们一方面要顾到本社的收支平衡，一方面也愿意

顾到读者的负担。

三、关于稿费，在过去一年中，我们已调整过七次，自去年今日的千字四千元，提高到目前的千字四万元；增加十倍，约等于一年来一般物价的上涨比率。我们所以经常提高稿费，一方面希望藉此使各方面获有一种印象，即我们确是当一件事业在办，另一方面也表示我们时常顾到作者的利益。我个人的办事性格是干脆明白。我平时最讨厌“稿酬从优”四字，因为“从优”两字并无明白的标准。稿子到了你手里，你爱给多少就多少，这不是一种公道。所以我们的稿费虽然菲薄，但是向例公开宣布，而不半吞半吐不着边际的说“稿酬从优”。不过我们虽然经常在提高稿费，无奈物价跑得太快。自第三卷起，我们再将稿费提高到千字五万至六万元，以后当视实际情形随时调整。

四、定户来信，仍然是我们事务上的一重负担。我们当努力在最快的效率下一一答复。我们要求读者来信时，姓名及地址的字迹务必不要过份潦草，我们有时收到读者的来信，因为字迹过份潦草，竟致无法复信。有的读者甚至连地址也不附。有时读者在信封上是一个名字，信纸上又是一个名字，我们复信时不知究竟应写那一个名字。（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只好把两个名字都写上。）又，我们希望各地读者汇款订阅的，最好不要在各省的省立银行汇款，因为省立银行汇款时，他们常常不将读者的附言一并送来，以致仅管收到了款子，还是无法寄刊。有的省立银行甚至仅仅通知本社有款到，何人所汇，甚至款数多少，也不通知，要本社自己去认，符合的就付款，不符的就不付款。但订阅的读者又不一定另外来信，以致我们根本无法取款。目下本社尚存有这种汇款通知单好

几笔，都搁在抽屉里。至于来函续订或更改地址而不附定单号码的仍旧很多，要使我们在七千几百号人中去找出一个名字，确是一件难事，我们为补救这个缺陷起见，决定开始编制全部定户索引卡片。但是我们仍旧要求读者来函时，尽可能的体谅我们，将各种必要的事项都注明出来。

益
四
村

一 年

菲 我们原定以一年为试办时期，现在一年匆匆过去，我们原就一年来的经过，综合说明几点感想如下：

第一，本刊创刊之初，各方面纷作推测，或疑本刊与张三有关，或疑本刊与李四有关。今日中国一般社会，似乎一致假定：办一个刊物一定有背景，一定有什么人在出钱。这是一种成见。我们相信一年来本刊所发表的文字，足以证明本刊不仅是一个“无党”的刊物，并且也是一个“无派”的刊物。本刊确确实实是一个独立而无任何党派关系的民营刊物。在经济上，本刊的发行数足以证明本刊可以自给，无须仰求“外援”，因此我们认为，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并给一切怀有成见的人们以新的认识：即办刊物不一定要靠津贴，刊物本身是可以依赖发行收入自给的。

第二，目前一般社会虽然充满着混乱，到处是不合理现象，种种事迹令人悲观消沉，但是我们感觉：假如我们真能正正经经，认认真真，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我们仍旧可以获得若干成就。无论在那一方面，我们都可以以自己的意志、信念和力量，去开垦我们的前途。我们希望一般年轻的朋友

不要消极。我们一面争取更大的目标，一面在自身范围内切实奋斗。政治的改革是一个方面，社会的充实又是一个方面，两者是并行的。互为辅助的。我们希望各方面的有志之士，大家鼓舞起来，沉住气，在本身的岗位上努力，以充实我们国家的生命。

第三，一年来的经过使我深切认识一点：假如一个人他本身是持正的，他在无形中可以抗拒许多邪道的侵袭。我们过去常常听到许多传说，说什么人被“收买”了，或者给他官做，或者给了他钱。我们愿意在此向读者报告，一年以来，政府方面从来没有任何人，无论直接或间接，明示或暗示，向我们有过任何接洽。我们唯一希望的，就是绝对维持本刊的超党派性和纯粹民营性。我们并愿在此附带报告，至少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对本刊施用过任何压力或干涉。

本刊草草，已出一年。在这一年中，本刊的立场、态度、编制、风格、以及做人做事的一般原则，大体上已树立一个规模，我们愿意遵循这个传统及方向继续努力，为中国的前途奋斗！

（原刊“观察”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面
大
面
出
刊
合
来

四、风浪 熬炼 撑住

——“观察”第三卷报告书

经过这紧张的、困顿的、并且富于戏剧性的半年，我们欣幸我们终得向读者宣布：“观察”第三卷业已出齐。本社社例，每卷出完后，休刊两周，以为同人整理之需。本刊第四卷第一期定二月二十八日出版。

这半年真是一段熬炼人们灵魂的日子，既需要勇气，又需要忍耐。一面是政治性的危机，一面是经济性的压迫——后者尤较前者使我们疲惫吃力。但是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风险，经费如何艰难，我们的一贯方针是：撑住舵、沉住气、向前撑。我们相信，这还仅仅是遭遇困难的一个开始，更大的困难也许还在后面。

开 支

我们仍旧先从业务方面说起。整个的局势愈来愈摇摆动荡，反应在经济生活方面的，也必然是大家愈来愈困难。法币愈来愈不值钱，物价也就愈来愈跳得快。就本刊说，创刊号每份售五百元，一卷二十四期售一千元，在第一卷的半年之中售价只涨了一倍。二卷一期售一千五百元，二卷二十四

期售三千元，在第二卷的半年之中，售价亦仅上涨一倍。三卷一期售三千元，三卷二十四期售一万元，在这一卷的半年之中，售价却涨了三倍多（如将发行数的增加和篇幅的减少两点一并算入，这半年间售价的上涨，并不止三倍多），这也可以反映最近半年来各种物价及工价激增的程度。在这一卷中，我们最感重压的就是“纸”的负担。我们曾在三卷九期和十九期上两次专文陈述此事，纸的问题确已成为目前国内文化界出版界最严重的问题。在三卷一期时，纸价约为三十万左右一令，其后四十万、五十万、七十万、八十万、九十万、一百万、一百二十、一百五十、一百八十、二百、最高曾一度冲到二百三十万一令，在六个月内大约上涨百分之七百倍。现在本刊每期纸的成本，占到每期总成本的百分之五十五以上。这半年来，我们几乎天天在为着纸的问题焦虑紧张。

排印工及装订工也一再涨价，兹将三卷一期和三卷二十四期各种价目比较如下：

种 类	三卷一期	三卷二十四期
五号字排工（千字）	43000 元	132000 元（日内又将加价）
六号字排工（千字）	50000 元	153000 元
印工（每令）	80000 元	260000 元
封面印工（千页）	27000 元	90000 元
纸型（每页）	32000 元	100000 元
订工（每份）	131 元 6 角	307 元

根据上表，排印工及订工的上涨，在这半年中，约为百分之三百多倍。稿费三卷一期时为千字五万至六万元，现在提高为千字十五万至二十万元，亦约提高百分之三百左右。本社员工的薪金开支，在这半年中，增加的比例很大，在1947年9月份（三卷一期时），每月员工薪金总额仅七百余万元，现在（1948年1月份）已达五千万元，一方面薪金本身调整了，一方面由于业务上的需要，职员的人数也有增加，因此每个月的薪金开支，也成为本社目前一项不轻的负担。其他一切杂项的开支，都随着增加。全部开支合拢来算，在这半年中，增加的比率当在百分之五百左右。但售价的增加则仅为百分之三百三十。因此第三卷的发行数，比较第二卷的发行数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所以收支两方还勉可获得平衡。

销 路

本刊的发行数，第一卷约为八千份，第二卷一万六千份，第三卷二万五千份，增加的比例约为“一、二、三、”之比例。本刊销路如此激增，我们自愧并无任何足堪重视的贡献；一切应归功于作者的支持和读者的爱护；同时也可以说，这充分反映今日国内对于这样一个真正没有背景的言论刊物的需要。

本刊第二卷临末各期发行一万六千份，（二卷二十四期发行一万七千份）。自第三卷起，另在北平出版“华北航空版”，委托北平新实书店代理发行，每期发行三千份。华北航空版发行后，在平、津、华北、东北一带，上海本社即停止寄发，

但三卷一期，上海仍印一万六千份，沪平两地合为一万九千份；“华北航空版”的发行，使本刊自第三卷第一期起，发行数即从二卷二十四期的一万七千份跳到一万九千份。华北航空版在这半年之中，根据北平代理发行人新实书店的报告，迄为三千份，未能有何增加。这可能因为东北及华北各地的战火，使刊物的销路愈来愈狭，因之难望推广。上海方面的发行数则自三卷一期到三卷十一期，迄在上涨的趋势中，三卷十一期以后，发行数即停滞不前，逗留在二万四五千份左右。战火的蔓延，交通的阻隔，以及售价及邮资的增加，都足以影响刊物的销行。兹将第一卷第二卷各期再版数及第三卷发行数报告如下：（略）

本刊第三卷的发行情形，前半期是上升的，后半期是稳定的。但是本刊第四卷的发行数是否能够再向上增加，或者是否能够保持已有的数目，我们不作任何乐观的预期。主要的原因是战争使大家越来越穷，而普遍的贫穷使买得起书刊的人越来越少。一方面书刊本身的售价，由于成本的增加，势不能不一再调整，另一方面邮资的加价使书刊在发行上遭受极大的不利——后者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尤较前者为甚。售价的增加，在京沪东南一带比较说来还不发生任何太大的影响。即以本刊目前售价一万元一份来说，现在这一万元在一般都市人民的生活中已无任何重量。在上海，看一场电影连票钱就要花到五六万或七八万，吃一碗最起码的肉丝面连小账就要花到两万元，坐一次公共汽车也要一万元，三轮车夫或黄包车夫对于一万元的生意简直已经不感“兴趣”；说到后来还是刊物最便宜，化一万元买一份“观察”可以消磨一个宁静的周末。但是在远地，情形就不同。远地寄刊，势须航寄。定

户航寄，航平每份就要四千多元，航挂每份要七千多元。同业批购，用航挂寄达，每份的邮资平均均合三千元左右。这一笔邮资的负担可观，而这笔负担最后当然仍落在读者头上。远地同业还要加上他们的利润，这样一来，本刊在后方各城市的零购价格，亦就可观。后方的生活程度本较京沪一带为低，现在却要他们付出较京沪一带读者所付出的更高的代价购卖书刊，这个情形所发生的困难，可以想见。本刊在发行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真正的全国性，发行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散布在大后方各大小城市乡镇之间以及远边地区，因之邮资的加价对于本刊业务上所生的影响，大于仅仅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发行中心的其他刊物。因之我们一方面希望后方的读者尽可能的向本社直接定阅，同时我们也吁请全国各地同业，能和我们合作，尽各种方法以减低批购的成本，从而减低门售的价格。我们希望各地同业尽可能的用“航空图书小包”寄递而不用“航挂寄递”，因为“航空图书小包”的邮资只合到“航挂”邮资的三分之一。用“航空图书小包”寄，不一定比“航挂”慢。假如当地同业共同约好，都用“航空图书小包”，则大家仍都同时收到，亦不致增加业务上的竞争困难。此外各地同业在规定本地的门售价格时，我们亦希望他们尽量采取薄利多销主义。过去有些地方的同业利润定得太高，比如在贵阳昆明，本刊售五百元时，他们已售一千五百元或二千元；这样的情形，对于读者、经售书店、及出版者三方面都是不利的。我们又希望各地同业对于本刊的门售价格有一个标准，不要把“观察”像一般商品似的有早晚市面不同的价格。譬如在台湾，就有这种现象。当我们售六千元一份时，最先到的一批“观察”，在市面有时喊到台币一百

五十元一份（合国币一万四千元左右），过了几天，售价从一百五十元减为一百二十元，一百元，或八十元。这种情形也非我们所愿闻。其实当本刊售六千元时，在台湾售八十元台币，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平时一贯地方针是想尽可能的减轻读者的负担，我们要求各地同业在精神上能和我们配合合作。

自从“华北航空版”出版后，华西及华南的读者来函希望我们出华西航空版及华南航空版，以期减低内地读者的负担。在原则上，这不仅是我们愿意的，也是我所希望的。但是出航空版有许多条件，不若想像中那样简单。本社目前还没有发展到可以直接派人到各地去自己发行航空版的程度，航空版的发行势非委托当地书业代理不可。但我们还没有得到合适的代理对象，代理对象最主要的条件是负责任，守信用，按期和我们结账。假如我们不能按期收回账款，而在各地出售航空版，这不啻是一种“自杀”。我们当然愿意随时留意并尽可能接洽此事，但至少目前还无任何好的消息可以宣布。不仅没有好的消息，我们反而要向华北读者宣布：我们的华北航空版也终于只能出到三卷二十四期，自第四卷起，不拟继续发行了。最主要的原因是代理发行本刊华北航空版的北平新实书店未能履行契约，按期和我们清账，拖欠的数目在全部应付的账目中所占的比例太大，而且势必越欠越多。新实书店也有新实书店的困难：战火的蔓延使他们无法推广销路，收款的困难使他们周转不易，北方纸价的昂贵也加重他们的负担；我们对于他们的困难是同情的，了解的。但就新实书店和我们的“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讲，这样越欠越多的情形，也不是长久的办法，所以我们考虑结果，只得将华

北航空版暂停发行；将来如有可能，再设法恢复。

定 户

关于定阅部分，等三卷中最大的改动是将“按期计账法”改为“硬性规定法”。以前是预收若干订费，一期一期的扣除，款尽通知续定。但定户对于这个办法，感觉不便，一致要求硬性规定：三个月多少钱，六个月多少钱。因为照以前的办法，定户都不容易知道自己的订费什么时候完，以致续定时常常中途脱节。况且硬性规定以后，刊物假如加价，读者即可不受加价的影响，多少可以得到一点保障。我们认为读者的要求非常合理，所以自三卷五期起，即改用硬性规定的办法。

关于征求定户的工作我们实在没有尽力去做，没有主动地去争取。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人手太少，没有专人负责设计推广的责任。我们仅仅在每一卷完了以后，向本刊的读者呼吁一次，希望读者帮我们介绍几个新定户。过去两次呼吁的结果，成绩很好。由于最近物价的波动，我们现在感觉有增加定户的迫切需要。本外埠同业和我们来往的虽然很多，但总不免有拖欠货款或延期付款的情形发生。譬如有些同业，特别是本埠的同业，总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算一次账，而结账时还要给我们“期票”。以目前物价的波动，上一个月的法币价值和下一个月的法币价值，相距极大。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非常吃苦：有时在账面上不赔，而在法币的实值上，等于赔了。这样做下去，我们的资金势必愈来愈小，而终有一天不易维持；事实上，我们现在也越来越感到周转的困难。因

此在本刊一方面，只有设法增加直接定户，才足以保障我们的财务基础。至于在读者方面，无论从那一个角度来说，定阅总比零购为便宜。既可避免按期零购之烦，又可避免中间书店所增加的一层负担。譬如以台湾来说，以零购八期的代价，至少可以订阅十二期，定阅明明比零购为合算，为什么不直接向本社定阅呢？汇款即使麻烦，每半年或三个月也只麻烦一次。我们对于直接定户的刊物，向例提前付邮，比较当地书店早日到达。特大号对于定户并不加价，售价涨了定户也不受影响。本社自三月底起，又将出版丛书，所有本刊定户，一律可享八折优待。我们在此特别向广大的读者呼吁，未直接定阅的希望赶快向本社直接定阅，已经定阅的，希望再帮我们介绍几个新的定户。本刊的定价，大体上总比别的刊物便宜，就是涨价也比别家涨得慢，这就因为本刊销得多，成本合得轻。所以一个刊物的销路大，刊物与读者两方面都是有利的。帮助本刊增加销路，也就是间接减低自身的负担。一件社会事件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携手合作，大家合作于大家都有利，希望所有关切爱护本刊的朋友们，给我们帮助，自动的、出于本心的、尽可能的替我们多介绍几个新定户。

最近我们常常收到读者来信，建议我们接受读者捐款，以增加我们的经济力量。我们对于这些热心的读者先生，心中不胜感激。但是我们总不敢接受这个建议。一方面，事实上我们倒底还没有到非向读者呼吁捐款的地步，一方面我们平时一贯的做人原则是要求公道。“公道”之一，就是权利与义务必须平衡。无条件的捐助我们，固然是出乎一片热心，但在我们，则不免受之有愧。我们凭什么白白地收读者先生们的捐款呢？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不公道，违背我们的良心。我

们现在想起：一切愿意捐款帮助我们的朋友，与其用捐款的方式帮助我们，不如用介绍定户或赠送朋友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你们可以订阅几份，分送给你们的朋友亲戚，一方面我们增加了收入，增加了定户数量，一方面你们的朋友又可因你们的赠送而读到本刊，同时也就扩大了本刊言论的影响。中国还没有赠送刊物给朋友的风气，而这风气在欧美早已十分盛行，并可作为过年、过节、或庆贺生日喜庆的馈赠礼品。现在正是阴历年关，订阅本刊赠送朋友最合时宜。一切愿意支助我们的读者先生，请考虑我们的建议。我们需要更多的定户！我们需要更多的定户！

编辑检讨

关于编辑部分，在内容上，大体说来，第三卷要较第一二两卷充实。假如拿第三卷和第一卷一比，印象就极明显：第一卷显得疏落，缺乏劲儿，第三卷似乎紧凑得多，味儿浓一点。虽然自三卷十期起，我们因故不得不将篇幅自二十四页减为二十页，但自三卷一期起，我们即已一方面扩大版面，增加每页容纳的字数，特别是尽可能的多排六号字，另一方面我们除了封面一页以外，自第二页至第二十页，每一页都已充分利用，整整的十九页都是文章，没有一点浪费的地方。所以，平均讲来，本刊所容纳的文字数量，要比其他页数相同的刊物所容纳的文字数量多出百分之十至三十。我们每期平均总刊载十篇左右文章，有时候登到十三篇之多（读者投书不在内）。这种充分利用每一寸篇幅的结果，至少在数量上可以帮助刊物充实其内容。

专论部分是我们最感困难的一栏。说起来，每期三篇，一个月也只有十二篇，但是每期在编辑时，常感捉襟见肘之苦。稿件的不宽裕，一方面使编者不能就各篇的性质加以配搭，一方面多少影响专论栏的重量。我们自问还没有随便发稿填凑篇幅的行为。但是专论栏的不够结实，却是我们自己深深感觉到的。编刊物的工作，本来是一件“看人挑担不吃力”的工作，事实上，要期期精彩，篇篇精彩，也确是一件难事。但读者可以如此原谅我们，我们一一不能如此解释。我们应当再加努力，来增加专论栏的分量。

关于“观察通信”这一部分，成绩比一二两卷为佳。在第三卷中，大体上，每期的“观察通信”都还站得住。其中有若干通信相当出色。一三两期中的三篇有关魏德迈的通信，都包含若干特殊材料，特别三卷一期的第一篇，有许多都是根据原始材料——直接从魏德迈嘴里得来的材料写的。三卷七期的“刘伯承南下记”，博得广泛的重视和赞赏，三卷二十一期上的两篇沈阳通信和二十二期上的成都通信，也可算得好通信。而第三卷“观察通信”当中最出色亦最受读者推崇的，当然要推本刊专论关于战局分析的文字。我们希望本刊第四卷在通信方面仍能保持第三卷的标准，除了我们自己继续努力外，还希望全国读者源源惠稿，大家来充实本刊内容。

国外通信第三卷还较第一二两卷为充实。在二十四期中一共登了十七篇国外通信，这个成绩不该算坏。除美、英、法三国本刊原有的通信网外，第三卷的通信网复伸展至印度的新德里和日本的东京。国外通信不若国内通信那样容易接洽，我们希望国外的朋友们继续帮忙。

外论选译这一卷只登了七篇，太少，希望自第四卷起，增加这方面的材料。根据第二卷“读者意见书”的统计，读者对于这一栏都有热烈的要求。我们现在已约定专人分担这一部分的工作。

书评是第三卷开始的，在二十四期中登了十六篇，也不算少了。

关于科学与文艺，第三卷比较第一二两卷有显著的减少。这也是我们根据第二卷“读者意见书”的统计而决定的。读者大都不欢迎本刊刊载科学文字。关于文艺，也有许多读者希望减少，主张由其他文艺刊物负这一部分的责任，认为“观察”应当多腾出篇幅来登政论的文章。因之我们在第三卷上，即很少刊载科学文字，文艺则不规定每一期都有。文艺在第三卷中，平均每隔一期有一篇。同时我们乘此向读者表示：我们的确相当接受读者的意见，并见之于事实。

关于投稿的情形，我们也愿在此附带报告。一个言论刊物本来应该是为全国作者读者所共有的，我们极其诚恳的希望本刊能成为全国作者读者共同发表意见的园地。我们自问在取稿上并无成见，只要文章好，有分量，我们都登。这一卷中，在投稿中录用的很多，尤其是观察通信。我们现在发表统计如下：

栏 别	第三卷所刊 文章篇数	投稿录 用篇数	百分比（约数）
专 论	72	17	百分之二十五
观察通信	80	39	百分之五十
其他各栏	85	37	百分之四十五
共 计	237	93	二百分之四十

读者投书一栏本来是供给一般读者发表意见的，但发表的意见应以与公共生活有关或与公共的意义者为限，纯然关于个人生活的诉苦，不在录取之列。提出的问题太限于地方性质的，我们也不一定能发表，因为投书很多，其间不得不有大小轻重之别。对于任何个人性质的批评为限，不应涉及法律性质的私人攻讦。最不能使我们同情的一种投书，就是不负责任的攻击任何机关或个人的投书，投书人既不署名，也无地址。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极其自私，极不公道。投书人如有必要，可以不署真名，但必须将真名及地址，让编者知道，投书人至少应对编者负责。这一点我们希望读者能够接受。

政治危机

在第二卷报告书中，我们曾宣布：“至少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对本刊施用过任何压力和干涉”。三十六年十一月初旬，我们第一次遭遇政治性的困难。毛病出在三卷九期编者所写的一篇“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上面。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对于这篇文章，引起极大反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行文上海市政府要求停止“观察”的发行。主管官署上海市社会局曾以公函召本刊发行人于十一月七日在社会局谈话，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秘书长于十月二十七日来访未遇，后来约期于十一月九日谈了一次。两次的谈话都没有什么严重。除此以外，则未有任何人（无论是否代表政府，代表国民党，或以朋友身份）和我们谈过有关“观察”的问题。正在社会局和市党部方面约我谈话的时候，听说中枢已有急电到沪，致吴国桢市长、方治主任委员、潘公展议长及

吴开先局长四人，不主张查封本刊。这个案子似乎应该可以过去了，但十一月十一日的晚上，编者个人的安全发生困难，不得不被迫暂时离开原来的寓所。

新闻界有许多朋友对于本刊极其关切，上海市党部要求查封本刊的消息最初是一位新闻界的朋友告诉我们的。南京的急电，不主张查封本刊的消息，也是另一位新闻界朋友告诉我们的。十一月七日，南京天津两地的报纸首先揭露本刊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其后上海、香港、重庆、成都、昆明等地报纸陆续记载此事。新闻报导引起各地前辈、朋友、以及读者的殷切关怀。由于各方前辈朋友发乎内心的支持所形成的道德力量，使事件至十一月下旬渐渐地缓和下来。

在这一个风浪时期，本社同人始终照常工作；编者虽然暂时离开寓所，但工作并未中断，因此本刊仍得照常按期出版。环境纵有波折，我们的心境始终宁静。在我们的心里底，我们有一种无可摇撼的信念：我们必须本着我们的良心，为祖国的前途努力奋斗。我们一切都为了国家，除了国家，我们另无其他。请看今日天下，芸芸众生，奔波终日，究为何事？争得脸红耳赤，打得头破血流，还不是为了几张钞票，为了若干权势。可是国家已经糟到这个地步，假如我们每个人还都在一己或一派的得失上打算盘、转念头、绞脑汁、我们的国家怎么得了？假如人人只知为私，国家的事情谁管？我们不敢妄自菲薄，随波逐流，我们有我们的理想，我们有我们的原则，我们也有我们的勇气，向前迈进，义无所辞。人与人的相交，经久知心；刊物与社会的相交，亦复如此。只要我们自问无他，我们亦不需颤颤地顾虑他人有无误会？仅仅站在一党一派的利益上来打击我们的，那只是一种过失；国

事糜烂，已至于此，我们还有何暇来计较这种过失！

我们今日所处的一个社会，是一个神经极度衰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充满着谣言、曲解、和没有根据的忧虑。各地既遍传本刊被封的消息，而又看到本刊仍售按期出版，于是以为其中必有“道理”。这情形可以香港读者梁子奇君投书中所引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主办的香港华商报所刊的消息为代表。香港华商报的记载云，

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曾于九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九期上刊载了储氏所作的一篇“评薄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痛骂美帝国的援华是要变中国为美国的附庸，顺便骂了南京政府。……南京当局在十月十日左右就下令封闭观察。此时储安平就以“失踪”闻，但是观察并未停刊，反出了一个“言论出版自由”的奇迹。奇迹的出现，是因为储安平“失踪”到陈立夫李惟果公馆里请罪悔过，表示改变言论态度的结果。CC们所以能允储安平悔过自新，是因为观察已拥有三万个读者，是全国第一流的杂志，CC们如不加利用，不是饭桶了吗？而储安平亦可利用已在读者中获得的“公正”态度，在观察上发表“偏私的不健康的”言论，以赎前愆。……”（按：本刊三卷九期的出版日为十月二十五日，不是九月二十五日。要求封闭本刊的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不是南京的中央党部。要求封闭本刊当在十一月初，不是十月十天左右。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纽约华侨日报也刊有与香港华商报同样的记载，文句一样，大概是同一来源。）

在通常情理之下，假如编者真的到过陈立夫李惟果公馆去“请罪悔过”，假如本刊真的出卖给什么人了，我们还居然刊载梁子奇君的投函并一字不改的转载香港华商报的记载，

那我们假如不是天下的大奸雄，亦必为天下的大傻瓜。可惜我们既然才不及奸雄，自问亦不致愚如傻瓜。编者和李惟果先生在最近一年中新识的，编者和陈立夫先生，至少到今日为止，无论在私人酬庆或公共集会上，还没有晤过一面，编者在那一个时期也没有去过南京。我们的一贯态度是我尽我心，不求人谅。打击来了，以宁静坚定应变，不以张皇失态应变。当十一月十一日夜晚十一点多钟，我因为无处可住，要到某处寻觅一宿，踽踽独行，经过外滩江边，想到这地方白日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何等热闹、而这里江水泊泊，大地如死，整个的人世被托在一片月色中，构成一幅凄凉的人生画图时，我心中亦仍宁静雍容，既不悲伤，亦无忧虑。意外的风浪竟然使我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假期，利用难得的闲暇，整理学校的讲稿，写信和朋友叙旧，并获得机会在太阳中作时间较长的沐浴。好汉做事、来去光明，用不着鬼鬼祟祟，而我们对于一切误会、传说、曲解，也不急急于辩讲、辟谣、或解释。只要我们自己脚跟站定，我们相信，“时间”终将替我们洗刷一切谣言。

万物幸能继续存在，但许多人又说我们的态度已经“转变”了，这也是目前这个神经衰弱的社会中极易发生的心理状态。在这个社会中，只要你批评国民党一句，大家便说你“左倾，”了，要是你批评苏联或者共产党一句，大家便说你“右倾”了。整个的社会已陷入一种严重的神经错乱程度。譬如本刊第二卷第二十一期登了读者杨光时君等十位投来的一篇文章后，许多人便传说“观察”右倾了。这次查封之说既成过去，便有人以为“观察”转变了！我们对于这一切传说，素不作任何辩护，我们认为最好的解释与辩护就是每期“观

察”的内容。举一例言之，当我们业已知道本刊已发生政治危机时，我们对于北平周炳琳等四十八位教授寄来的关于民盟事件的宣言及董时进先生投来的对于民盟事件的评论，毫不犹豫的照常发稿，在心中绝无任何有关利害得失的考虑。编者的根本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遇到大问题时，我们是无法躲避，无法退让的。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肯为言论而牺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们只能说些含糊糊没有斤量的话，那老实说，今日中国言论界，担当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经很多，用不着我们再来献身言论，从事于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论工作。我们的编辑方针素来是主动的，我们的目的乃在改变环境，而非欲环境所改变。尽管本刊已遭遇政治危机，但我们既不因此事而增加我们在事情上对政府的不满，也不因此事减少我们在理知上对政府的批评。假如有人想扇我们，我们不会被扇得冲前一步，假如有人想吓我们，我们也不会被人吓得后退一步。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我们有我们的尺度，无论我们所处的局势如何混乱震荡，我们必能撑住我们的舵，不使其在犹豫或张皇中失去其方向。

我们认为我们在第三卷中所遇的风浪是一个极寻常的风浪；大的风浪也许还在后面。我们在此感谢一切在此次风浪中，无论是出面的或不出面的前辈和朋友，他们的支持使本刊终得解危。我们同时感谢一切关切本刊的读者，他们的热心和同情增加我们努力的勇气！一切帮助本刊的朋友们，我愿我们的努力不致辜负你们的期待

（原刊“观察”第三卷第廿四期）

五、政府利刃 指向“观察”

南京新民报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以后，连日南京的政界、文化界、新闻界又盛传本刊将继新民报之后，遭受停刊处分。我们业已在多方面证实此项传说。听说当局最初曾想一口气“解决”几个在他们认为眼中之钉的报纸、杂志、和通信社。其后因为新民报的查封令发表以后，各方反应不佳，所以第二个查封本刊的命令迟迟未下。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本刊命运，存亡难卜；我们愿在尚未接奉停刊命令以前，对政府公开说几句话。

一、政府现在自称“行宪”，并在“行宪”以前，大吹大擂，说得一般人心痒痒地，好像从此中国，就要换个局面。其实，上海人一句话，大舞台对面“天晓得”！我们希望政府当局，抚心自问，你们行的到底是什么“宪”！人身之无保障如故，集会结社之不自由如故，而言论之遭受摧残，只有变本加利。即以本刊而论，虽然截至今日，仍在出版，但在各地所受迫害，可说一言难尽。或者禁售，或者检扣；经销“观察”的，受到威胁；阅读“观察”的，已成忌讳；甚至连本社出版的“观察丛书”也已成为禁书，若干地方的邮检当局，一律加以扣留。读者申诉，日必数起，谅解我们的，把政府

痛骂一阵，不明实情的，责怪我们何以款到而书不寄；每读来函，如坐针毡。此种情形，不仅“观察”一家，其他同业，亦有同样经验。我们创办刊物，献身言论，其目的无非想对国家有所贡献。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其组织既极繁杂，其活动尤极错综，全赖所有分子，群策群力，各在岗位，有所建树；分而言之，各尽一己之献，合而言之，充实国家之命。政府虽是治理国家事务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关，但是政府并不就是国家；政府官吏，受民之托，出而掌政，但是政府官吏并非国家祸福最后主宰之人。我们不仅认为执政人物，假如他们政策错误或不尽职责，可以令之去职，同时，对于过问国事，我们坚决认为，这既是我们的权利，亦复为我们的义务。在朝执政和在野论政，其运用的形式虽异，其对国家的贡献则一。所以欧美民主国家，在国会里无不有与政府相对的反对党，在一般社会上，亦无不有健全的公共舆论；如无反对党派和反对意见，亦即不成其为民主政治。所以英国反对党的官衔是“英皇陛下的反对党”，而英儒戴雪复称公共舆论为政治的主权者；凡此皆为欧美宪政的精义所在。今兹政府既称行宪，不可昧于此义。若以为今日之事，可以由一二人主宰之，未免昧于事理；而欲禁止人民议政，务使一切民间报章杂志归於消减，尤可谓糊涂太甚。抑有进者，批评政府与不忠国家绝为二事。“出版法”上有一条，谓不得有“意图颠覆政府或危害中华民国”的记载，这种限制，可谓滑天下之大稽。所谓“颠覆政府”者，亦即叫旧有的政府下台，让新的政府上台之谓也。以言英国，邱吉尔执政时，工党固无时无刻不处心积虑以求邱吉尔政府之颠覆，现在工党上台，保守党人又肆意攻击，以求工党政府之垮台，然昔日之艾德礼

无罪也，今日之邱吉尔亦无罪也。再观美国，杜威华莱士不正扯起堂堂之旗帜，以求杜鲁门之垮台乎，未闻有美人杜威华莱士於颠覆政府之罪者。就说中国，数月以前为“国民政府”，现在则称为中华民国政府，此岂非旧的“国民政府”已被颠覆，新的中华民国政府已告成立之谓乎？此“国民政府”既被颠覆矣，然则亦有人蒙颠覆“国民政府”之罪名乎？说来说去，实在说不通。但是我们的政府，一看见有人批评它，便脸红耳赤，度量既小，疑心又重，总以为人家要“颠覆”它；殊不知政府人物固无不可替换者，政府制度尤无不可更改者。拆穿了讲，毫无稀奇可言。只有那些占了毛坑不拉屎的人，才怕人家把他拖下来，於是今天想封这家报馆，明天想封那个刊物，说到头来，还是为了自己的私权，不是为了国家的福利。但是既要行宪，就得把国家放在第一，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发言论政的权利，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办报办刊物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人民这种权利。我们反对政府一切摧残舆论的行为和任何摧残舆论的意图，我们希望政府认真检讨自己的作风，封报馆封刊物的作风，是万万要不得的。

二、现在大家不满意政府是事实，然而政府应当平心静气的想想，你们过去所作所为，对于国计民生，有何改善？今日所作所为，对于当前局势，又有什么补救！今日一般国民，想到国家前途的暗淡，目睹一般子民的流离，无不悲从中来，欲哭无泪！在这种情形之下，要叫大家不讲话，不出悲愤之言，这是做得到的事吗？在政府里供职的朋友，或者接近政府的朋友，平时一开口就希望我们多作建设性的建议，其动机固不能谓不善，但是请问，今日的时代是一个建设性的时

代吗？今日政府又是一个建设性的政府吗？请问今日政府自身，又在做些什么建设性的工作？假如政府完全在做破坏性的工作，我们发为建设性的言论，政府能采纳吗？又能实行吗？我们一贯的态度是希望结束内战，这难道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能采纳我们这个建议吗？今日普天之下，皆无饭吃之民，无衣穿之民，无屋住之民，我们现在建议，请政府给无饭吃的人以饭吃，无衣穿的人以衣穿，无屋住的人以屋住，这不是又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能采纳之而一一见之于行吗？再退一万步说，就说本刊三卷十三期所刊陈之迈先生所作“中国行政改革的新方向”一文，此文曾引起国内外读者广泛的重视，并誉为一极有建设性的文字，然而该文发表以来，已八个月矣，政府果会采纳实行吗？政府果能励精图治，做几件福国利民的事，则又何怪乎民间舆论之抨击；假如政府百事不为，只管自私，则又何能以一手而堵塞天下之怨诟！今日大局日非，政权浮动，政府欲加紧其政治控制，取缔一切不利于政府的言论，就其自私之立场言之，固未尝不近情近理，但就解决国家之困难而言，固南辕北辙，无补实益。假如政府害怕一般社会的动乱因而影响其政权，则政府以有效方法，以苏民困，民困得苏，社会之动乱自平，此与封不封报纸杂志，风马牛毫不相关。重庆抢米，是出于报纸杂志煽动的结果吗？宁波抢米，又是出于报纸杂志煽动的结果吗？老实一句话，今日造成社会普遍不安的就是政府；政府自身在制造社会的不安，而反将其责任嫁移到我们言论界身上，可谓不平之至。我们不相信封了一个新民报，再封一个“观察”，社会即能趋于安定。文汇报被封，业已一年，社会秩序又何当因文汇报被

封而稍改善。我们在此忠告政府，你们要挽回你们的颓局，就得全盘检讨，痛改前非，人民受你们的迫害，已经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程度，假如你们以为封几个报纸刊物就能挽回你们的颓局，那就大错特错了！

最后，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吧，不封也吧，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原刊“观察”第四卷二十期）

六、吃重 苦斗 尽心 ——“观察”第四卷报告书

我们在一种既无幻想、亦不泄气的情境下宣布：“观察”第四卷业已出齐。本社社例，每卷出完后，休刊两周，以为同人整理之需。本刊第五卷第一期定八月二十八日出版。

这半年是一个苦痛的半年。物价的高压，带有政治意味的中伤，以及当前政治环境的险恶，无不使我们在这半年中，身心交瘁，困惫不堪。然而我们在无比的忍耐和沉毅中，终于又苦斗了半年。照大势看，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能写“观察”第五卷的卷终报告书，但是我们愿意向读者保证：只要本刊存在一天，我们必定努力一天。

开 支

我们仍旧先从业务方面说起。我们在第三卷报告书中，已经盛言物价波动和币值贬落的情形，可是在第四卷中所遭遇的困难，还较第三卷为甚。在第三卷的六个月中，支出方面，排印工及订工仅上涨百分之三百，稿费上涨百分之三百，员工薪金增加百分之七百，占支出中最大比例的纸，亦仅涨百分之七百，收入方面，售价上涨率为百分之三百三十。在第四卷中，情形大大不同，在第四卷的六个月中，各种支出，增

加的比例，要较第三卷的六个月中所增加的比例，大上六七倍。现将各项数字列表於下：

种 类	四卷一期时	四卷二十四期时	上涨百分比 (约数)
纸 (每令)	2, 500, 000	41, 000, 000	1600%
五号字排工 (千字)	200, 000	4, 500, 000	2200%
六号字排工 (千字)	230, 000	5, 300, 000	2300%
印工 (每令)	420, 000	9, 500, 000	2200%
纸型 (每面)	75, 000	1, 700, 000	2300%
订工 (每本)	308 元	8000 元	2600%
稿费 (千字)	200, 000	4, 000, 000	2000%
员工薪津	五千余万(二月份)	1,400,000,000 (七月份)	2800%

上列开支，排印工及订工的价格，在六个月内一律上涨百分之二千二百以上。(即二十二倍)。纸的上涨虽然仅达百分之一千六百(十六倍)，但由於发行数的上升，纸在整个成本里所占的比率，愈来愈高，日前纸在每期全部成本中，已占到百分之六十五左右，所以纸价的上跳，我们感受的压迫极大。稿费的调整，上涨率为百分这二千(二十倍)。员工薪金的增长，一方面包括待遇的调整，一方面也包括人员的增

加：业务既繁，人手势须比例增添，所以薪工总开支也跟着增加。至於其他杂项开支，如水、电、电话、煤气、房金、文具、车费等，上涨的百分比也很大。全部开支合拢来算，在这半年之中，增加的百分比平均当在百分之二千倍以上。

销 路

本刊的售价，四卷一期是一万五千元，二十四期是二十万元，上涨的百分比是百分之一千三百强。本刊是一个民营刊物，平时全赖业务收入。但是开支在半年中上涨二十倍，而售价仅上涨十三倍，这个差额，就靠由於发行数急剧上升所增加的利润来弥补。本刊的发行数，第一卷平均为八千份，第二卷一万六千份，第三卷二万四千份，照过去三卷的比例，第四卷的理想发行数应为三万二千份。但是刊物的发行数越大，它的上升的可能比率越小，加之售价一再调整，所以我们从来就不敢希冀第四卷的发行数能够超过三万份。当四卷一期印二万四千份时，我们心中，以为假如在第四卷中，万一能够销到三万份，那就是很好的了。但是在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形下，本刊的发行数急剧上升，终於造成五万份的纪录。但是至少在编者自己，對於这种销数急剧增加的情形是没有什么兴奋的；相反地，销路的急剧上升，只有增加我们的不安。我们平时一向愿意“向最好的目标去努力，向最坏的结果去着想。我们愿意事业循序发展，不愿意一步跨得太快。至少上海的许多书报业同业可以证明，我们曾一再要求他们减少批数，因为我们并不愿意销路跳得这样快。无论是个人，或者是事业，我们应当求根基的牢固，不应当仅求表面的膨胀。

爬得快的人跌得也快，膨胀得快的事业垮得也快。也许编者这种性格太“保守”了，但是对于一个务实重行的人，过分意外的膨胀，确不是他心理上所能骤然接受的。同时，销路的增加，编者发稿的斤量越重，他深感每一篇文章，每一句句子，发到印刷所去，无形中负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摆在编者面前的情形，常常使他深夜自省：他已经不适宜做这样一个五万份刊物的主编，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已经跟不上刊物的发展了。他常常在脑子里思索，有没有什么适当的人可以来主持这个刊物，他愿意做一个助手。这绝不是夸大的谦虚，编者的确常为此惭愧，他觉得他已力竭智拙，有些对不住这个刊物。

从另外一点来说，一般朋友都认为这个刊物确已打进了社会。本刊的主要读者约可分为三类：即青年学生（包括教育界人士）、公务员（包括军人）以及工商界人士；除这向来有的三种主要读者以外，这个刊物的影响已向多方面的放射出去。政府高级官员阅读本刊，足以增加本刊的身价；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讲到后来，本刊究竟是一个政治性的刊物，本刊应当打进他们的阅读生活。军人方面看本刊的也越来越多，多到几乎要在本刊原有的三大类主要读者以外，成为另外独立的一类了。广大职业群众，这些群众平时甚至可说没有任何阅读习惯的，现亦接受本刊的影响。湖北沙市的一个香烟摊贩曾有读者投书寄来（未刊），台湾一个农夫，受了当地党政人员的压迫，也有投书寄来（未刊），南京一个印刷所排字工人也有文章寄来（刊四卷十九期），我们在上海亲自知道的，确有许多平时根本没有阅读习惯的群众，现在也要每星期买一本“观察”看看。去夏清华、北大、南开三

校招生，公民试题有“试评日常所阅读的日报及刊物”一题，绝大百分比的投考中学生都阅读“观察”。我们两年来夜以继日的努力，总算收到了一点小小的效果，但是树高招风，影响越大，招的忌讳也就越大，这也是无可避免的。

回到发行数上说，目前虽然销到五万份，但是由於航空邮资的一涨再涨，以及售价的期期提高，我们相信第五卷的本刊（假如不被查封的话），发行数是一定要下降的。在我们自己，我们希望回跌到三万份左右，假如我们能够稳定在三万份左右，我们就已经很满意的了。究竟如何，且看事实。现在将这半年来本刊各期印数及第四卷发行曲线表附刊如下：
(略)

定 户

在第四卷中，定户也增加得很多。我们过去十分希望我们能实实在在有六千个甚或八千个定户，但是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定户和我们所希望的数目相差很多。第一卷中的实际定户约为一千六百名，第二卷约为二千五百名，第三卷约为三千三百名。我们在第三卷卷终征求定户的目标是八千名，由於许多读者的热烈支持，这个目标终得在第四卷中实现。在没有举办半价定户以前，定户数已接近七千五百名，半价定户举办后，定户的名额骤然增加了一千五百多定户，达到了九千名左右的纪录。在整个的发行数目中，定户数目在全部发行数中所占的比率，大体上亦甚稳定，兹列表如下：

卷数	定单号码	定单数目	实际定户	发行数	定户数在发行数中的百分比
一卷	1—2709	2709	1600左右	8000份	20%
二卷	2708 — 7682	4973	2500左右	16000份	15.1%
三卷	7683 — 14414	6732	3300左右	24000份	14.7%
四卷	14415 — 28946	16086	9000左右	50000份	16%
半价本	1—1554				

關於定户部分，这半年中最大的两件事情，一件是停收六个月的定户，一件是举办半价定户。停收六个月的定户，完全是因为物价波动得太厉害，为保障本刊的健康，不得不如此。举例言之，当四卷一期未出时，预定六个月仅收二十万元，但现在一期就要售二十万元，读者可以想见，假如我们再继续接受六个月的定户，则本刊不知要赔累到什么地步，实际上，照最近物价这个样子的波动，我们连预定三个月都有些踌躇，不过为顾到读者的方便，不好意思再将三个月一定改为二个月一定罢了。（最近日报已决定半个月一定，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足见物价压力之深。）不过自四卷十八期起，我们已将过去（十二期收十期的钱）改为（十二期收十二期的钱），藉以略略弥补由於物价波动太烈而致蒙受的损失。凡此都是很不得已的，只好请定户原谅。

我们久想为清寒读者有一点服务，所以决计在福利金项

下拨一部分款子出来举办“半价定户”。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半价定户自四卷十三期起举办。我们原定名额一千名，但事实上，超过了预定名额百分之五十，共计一千五百余名。“半价定户”，我们的本意是为清寒读者所设的，我们并希望以三分之一给予清寒的学生，三分之一给予清寒的公务员（包括军人在内），另以三分之一给后方小城市中的读者。但事实上很难作硬性的分配，而且，这一千五百名的半价定户中，是否个个都是“清寒”的读者，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到证实，所以我们只好在增设半价定户的启事中，最后一条提出良心的呼唤，希望“如非经济极端困难者，幸勿占取“半价定户”名额，以免剥夺真正经济困难的读者的权利。”但是“良心呼唤”在这个年头，倒底有多少效果，实可怀疑。譬如上海一些商业公司里的职员，也来定“半价本”，照普通情形来说，以上海生活程度之高，又在商界供职，论理可以订阅普通本，不必订阅半价本。又如同济大学有一个寝室里到有四个人来订阅四份“半价本”。照我们的意见，假如他们经济宽裕，便应各定普通本，假如经济困难，便应四人合定一份半价本。但是现在社会上，有便宜货便大家拓，既不尊重举办人的愿意，也不顾到是否剥夺了他人的权利。这种情形都使我们伤心。此外，定阅“半价本”的，上海因为近水楼台，容易捷脚先登，所以这次的半价定户中，上海及上海附近的读者，占绝大多数。真正后方偏僻角落里的读者，能享受“半价本”权利的，反而寥寥。我们心为不平。我们现在决定，自第五卷起，仍旧继续举办“半价定户”一千五百名（额满截止，不通融）。但为保障真正清寒读者的权利起见，过去那种自由写信来定，没有一点限制的办法，势须修正。我们现在业已印就一种表

格，凡是清寒的读者，希望享受“半价定户”的权利。这个新办法当然增加我们自己很多的麻烦，并亦增加我们的开支（如表格，复信，审查的人工等），但我们举办“半价定户”的目标既在使真正清寒的读者得到阅读的权利，所以我们亦不避麻烦，务使订阅半价本的读者，都是真正清寒的读者，同时使我们为真正清寒读者服务的初衷，亦得贯彻。

观察丛书

“观察丛书”虽不属於观察周刊的范围，但“观察丛书”和观察周刊是配搭平行的，成为本社目前两大主要业务，并为一般读者共同关切，所以在此略作报告。我们出版丛书有几个动机：（一）周刊只能刊载短文，并且大都是有时间性的，所以我们另出丛书，以便容纳较有系统，字数亦较长的著作。（二）有许多作者，有著作物出版，而找不到比较合适的出版人。所谓合适的出版人，包括水准严谨，出书迅速，印校认真，版税正确等等条件。由於我们过去一年多来和各方作家的合作，他们对我们业已建树良好的友谊和充分的信任，所以我们愿意来担当这个任务，为许多作者服务。（三）现在一般出版界都很消沉，大家都很少出书，观察周刊略有赢余，我们的目的既然不在谋利，愿意以周刊的赢余来帮助丛书的出版，使读者增加一些精神食粮，并为消沉的出版界增加一点生气。

观察丛书已出九种，大体说来，各方对于我们的努力，批评良好。各位作者对于我们的出书迅速，印校认真，以及版税的迅速，一致表示满意；读者的反应可於各书预约之多及

销行之畅见之。吴恩裕先生的“唯物史观精义”在十天之内销完初版三千册，现已出到四版。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载誉一时，现已出到四版。张东荪先生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一个月以内销完初再两版五千册，现已三版。其余各书大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再版。这些情形在目前的不景气的出版界中，都算是不多见的。

不过，“观察丛书”也不是没有缺点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新写的太少，大部分都是集子。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困难，由於环境的动荡和生活的不安，已很少人能够好好地坐下来写整部头的新书了，这也是一时之间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过我们以后当尽力设法增加新写的数量。

此外，还有几件事要一提的：（一）通常出版人所签订的出版契约，都是由出版人一方面拟就即好的，开列了几十条，把保护出版人的利益的地方，想得周周到到，而著作人只有在印好的契约上签字盖章，毫无发言的余地，甚至契约签了，书隔了两年三年不出版，著作人也毫无办法。我们认为这种情形是不合理的。出版一本书，乃是著作人和出版人的一种合作，对於契约，应当双方都有发言机会，所以我们这次的契约，是由我们先起了草，寄张东荪、潘光旦、朱自清、费孝通四位先生，请他们发表意见，（就请他们四位代表后来的作者），然后才缮写签字的。（二）我们的版税最初规定是一年结算四次的，於三、六、九，十二四个月月底结算之。第一批六册是四月五月出版的，第二批是七月八月出版的。在通常情形下，第一批六册的第一次版税一定是在六月底付的，第二批四册的第一次版税是在九月底付的，但第一批六册的版税，我们在三月底就付了，第二批四册在七月里就付了，原

因是因为各书发行预约，预约收入中的百分之十五应归作者所有的，出版人不应搁下不发。在目下物价的情形下，假如应当三月底付的款子搁到六月底再发，那作者真是损失太大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信用及公道的问题，我们办事或做人，都应当 Fair。（三）不仅如此，关于版税的结算，我们鉴于六七两个月中物价上跳的情形，认为三个月一结还是太慢，作者吃的亏还得太大，因之，在七月底我们又进一步的，又一次为中国出版界创一个新的纪录，决定自八月份起，“观察丛书”的版税每月结算一次。我们希望我们这种努力能够对于中国的出版界有一点影响。（四）“观察丛书”出版后，我们收到许多书评，投寄观察周刊。但我们为避免嫌疑起见，我们已订下一个原则：观察周刊不刊观察社出版的任何书籍的书评。以上数事，都与整个出版界的风气有关，所以我们愿意提出报告。

最后，观察丛书是赔本的，即使销路如此好，也还是赔的。（因为纸价跳得太快了）。但是在业务上虽然是赔的，在精神上却是有收获的。关于丛书的出版，我们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计划，只是照目前的物价情形，我们简直不敢再在此地有所报告，举例言之，我们出版何永信先生的这本“中国在戡盘上”，成本要用到二十五亿以上！事情真不好办！真是太难办了！

业务上的苦痛

业务上的苦痛，一言难尽，现在择要分述如下：

1. 照编者两年来的经验，纯粹就业务的观点说，上海出

版事业最大的致命伤就是本地同业的结账办法。上海本地的习惯，是先将刊物或书拿去，隔若干时候再结账付款，在半年以前，我们要在出版以后一个，甚至一个多月才收到钱。假如物价不跳，出入还小，现在物价波动得这样厉害，这种结账办法，就变成了我们的生存威胁了。举例言之，今年阴历年关一过，纸价陡然的从一百七八十万（一令）跳到五百万一令，在短短半个月中上涨三倍；六月里，纸价又在短短半个月中，从六百万跳到近二千万；七月初，又接连从二千万跳到四千万。物价这样一日三涨，要在十几天后才收到货款，在收到货款时，一块钱只值半块钱甚至只值三角钱了，所以在二月及六月的两次纸价大涨风中，本刊亏折很多。有一次大公报举办出版事业座谈会，文摘社的贾开基先生说：现在销路越大的刊物其危机越大，碰上涨风，赔得越多。这是内行的话，一点不假。在读者方面，他们都是按照刊物定价实付的，在我们的账面上，也是有利润的，但是实际上则赔了本，就因为在十几天后才能收到货款，那时物价已涨了很多，收到的钱甚至补不进原来用去纸张，以致不能维持再生产的程度。假如一直这样下去，刊物迟早要弄到关门的。所以这半年来，我们在这方面费尽口舌，力求改善。上海同业事实上也有他们的困难，我们也十分了解，所以我们愿意和他们一步一步改善，我们总期我们能够维持再生产的最低要求，因为假如这个最低要求不能达到，出版事业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2. 这半年来业务上第二件最伤脑筋的事情，就是有许多地方的定户，收不到刊物。最大的原因就是有许多地方已有出面或不出面的邮政检查制度，经常的或间或的检扣本刊。这

种现象很普遍，其中以潘阳、天津、青岛、西安等地情形最严重。这些地方的定户纷纷来函责难，并要求补寄，但补寄的事实上仍旧不能收到。弄到后来在我们方面是复不胜数，补不胜补，在定户方面是责难四起，一片怨声。我们真是苦痛极了。除了“邮检”的原因以外，也有由於中途遗失或者被人误取，因而使定户不能收到本刊的。在读者方面，他们的观点很单纯，认为凡是收不到刊物，好像责任就得由我们来负。又有些地方，竟会两期同日收到，甚至先收到下一期，后收到上一期的，在这种情形下，读者总疑心是我们没有准期出版。在九千份的定户管理中，我们也不敢说我们绝无错误或疏忽，假如真是由於我们的错误或疏忽，我们应该向定户道歉，并力求改善，但是假如把一切收不到，或者不能按合理的时间收到的责任都归之於本社，那是冤枉的。从本社发出到到达定户手里，其中要经过许多路程和阶段，在这些路程和阶段中所发生的意外，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我们这样解释，目的非在推诿责任，我们仅仅希望定户能够了解事实并给予我们体谅。至於我们有错误或疏忽的地方，我们自当随时改正。

3. 定户的来信始终成为本社工作同人最大的负担。来信的内容很杂，最主要的两类就是查失索补和更改地址。刊物遗失的责任不完全在我们一方面，前已言之，但是除了像沈阳、天津、青岛、西安那种大批邮扣，无法补寄以外，其余零星的索补函件，我们大都体谅定户，设法补寄。不过我们愿意在此说明，关于补刊这个问题，我们是非常苦恼的。不补吧，定户自然不满，而且他们残缺一期，定觉遗憾，补吧，不仅是刊物本身的成本，还要包括信袋和邮资，我们的损失

是很重的。这个问题真是无法两全。

至於更改地址，我们当然应该照办。不过我们也要解释几句：一、我们每收到一个定户，就要给他一张定单，同时根据定单用蜡纸写成签条，然后油印。所以定户更改地址，我们必须重行写印，所需的人工、蜡纸、油墨、纸张，这笔额外的负担不轻。二、我们每次寄刊，虽於星期五付邮，但是由於定户太多，剪贴标签的工作，在星期一，甚至在上星期六，即须开始，标签剪下以后，即按平寄、挂号、航平、航挂四种分类，分类以后，要在几千个分散的标签中寻觅一个，就不容易了。所以，举例言之，即使在星期三收到一个定户的来信，要求更改地址，在这个定户自己，以为本星期六的一期必可照新地址改寄，而事实上，我们常要到下星期出版的一期，才能照改。定户不知实际困难，每多来函责难。三、有些定户，在定阅三个月中，要更改地址二次甚或三次的，我们虽然应当照办，但是对於我们确是一重负担。（譬如在上个月（七月），由於学校放假了，平均每天都有二十个至三十个定户来函更改地址）四、目下交通情形并不正常，刊物的改寄和定户本人的移动，有时不免要脱节，这种种情形也只好请定户忍耐原谅，不要一味的责怪我们。

4. “覆信问题”是最难使读者满意的一个问题。许多读者为了此事对本社表示不满，或者因为我们搁而不覆，或者因为我们覆得太迟。我们愿意说明几点：一、我们承认我们过去的覆信工作没有做好。编者自己是最恨有信不覆的，所以平时一再叮嘱本社同人：读者来函，务必答覆。工作同人当然有他们实际上的困难，如来信太多，来不及覆等。但是事实上有困难，应当设法解决困难，这是本社内务的问题，我

们不能因为内部的困难就将读者的来信搁置不覆，（实在没有覆的必要的信可以不复）因为假如覆信工作做得不好，则无形中就等於在破坏本社的信誉，减低读者对於本社的信任，并抵消本社全体同人在其他方面的努力。所以我们从第五卷起，决定将覆信工作，另派专人负责，以免延误。二、来信的太多，其中一部分责任仍应由我们负责，因为假如我们能改进我们的工作效率，如减少错误，避免疏忽，覆信迅速等等，则亦可减少来信的数目，所以我们仍应在根本寻觅原因，以期减少来信的数量。（因为大部分的来信都是查询或质问的）。三、我们虽然尽我们的本份，力求改进，但同时也希望读者和我们合作，有许多信件可以不写的，最好不写，俾可节省双方的时间，现举两例说明：芜湖安徽学院有一位朱建纲先生，三月二十四日来函查询四卷四期为何没有收到（他是挂号的）。查四卷四期是三月二十日出版的，在目前的环境下，上海到芜湖的邮件，偶而不能在四天之内到达，也是一件很可能的事情（挂号本比平寄慢），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希望定户稍为等待一下，勿经函查询。（像这种信件，我们认为是不可以不复的）。又如，广州中山大学有一位定户，是新定户，当他看到广州市上已有“观察”，出售，而他的一期尚未收到，便来信质问，实则广州市上出售的是航空寄去的，而他的一份是注明要挂号寄的，挂号的当然比航寄的慢。像这类自己没有弄清楚而即来信责难的，例子很多。至於因不注明定单或字迹潦草到无法认清，以致我们无法查或无法复的信件，为数尤多，凡此我们都希望定户体谅，能自行注意，俾间接增加我们的办事效率。四、我们虽然对於覆信问题，力求改进，但我们也愿让读者知道，我们复一封复信，成本也是相当大

的，平均言之，复一封信至少要化成本十五万元左右。假如以七月份为标准，一个职员月薪是一亿，则每天的薪金是三百三十万，一天平均覆四十封信（因为不仅覆，还要查，）则每封信的人工成本就要八万元，再加上信封、信纸、邮资、及收发人工，当在十五万元以上。这样的负担也不算轻了！

最后我们自己也知道，在最近三四个月中，我们得罪了不少读者，这是我们极其苦痛，而又无法可想的。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物价的过度的波动，几乎使我们无法维持正常的营业，特别是购买五册的，给他买四册，本购四册的，给他买三册，购买者虽然扫兴，但总算有一交代，最困难的是只购一册的，於是只好去函请其补款，可是购者并不立刻将款补来，搁上十天半月才补，补到时，书价又涨了！像这样的情形，真是伤透脑筋。定户也是如此，由於物价变动太剧，本社登记定户，计算刊费，均照款到时订费为准，但由於订价变动太快，以致定户来款，常常不足，只好酌扣寄刊，读者每不了解，表示不满。

编辑检讨

关于编辑部分，这半年也是苦痛之至。先说专论。按理说，本刊是一个政论刊物，重心应当在专论部分。可是事实上呢，本刊的重心现在已移到“观察通信”上面去了。读者来信或朋友见面，都盛称观察通信的精彩，但是我们读了这种信，听到这种话，内心暗自惭愧。当然，我也愿意很公平地说：专论不像“观察通信”那样容易“讨好”读者，因为通信是雅俗共赏的，专论是硬性的，高级的，不容易使个个

读者接受的。不过，本刊专论的不够充实，也是事实。一个原因是好文章本不易多得，另一个原因是现在大家对于写政论文章，已经没有什么兴趣。编者在四卷二十期“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所说，现在大家都十分消沉，没有兴趣批评政府，这话确是：实际情形。象我们这些办刊物的人，因为职责所在，不能不写，但是一般而论，现在许多人对于当前的局面，都觉得没有什么话说。张东荪先生最近在“增产与革命”一文中开头有几句话，很可代表这一种趋向。张先生认为“时局严重已超过了说话的阶段”，而“向现实的当局说话”，则“自政协被破坏以后久已不做此想”。这一种也多少影响到稿件的来源。编者自然应当尽心尽力，广征佳稿，但是有无成就，不敢先说。

第四卷中比较满意的仍推“观察通信”一栏。编者在第三卷报告书中说：“我们希望第四卷在通信方面仍能保持第三卷的标准”。大体说来，这点算是做到的。观察通信中最出色的当然是军事通信，也就是这些军事通信，使政府一再对“观察”表示不满，而企图加以封闭。据在政府供职的人说，为什么“观察”的军事通信写得那样好，又详细，又正确？他们说，假如“观察”的军事通信写得不那样正确，政府倒可以不必那样怀疑了！这个逻辑似乎是：政府认为一般社会上的人都是饭桶，只有共产党不是饭桶，所以“观察”的军事通信因为写得太好了，就不免要疑心到共产党一方面去了。其实真是天晓得！过去“观察”有几期军事通信对傅作义稍有颂扬时，左派的记者（时代日报）还公开的不负责任的说，说“观察”是傅作义的宣传机关呢。此话真是从何说起！

除“观察通信”外，第四卷中的“国外通信”和“外论

选译”两栏，还算正常。国外通信在二十四期中登了十六篇，平均每三期中有两篇。“外论选译”在二十四期中登了十三篇，平均每二期中有一篇。我们希望第五卷中也能保持这个状态。

一般读者对于“书评”栏的兴趣都不高，本卷二十四期中只登了六篇。

由于物价的高压，自四卷十九期起，篇幅减少，仅出十六面。减少篇幅的目的是为了不愿增加读者的负担，但是在编辑上，对此苦痛不堪，因为篇幅减少了，容纳的字数比例减少，文章不能多登，无形中使读者容易发生内容不够充实的感觉。有许多读者来信表示反对，愿意多负担售价，不愿我们减少篇幅。但是来信的读者大都是江浙一带的读者，不知后方的读者对于这个问题意见如何？第五卷起，究竟恢复二十面或仍出十六面，我们希望读者表示意见，以供我们参考。

关于投稿录用篇数在全卷所刊文章中所占的百分比，大体上和第三卷差不多。我们愿意在此说明，“观察”的篇幅是绝对公开的，我们十分希望这个刊物能够真正成为全国读者所共有的刊物。我们不希望一个刊物仅仅只有少数的作者在写稿，而且为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公共舆论，也必须有广大的群众大家来参加，才能增加其力量，因之我们经常盼望有新的作者来参加这个写作的阵营。我们对于投稿，认真阅读，取舍绝无偏私，只要合乎水准的有重量的文章，我们无不乐于刊载。我们希望各地作者读者踊跃惠稿，共同来充实本刊的内容，第四卷中投稿录用数在全卷所刊文章中的百分比，现在统计如下：

栏 别	第三卷所刊 文章篇数	投稿录 用篇数	百分比 (约数)
专 论	62	18	30%
观察通信	76	29	40%
其他各栏	90	41	45%
共 计	238	88	40%

流言与警告

在政治上，这半年来我们始终蒙受不利的打击；大别言之，可分两类。一类是飘浮在空中的无根的流言，一类是当局对于本刊的警告，甚至有查封本刊的意图。先说谣言部份。谣言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笼统的怀疑我们和当局有什么“勾结”，一类则简直很具体的传说本刊已出卖给什么人什么人了。怀疑我们和政府有“勾结”的人的理由是：假如“观察”和政府当局没有“勾结”，为什么“观察”会出版到现在？特别是四月八日大公报登了“时与文”和“世界知识”被政府警告以后，这种怀疑格外普遍。因为“观察”不仅没有“问题”，甚至警告也没有，其中必有“花样”。其后我们又听到更为具体的谣言，谣言竟然肯定地说，说“观察”已经出卖给CC了。凡是一种谣言，向例当事人是不大容易听到，或者听到时也已是谣传很久了，因为只有很好的朋友才愿意将这种谣言告诉当事人。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这种流言时，也只是淡然一笑，其后传说渐盛，有一位关切本刊的读者写了这样一封信来：

编者先生：最近好多人都纷纷地说“观察”月前会经与

CC 派谈判过出顶事宜，结果以 CC 只肯出价六十亿而未果。我倒不相信这些话，我只相信你的人格和脾气，但是，为了正如你所说过的“这社会是一个神经极度衰弱的社会”，而且人言可畏，我劝你不要太对这种已经散布得颇广的恶意流言不理不睬。最好你能在四卷十三期中拿一小角来辟谣。

一高中学生 五月十七日

PS 记着，一定要辟谣啊！

我们读后，对于这位“高中学生”当然是很感激的，但是冷静考虑后，我们仍旧不愿有所表示。其后又有朋友自南京来函，文云：

久不晤教，近况何似，念念。近日道路流言，于先生颇为不利，金言贵刊因已得官价配纸，态度渐趋转变。先生之情操亮节，弟所深知，然啧啧烦言，三人成虎，亦不免于惶惑矣。弟于此事，至为关切，盼能以详情见示，用释鄙怀，忝在知交，当不以为读也。

谣言是那一方面传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也无意知道假如是由配纸而起，则四月二十六日苏联方面在沪主办的“时代日报”的出版消息有下列一段记载：

“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日前赴京列席国大，已于昨日返沪。闻该刊自下月起，新增配纸一百八十令，共合三百令，故将在百物飞涨时维持旧价云。

编者曾在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四卷九期上写过一篇“国大评论”。编者为想评论国大，曾去南京，借了朋友的来宾证，到国大会场旁听一次。就是中共办的华商报，也常刊南京通讯，所以到南京去采访新闻，想来不致被视为和政府有何勾结。编者在“国大评论”文中曾述及我曾到国大会场旁听过

的话，故“时代日报”所刊编者赴京一节，仍系根据编者“国大评论”文而来。但在普通常识上，旁听与“列席”有很大的分别，“时代日报”称我为“列席”，究系笔误，还是另有意味，我弄不清楚。至于配纸，众所周知，都是每季一配，向无每月一配之事。这半年来，我们向书业公会提过好几次抗议，就是六月二十五日，我们还去了一封信，说我们在四、五、六三个月中用了一千一百令纸（周刊及丛书），而他们仍给我们三百元配额，只够卖六七十令，仅敷本社实际需要量的十六分之一。说到头来，自有配给制度以后，截止今日止，我们一共还只拿到一百三十令纸，（仅敷本刊半月之需）。假如“时代日报”该项记载，是一种恶意的中伤，那末我们承认，他们的确相当成功，因为文化界中到处都在传说，说“观察配纸增加了，态度转变了。”最妙的是，天津益世报的上海记者，把“时代日报”这个全无根据的消息，全文照抄，打了一个电报到天津。我们曾分别正式去函时代日报及天津益世报更正，除此之外，我们无意作任何辟谣的解释。我们还是一贯态度，如我们在第三卷报告书中所说的：“我们对于一切误会、传说、曲解，不急于辩护、辟谣、或解释。只要我们自己脚根站定，我们相信“时间”终将替我们洗刷一切谣言”。

关于政府方面对于本刊的种种，编者不十分详细，兹谨就所知者，报告如下。三月二十日，编者接上海市政府新闻处来函，邀去一谈，当在上海市府新闻处看到了内政部给“观察”的警告，罪状是“言论偏激，歪曲事实，为匪张目”。这个公文是我亲眼看到的，不过有一个谜始终不能解答，即这个公文我们始终没有收到。当四月八日大公报载“时与文”和“世界知识”受到警告时，我们心中还暗自疑心，以

为新闻登错了呢，因为内政部警告本刊的公文，是编者亲眼目睹的。不过我们后来也没有去查理此事。由于最近传说政府打算查封“观察”，我们才知道在二三月间，有人已想查封本刊，但内政部未将查封命发出，可能这就是那个警告令的来历。目前政府对于“观察”最伤脑筋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军事通信，据说在最近半年，政府中好几方面的高级会议，几次讨论到这个问题。政府把这个问题看得极其严重。我们的军事通信实际上也只是报导事实，但事实的发展，常与政府不利，所以政府认为我们这种暴露性文字，颇足影响士气。最近南京新民报被封，政府曾公布一篇罪状，据传“观察”也有同样的一张单子，把过去我们所刊的文字，一一开列。对于封不封的问题，编者已在“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表明态度，此处不赘。政府对于“观察”当然是讨厌的，也许从“军事通信”开刀，在技术上最为顺口。不过目前所有的刊物，大都刊有有关战局通信，假如因为刊载有关战局的通信而要查封，则恐怕将来所有的刊物，都只好被封大吉。我们不知政府对于这种情形，即每一个刊物都有战局通信这一情形，如何处理。至于本刊，这半年来，有人好几次劝我们不刊战事通信。我们的原则很简单：封或不封，那是政府的“权力”，但我们绝对不愿因为外来的意见而改变我们的编辑政策。我们的编辑政策是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我们在商标上标明 Nonparty 和 Independent 两字，Independent（独立）是我们的主要精神之一。而我们所以如此者，就因为我们认为：要维持完整的人格，必须保有独立的意志。这个原则是我们绝对不能放弃的。

原刊“观察”第四卷第廿三、四期)

储安平与“党天下”

戴 晴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储安平与“党天下”

戴晴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ISBN 7-80074-110-9/D·08

定 价：3.40 元

出版说明

“大右派”储安平，是个不知所终的神秘人物。在1957年震动全国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极右分子，从此埋名隐姓，经受劳动锻炼，过着孤寂生活。“文革”发生后，受到革命小将的千锤百炼，终因难以承受，悄然出亡，至今不知所终。著名女作家戴晴根据亲身采访，查阅有关文献，写成了一篇介绍其人其事的历史纪实作品，在1989年第一期《东方纪事》上发表，引起各方关注，誉为我国报告文学的新收获之一。现经作者根据新收集的资料，加以增订修改，送交本公司出版。

书中还辑集了储安平在解放前任《观察》杂志主编时所写的主要论文，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其人与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些情况。

储安平与“党天下”

戴 晴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印刷厂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20 千字 10.25 印张

版 次 198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198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74—110—9/D·08

定 价 3.40 元